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 社会行为的 影响

清

华

传

播

译

丛

一美二约书亚·梅罗维茨 著

肖志军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 社会行为的 影响

清华传播译丛

《新媒介与创新思维》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

《数字媒介：技术与应用》

《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

ISBN 7-302-05295-6



9 787302 052951 >

定价：35.00元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 社会行为的 影响

清

华

传

播

译

丛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 著

肖志军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为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的传播学教授。该书 1985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 年获美国广播者协会和广播教育协会的最佳电子媒介图书奖,以及语言传播协会的年度图书金奖,被译成日、法等多种文字出版。

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创造出了新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重新塑造行为的程度远远超越了它所传递的具体信息。本书着重研究了新的信息流动模式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作者继承了场景理论和媒介理论,提出了将面对面的交往研究与媒介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切入点:社会“场景”结构。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机制是:角色表演的社会舞台进行了重新组合,并由此带来了人们对“恰当行为”观念的改变。

全书内容丰富,文笔流畅。适合广大传播界的师生、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阅读。

中文书名: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原著书名: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Copyright © 1985 by Joshua Meyrowitz

First published in 1985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本书中文版专有出版权为清华大学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0-14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清华传播译丛/熊澄宇主编)

ISBN 7-302-05295-6

I. 消… II. ①梅… ②肖… III. 电子技术—传播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研究 IV. C91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8198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960 1/16 印张:23.5 字数:359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5295-6/G·251

印 数:0001~3000

定 价:35.00 元



清华传播译丛

主 编：熊澄宇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 鸿

张国良

明安香

胡正荣

胡苏薇

郭庆光

熊澄宇



“清华传播译丛”

序

传播学是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1997年正式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受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传播学素有“多学科的交叉路口”之称,构成其学术渊源的学科主要为行为科学群中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语言学、符号学和信息科学群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数学、统计学等。

自传播学诞生以来,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传播实践活动密不可分。随着计算机、有线电视、光纤传输、卫星直播、数字电影、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等新传播形态的不断出现,传播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为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推动文理交叉的相关学科发展,清华大学于1998年成立了传播系。在传播系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与不同国家从事传播学教学、科研和出版工作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接触了许多国外传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研究生教学中我们也有选择地部分使用了国外的原版教材。

考虑到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和社会需求,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愿望,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将选择一批国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国际通行的传播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大致包

括传播者研究、传播媒介研究、受众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过程研究、传播效果研究、传播制度研究、认识论方法论研究等八个方面。清华传播译丛的选题将主要围绕这八个方面展开。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媒体社会是继信息社会后的又一说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媒介与信息传播活动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性。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希望我们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推动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进程,也希望读者能对我们工作中的不足提出批评和建议,以帮助我们完善这样一种努力。

熊澄宇

2001年10月

原著前言

1963年11月24日,涉嫌刺杀肯尼迪总统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被杰克·鲁比(Jack Ruby)枪杀。无数的美国人看到了枪杀事件的电视直播。那些在电视上看到该事件的人们可能认为自己“亲眼目睹”了这场谋杀,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睹是“第一手的”。无论你是否完全赞同,电视上看到了就等同于“第一手”的经历,但是从整体上看,电视和电子媒介显然极大地改变了“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

长期以来,亲身参与是“第一手”经历的先决条件。例如,为了在办公室看到总统并听他讲话,你必须同他一起呆在办公室。假如你在报纸上读了他的演说,或者听了当时在场的其他人的叙述,那么你所看到或听到的信息至多是第二手的。现场播出的与有中介的传播从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媒介的演化降低了“亲身参与”对于经历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性。现在人们可以在不亲身参与的情况下就能观看社会表演;人们可以不必在同一个地方会面就能“直接”交流。物质结构曾经将我们的社会分隔成许多用于交流的空间环境,因此这些有形的空间结构大大地降低了其社会重要程度。例如,家中房屋的墙不再是将家庭同大的社区或社会完全隔离开的有效屏障。家中的房间是限制较小的独特环境,因为家庭成员可以通过收音机、电视或电话接触到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他们有这种

接触能力。

即使在家庭中,媒介也改变了个人房间的社会重要程度。以前,父母能够将孩子关到他们自己的房间,对他们进行管教,这是一种限制社会交往的手段。但是如今,假如孩子的房间通过电视、收音机、电话和电脑与外面的世界相连,这种行为就会有全新的含义。

临近的区域、建筑物和房间在身体上、感情上和精神上限制着人们,过去传统上一直如此。如今物质围成的空间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因为信息可以跨越围墙,到达遥远的地方。这样,一个人生活的地方与他的知识或经历越来越不相关。电子媒介改变了时间和空间对于社会交往的重要意义。当然,亲身参与和直接的感官接触仍然是最基本的经验形式。由高墙和大门所确定的社会空间只是交往环境的一个类型。如果安装有镜头、麦克风或电话,巨大的城堡的高墙也不能真正造就完全隔离的社会环境。

而且在我们国家中,电子媒介几乎出现在所有的有形环境中。每一户美国家庭几乎都至少拥有一部电话和一台电视。在这个国家,收音机的数量超过人口的数量。即使是犯人和靠福利救济的家庭也都认为电子媒介是生活必需品,而非奢侈品。每个家庭平均每周开电视的时间是50个小时。我们的总统们使用并排的几台电视,这样他们可以同时监视三大新闻网所有的广播。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在牢房里靠一台电视陪伴着度日。电脑正在进入所有的社会环境中,从儿童的卧室到公司董事会的办公室莫不如此。电子媒介以各种方式将地域和经历同化,并且已经成为连接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共同基础,不论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如何。

与监狱类似,女修道院、家中的房屋、临近地区、行政人员的套房、大学校园和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都充满了电子信息,我们对社会、当局和自己的认识肯定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的确切性质是什么呢?其中部分的问题是,仅仅描述电子媒介出现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合,就需进一步地询问,以前较为封闭的社会场合是怎样影响社会交往方式的呢?如果不能了解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如何影响到行为方式,我们就不会知道当这种限制消失或发生变化后所造成的后果。

为了研究社会传播新模式的影响,本书采用了“场景”方法来研究媒介和行为。社会学家很早就指出,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

会有不同的举止,会受到所在的地方和参加者的影响。这种方法暗含着这样的观点,在某个既定场景中的行为也会受到“他不在某个地方”和“某个人不在场”的影响。场景的方法本来是研究界限和限制的,然而大多数的社会学家认为某个社会的社会场景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场景通常是用有形的空间划分的,如地域、房间、建筑物等等。这里所提出的理论将静态场景的研究扩展到变化场景的研究,将有形场景的分析扩展到对媒介传播形成的社会环境的分析。

本书描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我们所看到的其他人的角色。这些角色越来越多地展示给新的观众,展示在“观众”不亲身参与的舞台,展示在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的“舞台”。本书研究了个体和群体为了适应这种新情况,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

这里所提出的场景分析描述了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密切的联系。已经证实,社会环境在群体身份、角色变化以及等级社会的地位中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这项研究描述了,当我们失去旧的“地点观念”后,如何获得恰当的社会行为观念和新的身份观念。本书认为行为环境的变化,是过去30年许多潮流、事件和运动的共同原因。书中分析的内容是新媒体所造成的新环境,或者称之为“信息系统”。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对社会的变化或我们当今社会的特征作出一个完整的解释,而是为了说明媒介的变化与当今社会的潮流有着莫大的因果关系,这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想像。本书更进一步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研究媒介影响和社会变革的新方法,不仅能研究现在,而且能研究过去和将来。

本书首先提出了媒介、场景和行为三者关系的一般原理,然后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研究了“印刷场景”转移到“电子场景”后潜在的影响。最后是三个个案研究,详细描述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成人和儿童以及政治英雄的观念的变化。第一章介绍了主要的论点和研究方法,最后一章归纳了理论,并探讨了它对未来的意义。附录部分讨论了主要的观点及其内在的联系。

本书适合于一般的读者、学者和某些专业的学生。不同的读者可能希望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读完第一章后,有的人可能就跳到个案研究的那一章,然后再阅读前面的各章,看看理论是怎样提出

的。虽然个案研究是在前面几章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我尽量使它们独立成章。考虑到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需求,我将脚注分成两大类,每一页下方的脚注为通常的评述、例子以及研究和调查的统计数据,这些对一般的读者都有兴趣。大量的学术性参考文献、证明和注释都放在书末的注解部分。

当电视在我家附近流行起来时,我的父母坚决拒绝“盲目”购买这个新“玩具”。父母的这种做法无意间使我开始思考本书所涉及到的问题。当我们买电视时,我们所认识的家庭几乎都有了电视,但是我的父母仍然坚持认为“它们还很不完善”(因为这个原因,我的父母至今还没有买彩电)。幸运的是,最后我们买了一台“柠檬”牌的大型落地电视,屏幕前面有门(可以看成是收音机),这样可以调整我父母的恐惧。电视机好的时间同坏的时间几乎一样多,我的父母从不急着去修理。

当我是孩子时,有时可以看电视,有时不能,这使我能敏锐地看出看电视和不看电视的孩子对世界的看法有何不同。虽然当时我没有多少思考,但是我认为电视好像是“秘密展示机”,它将我不知道的成人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对电视的初始反应既不是模仿我所看到的行为,也不是受到诱惑,想拥有众多的广告产品。我从电视上看到的社会交往的信息,影响到我是否愿意接受别人的行为和表面价值。电视使我和朋友有了某些方面的成人认识,不再允许父母随意采用传统的父母行为方式。它也影响了我对异性、老师、警察、政治家以及其他“权威”的看法。与大多数电视节目的内容一样愚弄人的是,电视对陌生人或地方的特写镜头式的展示,影响了我对所认识的人或遇到的人的社会行为的评价。电视改变了我家中墙的组成方式,限制了我的社会经验。

许多年后,当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对分析媒介和人际行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兴趣。我惊奇地发现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是完全孤立的。当然,人们观察了媒介如何影响真实的行为,真实的行为如何与媒介的内容相关。然而,未将两个传播系统截然分开,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模型几乎没有。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关注“人们模仿在电视上看到的行爲”,或者电视所展示的内容不是现实的确切反映,现实生活与媒介有冲突。很少有人将媒介和人际交往在同一“行为”系统中或“对他人行为响应”系统中进行研究。好像也无人研究社会行为信

息的新的获取模式在如何影响人们扮演旧时角色的能力。

正如第一章所说,我在大学中学到的一些理论框架提示,可能会“组合成”这样的一套理论。在奎因斯大学(Queens College)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我通过比较人际行为规则和电视产品规则之间结构上的共性,首次为媒介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1976年我开始研究本书中的更为宽泛的理论,并且于1978年在纽约大学我的博士论文演讲中提出了最早的雏形(1979年 Microfilm 大学)。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81年开始修改和扩充,终于成为本书。

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曾在其他地方以各种形式出现。第十四章的观点曾出现在1977年的“ET CETERS”,文章的题目是“中部地区政治的兴起”,以及1984年7月《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中的“影视眼中的政治:英雄都去了哪里?”。基于第十三章的会议论文“电视与童年的消失”被收录进1981年文化与传播国际会议的会议录选编第1卷“大众传播与技术研究”,它由萨里·托马斯(Sari Thomas)主编(ABLEX 1984)。从第十三章抽出的一篇文章发表在DAEDALUS 1984年夏季册,文章的题目是“成人化的儿童与儿童化的成人:电子时代的社会化”。该章内容的一篇短文“孩子们哪里去了?”发表在1982年8月的《新闻周刊》。

许多人为本研究作出了贡献,我想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最大的帮助来自于我的同事,他们对部分的甚至是全部的书稿进行了阅读,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简·阿尔伯荷恩(Jan Alberghene),拉里·巴伦(Larry Baron),比尔·比曼(Bill Beeman),约翰·凯利(John Kelly),汤姆·库奇曼(Tom Kochman),杰克·兰纳曼(Jack Lannmann),保罗·利文森(Paul Levinson),希拉·麦克纳米(Sheila McNamee),鲍勃·门内尔(Bob Mennel),埃德·瓦施特尔(Ed Wachtel)和马克·韦斯特(Mark West)都给予了极为有用的评论和建议。我同心理学家卡罗琳·麦伯特(Carolyn Mebert)的争论帮助完善了第十三章的观点。我也要特别感谢德维·利里(David Leary)对书稿的阅读和评论,这使我在“文字处理”时得心应手。他是一位热心的同事,在许多方面给了我大量的支持,不胜枚举。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苏珊·兰比尼尔(Susan Rabiner)编辑提出的建议很有独到之处,她对本职工作非常热心。乔安妮·霍兰兹

(Joanne Hollands), 拉斯·拉韦松(Russ Lawson)和托马斯·扎克(Thomas Zack)是我的研究助理,他们在搜集书籍和文章时比我更有耐心。新罕布什尔大学戴蒙德图书馆和它的馆际借阅办公室的员工对我们的各种要求都鼎力相助。我的三位学生,卡连·赖施(Karen Reisch)、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和塔德·阿克曼(Tad Ackman),他们批判性的文章和对许多有趣的参考文献的深入探索,丰富了这项研究。劳拉·李·伦纳德(Laura Lee Leonard),朗达·曼(Rhonda Mann),贝丝·奥热霍夫斯基(Beth Orzechowski)和罗斯玛丽·托马斯(Rosemarie Thomas)帮助进行校对。还有许多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不能忘记,在我写这本书的8年中,他们提供的思路、文献和观点使本书更加完善。由于人数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出。

本书研究的最后阶段得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研究办公室的中央大学研究基金的支持,以及该大学研究生院夏季学院奖学金的赞助。斯图尔德·帕尔默(Stuart Palmer)校长和系负责人威尔伯恩(Wilburn)和琼·布朗(Jean Brown)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对完成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为我营造了一种富有创造力和成长的工作环境。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康迪斯·勒蒙纳德(Candice Lemonard)和女儿让娜(Janna),她们给了我关爱和支持,使我认识到人和写作的重要性。康迪斯给了我具体的批评和建议,以及大量的资料和想法。让娜出生在我完成最后一稿的紧张时期,她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情感和体验,这是我从前所不能理解的。康迪斯和让娜一起,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给了我地域和永恒的感觉。

目 录

引言.....	1
第一部分 作为变化原理的媒介	10
一、媒介和行为：被疏忽的关联	10
二、媒介、场景和行为	31
三、媒介变化时角色为什么会改变	48
第二部分 从印刷场景到电子场景	65
四、公共场景的融合	67
五、公开和私下行为的模糊	87
六、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的分离	109
第三部分 新的社会风景.....	121
七、新的群体身份	123
八、“成为”的新方法	142
九、质疑权威	151
十、影响圈	164
第四部分 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	176
十一、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融合——群体身份变化的 个案研究	177

十二、成年和童年的模糊——角色转换的个案研究	216
十三、政治英雄降为普通百姓——权威变化的个案 研究	258
第五部分 结论	297
十四、我们去过哪儿，我们将去何方	297
附录：名词术语讨论	321
参考文献	332

引 言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当我还是名大学生时,我曾在欧洲度过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暑假。在那里我有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新体验。当我返回家后,我开始将这些经历与我的朋友、家人以及我认识的其他人分享。但是我并没有千篇一律地向每个人讲述完全相同的旅行故事。例如,我的父母听到的是我留宿的旅店如何的安全和干净,旅行是怎样使我不再挑食;而我的朋友们所听到的故事则充满危机、冒险,并带有某些浪漫;我的教授听到的是旅行的“教育”方面:参观博物馆、教堂和历史名胜,以及对交叉文化不同行为的观察。就这样,我的许多“听众”听到的故事各不相同。

我的旅行故事不仅在内容上有变化,而且其风格也各不相同。每个故事中俚语的数量不同,语法结构和发音也不一样。而且讲话速度、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和手势在每种情况下也不相同。每一次的描述都是真实与夸张的独特的结合。例如,我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中充满了浮夸的语言和讽刺。

那么我是否对其中某些人“撒谎”了呢?并不是。我只不过是告诉了他们不同的事实。而我所做的其实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日常交往中所做的,我突出了自己的个性和经历的某些方面,而掩盖了其他方面。

在旅行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这种变化的特征。像大多数人一样,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统一的“我”,行为方式总是大体相同。而现在我意识到,过去我仅仅是关注了在不同场景中自己行

为中的相同地方,关注在特定场景中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整体的限制。例如,我考虑到了在研讨会中自己可能的发言范围,但是没有注意到,作为一名学生,是不能站出来引导讨论的(就像现在一样,作为一名教授,我不能在课堂上保持沉默,面无表情)。我没有考虑到在某些情况下,对我来说安静地坐着,一言不发是正常的(例如听一场宗教布道),而在其他场合中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怪异的或有敌意的(譬如同朋友一起吃饭时)。虽然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会在不同的场合中无意识地改变了行为方式,但是我认为(为了与当时人们的情调一致)那些“演戏”的人要么不诚实,要么没有接触到“真实的自我”。

此后的一个学期,在我熟悉了社会学家埃尔温·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著作之后,我对行为规则和社会交往方式的理解总的来说发生了变化。戈夫曼将社会生活描述成一出多幕的戏剧。在戏剧中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是根据所处的环境、我们在其中的特定角色以及观众的组成决定的。戈夫曼的著作读起来像人类学,但是他的观察并不注重于奇异的或原始的文化,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行为。戈夫曼让我意识到了通常属于直觉和无意识的观念和行為。他使我意识到某些我已知但自己却无感觉的东西。

虽然戈夫曼为我提供了观察社会行为的全新视角,但是我认为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遗漏了某些东西。在60年代最混乱的时候,用戈夫曼于50年代首次提出的理论框架,就无法解释当时所发生的社会角色的变化。

戈夫曼所展示的社会交往的一般图景是:一个人主动参与到许多不同的剧幕中,人们不停地变换身份和角色,学习并遵守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规则,努力维持他们在每个场景的表演,同时不会威胁到他们在其他社会场景中的不同表演。戈夫曼的“社会脚本”表面上看是动态的,但是这种动态需要相应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作基础,即固定的规则、角色、社会背景以及固定的团体。个体必须遵守这些社会传统,必须进行练习和预演并持续他们的表演。当然了,这里的脚本和舞台相对来说不变化。在戈夫曼的社会世界中,动态主要是指人物投影在不变的背景中。人们的行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可能发生改变,但是其变化的方式相应于变化的场

景,通常是不变的。

这种社会生活一成不变的看法与当时的社会时局不符。虽然 60 年代末期的人们仍然在“扮演角色”,但是他们所扮演角色已不同于以往。用戈夫曼的话来说,“演员们”似乎将他们的表演和交往风格混合起来了。以前在“幕后”的生活,如性和毒品,现在却挤进公众舞台。人们在公众场合的穿着、说话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许多记者和学者正在抛弃“客观性”这个公众理念,将他们个人的经验和主观感受倾注在作品中。已有的压力打破了原有的行为和观念的禁锢,以相似的方式对待性别、年龄和职业各不相同的人群。修女们丢掉她们的习惯,从修道院搬到社区。而女秘书们则拒绝再为她们的男上司泡咖啡。同时,一种“青年文化”出现了,它跨越了阶级、种族、宗教信仰,甚至民族界线。孩子们对父母和老师直呼其名,好像他们是同辈人。男性和女性也正在摆脱求爱和结婚的旧套路。美国总统将自己的手术伤疤展示出来,好像全国的人们都是他的亲密朋友。而对政府、政治家和公司又产生了新的不信任。中央集权看来要让位给“社区管理”。在这些以及其他诸多的变化中,戈夫曼曾提出了寻找“演员的最简单模式”,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出演员,将其归类,这样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会有一定之规可循”,这似乎是虚幻的。

我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家是麦克卢汉,他提供了一个可能解释社会行为普遍发生变化的理由,这就是传播媒介的变化。麦克卢汉的著作读起来不像传统的学术分析,而更像叙事诗。不过麦克卢汉以自己的方式预测了 60 年代末期所发生的行为变化,这比戈夫曼的有效得多。在麦克卢汉 1961 年和 1963 年的著作中,他所描绘的情景出现在 1967 年至 1972 年的纽约、三藩市、华盛顿以及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城市的街头,这种描绘的准确性令人吃惊。麦克卢汉描述了普遍范围的社会变化:如“重新部落化”,传统的民族主义感情的减少,青年、少数民族和其他群体对“进一步”参与的要求以及对远方权威的不信任。长发、胡须、裸体、部落音乐以及反对“当权派”的歌声似乎都应验了麦克卢汉的预言。

麦克卢汉将这些变化归因于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说明电子媒介能够引起广泛社会变化的原理。麦克卢汉将媒介描绘成感官的延伸,并且宣称新媒介进入某种文化后就会改变这种文化下的人们的“感官平衡”,并改变他们的意识。但是麦

克卢汉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具有不同感官平衡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

当我还是大学生时,曾试图将我所学过的和所经历的综合成一个整体,我对这两种理论的不完整感到不安,但对他们对社会秩序的看法感到好奇。戈夫曼和麦克卢汉为理解社会行为提供了不同的思路。戈夫曼提出了影响行为的一个因素:“环境的限定”,它是由特定的交往地点以及观众所决定的。戈夫曼显然忽略了角色和社会秩序的变化。而另一方面,麦克卢汉指出了电子媒介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角色的普遍变化,但是没有清楚地解释电子媒介“怎样”和“为什么”会引起这些变化。

将这两种理论流派合二为一的兴趣,以及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这本书。我认为戈夫曼和麦克卢汉二人的优势和劣势是互补的。戈夫曼侧重研究了面对面的交往,而忽视了媒介对于他所描述变量的影响和作用。而麦克卢汉侧重媒介的效果,却忽略了对面交往的结构特征。这些疏忽可能是源于传统的观念。面对面的行为和有中介的传播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交往,即现实生活和媒介。这本书研究了能够将面对面交往与媒介的研究联系起来的共同基础——社会“场景”的结构。我认为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原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感官平衡,而是我们表演的社会舞台的重新组合,以及所带来的我们对“恰当行为”认识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观众变化的同时,社会行为也会变化。

例如,假如在我回家后,我的父母举办了一场出其不意的欢迎晚会,他们邀请了我所有的朋友、亲戚、教授和邻居,试想我欧洲度假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会是怎样的。如果我不能将听众分开,我对旅行的描述又会是怎样的?如果我的父母将我带到这些人中间,在这些人都在场的时候,给我 15 分钟时间来讲述我的旅行,我又能说出什么呢?

如果开始讲私下对父母所说的“安全”故事,我的朋友会感到厌倦甚至可能会咯咯发笑。如果我讲危险而浪漫的冒险,我的父母和邻居可能会不舒服。显然,我为特定的听众所准备的故事几乎每一个都会使混合听众中的部分人感到厌倦,甚至会冒犯某些人。所以我可能是,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也可能迅速适应这个混合场景,想出一个新的综合故事,将每一部分听众感兴趣的故事都说一点儿,但

是毫无特色,不会冒犯任何人。不过无论我说什么,这种情景与我和孤立听众交往的情景大不相同。

问题是,当不同的社会场景组合在一起后,原本恰当的行为可能就不合适了。当一个特定的私人场景与其他社会场景融为一体,变得公开时,行为方式必须随之调整、变化。场景的组合改变了角色的行为模式并且改变了社会现实的构成。我在回家的欢迎晚会中所遇到的场景粗略地模拟了电子传播媒介所创造出的场景。

在面对面交往时,许多不同类型的观众同时在场的情景很少出现,即使发生了(如在婚礼上),可以发现人们通常会很快就恢复成私下各自的交往。然而电子媒介使许多社会言论重新分类,这使得大多数人发现自己以一种新的方式与别人接触。与面对面交往融合的情形不同,电子媒介的混合场景持续时间相对要长,且不可避免,所以其对社会行为有更大的影响。例如,假如在我回家的晚会上不能摆脱混合人群,那么我本来只想告诉朋友的事情就必须在父母和教授在场的情况下说出来,要不就是什么也不说。再者,如果我的父母和教授也无法离开这个群体,那么我和朋友就会看见并听到他们的行为的各个方面——争吵、生病、猜疑、焦虑、性行为等等,而这些都是他们从前对我们避而不谈的。这种新的融合在一起的行为模式,可能缺少过去交往时的独立极端性,它们包括了许多过去认为在“混合人群在场”时不恰当的行为。

类似地,我在这本书中提出虽然仍存在许多个人言论,但是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使得曾为各不相同的社会场景相互交叉。例如,与面对面的交谈及书本相比,成年人很难利用收音机和电视来“相互”交流,因为他们常常会被孩子们“偷听”到。类似的电子媒介增加了男女异性之间社会行为的了解。收音机和电视对不同类型观众和场景的融合,使全国性的政治家很难对某个选区的选民说具体的事情,也很难在不同的公共场合有不同的表现。这里所提出的理论显示,社会舞台和社会行为的重组至少是引起近期社会潮流的部分原因,这些潮流包括儿童与成人概念的模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概念的融合,政治英雄与普通市民的等同。

简而言之,这里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阶段以及不同的权力阶层,有着各不相同的传统观点,这种差异是由人们不同的社会经历造成的。被分隔在不同的场景(或不同的场景集

合)中的人们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人们的行为在“台前”和“幕后”可以完全不一样,人们可以表演补充的角色,而不是互换角色。这种场景的区分是由于文字和印刷材料的传播而形成的。基于人们阅读能力及文化的素养的差异,他们则分别属于不同的信息社会。这种场景的区分同时也是由于不同的人群被隔离在不同的地方,且在某个具体地方有着具体而有限的经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身份。而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其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

也许对本书所描述的变化过程的最好的比喻是—建筑物。设想一下,假如现实中用于分隔房间、办公室和住宅的许多墙壁忽然消失或被移走,这样许多从前各自独立的场景一下子被合并在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所展示的自我的区别以及我们在不同场景中所展示的自我区别可能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它们肯定会发生变化。我们可能仍然试图在不同的人面前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们区分开这些境遇的能力会大大地降低。由于划分清晰的场景空间已不复存在,我们不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中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

例如,在一个大型的混合社会场景中,学生可能会看到他们的老师在电视机前睡着了;蓝领工人看到公司总裁被自己的孩子大声吼叫;选民看到政治家喝一杯酒就醉了;女士偷听到男人谈论与女性交往的策略;孩子们看到父母孩子气的表现。结果,过去的许多行为将不再行得通。例如,当某些人在场时,你就很难策划对付他们的办法。当旁人能得到我们自身的许多信息时,我们就很难在不同的人群前展示非常不同的自我。所以,新的行为模式将会出现。在混合场景中,过去表演中处于“后台”的一些行为势必会出现在扩大的“前台”。我们会不得不说或不得不做一些从前认为是不体面、不礼貌的事情。同时人们在这个混合场景中的行为将会具有过去的独立场景中的行为元素,不过是一种新的组合和新的模式,实际上也就是新的社会秩序。

而作为旧社会秩序的一员,当其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局外观察者时,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新的社会体系中的人们失去了礼貌观

念,甚至还失去了道德和理智。但是实际上观察者所看到的这些行为是受到社会场景融合的影响,而不是出自人们有意识的决定所采取的不同行为。

当然,用这个建筑物的比喻来描述电子媒介的影响有点夸张。墙、房门、大门和距离仍然可以形成独立的场景。但是电子媒介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空间结构划分的场景。其中媒介的交流方式越来越类似于真实的面对面交流。媒介越来越多地使我们成为观看异地表演的“直接”观众,并且使我们能够接触到未在现场的观众。

戈夫曼和许多其他社会学家倾向于以行为发生地的角度思考社会角色,但是我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场景,破除了旧的场景。许多美国人好像不再“知道自身位置”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位置,也就是行为与物理环境及其观众的相匹配。

本书研究了一种新的社会场景观念,它包括物理场景,如房间和建筑物,也包括由媒介所创造出的“信息场景”。与物理场地类似,媒介可以容纳和拒绝参加者。媒介亦像墙和窗一样可以隐藏和显示某些东西。媒介既能创造出共享和归属感,也能给出排斥和隔离感。媒介能加强“他们与我们”的感觉,也能消除这种感觉。本书试图描述当我们的社会场景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行为会有新的形式和意义,而我们将会变成谁,变成什么呢?

本书的第一部分(作为变化原理的媒介)提出了研究媒介和社会变化的总体框架。第二章论述了传统上侧重媒介内容对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的局限性,并讨论了两种看起来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中每一种观点都为研究媒介产生影响的新方法提供了部分线索,这就是“媒介理论”(麦克卢汉等)和“场景主义”(戈夫曼等)。

第三章使用了“信息系统”的概念,并将它作为连接媒介环境研究与面对面场景研究的公共基础。本章概述了当新媒介或其他因素出现、或者信息系统被分隔时,社会行为变化的一般方式。从“后台”和“前台”概念出发,描述了原有的各自独立的场景的融合如何导致了“侧台”或者“中台”行为,以及一个场景分成两个以上场景时如何导致“深后台”和“前前台”行为。

第四章通过讨论群体感觉(群体身份)、角色转换(社会化)和权

威(等级制度)三种角色类别,以更为具体的方式分析了这些“行为”。结果发现,每一类角色都依赖于特定的信息系统,因此当一种文化采用新的传播媒介时,角色行为就会按照一种可预测的方向发生变化。我认为群体身份、社会化程度和社会中权威层次与不同性质的公共场景的数量,台前与幕后场景区分的清楚程度以及所在地域和社会经历之间关系的强弱有直接的联系。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印刷场景到电子场景)详细论述了在以印刷传播为主的社会中,电子媒介影响信息系统的三种主要方式。第五章描述了“接触代码”、“物理特征”、“参与条件”以及获取信息清晰程度的不同如何使印刷媒介形成隔离的信息系统,而电子媒介孕育出了整体的信息系统。这样,在印刷文化中许多技术上讲“公开”的信息,实际上人口中许多群体不能获取,而现在通过电子媒介大多数人都可以得到。第六章描述了信息的不同形式(如图片和印刷文字)以及信息编码和解码的不同,如何使印刷媒介成为正式的、非个人的传播方式,而使电子媒介成为非正式的、私人的和富有表现力的信息。因此电子媒介倾向于表现社会生活中以往处于“幕后”的许多特征。第七章详细论述了电子媒介如何打破亲身旅行和社会流动性的传统关系,如何将“现场”信息传递给不在场的人们,以及不需将经历同地理位置相联系。这样电子媒介重新定义了社会“地位”和社会“地点”的概念。

第三部分(新的社会景观)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提出的原理综合成了一个通用理论,解释了“现代媒介矩阵”对30年来社会变化的影响。我认为,由于电子媒介融合了以往不同的公共场景,模糊了私下和公开行为的分界线,隔离了环境“位置”和社会“位置”的传统联系,因此我们看到了群体身份的模糊,社会化不同阶段的融合以及社会等级的消失。

第四部分(社会变化的三个方面)通过详细检验三类角色近期的改变,证实了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在书中对每一类角色做一种检验,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群体身份),儿童和成人(社会化),政治领袖和追随者(等级制度)。这三个分析都证明电子媒介引起了从前不同角色的模糊化。

第五部分(结论)总结归纳了书中的观点,为评价所描述的变化以及预测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并指出,作为一种“无地域”的文化,

我们许多新的行为规范都类似于游牧部落的猎人和采集食物人的行为规范。

致力于研究媒介原有特性或媒介内容的影响的读者会惊奇地发现,本书描述了许多人际行为的结构。而对“面对面”交往的动态性分析源于我相信,许多对媒介研究仅局限于对媒介内容的非常专业的限定响应(如模仿和劝服)的研究,因为研究人员完全忽略了当新的媒介改变了“谁知道关于谁的什么”后,日常社会行为非常易于变化。通过研究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本书提出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在近年的许多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 60 年代社会上爆发的许多“整合”运动(黑人、妇女、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奇装异服的兴起,为犯人和精神病人建造“临时”住房,核武器家族的衰落以及核武器冻结运动的兴起,独住和“合居”的趋势。本书认为,看似广泛的、动荡不定的社会变化,就其行为模式以适应电子媒介所创造出的新的社会场景来看,其部分却可能是有秩序的且易于理解的。

第一部分 作为变化原理的媒介

一 媒介和行为：被疏忽的关联

几乎所有评论过电子媒介的人，无论是偶然的观察者还是专门的研究者，无论是褒是贬，他们都知道，电子媒介能够绕过以前传播的种种限制，改变了传播变量中空间、时间和物理障碍的重要程度。如今，当我们在佛罗里达州晒太阳的同时，就可以跟阿拉斯加的某人通话；我们能够经历正在远方发生的新闻事件；亦可重温逝去人的音容笑貌；我们还可以坐在家中任意的房间内，看到足球赛场上嘈杂人群的特写镜头。

虽然电子媒介非常流行，人们对它近乎神奇的能力有诸多共识，但这些都没能引起学者们针对这种新的信息流动模式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的广泛研究。例如，在美国进行的电视研究中，绝大多数延续了早期大众媒介研究的主流传统，注重于信息的内容。不同类型媒介潜在的不同影响被完全忽略了。

对媒介信息的关注源于早期的一些观点，即通过大众媒介或收音机进行的宣传对不同的个体有着几乎相同的作用和效果，并能引起民众的响应。然而研究人员通常都未能证实媒介内容对社会行为的确切而直接的影响，这导致了过去 60 多年中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断修订。而旧的“皮下注射”理论（流行于 20 世纪 20 年代），是假

定人们对信息刺激有直接而普遍反应,已被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所抛弃。但是接下来是在刺激和行为响应之间增加了新的变量。现在认为个体差异、群体差异、有影响力的同辈人的角色、认识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其他的社会和心理变量,能对信息的作用产生削减、改变或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些新模式仍然是基于对信息刺激反应的概念。

无论考虑多少中介因素,绝大多数的媒介研究都未能摆脱最初的假设,即媒介将某些东西“注入”给人们。因此在研究媒介的影响时,首先必须分析“注入”给人们的是什么。电视研究关注媒介的内容,它研究人们看什么、看多少,人们如何认识和理解所看到的内容,以及他们所看到的内容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思考和行为。如此,关注的焦点是媒介信息,而并非是不同的媒介所产生的不同信息流动模式。

有些研究即使超越了具体的信息,宣称研究“电视环境”,但是最后往往还是回归传统而以内容为中心。例如乔治·格布纳(George Gerbner)的“培养分析”,将电视看成是我们生活的象征性环境,这个环境培养特定的世界观。但是格布纳及其同事对这个环境最关注的方面仍是电视信息所勾画出的现实景象。培养分析注重于媒介内容的总和如何创造出有关女性、少数民族、犯罪等等的神话,而这些神话又怎样决定了观察者对真实环境的看法和反应。

各种“影响模式”所产生的有限知识使人们不再抱有幻想,这导致了在过去 20 多年里许多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不同的观点,即“使用和满足”论。在这个模式中,人们(甚至是小孩)不再是媒介刺激的反应者或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目的、有意识地选择信息以满足个人需求(如“对重要事件保持关注”或“逃避无聊”)。这一论点将旧的刺激-反应模式完全颠倒了过来。它表明,人们通过有选择地使用信息对媒介所产生的影响比媒介对人的作用要大得多。例如,该模式认为,报纸或电台等媒介以及肥皂剧和场景喜剧等体裁形式的媒介,为了能够存活,就必须适合人们的需求。虽然这个理论摒弃了旧的假设,但在一个重要方面它仍与传统研究非常相似,那就是它仍着重于信息的内容。它提出了“人们为什么选择他所选的信息”这一问题,并研究了各种类型媒介信息所起到的作用。甚至当他们研究人们为了满足需求会采用何种媒介时,也很少将重点放在不同传播媒介的特征上。

许多媒介机构(媒介研究的主流)的行政和经济批评家提出不同的问题:是谁控制了这个社会中的信息的传播渠道?为了将来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目标该怎样组建媒介机构?但是,即使是这些批评家也常常回到注重内容的老套路。他们询问,如何控制媒介机构决定电视演什么,不演什么?这些都是合理的且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却常常忽略了各种媒体的特殊性质。很少有人探讨不同的媒介怎样对相同的政治、经济体系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很少有人讨论试图控制报纸的内容与试图控制电视的内容有何差异。

虽然对媒介内容的研究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少对媒介提出其他类型的问题。实际上,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而对电视的内容和控制的研究方式与研究报纸、戏剧、电影和小说的内容与所采用的控制方式完全相同。媒介本身则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

研究其他类型的技术影响的学者却很少持有这种极为狭窄的看法。例如,研究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的人中,很少有人会宣称研究中惟一重要的东西是新机器生产出的某种物品。恰恰相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很早就指出,社会工业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新的生产方式本身对一些可变因素的影响。如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平衡,劳动的分工,社会的凝聚程度,家庭结构,价值体系,时间和空间观念,阶级构成,以及社会变化的速度等等。

电视的研究曾经有过非常严重的局限性,它将电子媒介仅仅看成是原已存在的环境之间的新联系。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忽视了这种可能,即电子媒介一旦被广泛应用,它可能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重新塑造行为的方式可能会超越所传送的具体内容。例如,对电视的关注集中于暴力和黄色内容对儿童行为的影响,但是很少注意到文化内容的不同传播方式可能会导致人们关于“儿童”和“成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观念发生变化。与在报纸上寻找电视节目表的人一样,仅仅关注媒介内容的人更注重媒介给家庭带来了什么,而不是新的媒介可能会将家和其他社会场景转变成具有新的社会行为模式、情感和信仰的新的社会环境。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至少知道两件事情:一是媒介的变化怎样会改变社会环境;二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可能对人的行为有何影响。为了能够对电子媒介给社会行为的影响有新的认

识,本书将两种理论观点融为一体,这就是:“媒介理论”——对不同传播媒介创造的不同文化环境进行历史性的、跨文化的研究;“场景主义”——研究“社会场景”塑造社会行为的方式。这两个领域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它们所研究的问题同绝大多数大众传媒研究人员的传统上的关注点相去甚远。但是它们都为研究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的具体理论提供了部分的思路。这一章的后面部分总结了这两种观点,评述了各自的优缺点,并描述了两两者之间需要填埋的鸿沟。这样我们才能观察媒介的变化是如何影响日常社会行为的。

作为文化环境的媒介

社会科学家注重研究媒介的信息。但是传播学、社会学和心理科学领域以外的少数学者曾采用了历史的和交叉文化的方法研究传播技术,他们想使人们看到,除了媒介传播的内容以外,媒介所具有的潜在的影响。我使用了单数的“媒介(medium)理论”来描述该研究,因为它与其他的“媒介(media)理论”的不同之处正是它注重研究每个媒介的特别性质。

这些媒介理论家的观察往往是不完整的,而且很难分析和应用。但是对本节的研究却很重要,因为他们指出,媒介并不单纯是两个或多个环境之间传递信息的渠道,而且也是一种环境。这些学者中最著名最有争议的是哈罗德·亚当斯·因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和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

因尼斯原本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他将经济垄断原理扩展到了信息垄断的研究领域。他把对传播媒介(如特殊的神父阶层控制的复杂写作体系)的控制看成是实施社会和政治控制的手段,而新的媒介能打破旧的垄断。因尼斯认为,中世纪教会对宗教信息的垄断(因而垄断了超度)被印刷媒介打破了。印刷媒介绕过了教会的抄写者,使《圣经》和其他的宗教资料随处可得。因此,《圣经》虽然内容依旧,但采用不同的媒介却有不同的影响。

因尼斯认为,不同的媒介对控制有着不同的潜力。不能广泛传播的媒介,或者需要特殊编码和解码技巧的媒介很可能被上流阶层所利用,他们有时和来源获得这些媒介。相反,如果一种媒介很容易被普通人接触到,它就会被民主化。

因尼斯还宣称,每种传播媒介都有一种“偏向”,或者偏向于持续很长时间,或者易于远距离传播。他认为某种文化主流媒介的偏向,影响着这种文化的稳定程度、保守性,以及这种文化所覆盖地域面积的能力。他说,“时间偏向”的媒介,如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产生了相对较小的、稳定的社会。总之,石头上的刻字很难经常修改,又不便移动,不利于远距离联络。相比之下,具有“空间偏向”的纸草上的信息使罗马维持了一个巨大帝国的统治,中央集权政府可将政令输送到遥远的地域。但是,纸草媒介也导致了更大的社会变化和更多的不稳定。

在《帝国和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与《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两书中,因尼斯将人类文明史改写为传播媒介史。始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明摇篮,结束于大英帝国和纳粹时期。

1952年在因尼斯去世前,受到他的观点影响的一位研究中世纪文学的学者——麦克卢汉,将“感官平衡”的概念补充进了因尼斯的信息垄断和媒介“偏向”理论。他分析媒介时认为它是人感知信息或处理信息的延伸,并且指出,使用不同的技术会影响人类感知的结构。麦克卢汉将传播历史划分成三个主要时期:口述传播、书写或印刷传播以及电子信息传播。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每个时期都以其感知器官的相互作用为特征,各有自身独特的思考和传播方式。

麦克卢汉认为,口述交流存在于即时的、往复的“听觉文化”中。口述“部落的”听觉社会是一个相互依赖,缺乏个性的“封闭的社会”。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生活在口述文化中的人有着神秘的“深度的经验”,所有的感官都非常和谐。是书写或者说是印刷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部落的平衡,使以口述交流的人们“眼睛代替了耳朵”,视觉变得重要起来。同时远距离的人们不再依赖于声音、触觉和直接反应。对口述传播的依赖被彻底打破之后,允许人们变得更加自省、理性和个人主义。抽象思维得以发展。声音的圆形世界里有着圆形的小屋,圆形的村庄,人们经过一段时间走向一种线性的因果思维,网状的城市,每次一件事,一件事接一件事,这样的世界模仿了手写和打字的线性。人们对同自己一起居住,对自己能听到、看到和接触到的人的忠心发生了改变,转移到了对一个特定地区里抽象的“国家”或“兄弟友爱”的忠心。对麦克卢汉来说,西方社会的理性和文明行为

的许多特征都可归因于印刷媒介的影响。

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电子媒介就像是神经系统的延伸,覆盖了整个地球。电子感应器使我们返回了乡村一样的环境,只不过是一个地球大小的村庄。电子媒介广泛使用的结果,使我们每个人都卷入了别人的事务中去,而依赖印刷的权力派遣、民族主义和线性思维的主张出现了衰落。

因尼斯和麦克卢汉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所要包含的历史和文化范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其他的媒介理论家研究了媒介影响的具体方面。J. C. 卡罗瑟斯(J. C. Carothers), 杰克·古迪(Jack Goody), 伊恩·瓦特(Ian Watt), 埃里奇·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 A. R. 卢里亚(A. R. Luria)和瓦尔特·翁(Walter Ong)研究了从口述转变到文字的各个方面。他们非常令人信服地指出(实际上比因尼斯和麦克卢汉更有说服力), 文字和口述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模式。他们描述了文字的引进如何影响社会结构, 知识的社会定义, 个体的观念, 乃至精神病的种类。

H. L. 蔡特(H. L. Chaytor)和伊丽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研究了从书写到印刷的意义。尽管印刷常常被看成不过是书写的“机械化”, 但是蔡特认为, 这种变化引起了文学风格概念的改变, 形成了新的“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的观念, 促进了民族主义感情的生长, 并且改变了词语和思想的精神交流。艾森斯坦支持其中的大部分观点, 提出了大量的证据并做了极具说服力的分析, 以支持印刷媒介通过促进欧洲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的发展, 引发了西方欧洲革命的观点。

瓦尔特·翁, 埃德蒙·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 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和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研究了电子媒介对思维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施瓦茨和卡彭特则大体沿继了麦克卢汉的内容、方法和风格。而翁和布尔斯廷采用了更加传统的学术分析来证明麦克卢汉的基本论点, 并且还有所超越。翁描述了电子媒介引入文字社会后所产生的“第二个口述期”与前文字社会“基本口述期”的共同点和区别。他研究了以电子形式回归的“字词”的精神意义和心理意义。布尔斯廷描述了新媒介如何“批量生产某个场景”, 使经历具有“可重复性”, 并利用许多其他现有的技术发明“使时间和空间处于同一等级”。布尔斯廷也将技术革命同政

治革命进行了比较,并且讨论了新技术——包括电子媒介,对于人们的民族、历史和进步等观念产生的影响和冲击。

媒介理论家并不认为传播方式完全地决定了文化和个性,但是他们认为传播模式的改变是造成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因素通常却被忽略了。他们对媒介和社会变化的分析也显示,这种转变并不是突然的或彻底的。用威廉姆斯·奥格本(William Ogburn)的话来说,就是存在有“文化的后滞”,即部分文化处在其余部分的前方。例如,尽管荷马的继承者们的创作和组织诗篇就得益于书写体系的帮助,但是他们仍为“听”诗而不是“读”诗的听众们不停地写作。他们仍然视自己的作品被广泛地留在人们记忆中为其不朽的标志。

另外,虽然在这些理论中新媒介被认为转变了文化和意识模式,但这是通过增加传播手段实现的,而不是破坏旧的传播手段。因此,书写并没有破坏口头论述,但是它改变了演讲和个人记忆的职能。类似地,电视并没有淘汰阅读和写作,电话也没有淘汰写信。但是,当一种新媒介被引入某种文化的同时会改变原有媒介的性质、含意和效果。例如,电话的确影响了写信的性质和频率。实际上,现在个人通信的减少,造成了重要的个人记录和社会记录的丢失,这使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非常痛心。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社会的工业化对社会的结构和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且结束了“农业化”的社会形式,但这并没有破坏我们对食品生产的根本性依赖。其所隐含的重要原理深深地根植于系统论和生态学中:当一个新的因素加入到某个旧环境时,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旧环境和新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全新环境。当然,“新”的程度要看新的因素对旧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改变程度,但是新环境总是胜于各个部分之和。

简单地讲,媒介理论家认为,在人们中传播的方式的冲击超出了对特定信息的选择。他们并不否认在某个文化环境中信息选择的意义(例如,麦克卢汉本人就清楚地表达了对某些节目的喜爱,包括“60分”,他说,“有些东西我不想错过,就是这样”;而对于其他一些节目,如“星际旅行”,他补充说,“我都懒得去骂”)。但是这些理论家主要对高层次的分析感兴趣,也就是交叉文化和历史的方法。

这种分析在其他领域很少有争议。如果一位政治历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演讲中所说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领

导人是民主选举的官员,还是继承了王位的君主,而也许百姓对此却连眼睛都不眨。然而一位赤脚的农民可能会更愿意得到一双鞋,而不是锤子,且不管鞋子和锤子哪个是手工制作的,哪个是批量生产的。一位经济历史学家会注意到,所有物品从手工生产到机械生产的变化都会影响社会的许多方面,包括赤脚人口的比例。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媒介理论的观点没能深入到学术活动或公众意识中。因为一方面,媒介研究基金的大部分资助者,都是对现存媒介机构的管理感兴趣,或者对媒介法规和管理公共政策的形成感兴趣。另外,特别是在美国,对媒介效果的“科学”证据研究,使得大多数的研究人员注重于收集能够量化和统计分析的数据。由于媒介理论家比较并对比了不同的媒介环境,而对在一个特定技术环境中如何运作和规范媒介并没有多少涉及,同时又因为通过调查、直接观察,或者实验很难“检验”媒介理论家概括性的历史和文化理论,所以大多数的媒介研究都集中于非常狭窄的问题上。类似地,媒介理论家没有引起公众长期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尽可能地避免说某种传播形式比另一种传播形式“好”或者“坏”,而这与许多流行观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譬如人们认为读书就好,看电视本来就坏。

再者,包括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在内,人们通常倾向于忽略甚至拒绝承认媒介的这种看不见的环境,而理由亦仅仅是因为它们看不见。通常我们以人类具有交流的能力将自己同野兽区别开,然而许多人却很不情愿去考虑人类的传播手段的重要变化所能产生的影响,这实在是一种讽刺。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物理或物质原因(比如工业化、新的交通方式、旱灾、战争和经济萧条)所造成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而不愿意考虑信息对社会变化所做的贡献。例如,通常让人们考虑汽油价格上涨10%所产生的冲击很简单,但是若让他们考虑电脑芯片存贮能力增加10倍所产生的影响则要难得多。物质的变化是具体的、可以想像的,而信息的变化似乎就非常抽象和神秘。即使是对信息本身的变化,人们也更倾向于抓住信息环境中最易看得见的方面:具体的信息。然而,由于公众和学者的注意力都主要集中于信息的内容上,这样我们的方法就与研究汽车的影响时,忽略运输的新模式问题,而专注于乘客姓名和外貌的细节研究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许多人反对媒介理论家的这些看法,但是由于媒介理论著

作自身的局限性,在接受以及进一步研究媒介影响时,有许多问题便产生出来。例如,因尼斯和麦克卢汉对各种媒介的影响作了广泛的论述,但是这些观点缺乏清楚而有逻辑性的论证和论据。他们的著作似乎是从论述中间部分开始写的,带有因顿悟的耀眼光芒而产生的激动和渴望。他们略过细节,跳过逻辑论证,好像他们确信读者能够跟上他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

因尼斯的论述很难理解,他将段落浓缩成句子,忽略了论证和论据直接得出结论。麦克卢汉的作品充满了格言、双关语和比喻。实际上麦克卢汉最深奥的见解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而言是无法理解的。因为麦克卢汉运用了他自己的非线性思维风格,并以此来证明口语形式推理的力量。因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分析对于早已认同他们基本观点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然而即使是接受因尼斯和麦克卢汉观点的人,他们亦可能很难用自己的语言向其他人解释这些观点。就像是神秘的宗教,相信“麦克卢汉主义”的人会认为它是绝对的真理,而不相信的人则认为那是胡说八道。

因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发现”采用的是一种不寻常的形式,因此,不易与其他理论研究框架融合在一起。他们的观察采用了一种直接的、通告式的、结论性的语气,这使得它们易于被全部接受,或被彻底否定,但亦很难进行应用或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麦克卢汉宣称电子媒介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间和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他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分解我们的角色以及持有具体观点的能力,我们开始“神话般地、完整地生活”在一个“地球村”。

对媒介影响的这种富有诗意的描述,能触动我们的灵魂,但却使我们的头脑痛苦。这些强有力的形式的论述使得陈述具有强迫性,但这样也使得它面临被很微弱的论证或论据驳倒。例如,时间和空间真的被“消除”了吗?或者它们是否真的从一切直接交流的首要因素“降级”为只是某些交流形式的重要因素?

麦克卢汉指出,传统的学术分析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前提,即线性思维是推理的惟一方式,他宣称这个由书写和印刷的直线性所产生的假设,现在正受到电子媒介的削弱。因此,试图评价麦克卢汉著作的学者面临一个两难境地:他们必须采用传统的理性批评技巧来批评这本著作,而这著作本身又对这些技巧的必要性和普遍价值提出了质疑。可以预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批评家的反应是感情化

的,敌意的,并且有时是非理性的。

麦克卢汉有争议的观点和不寻常的风格使得他在一个时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1967年NBC播放了一小时的麦克卢汉的节目。1969年3月《花花公子》杂志刊登了有关他的专访。麦克卢汉被冠以各种不同的绰号,如“电子时代的神喻”,“宝瓶座的圣哲”以及“流行文化的斯博克博士”。他的口号和术语(“媒介即信息”,“地球村”,“冷”和“热”媒介)广为人们所熟知。而关于人们是否真的理解他那非线性的、一语双关式的散文式论述的争论,成了伍迪·艾伦(Woody Allen)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一个插科打诨场面的依据。在影片中艾伦将麦克卢汉拉进一个场景,让他告诉一个讲话冗长的麦克卢汉理论的“解释者”,“你对我的著作一无所知”。

然而麦克卢汉这颗星很亮,也很短暂。电视、广播、书籍和报刊对麦克卢汉理论的关注是一把双刃剑。它们使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部分人意识到了媒介的非内容分析概念,但是采用麦克卢汉式的同样的研究方法,使许多学者不能严肃地看待媒介影响这个问题。当麦克卢汉1980年去世时,他在两方面都失败了:尽管他的许多术语仍然在公共场合使用,但人们对其内容却不甚了解;同时他的理论框架在大多数学术研讨会上被束之高阁了。

与因尼斯和麦克卢汉相比,卡罗瑟斯、哈夫洛克、翁、蔡特、占迪、瓦特、艾森斯坦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其中大部分是传统的学术性著作,其令人信服的有力的观点是建筑在历史研究和对该领域资料的占有的基础上的。然而,或许是他们狭窄而集中的研究是从不同的学科(古典文学、精神病学、英语、宗教、人类学、历史等)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没有广泛流传,也没有被看成是某个学科的组成部分。除了翁以外,绝大部分人甚至没有清楚地表达出他们的基本观点,即媒介是文化和意识主要的塑造者。相反,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遇到的具体问题上:文字造成的后果及不同书写系统的差异造成的影响等。由于注重面的狭窄,也由于最有生命力、最详细的著作——翁的后期著作和艾森斯坦对印刷的大量研究——写作时正好是麦克卢汉的观点被普遍地抛弃之后,这些学者没有为他们的研究找到确切的读者。

也许媒介理论著作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所提供的充其量只是研究媒介对行为的影响的一种观点,而不是他们宣称的详细的理论。

他们的见解、观察以及收集的证据是因为研究媒介环境和研究媒介信息的需要,但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观点来解释媒介怎样重塑某种行为。麦克卢汉对感官平衡的探讨富有见地和直觉,听起来是正确的。翁为感觉变化和意识模式变化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是对“媒介的偏向”,“感官平衡”以及“意识的新模式”的探讨却非常抽象。他们找出了主要步骤,但是当他们最后试图将这些步骤说清楚时,反而使得媒介的影响变得神秘了。具体地讲,一种新的感觉或一种新的模式是怎样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呢?艾森斯坦具体分析印刷媒介所引起的新的信息扩散造成的影响。但是她对改革和科学革命的详细探讨对于媒介在总体上对文化的影响方式,甚至印刷媒介对个人行为具体的影响方式都没有多大帮助。

最后,也许因为当一个人置身于环境之外时,才能将其看清楚,对书写和印刷影响的研究要比对电子媒介的研究更详细、更具有学术性。麦克卢汉晦涩的著作仍然是关于电话、收音机和电视特殊假说的最丰富的源泉。在日常社会行为方面,媒介理论著作对主流的电视内容在具体问题 and 理解电子媒介的影响研究上没有形成一点竞争力。

媒介理论研究者遗漏的一部分内容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想把对媒介特征的分析同日常社会交流的结构和动态性分析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人会声明,新的媒介导致了人际之间和地域之间的新联系,以及存取社会信息的新方式。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回答:为什么和怎样仅仅是在人际之间和地域之间创造出新联系的技术,能导致社会结构或社会行为的根本转变?用消除联系——社会场景和交往分离——塑造社会现实的方法可得到这个问题的潜在答案。

因此本书所提出的理论试图在媒介理论家提出的看法和社会学家的看法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即“社会场景”和社会角色的关系,这在下面部分做出了概述。首先,对行为的场景决定因素的讨论似乎与电子媒介的影响无关;实际上,提出和抱有这一观点的人绝大多数根本不了解媒介。但是,借着场景的隔离,通过描述人们相互之间有限的接触的社会意义,场景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借助某些方法其可适用于研究由于新媒介所带来的新的交往模式的影响。

场景与行为

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础。当我们说“某地”发生了某事，或者对某人说“你肯定在那儿”，或者指出某人解释行为时“脱离了具体环境”，我们即是暗指“社会场景”的一个易被遗忘的变量。相似地，当我们指责某人的行为“不恰当”时，我们显然是对与我们所处场景相匹配的一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表示尊敬。

在 20 世纪初期，社会学家 W. I. 托马斯(W. I. Thomas)指出了社会场景的两难境地：“如果人们认为场景是真实的，那么对他们来说结果就是真实的”。换句话说，我们构筑了社会场景，但是我们对场景定义的随意性并没有减弱场景对我们的束缚。

场景的规则介于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在某一文化群体或其子群体内，场景规则和角色看起来是“客观地”存在，因为人们的期望是相同的。但是这些规则并没有自然基础，并且对其他文化或群体的人不具有什么意义。同时，场景的定义也不仅仅是“主观性”的，因为对相同文化或群体的大多数人而言，它们是真实的。而这些人一致认可的社会意义被称为“内部主观性”。

每一个特定的场景都有具体的规则和角色。葬礼上要求的行为与婚礼中的行为不同，晚会的规则与课堂的规则不同，找工作面试中担当的角色与精神治疗面谈时的角色完全不同。任何一位认为场景的定义和场景所确定的角色不“真实”的人，会试图在前面列出的每一组场景中有另一种不同的表现。

每一种场景定义也为不同的参与者规定和排除了不同的角色。当一个精神病人同医生面谈时，这个场景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范围。例如，这两个参与者中只有一人被“允许”哭。类似地，在葬礼中部长与死者亲属的行为应当是不一样的。

因此，当人们进行任何特定的交往时，他们第一件需要知道的事情是，“这里正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要知道“场景的定义”。场景的定义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它是用来描述场景的复杂的动态情景及控制这些情景的规则。正如埃尔温·戈夫曼在他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书中指出的那样，场景定义的变化可能非常复杂

困难。一个场景可能有一个“基本框架”(如“打架”),但却有各种“调整”方式(如“在打架中的表现”,或者是“表现戏中打架的演员”)。然而尽管分析起来很复杂,但是对于社会或群体中的当地人来说,对定义的理解显然是一种相对直观或直接的。实际上,研究人员识别和研究场景的定义,要比普通人掌握它更难。

我们适应社会生活的方法之一是学习我们文化中的场景定义。当我们在某个环境中长大成人时,我们绝大部分人已经在无意识中掌握了我们社会的许多场景定义的概况。“不恰当的社会行为”的部分原因是不能成功地协调各种场景的需求。譬如在老板和同事面前表现一样的工人,在葬礼上开玩笑的人,或者在婚宴上玩扑克牌的人,他们要么是无法掌握场景的定义,要么是对它们很敏感,想不断向其提出挑战。对于“正常”的社会交流渠道,我们绝大部分人会下意识地适应场景,而无需过多地思考。研究证实,4岁的儿童就能根据场景和“听众”来调整说话的方式。

在一种文化内,几乎不需要有意识地思考就能适应绝大多数的场景。因为在任何特定时间里一个社会的场景倾向于传统化,且数量有限,它既不是个人的习性,也不是无限的。实际上,一个人可以通过使用简短标签的方法设想出大部分场景的恰当和不恰当行为的范围,如“第一次约会”、“生日晚会”、“机构会议”等等。而且一个人可以将各种标签混合在一起(例如,“为一个我打算近日请他出去的同事在办公室举办生日聚会”),使行为的范围缩小。总之,每种场景都有一个“议程”。虽然非正式的集会中,如晚会或“同朋友居住在一起”,暗含的议程通常包括,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有正式或明确议程的规定。

通常只有出现问题时我们才有意识地思考场景议程,如一位律师在解决离婚问题时开始唱他最喜爱的爱情歌曲,或者你的一位密友同你说话时像对待他的雇员那样。即使出现了类似上述的情况,即场景/行为的匹配出现了问题,我们仍会将这种怪异归因于某个人,而不是场景的定义。总之,感觉上我们几乎不认为这每一个行为是“正常”的,而这问题出在了行为和场景两者的关系上。在交叉文化的情况下,从个人身上找问题非常有害,因为参与者在开始时都带着最好的意愿,结束时却认为具有对方文化背景的成员粗鲁或疯狂。

场景定义的影响(以及它们通常不可见的原因)可以通过考察以

下三类场景行为的方式弄清楚：在某个场景几乎总是发生的行为；在某个场景中几乎从不发生的行为；在某个场景中有时发生的行为。例如，在工作面试时，面试者几乎总是问来面试的人一些问题，但是面试者和被试者从不会在这种场合下国际象棋，或者性感地拥抱。而在面试时第三类行为有时会发生：开玩笑、调情、工作或申请人被拒绝。然而，在不同情况下，这三类行为的内容会有所变化。例如，在面试时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在集会时或公园里会经常发生。实际上，相同的两个人的行为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完全不一样。

行为的场景因素常常是不易觉察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常常集中注意到的是第三类行为——在某个场景中有时会发生的行为，而没有关注“几乎总是”和“几乎从不”发生的行为。我们倾向于认为场景框架是理所当然的，转而关注在整体限制下所选择的范围。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看到的场景的力量，另外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绝大部分人倾向于在我们的社会经历分析中将自己作为基本元素，倾向于关注从一种场景到另一种场景时行为的共同之处，而没有意识到场景改变时我们的行为的变化方式。例如，当我们在一个场景中选择穿什么、说什么或者采取何种行动时，我们更多的是注意我们决定做什么，而不是场景给我们的选择所作出的限制。因此，在一定可选范围内的自由常常被误认为是绝对的自由。总之，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中有不同的个性，但是我们总是选择去关注那些在我们适应不同场景时所采用的一致的方式，所显露出的较高层次的个性。

对于我们出生时所面对的已有的文化场景，我们无能为力。既然我们可以创造场景，我们也就可以改变它们。人们，特别是有权势的人，能够定义新的场景。立法人员、法官和行政人员就常常这样做。类似地，个人之间通常采用相互约定的方式来定义或重新定义他们的交往。但是，一旦我们定义了一个场景，比如婚姻或者生意关系，我们也就受到了其定义的束缚。另外，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定义和再定义一些场景，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大部分场景凭个人的能力很难轻易地改变。大部分社会场景的变化是缓慢的、无意识的（例如，求爱方式的变化）。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社会场景的演变常常是技术革新的额外产物。即使当一个场景突然被法律（例如学校种族隔离的结束）或经由其他手段所改变，通常只有当

此后的几代人“继承”了这种新场景之后,它才能被看成是自然而然的,或者换种说法,它才会显得很“正常”,以至于感觉不到。

我们常常抱怨必须履行各种“义务”,或者在社会场景中(比如,在商业宴会上同我们不喜欢的人交谈,或者为参加婚礼去租黑色礼服)不得不遵守某些礼仪。同时,我们大部分人通常不希望在场景的定义中有太多的模棱两可或不确定性。我们选择去某个餐馆或俱乐部,或在某种类型的饭店住宿,是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有相对确定的经验类型。当我们选择一个吃饭的地方时,我们通常知道那里是否会有尖叫的小孩或者狂吠的狗来打扰吃饭时的谈话(或者我们能猜到其他就餐者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或宠物行为的反应)。即使当我们想“轻率的冒险”,我们通常也会选择这种冒险——与常规的行为相对立——最可能发生的冒险环境。没有人会在一个对其一无所知的环境中感到舒服。正如许多神秘剧和侦探剧所描述的那样,非常不确定的场景可能是紧张和焦虑的根源。

那么,社会行为和传播除了人们将“信息”相互传递之外,还包括更多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其所处社会所定义的场景塑造和修改的。在某个场景中仍存在着许多个体差异,但是当人们从一个场景进入到另一个场景时,大部分人所展示的变化模式有很多的共性。

因为没有确切地意识到场景,以至于场景一直是社会研究中的一小部分,这一点直到最近才得到改变。例如,在社会心理学中,分析的元素通常是个体及其行为。为了研究这些行为,社会心理学家通常将人们从确定的社会场景中分离出来,然后将其放入实验室的“受控环境”中,目的是将某些行为分离出来,以进行更加精确的观察和分析。

近年来,实验室方法的批评者认为心理学家并没有隔离无关的变量来研究“原始行为”,而实际上研究的是在新定义的场景(心理学实验)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另外,研究显示,参加实验的被试都试图取悦实验者。志愿参加实验的人在许多重要方面与普通人群并不一样。同时实验者的期望常常在无意间影响实验的结果,或影响研究人员对结果的看法及解释。起初,这类研究被看作是对实验方法的完善;然而实验场景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越是不可避免,这些研究就越发成为对实验方法本身的一种批判,尤其是因为它曾被用于研究社

会行为的许多方面(几乎排斥了其他方法)。例如,心理学家拉尔夫·罗斯诺(Ralph Rosnow)曾呼吁一种“多元”的社会心理学,采用各种理论和方法,包括对“行为发生的地点、时间以及在谁面前”的“依环境而定的”研究。

近几年来,对社会“场景”、“地域”和“来龙去脉”的研究更加广泛。研究结果、理论文章和评论文章显示:个性指标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日常生活的社会行为,而且焦虑反应之类的行为主要是由场景因素引起的。一项令人不安的研究发现,一个原本正常的学生在被随机地分配去“守卫”模拟的监狱后,开始显现出一种原本不属于他个性的冷酷、侵略性和虐待狂行为。实际上,这种卫兵—犯人之间充满敌意的关系发展得如此迅速、如此强烈,使得实验不到一星期就被迫取消了。由此,研究人员也开始研究场景定义对个人的口音、词汇,以及其他语言学变量的影响方式。心理学家开始用教育人员做实验,通过监视引发行为的场景暗示来控制强迫和沉迷。这种方法也用于研究饮食过量、滥用毒品、酗酒和吸烟等方面。另有理论和研究指出,“权限”和“技能”是由场景所决定的。种族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通过打破场景规则,观察其所产生的疑惑及其随后而来的再建过程,发现了一种使场景规则可见的方法。哲学家罗姆·阿尔(Rom Harré)和心理学家保罗·西科德(Paul Secord)认为,人们自己对社会场景规则的叙述应当作为研究社会行为新的科学方法的基础。尽管心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个体的特性或者对独立刺激的反应,但是阿德里安·弗汗姆(Adrain Furnham)和迈克尔·阿盖尔(Michael Argyle)曾经指出,使用旧方法和旧观点所造成的“幻想破灭和有限成功”是,使得“社会场景可能会发展成心理学研究的新元素,而不是个体”。

场景主义者埃尔温·戈夫曼所采用的方法,可能是为研究新媒介对社会角色的影响间接地提供了最多的思路的方法。戈夫曼用戏剧般的比喻描述了社会生活。他指出了在不同的社会舞台上我们所扮演的角色的多样性。我们对不同“观众”展示出不同的自我。

戈夫曼指出,这种角色的扮演对社会生活的平稳而正常进程非常必要。在所有的交往中,我们都需要了解相互之间的期望。我们不希望急诊室的医生告诉我们说,他们今天不愿意为我们看伤口,我们也不希望餐馆的侍者坐下来同我们一同进餐。我们期望人们遵从

场景的定义以及他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甚至期望我们的朋友在风格和行为上基本保持一致。然而,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必须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如果精神病医生向自己的病人详细叙述自己的感情问题,则会被认为是很怪异的,而且他们如果不把自己的问题和感受告诉他们的配偶或朋友,就会使配偶或朋友感到气愤。

戈夫曼指出,当我们进入一个社会环境后,需要了解场景和其他参与者既是主观愿望也是客观需求。我们需要知道场景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是喜庆的还是悲伤的。我们需要知道其他人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应与谁交谈,应该避开谁,以及我们是否受欢迎。同样,场景中的其他人也需要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到那里的理由是什么?在这个场景中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戈夫曼指出,大部分这类信息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得到的。彻底了解一个人、理解一个真实的特定社会场景的复杂性,以及了解在一个特定场景或固定环境中某一人群的职能,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然而大多数的社会交往需要立刻判断、组织和行动。戈夫曼认为,上述行为的结果就是人们不停地建立起有社会意义的“印象”。我们通过服装、体态、肌肉的舒缓、家具的摆放以及其他的支撑,构筑了我们的生活舞台,为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确定了基本角色。因此,当我们走进商店、办公室或学校时,我们通常立刻就能知道在该场景的整个构造中,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戈夫曼说,即使那些看起来“什么也没做”的人,也常常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耗费精力。当有他人在场时,人们常常有一种“交往紧张感”,这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们已经做好了交往的准备。人们也常常注意控制自己的姿态和目光,避免看起来具有威胁、危险或古怪的表情。彻底的放松或者远眺——特别是长时间这样,常常会被当作是有敌意或精神不正常的表现。

对戈夫曼而言,所有社会角色的行为实际上都是表演,也就是说,它们是行为的有选择的展示,无法持续进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需有意或无意地进行计划和演练。同戏剧表演一样,必须有恰当的舞台,演员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举止,每出戏中的角色应该与其他戏中的角色有所区别。

为了同戏剧的比喻保持一致,戈夫曼认为,任何个人在某个环境中的行为可以被分成两大类:“后区”或后台行为,以及“前区”或台上

行为。在前区,表演者是“观众”面前的一个特定角色,他们要扮演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概念的社会角色。例如,当侍者在餐馆或饭店为别人服务时是处于前区。这时的侍者通常是有礼貌和可敬的,他们的外表和行为是整洁和有效率的。他们不能加入餐馆主顾的谈话中,也不能对顾客的饮食习惯或吃饭的举止品头论足。他们也极少让主顾看着吃饭。

但是当侍者从餐厅进入厨房后,他们便突破了台上和后台之间的界线。在厨房里,侍者处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他们同其他与观众相对角色同类扮演者共同分享这个地方。这时,侍者可以对“坐在7号桌的人的奇怪行为”进行品评,也可能会模仿一位顾客,或者教一位“新手”如何得到更高小费的方法。同样,在厨房里,对食物的处理和讨论也不像在餐厅那样充满敬意;而且侍者可以“脱掉戏服”,或将脚放在柜台上随意而坐。

当然侍者的社会地位较低,不过在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群中,这种行为上的差别也非常显著。例如,医生、律师和法官。医生在“台上”惯于隐藏自己的疑问、无知和压抑的感觉,或者是看到病人裸体时的性冲动。但是当医生不与病人在一起时,也许会与护士一起拿病人的身体特征或性格开玩笑,要求护士在听到他们的话时(一种“舞台指挥”)决不要纠正他们,或者打电话给同事向其咨询不常见的症状。实际上所有的角色扮演者都会有后区,在那里他们同“队友”(那些担任相同的角色和工作、具有相同印象的人)放松地演练、琢磨将来演出的策略,并拿他们在前区的行为开玩笑。

这种后台的行为从表面上看可能比前台的行为更“真切”,更诚实,不过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一个人即使是跟同事抱怨工作负担太重,并大声地质问假如自己不当广告主管了会怎样,或者开玩笑说有时想掐死某个学生,但他很可能“真的是”一位有感情、有献身精神的教师。几乎每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中都会有行为冲突。实际上,后区的行为甚至也被认作是在扮演某种角色,只不过在那里相互之间不用忍受前区的那种正式风格。社会事实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与场景有关”的概念。

虽然我们常常相信“戴上”面具或“扮演角色”是不诚实、不道德的,但是戈夫曼指出,这种看法是幼稚的。的确,有些人可能故意留给人引起错觉的印象(如艺术家、间谍、密探),但是所有的个体都要

给别人留下某种印象。因此，一名不正直的法官可能要假装正直，而正直的法官也要表现“正直”。所以无论正直的和不正直的法官都一样，他们必须避免被看到同可疑的人呆在可疑的地方，即使“事实上”并没有不恰当的行为发生。同时即使是正直的法官在“台上”时也必须要有恰当的穿着和行为。在陪审团面前他们穿着黑色而不是粉红色的袍子，坐在后排的座位上，而不是跷着二郎腿坐在地板上。

因此“印象处理”是一种社会速记形式，人们通过它来识别出自身并对他人和自己相互间的行为做出期待。戈夫曼指出，诚实和不诚实“演员”的区别不在于表演，而是演员对自己角色的态度。总之，诚实的人至少部分地融入自己的角色，并认为自己就是他所展示的角色。

另外，前区上演的角色并不是一定在“愚弄观众”，因为观众在很大程度上只需要演员有限的“叙述”。由于每个人所能展示的行为范围非常宽广，而我们所期待并接受的仅是某个社会场景小范围内的表现。我们期望在餐馆和医生的办公室里会受到不同的对待。我们期望医生看起来自信、精力集中、有耐心、很专业，并有优越感；我们期望女侍者干练、可敬且不打扰人。我们需要这些“演员”的这种不同，即使女侍者是一位打工的医学院学生。

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获得自我的观念，这一事实加强了以表达和印象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稳定性。虽然我们通常愿意将自己看作是自主的个体，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用来定义自我的大部分概念又都是相对的和具有社会性的。当我们认为自己高或矮，聪明或呆板，细心或胆大，能干或不能干，慈祥或严厉，我们都必须将自己同别人相比较。实际上，即使我们想像或者回忆我们在某个社会场景时的行为，我们也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自己。例如，你回忆起自己逃离某个可怕的事情或者进行公共演说的场景，你很可能看到自己是处在某个画面中。在我们真地沿着大街奔跑时，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身体和表情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跳动”的房子和汽车。不过我们常常会忘记自己的感官经历，而是回忆起我们的社会经历在其他观察者眼中的形象。

我们所展示出的自我，并不是简单地戴上的面具，而是我们所具有的个性。尤其是我们扮演某个角色的时间越长，角色就越真实，这一点不仅仅是对我们的观众而言，对我们自己也是如此。例如，毕业

生第一次在大学授课时常常会感觉自己是一名冒充者,但是如果表演“获得”成功,特别是几个学期后,他就可能感觉到“是的,我是一名教师”。正如彼特·伯格(Peter Berger)观察到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假装,通常一个人会成为他所扮演的角色。”^{*}

虽然一些人认为得到自由的关键是拒绝社会角色,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自由取决于选择角色的能力,最大限度控制观看我们表演的观众类型的能力,以及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成为其想扮演的角色的能力。比较这两种自由和自我表达的观点,就可以解释为何戈夫曼的著作既是对自我的否定又是对它的肯定。

戈夫曼等人提出的场景主义与其他社会理论及观点类似,都只是告诉了我们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例如,许多场景主义者忽略或者轻视自我的本能方面,它创造了许多新的现实,并拒绝了社会规范和角色的束缚。不过,将场景方法应用于行为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观察个性特征或者检验对某个独立“刺激”的反应,在相对自主的自我观念和社会行为的研究传统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近期对社会场景的研究曾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状态:现在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承认需要研究自然的社会现象,但是却又很少有人去做。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场景方法几乎没有给出具体可行的方法来代替主流社会心理学家认可的实验室方法。即使看起来简单的场景的研究也是极为复杂的,它包括许多不同的变量,以至于对于习惯了分离和使用少数几个指标的研究人员来说,分析元素就显得有些难以置信的“杂乱”。

* 毫无疑问这个规则有许多例外,但也被许多戏剧性的结果所证实。例如,1981年11月,在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抓到了 一名入店行窃的人,他自称是帕特·萨拉莫内(Pat Salamone),然而到后来他变成了联邦调查局的密探帕特里克·利文斯通(Patrick Livingston)。而在迈阿密他假扮一位色情书画推销者五年以后,利文斯通真的成了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总是自我介绍他是萨拉莫内,且日常行为总是像萨拉莫内一样,连在银行开户也用了这个化名。“60分”节目在对这个事件进行报道时指出,从尚未公开的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发现,其他密探也有类似的倾向。同样的,被绑架人帕蒂·哈特斯(Patty Hearts)宣称,开始时她只是假装加入了“森博尼斯解放军(Symbionese Army)”(绑架她的组织)“但是在行动上我迷失了方向。……我跟着他们做……。我的现状就是他们的现状”。在躲避联邦调查局的几年中,哈特斯错过了许多逃跑的机会,在一次事件中,她拿着半自动武器朝天开枪使得她的两位“同志”逃跑。当她被捕时,她举起拳头,一副公开抗拒的姿态,并称自己的职业是“城市游击队员”。

至于现在,场景主义不仅仅是朝着场景和行为通用理论的方向发展,而且对场景的研究证明了场景主义的可信性。虽然对场景的研究有许多是经验的和理论分析的,但是其大部分都集中描述了在某个文化背景下,某一特定时间内,特定场景中的行为。相对来说几乎没有研究、解释场景影响行为的一般过程,也很少有人试图提出社会场景如何以及会怎样变化的预测,也几乎没有人分析当场景变化时行为会如何变化。事实上,对如何定义“场景”或者描述它的元素还没有达成共识。

从这点来说,戈夫曼的研究很是令人受挫。他提出的理论框架是从大量的观察、细微的枝节和有独到见解的分析中发展出来的,看起来像是有内在的证据。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戈夫曼的原理几乎没有得到发展或应用。原因大概是,为了就行为提供丰富的数据,戈夫曼给出了无数的观察结果,但是几乎没有完整的理论。有人认为它的著作是一种学术独白和小说的混合风格,很难从戈夫曼的书中抽象出原理。实际上,他最重要的原理常常不明确或者在段落的结尾处不经意地给出。更为麻烦的事情是,戈夫曼很少将他早期的著作综合成一部新的著作,他的大部分书都没有标题索引。而当戈夫曼1982年去世时,他正在探索新的社会领域,而不是对他的毕生著作做解释。

虽然场景主义有许多问题,但它确实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角色和行为规则的有用且有趣的方法。另外,特别是戈夫曼的戏剧艺术的模式,为了解新媒介对行为的影响提供了许多隐蔽的线索。这个模式指出,“成为”某种类型的人通常需要恰当的社会环境和观众。因此,任何能够改变社会舞台结构的因素或者使社会观众重组的因素都会对社会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社会现实存在于不同的行为集合中,如果“真实”是与场景相联系的,如果我们对个人整体上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可能会更看不清楚在某个场景中我们面前的人到底“是谁”。那么,当人们发生行为的场景做某种调整时,我们就会看到自我、社会和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理论上的差距:媒介和场景

在试图将媒介理论家和场景主义者的著作融合起来时,存在着

某些方面的困难。从表面上看,这两种研究的主体好像并没有共同点。它们每一个都研究了社会秩序的内容,但是并没有交叉点。媒介理论家描述了媒介如何塑造大的文化环境和组织结构,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媒介塑造特定社会场景或日常社会行为的方式。对大多数的场景主义者来说,他们更关注描述存在于某个社会中的场景和场景行为,而不去分析场景为什么以及如何演化。这种静态的、描述性的方法对分析或预测场景的变化用处不大。此外,场景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关注面对面的交往,而忽略了通过媒介进行的交往。

但是抛开表面现象,两种看法还具有一些共同元素。媒介理论家和场景主义者都认为,在一个系统内只研究低水平的变化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一种媒介中内容的变化或者在一个场景中个人行为的变化)。相反,他们都注重整个环境结构所受到的整体影响。更重要的是,媒介理论家和场景主义者都隐含了相似的理念:接触的模式。场景主义者指出了,我们的行为和语言是如何受到我们知道谁会接触我们的影响的,而媒介理论家认为媒介改变了接触的模式。

将这两种看法融合在一起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理解媒介和场景关系的理论差距。媒介理论家探讨媒介时,好像媒介与面对面交往的动态性没有任何关系,而场景主义者几乎没有注意到媒介的存在。为了将这两种方法融合成一种用于研究媒介对社会行为影响的理论,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共同的观念基础,它将对媒介的探讨同与地点有关的场景的探讨联系起来。我们需要一个理论基础,将固定场景中相对固定的角色行为的描述扩展为分析场景的和行为的变化。另外,我们需要知道媒介和场景的变化在整体上如何影响社会角色。这就是第一部分后面两章的内容。

二

媒介、场景和行为

超越地域:作为信息系统的场景

场景通常是根据有形的地点中的行为来定义的。例如,戈夫曼将行为区域描述为“任何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受到屏障限制的地方”。

罗格·巴克(Roger Barker)认为“行为场地”是“有界的、临时的、有形场所”。劳伦斯·佩尔温(Lawrence Pervin)定义场景为“一个特定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包括特定的人,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活动”。*

许多研究人员在研究场景对行为的影响时,将研究集中在某个具体地点的交往上并不奇怪。直到最近,地域界限和面对面交往仍是获得彼此行为景象和声音的惟一的“直接”方法。以墙、篱笆为标志的有形障碍和界限,同门和走廊组成的通道一样确定了人们流动的方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面对面交往的数量、类型和规模。

另外,这样的有形地域仍然非常特殊。某个给定地点,如一间房屋,有着特别的社会意义。由它的墙、门和地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倾向于容纳或排除参与者。房间的墙在容纳一些人集中交往的同时,也将参与者与其他人隔离开来。物理场地的尺寸便于设定参与人数的上限和下限,他们可以在其中自在地交往。例如,足球场对两个相爱的人来说并不是非常浪漫的交往地点,而电话亭对信托会会议来说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门和墙的厚度、窗户的尺寸和地点(以及有没有窗帘)、该地点与其他地方、其他场景的距离,这些都会对场景的各种潜在定义具有支持或破坏作用。”

虽然传统上关注于以地域为界限的场景有许多合理的原因,不过其中出现一个问题,即行为场所是否必须有确定的地点。也就是说,实际地点是行为最大的决定因素吗?或者说,是否有其他一些东西是地点所依赖的,并因此与地点混同起来了?在戈夫曼对地域的定义中,除了地点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起决定作用,而这个因素在戈夫曼和其他场景主义者探讨行为场所时常被忽略了,它就是“感觉屏障”。实际上,对场景和行为动态性的细致研究显示,地点本身是这

* 当然,场景主义者也考虑许多其他的场景特征,包括任务、目标、规则、角色、传统、临时因素(季节、月、天、时间、会面的长短)、出场人的特征(人数、年龄、性别、身份、国籍、种族、宗教、与其他人的亲密程度),以及对参与者的主观看法。但是地点常常被看成是场景定义中隐含或明确的部分,也许可能因为场景主义者认识到,许多场景因素会因物理地点或其界限发生较大变化而受到影响。

** 某个指定房间内的其他物理变量,如家具的摆放,室内的光线和温度,都会影响参与者的行为。例如,在一间教室里,与固定在地面上排列整齐的桌子相比,能够自由移动的椅子围成一圈对参与者则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交往类型。类似地,接待员的桌子与正在等候的顾客的椅子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接待员或顾客是否会感觉“必须”与他人交往。

个感知领域所包含的丰富概念的一个子类别。场景通常是以谁在哪儿来定义,它隐含的现实问题是其他人可以仔细观察到行为的类型。

例如,戈夫曼描述了侍者在餐厅时是怎样处于“前区”的,以及当在厨房时又如何处在“后区”的。在戈夫曼的分析中后区和前区的关系常常是直接和物理地点相联系的。但是地点并不是真正主要的问题。如果餐厅里没有主顾(例如,营业时间的先后),那么餐厅显然就成了做准备、预演和放松的后区。相反,如果一名顾客走进厨房,在一段时间内(在允许的范围内)厨房就变成了前区。类似地,如果两位侍者在餐厅里暗中以目示意,取笑他们正在服务的顾客,或者当他们碰面时相互低声说“舞台守则”,这时他们进行的就是幕后的交往,虽然他们当时身处“台上”。

对人们交往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实际上,场景定义的讨论可以由直接物质现实问题完全转向只关注信息渠道。如果有一个内部对话在厨房中被曲解地流传,而几位顾客又偶然听到了侍者在后区的嘲弄,这样即使参与者所处的物理地点或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场景的定义也会受到影响。同样的,现实社会的社会场景和社会表演总的来说都会受到引入的新传播媒介的影响。为防止他们的年幼且不识字的孩子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具有读写能力的父母们相互之间可以用文字进行交流。这样虽然有孩子在场,父母们仍建立了一个后台区域。类似地,当两个十几岁的青年通过电话交谈时,他们克服了物理距离,创造出一个不包括与他们一起居住的成年人的后台区域。

在场景研究中,为了包括有中介的交往,我们需要抛弃社会场景仅仅是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面对面的交往的观念。我们需要研究更广泛、更有包容性的“信息获取模式”观念。

这里所用的“信息”具有特殊的意义,意指社会信息,即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自己和其他人的行为和活动。这个术语指我们在传播过程中相互了解到的一种含糊的东西。这种类型的信息是新闻、闲谈、政治活动、求爱以及所有个人和职业关系与交往的核心。它也是绝大多数初级教育的子内容。这种信息以多种方式出现,包括词语、手势、语音、姿势、服装和活动的节奏。从根本上看,这里所关注的信息指的是社会行为——我们相互接触的社会表演。

一般说来信息的这个定义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事实”这一术

语,也有别于小测验提出的,如:“内布拉斯加的首都在哪儿?”或者“议会中第一位女性议员是谁?”一类不重要的事情。类似地,它也不是对人类之前或人类之外宇宙原理的客观描述。按照这种分析,信息与社会秩序有关,与自然秩序无关。它更多地关注于“社会经验”,而不是通常的“知识”。

另一种考虑社会场景的方式是将它看成是“信息系统”,也就是,将其作为接触社会信息的某种模式,作为与他人接触的行为的某种模式。这一定义与大多数场景主义者提出的定义并不矛盾,但是它扩展了场景研究,超出了那些发生在界定地域场所中的交往。

将场景看成是信息系统,打破了面对面交往研究与有中介传播研究二者的随机区分。信息系统的概念表明,物质场所和媒介“场所”是同一系列的部分,而不是互不相容的两类。地点和媒介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

因此,地点创造的是一种现场交往的信息系统,而其他传播渠道则创造出许多其他类型的场景。这种将场景看成信息系统而不是地点的较为广泛的看法,与电子媒介的研究尤其相关。这是因为电子媒介消除了现场交往与有中介交往的差异,现在,在不同的物质场地也能接触到其他地点的人的音容笑貌。电子媒介的广泛采用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场景出现。

新媒介、新场景

我们可以从日常经历中知道,电子媒介跨越了以物质场所为基础的场景界限和定义。例如,当两个朋友进行电话交谈时,他们“所处”的场景与各自的物理位置仅有一线联系。实际上,电话在某种意义上拉近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甚至比与他们所处同一物质环境中其他人的距离近。这解释了为什么当有人打电话时会引起屋内其他人近乎嫉妒的反应。他们常会问“那人是谁?”“她说什么呐?”“什么

• 正如第四章和附录中讨论的那样,知识——或被称为“技术信息”或“客观事实”,被假定存在于社会交往的主观性之外,但通常其结果大部分变成的是关于人、行为和社会秩序的。例如,当伽利略凝望天空时,他得到的“事实”威胁到了天主教堂和他当时的角色构成。因此,技术知识常常掩盖了它具有的与社会信息相同的功能。

事那么可笑？”或者说，“好啦，已经放下电话了！”或他们在身后说上几句评论试图参与进去，或引起电话另一端的人的反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加入同你“在一起”的某人的电话交谈，你必须离开那个人，到另一个房间拿起另一部电话分机。

通过媒介的信息传递和在物质场所的信息传递有许多基本相似之处。例如，电话交谈就大致模拟了这样的场景：四个人在听演讲或一起玩时，坐在一排。在这一场景中，坐在两端的人常会感到相互之间被隔离，同时与中间二人之间发生的谈话被隔离开。相反，中间的两个人可能感到他们之间有一个小协议，能够相互交谈，而两端的人相互间则不能完全接触。

与之类似，当推销员按下门铃后，会迅速检查自己的头发和衣着是否整洁时，他们所处的场景与推销员按完电话号码、电话未接前清喉咙的情景大致类似。开门前和接电话前，推销员仍然处在后台。这时后台和前台的分界线是信息性的，而无需是物质性的。

大多数通过媒介的交往可以用人际关系模拟来描述。看电视有点类似于通过单向透镜观看某一场景中的人，这些被观察者知道他们处于孤立的小屋中被成千上万的人观看着。而听收音机的参与者就会感到就像是在隔着墙或门听别人说话，等等。这一观点表明，虽然有中介的交往和现场交往在某些方面有很明显的不同，但它们可以采用相似的理论进行分析。信息传递的模式，无论是直接的还是有中介的，有助于定义场景以及恰当的行为和风格的观念。

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某个给定的场景中时，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问：“谁会看到我，谁会听见我说的话？”“我会遇到谁？我能听到谁的话？”*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决定如何行动。虽然这些问题过去在评估完物质环境后就能完全回答，但是现在还需要加上对媒介环境的评估。

作为信息系统，而非物质场所，一个社会的社会场景进行调整时可以不依赖于建造或移开墙和走廊，也无需改变接触地点的风俗和

* 在现场场所中，我们也常常问：“谁会接近或伤害我？”实际上，将有中介的传播与现场传播区分开来的情况之一是其不具有身体伤害或亲身参与时可能遇到的危险。某些电话和CB电台谈话所具有的进攻性和色情风格，可被归结于这些媒介提供的亲密和距离的奇特组合。

法律。新的传播媒介的引进和广泛使用,可能重建大范围的场景,并需要有新的社会场景的行为。

当然,交往场所本身并不是场景定义的惟一来源。场景的通用内涵是经过很长时间并通过社会传统发展起来的。宗教礼仪、社会习俗及法律法规都对场景定义的内容有所贡献,它们指导人们利用有效的场所。因此,仅仅是场所本身的变化并不能引起立时的和完全的变化。然而,当社会的“剧本”通过许多途径发展后,演出社会剧就需要有恰当的“舞台”。如果场景的场所出现了融合、分隔或消失,那么就不可能维持旧的场景定义了。

场景和角色理论家倾向于认为社会场景是相对稳定的,其原因之一也许是,墙、门、城市布局、或者其他的建筑结构和地理结构,极少会突然发生大范围的变化。但是,当门被打开或者关上、墙被建造或去掉时,场景和行为都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与麦克风开关的打开,电视机的打开,或者接电话的情形相似。

为了更完全地了解电子媒介对行为的潜在影响,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观察行为和“场景分隔”的关系,留意观察当场景的边界去除后,行为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新场景、新行为

当你坐下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许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正急需你的帮助或建议;一位年迈的亲戚可能需要你帮忙换个灯泡;一位沮丧的朋友听到你的建议后可能会振奋起来;如果你是一位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毫无疑问,许多人会急需你的专业技术。如果这些人中间的某一位与你呆在同一房间里,你有可能放下这本书与他进行交流。然而当你所处的位置与需要你的帮助的人在环境上有一定距离时,你可能会不同的行为方式。但如果需要你的帮助的人与你同在一个地方,这种行为方式可能被认为是不恰当、粗鲁,甚至是充满敌意的。”

•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某个人认识的越长,关系越好,就越容易忽视他们,即使他们与我们处在一个地方,也是如此。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类似于我们在电子媒介长期影响下,增加了对国家和国际问题及争端的认识。

完全不同的行为需要有性质完全不同的场景。这就解释了为何餐馆经理很难在自己的餐馆中“外出就餐”。因为即便是技术上“下班了”，他们也会强烈地意识到及关注可能出现的问题。类似地，当医院内部人员下班后想看点书或吃点东西时，他们通常不会呆在医院急诊室的一个角落里做这些事情。因为当急诊室里有一位正在流血的病人时，医生很难开口说，或让病人听到：“对不起，我不能帮忙，我已经下班了。”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当人们“下班时”，他们一般会呆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

在一个给定的场景中特定角色间相互接受的能力常常取决于我们对在其他场景中相互之间有限的认识。例如，当一个男人发现自己和妻子约见的婚姻律师是自己的前妻时，他可能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同样，当一位年轻女士发现医生是高中时迷恋自己的某位男生时，她可能不愿意在这个医生面前脱掉衣服。在这些例子中旧场景和新场景之间缺少足够的隔离，这样很难接受新的定义是“真实的”。出于这种原因，在某个场景中相互熟悉的人们在另一个场景中遇到时，有时双方都会感到很尴尬。你想一个人在鸡尾酒会上会对自己的妇科医生说些什么呢？

而将一个场景当成另一个场景来反应是很难的。父母会在劝告一个小孩必须吃光盘子里的食物时说，“因为非洲的儿童还在挨饿”，这通常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不可能有饥饿的非洲小孩被透过窗户看到。场景的分离使得行为分离。正是通过场景的分离，使得即使是默默奉献的医生和老师也能在某些时间休息和娱乐，尽管在其他地方肯定会有病人因疏于照看而死亡，也会有一些小孩因无知受到指责。

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在某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都可能使我们悲伤，使我们卷入，也可能会耗尽我们的精力、占据我们的情感。而还有许多事情如果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觉得自己必须有所反应，或者做点什么以符合自己一生中理性的经验。场景的分离就像是精神——社会的缓冲器。通过有选择地将自己暴露在事件和人物面前，我们控制了自己行为和感情的传递。爱、同情，甚至伦理可能是更多地同场景联系在一起，这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想像。

如果整个的社会场景模式突然发生大规模的变化，我们的社会行为会是怎样的呢？不幸的是，研究场景的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几

乎没有论述。对于戈夫曼和其他场景主义者而言,场景及其相匹配的角色是相对稳定的。他们认为场景的界限有时是会被打破的,但这又常常被看成是不正常的和暂时的。即,某个人说的话或做的事可能不恰当,不符合行为规则,或者信息可能从一个场景“渗漏”进另一个场景(引起混乱和尴尬),或者两个不同的场景发生了融合,但是最终,旧的定义又将重新得到维护。

例如,孩子可能醒后从卧室出来,进入他父母开的晚会中,这样会引起某些大人的尴尬,他们会感到通常自己不在孩子面前出现的言行被偶尔听到或看到了。或者当一位年轻女主管的父母来看她的办公室时,坚持对他们所遇到的每个人说当女儿还是孩子时,常常做的一些“聪明”事,她就会感到非常尴尬。但是,一旦孩子回到床上、女主管的父母离开办公室,旧的定义常常又恢复原状。

即使在极端情况下,个人表演者丧失体面并永远失掉信誉时,类似的场景和表演仍然继续不变。因此,当一名原本杰出的教授在一次全国会议上出现时喝得大醉,不能发表重要演说时,通常情况下会议和教授们不会有大的改变。类似地,少数个人主管、医生或法官不专业的评论或行为并不一定会改变公司、医院或法院的基本社会定义。

到目前为止,使许多场景主义者感兴趣的是,场景的定义是如何免受这些扰乱的危害,以及受到扰乱的这些场景是如何修复的。我们从上述这些分析中不能说明,当场景的变化相对持久时,行为会是怎样的。如果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新媒介对场景边界影响的方法,来研究新媒介对行为的影响,这恰恰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信息。

为了研究媒介对行为的影响,我们需要将某个场景中行为的静态和轮廓性模式,转变为可变的和可预测的模式。我们需要提出通用的原理,使我们能描述场景和行为的动态性。本章的后面部分提出了几个这样的原理:对应于“行为总合”的“场景模式”的重要性;对单一的场景定义所需条件;“深后台”、“前台区”和“中区”行为随着场景分离和融合的产生;以及所有个人前台和后台表演的相互依赖性。

可变的场景模式

社会现实并不是存在于人们行为的总和中,而是存在于所有场

景行为模式的总体之中。因此，当两个不同场景之间的界限移动或消失之后，社会现实就会发生变化。与大多数场景研究推论相反的是，场景分离和融合的模式是个变量，而不是个人或社会存在的不变量，场景的交叉有着无数的进程和模式。个人的生活决策、偶然机会以及其他的力量，包括社会对媒介的使用，都能改变场景分离和融合的模式。

然而我们往往采用以“什么或谁在其中”的方式来思考场景，也常常用“什么或谁不在其中”来定义场景。一个环境中社会信息的获取模式以及可获得社会信息的限制塑造了那个环境下的行为。例如，高中男生在更衣室的说话方式不仅是由其他男生在场决定的，也是由女生、父母、老师和校长的不在场决定的。

决定一个场景与其他场景分离程度的主要因素是，将场景和场景分开的边界的性质。环绕社会场景的边界能影响行为，不仅因为它们能够完全包括或排除参与者，也因为它们能部分地包括或排除参与者。一个人可能在视觉上被墙排除在一个场景之外，然而由于视觉障碍很薄，使其在听觉上又被包括在那一场景中。同样的，媒介可以通过信息传递的传统的限制影响场景的定义。例如，理查德·尼克松发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有一台录音机，这使得他在“衣帽间”的私下谈话被当作公众声明来评价。

电子媒介通过改变社会场景的界限，不仅是简单地使我们更迅速更详细地接近事件或行为。它们还给了我们新事件和新行为。

例如，麦克卢汉写道：“杰克·鲁比枪杀了李·奥斯瓦尔德，当时在奥斯瓦尔德的周围满是被电视镜头麻痹了的卫兵。”虽然麦克卢汉并非故意这样写，也许他的本意是，卫兵没有对突发场景进行恰当的反应，是因为电视的镜头模糊了卫兵的角色功能和卫兵的“观众”身份。他们是到现场的人还是看电视的观众扮演角色呢？他们是到这里来威胁人们并对人群混乱作出快速反应吗？或者他们在那儿是为电视画面充当权力的无声而僵硬的标志？

当然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是它表现了许多美国人所面对的场景。他们会发现自己活动在新的场景，有新的观众，他们以一种新的令人迷惑的方式接近别人，别人也以这种方式接近他们。这些变化影响着从华尔街到白宫的所有人。

例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倡议黑人权利的斯托克利·卡迈

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发现自己引起了媒介的注意时,他对这个大的社会舞台的接触结果变成了灾祸,而不是福音。在电视和电台这种大家共享的舞台上,他发现自己要同时面对至少两种不同类型的观众:他最初的黑人观众和“窃听讨论”的白人观众。在个人(无中介)表现上,他能够分别对黑人和白人进行两种完全不同的黑人人权演说,但是在电子媒介的混合论坛上,他必须决定是使用黑人或是白人的修辞风格和内容。如果他使用了白人风格,他会疏远最初的黑人观众,并且使其达到给黑人以新的自豪和自尊观念的目标失败。但是如果他采用了黑人的修辞风格,他会与白人疏远,其中包括许多支持给少数民族充分权力的自由人士。由于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找不到折衷的风格,卡迈克尔最后决定在有中介的演讲中使用黑人风格。这样虽然他点燃了黑人观众的火焰,但是也对他的第二类观众灌输了仇恨和恐惧,以及引起了对白人权力结构的愤怒。

类似地,当记者在电视镜头前与总统夫妇会面,总统和第一夫人应该有怎样的行为呢?这个场面是三者之间亲密的社会交往,还是在全国观众面前的公开表演呢?答案是两者都是,却又都不是。总统的行为既不能显得好像只有他和妻子同记者单独在一起,也不能类似于像在盖茨堡对公众进行演讲时那样,而应改变行为以适应特定的社会场合。在某种程度上,新的场合导致了新的行为和新的社会内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有了不同的场景,也有了不同的总统,而且长此以往还会有不同的总统职权。

但是当场景模式改变时,旧的场景定义到底会发生哪些具体变化呢?当场景融合、分离较长时间,我们是获得全新的行为模式还是仅仅是旧场景各小部分行为模式的简单组合?也许我们根本没有得到显著改变。也许我们得到的仅仅是混乱。而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对大多数的社会场景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统一界定的条件

就像第二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当人们被邀请去参加晚宴、会议或者其他的社会集会时,他们希望知道该场合是欢乐还是沉痛、正式还是非正式、私人的还是专业的,以及交往是在平等主体之间还是有优劣之分的人群中进行的。但这不是单纯一个好奇的问题,这种“场景

的界定”有助于确定参与者的服装、姿态、语言模式及风格、精神状态、情绪等。虽然场景的定义常常在参与者的意识之外,但它就像是胶水将交往的许多元素粘合在一起。另外,因为每个参与者都必须以一种基本相同的模式穿戴、说话和行事,所以似乎需要对每个社会场景有一个统一的基本界定。

对大多数场景有统一的初步界定的需求,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场景融合或分开时通常会发生什么。当两个场景融合后,我们很少是得到两个场景的简单组合,而是常常会演化成具有统一新规则和角色的新场景。例如,两对夫妇要参加一个“双约会”,这时出现的场景不是两个独立约会的总和,而是第三种新场景。实际上,在双约会中常见的模式包括两个男人之间的交谈和两个女人之间的交谈。类似地,当一对浪漫的夫妇搬到一起住时,他们得到的并不是浪漫的交往再加上日常生活所需,而是一个全新的交互系统,他们做爱以及付账的习惯都会发生改变。

场景的长期融合和短期融合所产生的影响有很大的区别。截然不同的场景突然发生暂时的融合,会引起行为的混乱。由于该场景没有明确的定义,会使所有的人感到尴尬、迷惑,或者感到愤怒。譬如,在晚会上某人打开卫生间的门,却发现里面已经有人,而那人又忘记了插门,这两个人此时可能会非常尴尬。

场景暂时的打破仅会导致迷惑和混乱,而永久或长期的打破会导致新行为模式的诞生。例如,当人们在相同的物质场地进行具体的日常工作时,一个新的稳定的场景界定必然会出现。这就是在Peruvian 英式足球队里发生的情景,他们的飞机在安蒂斯(Andes)坠毁。《活着》(Alive)这本书详细描述了他们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以及相互之间关心对方大便状况的对话。相似的场景也会发生在长期住在一起的室友或一起生活多年的夫妇身上。

场景融合的状态有着必然的“文化逻辑”。实际上,混合场景的新界定有时会产生那么多的“含义”,我们常常注意不到原来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代之而出现的是第二个场景。然而在新场景中常常会发生许多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原来的两个不同的场景中都不可能发生,反之亦然。例如,娶了自己雇员的雇主会发现有许多新行为是原来行不通的,同样也有许多要求不能再提,许多行为不再合适。而这

种新的关系既不是“丈夫和妻子”也不是“老板和雇员”。*

在亲戚、朋友和商业伙伴中,所有独立的关系中可以包括对不在场成员的抱怨或嘲笑,也就是说,如果所有成员都在场,这些行为则会显得不恰当或者是粗鲁的。这种原则可应用于媒介所创造的场景融合或分离中。

虽然我们常说希望人们能“前后一致”,我们通常是指,他们应当“根据场合前后一致”。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要求其他人在同一场景内对待我们要前后一致,而很少关注跨场景对待我们的前后一致性。例如,购物者在某天容忍了购买某一货物时多付了钱,而在隔天则不行。他们甚至能够容忍在不同商店购买同一货物时付出不同的价钱,但他们通常却不能容忍在同一家商店的同一时间和地点所买东西比别人贵。类似地,通常,大学生都能接受同一教授在不同学期对同一课程的要求有所修改,但如果同一教授在同一班中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则可能引起学生抗议的喧闹。因此,场景边界的改变,能改变人们对平等和公平的看法,从而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后面我将会论述关于媒介的变化造成的场景边界的改变与近期的女权主义者和少数民族意识的出现有很大关系。

总体上可以指出:(1)行为模式可以分成与不同场所同等数量的单个定义;(2)当两个或多个场景混合后,它们各自的定义融合成一个新的定义。

这些原理显示,社会系统的动态性,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与物质系统的动态性非常类似。社会系统和物质系统都可以按照不同的系统分成不同的状态,而混合系统倾向于混合成相对一致的状态。例如,可以使两个独立但相邻的房间保持不同的温度,如一个是40度,

• 由于场景的融合破坏了旧的界定,而保持场景分离状态有许多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如:精神病医生不能与病人有情感上或性方面的关系。军方强烈反对“结交”——即上下级之间的友好或浪漫的关系。类似地,老师不应与其学生约会。而许多通俗的说法认为将商业关系卷入浪漫感情是多么的不明智。因为无论个人关系增进还是破裂,相互之间都很难维持旧的商业关系。何况某些融合的角色有着道德方面的问题,这种关系是混乱的,各相关个体的目的常常是模糊的。实际上,对这种乱伦的禁忌的一种解释是,它考虑到一种非常特别的明确的关系——爱、照料和教育而非性关系。当然,人们常常打破这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例如,由于过去和现在的人际关系产生的结果,使许多工作场所充满了仇恨,并常常存在有完整体系的不成文规则和行为模式,但这些没有出现在组织的章程中。

一个是4度。如果两个房间之间的墙被拆除,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整个组合的空间会达到一个相对一致的温度。但是温度不会是44度(两个不同温度之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温度。类似地,人们在不同的场景中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但是当两个场景融合后,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综合定义。这种物理模拟可以进一步地扩展。正如在一个房间内从上到下,从中间至墙边的温度会有变化,而对于某个社会场景的界定也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在一个婚礼中,有的人完全地投入到仪式中,而有的人则介入较少,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并未完全在其中。

“中区”、“深后区”和“前前区”的行为

以往不同的场景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单一场景,那么是否有方法来描述与旧场景相关的新场景?而旧的行为与新的行为的关系又是什么?

戈夫曼的后区和前区行为模式描绘了一组静态舞台,它仅局限于面对面的交往上,但其中暗含的原理经过修改可用来描述新媒介所带来的场景和行为的变化。区域模式暗示了后区和前区的相互依赖。个人的台上表演依赖于后台区域的存在。在这个与观众隔绝的区域中,表演者可以了解自己的角色,进行演练,与其他表演者讨论策略,或只是放松或保持沉默。因此,如果表演者不能将其后台行为与前台行为分开,他们不仅会没有了隐私,而且也会失去表现前台角色某些方面的能力。如果演员没有地方私下演练台词,他们就不能完成动情的表演。例如,住在一起的人经常相互帮助,演练在其他社会舞台上的舞台角色,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私人的地点和时间来为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而进行演练。

在这种社会表演的戏剧化方面,有时有后台区域,有时则没有。这种观念可以扩展成为台上和后台风格相互作用的持续的、变化的模式。总体上来说,无论演练的哪个方面让观众看到,它们必须与演出本身整合为一体。无论后台的时间和空间还有多少被隐藏起来,它们都能被用来完善表演。无论台上和后台行为的分界线朝哪个方向移动,戏剧的性质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演练空间失去得越多,台上的戏剧就越能代表一种即席的后台演练。当后台区域的面积增加

时,台上的行为就变得越来越正式。

以后区和前区观念为基础,在混合场景中出现的新行为可被称为“中区”行为。相反地,从场景的分离中产生的两类新行为就被称为“深后区”行为和“前前区”行为。当观众有了“侧台”观念时,就出现了中区行为。也就是说,观众同时看到了部分传统上的后台和前台区。他们看到了演员从后台到台上,然后再回到后台。为了适应新场景,有能力的演员会调整他或她的社会角色,以期与观众所获得的新信息保持一致。中区或“侧台”行为模式包括最初的台上和台下行为模式的元素,但又缺乏两种行为模式的极端行为。“深后台”和“前前区”行为会因为演员与观众的分离程度的增加而产生。场景新的分离造成了粗犷的后台风格以及更为质朴的台上表现。

在中区行为中,因为表演者不再拥有必需的后台时间和空间,以往前区的极端行为消失了;对支撑旧的前区角色的演练和休息的控制也在削弱。新的行为常常缺少以往后台行为的极端性。由于新的中区剧也是公开的(也就是说,在一名“观众”面前表演),因此,演员需尽可能地适应观众的在场,但仍将能隐藏的都藏起来。

例如,如果孩子们出现在成人的晚会中,有关死亡、性和金钱的谈话就会停止,直到孩子们离开。但是,如果孩子们呆的时间较长,则会有某种新的折衷风格的行为出现。“成人的”话题当着孩子们的面进行,但其特征既不是明确的成人晚会,也不是成人和儿童共同参加的非常纯粹的那种恰当的风格。事实上,成人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成年人孩子气的一面就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在成人话题中,并对其进行谈论。正如后面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情景模拟了当电子媒介使儿童和成人信息开始融合后,孩子和成人的角色所发生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区行为就是新的前区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们看成是前区行为,就无法看到行为变化的性质和方向。通过将新的行为描述为“中区”或“侧台”,我们可以将新的行为与旧的行为进行比较,我们能够得到新戏剧的综合特征。另外,中区行为的观点解释了产生新的公众风格的过程:即传统的后区与前区行为分界线的移动。

中区风格似乎有“后区偏向”。造成这种偏向的部分原因是,我们生活中的后区包括许多不会消失的东西:如,睡觉、吃饭、大小便、

性行为、沮丧、焦虑和疑惑。相比而言,前区的行为更加灵活多变。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种不同于人的前区风格,但是后区所包括的内容都是相同的。中区行为具有显著的后区特征的另一个原因是,观察新出现的东西容易,而观察刚刚消失的东西较难。例如,我们第一次住在一位新朋友的家中时,我们会注意到新朋友打鼾或打嗝,而忽视他的说话风格失去了某些正式的特征。

中区行为的后区偏向随着时间的增长会越来越明显。在短时间内,显露出的后区可以转变成相对传统的前区表现。表演者对其他人接近自己的控制和限制越少,会使更多的后区行为暴露出来。例如,一个平常不爱整洁的十几岁的青年人,当他的姑姑在复活节到他家吃饭时,他会打扫自己的房间。但如果他姑姑玛丽要是住上6个月的话,毫无疑问她会看到他完全不同的表现。类似地,对白宫的电视旅游显示了以往看不到的房间和会议室,这在一段时间内会变成前区的戏剧(例如,艾森豪威尔的“内阁会议”的原稿和电视稿)。然而,即使电视显示了全天的“现场”过程,表演肯定会有所改变。因此,当卡特在白宫的特别电视节目中,观众听到吉米·卡特提醒埃及总统安瓦·萨达特(Anwar Sadat),他们要举行一个相当长的会议,在此之前萨达特最好先去下卫生间。无论是亲临现场还是通过镜头及麦克风,当人们被观察得时间越长越仔细时,他们的行为就会越多地剥去其社会的标志和姿态的外衣。

当一个场景分成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区域时,完全相同的反过程也会发生,即每个区域的行为变得更加具体和极端。例如,当孩子搬出父母的房子后,他们各自居住的隐私使得父母和子女能够形成更加个性化的私人行为风格,以及相互之间调整过的“更明确”的前区。类似地,政治领导人保持的隐私越多,非正式的后台风格与前台“杰出的领导人”之间的潜在对比就越突出。因此,当一个社会的主要媒介形成许多不同的信息系统时,它们同样会支持最前区和深后区的行为风格。

区域行为的动态性以及电视对它的影响在日常交往中几乎看不出来,这是因为人们很快就适应了场景的新定义。通常,角色的扮演者控制一切可以控制的后台信息。但是如果有破坏性的后台信息跑到了前区,它常常会与表演形成一个整体。例如,某位参加晚宴的客人到达的时间比预料的要早,并目睹了主人和孩子们的争吵,以及最

后一刻打扫房间和准备食物过程,主人就会发现很难再扮演客人准时到达时他们所扮演的前区角色。结果可能会引发一些中区的讨论——“这些年孩子的养育问题”,或者让这么大的房子保持干净根本不可能等。由于这种出乎意外的“行为”,是很多社会表现自身的一部分,所以重要的是,观众不能变得太在意隐藏后区信息的意图。

“更深”的后区和“更前”的前区行为的形成过程,与中区行为的形成过程相比,观众更不容易看到。因为按照定义不再看得到的是不会被拿来仔细查看的。当新的私人场景形成时,人们很少思考到它对结构变化的影响;相反,新的行为常常归因于性格或动机的变化。当年轻人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他们的家人和邻居可能开始认为他们“更成熟”了。类似地,国内的政治家从当地的政治中暂时隐退到“私人场景”,然后再进入全国的场景,以一种更具有“主宰意识的”面目出现。

新传播媒介的采用以类似的方式造成了社会交往模式的广泛而重大的变化,人们无法完全意识到变化的程度和性质。在每一种给定的交往中,个人常常感到自己仅仅是在适应自己所处特定场景的需要。人们会惊讶为什么行为模式好像发生了变化(或者更可能是,为什么“人们”变了),而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与后台和前台场景的分界线的移动有关。

行为系统的相互依赖关系

前区/后区模式通常用来分析单一场所的行为,如餐馆和医院。一旦我们超越了单一的场所,很难直接套用这个模式。前区/后区这种区分方式过于简单。例如,对于同一个人而言,几个不同的前区表演的关系是什么?

这种戏剧艺术模式可以进一步地用来表现所有表演和行为场地的相互依赖关系。某个个人在某个角色中的前区行为,不过是其他角色的间接的后区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前区的行为都依赖于多个前区和后区。例如,一个人是否具有扮演好法庭律师的能力,不仅有赖于良好的法庭表演以及用来准备答辩书和与同事讨论策略的后台区域,而且有赖于他过去和现在表演其他角色的相对较好的能力(不需特别显著),例如,学生、纳税人、父母和配偶等。这些与同

事之间的策略讨论会相比,可能与法庭风格的关系并不明确和直接。但是作为律师的表演仍然依赖这些其他的角色,也依赖于与律师角色隔离时对这些角色的表演。律师的驾驶习惯、婚姻关系及其父母风格方面的信息可能会影响到律师在法官和陪审团眼中的可信度。

由于大部分人都试图对每一位观众展示自我的某种相对一致的个性,所以对于观众从其他场景中得到的我们的行为的任何信息,在我们进行一项表演时都要将其考虑在内。^{*}因此中区行为的概念可因某个角色被扩展,超出后台行为和台上行为的融合之外。中区行为,可以指任何两个或多个以往不同场景的融合所产生的行为。相反,当任何场景分隔成两个或多个不同场景,或者场景之间的距离增加时,“深后区”和“前前区”的行为就产生了。场景和观众新的交叉就产生了中区行为,更加“纯粹”的或者更加极端的行为与更加专门和独立的环境匹配的可能性,就形成了“深后区”和“前前区”的行为。

大体上讲,两个或多个场景之间的距离越大,一个人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的行为变化也就越大。相反,场景之间的距离越小,其中发生的行为就越相似。以学生和老师的角色的区别为例。一个人不能同时既是听话的学生又是严格的老师,但是同一个人却又常常被要求扮演这两种角色。约翰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大学生,如果他的老师史密斯女士因要去参加一次专业会议而要求他来主持课堂讨论,约翰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综合角色。这种现时表演的“学生/老师”角色,既不是他在同学面前曾经扮演的角色,也不是真正的老师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如果当老师离开时,约翰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其本身的学生角色,那么他对班级的影响就会很少或几乎没有。而如果他扮演典型的真老师角色,他则可能会被同学取笑或憎恨,因为他们对他知道得太多,而无法接受他的“老师”角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里当他试图扮演老师角色时,他曾表演得很好的前区学生角色开始成为后区行为的潜在损害。)

以下这一场景变化可以用来说明场景之间的相距的程度对行为

* 在所有能得到的信息中对要求的一致性的一个例外是真正亲密的关系。两个人接受对方行为的不一致,就像接受自己的一样容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浪漫的语言显示出爱使“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但是也许事实是爱情使一个人变成了许多人,至少在一个亲密的社会环境中是如此。

的影响。如果史密斯女士要约翰接管的是这所学校的另一个班级,约翰则能更加完全地扮演老师的角色。如果史密斯女士本人是另一所学校攻读更高学位的学生,那么史密斯女士的老师角色和学生角色的反差可能更为巨大。场景的距离造成了行为风格的分离程度。这种“距离”是由时间和空间决定的。例如,所有的老师都曾经是学生,但是时间上的隔离使得这些角色差别很大。

这种面对面场景及行为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对电子媒介使社会场景的融合与分离所引发社会变化的方式的一种模拟。新媒介倾向于分隔现存的社会信息系统,它允许个人形成“更深的”后台和“更前的”前台的行为风格;而新媒介具有的融合现存的信息系统趋势,导致了“侧台”或“中区”行为。

对于研究媒介变化对日常社会行为的潜在影响,我们与其基本框架仍有一段距离。我们研究时需要超越具体场所个人行为的变化,而考虑在总体上当所有的或大部分的社会场景发生广泛的、系统的变化时,社会角色是如何和为什么发生变化。

三 媒介变化时角色为什么会改变

信息传递模式是社会状态的基本元素。一个社会中处于相同位置的人通常接触到的场景或信息系统是相似的。社会地位不同的人通常接触的社会场景不同。例如,传统上儿童被限制接触某些类型的场景,及其中所能得到的信息。类似地,男人和女人传统上被分隔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新媒介(或者其他因素如工业化、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出现造成了社会场所普遍的重组,因此,这不但影响了许多个人的行为,而且影响了整个同类人的行为。新媒介通过改变各类社会人群所接触的场景类型,改变了我们对各种社会角色的认识。

当然,在一章内讨论到每一种社会角色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本书中分析了三种角色类型,隶属或者“作为”(群体身份)的角色,转变或者“成为”(社会化)的角色,以及权力(等级)的角色。

在日常生活中,这三种类型的角色相互重叠交叉。大多数人同

时具有这三种角色的职能,他们被归入几个不同的群体中,处于新角色的不同社会化阶段,及一个或数个等级体系中的特定级别中。另外,这些类型本身也有交叉,而且就某一个具体的角色来说可能不会完全符合。例如,成为一名“新兵”,其最根本的功能是社会化,但它也包含了群体身份和等级制度的问题。而成为优秀阶层的一员,其同时也具有等级制度和群体身份的元素。

虽然角色的类型有其内在的联系,但是它们又各有各的特征。群体身份与其他类型身份不同,它赋予角色“分离但平等”的地位,不同群体的成员不必处于某一特定的等级关系中或是发展关系。社会化角色在三者中是最独特的,它包含了“成为”的过程,也就是从一种角色到另一种角色的转变。它不同于单一群体的成员(例如,医生与律师),一个孩子被期待着长成大人,一位医学院的学生被期待成为一名医生。与群体身份和社会化角色相比较,等级角色包含着“独立的、不平等的”一面。

之所以选择这三类角色,是因为它们之间相互独立,但结合在一起时又相互包容。也就是说,这三种类型的角色结合在一起可以覆盖各种社会角色的各个方面。群体身份、社会化阶段,以及等级制度中的级别,三者的重新组合将改变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

本章给出了一种相对传统但又与之有一点重要变化的社会角色观点,它采用了与分析信息系统相类似的方式,也就是上一章所讨论的共同基础概念,对每一种角色的特征进行了诠释。虽然角色常常被简单地当作“恰当”或“期望”行为的静态状态来分析,但本章从与他人相比较,人们知道或经历了什么这个角度来描述角色。每一类角色——隶属、转变、权威,都用三个变量——社会信息的相对关联,后台/台上的区别,以及与物质地点的关联——来讨论。我试图通过显示这三类角色是如何依赖这些场景变量来说明,所采用的传播媒介发生变化后,一个社会的社会角色构成是多么容易发生变化。本章中没有详细分析电子媒介对社会角色的影响,这被留到了后面的章节中。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大体给出媒介变化引起社会行为变化的原理或步骤,并指出当媒介发生变化时角色变化的普遍趋势。

• 角色、地位、群体身份、社会化以及等级的概念在附录中将作进一步的讨论。

群体身份：共享且隐秘的信息

共享且隐秘的行为将使任何群体粘合成共谋团体。

——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

“我们的”经历与“他们的”经历

许多有关冒险、间谍和怪兽的电影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理念。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被扔进了某个有极大危险的环境。最初，他们互不关心，而且实际上，某些时候他们还相互嫌弃。但是在为了生存，或者为了获得不信任或漠不关心的外人的帮助时，或在消除环境威胁与恐怖进行的战斗中，他们坠入爱河，并且相互委身于对方。

这个熟悉的电影脚本可能在其范围和细节上是神秘的，但是它毕竟展示了所有人类团体或群体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对共享的但特别的经历的需求。

一个群体是由其所具有的特殊的東西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特殊性”是由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且不与其他群体的成员分享的信息所构成。另外，虽然在我们考虑群体时，常常想到的是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能偶然遇到那些人，同样的信息因素会对某个人的群体或社会类型身份的观念起作用，尽管这些群体或社会类型的人从未全部会面过。例如，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们都共同享有在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中当兵的经历。这个经历将他们联系起来，但同时也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开。

不幸的是，群体身份总是包含着“排他性”的意思，这涉及到不在群体内、且不分享相同场景的那些人。一个群体要成为“我们”，则必须有“他们”存在。西蒙尼·迪·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表达了这种包括/排除群体感觉的出现是多么的容易和频繁。“如果三个游客偶然坐在了同一车厢，就足以对火车上其他乘客形成一种模糊的具有敌对意识的‘其他人’。”

所有共同的经历、信息将两个或多个人与其他人分开，会使人们有一种共同身份的感觉。但是由于社会经历、信息和角色都是与场

景相联系的,因此群体身份会随着场景的变化或参与者的“内部人”和“外部人”观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两位在佐治亚州相遇的纽约人,可能会感受到有一种纽带即刻将他们联系起来,与佐治亚人“相对立”。同样,在意大利相遇的一位佐治亚人和纽约人也会感到相互之间有着相似的联系,这是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他们的谈话可能注定是沙文主义的群体话题:对“家”的赞扬以及对“外国人”的嘲笑。类似地,当两位正在争吵的黑人听到某个过路的白人喊出种族蔑视的口号时,会突然感到一种联合。相反,一个曾经小的但很统一的群体会因为许多新成员的加入而分成更小的因子。

个人常常具有交叉的群体身份。例如,医生可能认为自己与护士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是在手术台上与病人相对时,医生和护士就会感到自己是“手术小组”的一部分。海军、陆军和空军的成员之间可能会相互竞争,但是与平民相对比,则会有一体的感觉。有时候,战斗中的士兵甚至会体验到一种与“敌人”的联系,这是由于他们与其他类型的人相比较同为相似的角色。类似的超越类型的纽带也可能出现在一个案例对立双方的律师身上、相互竞争的公司的秘书之间,或者宿仇家庭的孩子们之间。

无论群体交叉的复杂性,还是临时的社团或群体出现的突发性和简单性,都不能使这类群体的存在的形式显得不真实或不重要。在循着社会交往的经络编织我们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与他人有着多种非线性的联系。但是从把这些联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其分开的过程来看,所有的“集团”都有某一共性。联系和纽带的本质,无论它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能通过与他人的对比将相似的场景和经历联系起来。

因此,当我们简单地用我们是“谁”的方式来考虑群体隶属时,我们身份的感觉也被我们在哪儿?以及“谁”和我们一起所改变。由媒介或其他因素的变化所造成的场景结构的变化,会改变人们对“我们”和“他们”的感觉。为了预测新媒介对群体身份的影响,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新媒介如何改变“谁同谁分享社会信息”。随着

社会信息系统的融合与分离,群体身份也会随之变化。*

后台的团队

共同的经历是群体联系的基础,这也可以将前台和后台行为的区别联系起来。相同群体的成员倾向于共同承担同样的角色或进行同样的表演。甚至可以在快速形成的群体中看到共享后台的权力。所以,坐在同一节车厢的乘客——这是改编的迪·波伏瓦的例子,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有一共同的角色就是“7号车厢的乘客”。当这些乘客在一起度过了旅程的大部分时间,在他们被抱怨太吵,或者一个醉鬼想进入他们的车厢时,他们就有可能发现自己和车厢内其他乘客形成了统一的战线。

按照戈夫曼的说法,这些乘客成了一个“小组”。而一个小组成员与观众成员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场景的看法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有关表演的信息量的多少。小组成员对表演知道得比观众成员更多,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后台和台上两个场景的行为。小组成员倾向于关照相互的表演,并且团结一致保护所表现的场景界定。长期生活或居住在一起的人们会形成非常强的小组关系。

“小组”这个概念可以进一步扩展并用来模拟所有的群体,即使是那些成员不共享相同的具体表演或后台的群体也一样。例如,所有的教父虽然不在同一个教区工作,但他们在宗教和自己的角色方面有着大体相似的信息类型。实际上,所有的神职人员,无论宗教信仰为何,都倾向于共享着相似的舞台偶发事件、问题和各种可能性。

共同拥有的后台使得一个群体或小组行动一致或者以相似の方

•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的“看玻璃中自我”的观念以及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一般化的他人”的概念,都有助于解释信息获取的能力以及它和个人身份的关系。根据这两位思想家的观念,当个人开始吸纳别人的看法,并用别人评价自己的方法对自己进行评价时,他们就形成了社会自我。因此“我们所显露出的”价值和标准对我们自身的观念有着巨大的影响。出于这种原因,基本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反过来也与个体所具竞争参考点的总数有关。许多群体都将“陌生人”和“外人”看成是威胁,因为他们是潜在的“重要的其他人”,他们的看法会使群体成员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观察和评价自己(类似地,父母总是非常关心孩子们对朋友的选择)。书刊、电影和电子媒介也提供了其他角色行为的信息,这与在家庭、教堂或学校的面对面交往时所学到的信息形成了竞争。这种相互竞争的社会观念的力量非常之大,以至于长期被绑架的受害者,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开始从绑匪的角度评价自我。

式行动。与之类似,一个群体的台上行为也要求其他群体的成员或观众不去接触该群体的后台演练和休整。互补的角色常常依赖于对后台场景及其信息接触的严格控制。如果两个人能获取相同的舞台信息,那么他们就很难扮演相互非常不同的角色。例如,传统的律师/客户关系要依赖于律师和客户不同的群体身份。老师/学生关系也依赖于这种区别。因此,一位律师会成为另一位律师“很差”的客户。他或她对台上的律师角色知道得太多,以至于无法具有一般人的表现。类似地,当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去听另一位老师的讲课时,两个人都会感到不舒服。

由于“我们”的确切的感觉依赖于共享相互间的后台行为,而“他们”的确切的感觉有赖于不接触其他群体的后台行为,所以电子媒介的变化,通过为许多群体提供新的显示或隐藏后台行为的方法,使得社会的群体身份有了新的排列。

“我们的”地方与“他们的”地方

由于地点和场景的传统关系,群体身份常常与对物质地点共同而特别的接触密切相联。个体因在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被“孤立在一起”而获取相似的经历。群体身份与物质地点的关系解释了原本令人迷惑的说法:“我非常高兴我们终于可以单独呆在一起了。”

共同但特殊的经历所产生的力量令人敬畏,这种经历来自于长期共享相同的环境,而这种力量在专业会议、夏令营和“疗养”这些短期聚会中被暗示了出来。这些场景突然随机地将人们聚集在了一起,然后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又将他们分散开,而他们通常都能成功地将陌生人拉进一个群体,同时将其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

群体身份和群体领地的关系受到了地点和信息渠道传统关系的束缚。为了“处在”一个群体内,分享它的经历和信息,一个个体一度不得不处在恰当的地方。由于一起被孤立 in 相同或相似的地点,群体的成员通常生活在自己的信息世界中。物质地点传统的信息特征一度隔绝了参与者,创造出一种共享的特殊的信息系统,它将群体成员联系起来并把他们与“外人”区分开来。接触某一群体的领地曾经是加入此群体的基本手段。

因此,另外一种预测新媒介对群体身份影响的方法是,考查媒介支持或破坏不同物质地点与独立信息系统之间传统关系的方式。例

如,电子媒介损坏了物质地点和社会场景的传统联系,电子媒介模糊了以前不同的群体身份,允许人们在信息上“避开”由地点所确定的群体并允许外人不用进入其中就能“侵入”许多群体的领地。

角色转换:对群体信息的控制接触

任何人前往某个他既无熟人又言语不通的外国时,都会体验到儿时的无助感。

——舒拉米史·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

当你长大后我们会告诉你

社会化是一个“成为”的过程,是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的转换。因此社会化与上述的群体身份的信息特征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社会化过程的目标都是为了获得那个群体“共享而特殊”的信息。

某一被社会化的进入某一群体的个体被排除在该群体的整个信息系统之外。例如,小孩被排除在成人生活的许多“秘密”之外,包括成人场景的全部界定。当然,一个被社会化的进入某一群体的个体与纯粹的外人(不同群体的成员)的区别在于,这种排除在群体秘密之外并不是永久性的或绝对的。被社会化的个体可以接触该群体的信息,但是这种接触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

虽然对社会化的注意主要集中于儿童,但是社会化进程却贯穿整个一生。所有的社会化过程,单身汉成为丈夫,女人成为母亲,移民成为公民,姊妹会申请人成为姊妹会成员,学生成为毕业生,等等,都包括将个体显露给新的场景和新的信息。对某个群体场景的显露将逐渐地将个体带进该群体中去。同时,社会化也包括显露给群体的信息的数量及速度的规则。因此,参照任何一个群体,社会化的角色与外人的角色(其他群体成员)以及该群体的真实成员都不一样。例如,一个公司的销售受训人员的待遇与顾客或其他公司的销售员相比,更像是内部人员,但在他们成为专职雇员(也可能是长期)之前,他们不会得到很多重要秘密。

对群体信息提供的逐步接触的模式是一种社会传统,但是它不像对不同群体成员的直接信息限制那样随机。为了成为该群体的

员,某一个体可能必须学习大量的复杂知识(就像工程师和经济学家那样)。复杂的技术数据及其数量可能“自然地”要求社会化过程具有一定的时间长度。类似地,个人的脑力和体力可能对学习的质量和速度设置了外在的限制。一位高中生要训练成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拳击手,则必须改进身体的力量和耐力。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个体的社会发展由身体的成熟和认知的成长所决定,它不可能总是因场景的因素而加快速度。

无论如何,任务的复杂性和个人有限的的能力只能部分地解释如此之长的社会化过程和行为。社会化时期的具体程度和精确时间常常由一些随机的条件所决定。通过新成员的社会化过程,群体不断地巩固着它的存在。但是新成员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他们可能不完全接受群体所珍视的信仰和价值,也可能将群体的特殊信息泄露给外人。社会化时期是解决新成员的要求与维护群体“特殊性”期望的仲裁手段之一。为了保护群体,社会化时期倾向于成为超出“教育的”经历。由外人变成内部人员的仪式被宣告是某个人的一个转变,而不是信息获取的改变。

社会化和行为的不同阶段影响着个人的身份,即使这些阶段是随机的、社会的,并与信息相关的。医学院的学生被接纳进一个群体,或“成为医生”,是他们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随机点。但是无论如何,大多数人——从学生的父母算起,现在可以对机动车委员会的委员宣称“我的孩子是医生”!则这个委员现在给“这位医生”颁发一种不同类型的驾驶证和汽车牌照——认识到这个学生的角色和身份发生了变化。所有的社会行为和态度都是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变化是“真的”。从一种社会角色类型转换到另一种角色类型引起了个体行为的变化以及其他人的反应的变化。然而这种社会变化常常被误认为是个体本身的变化,其结果就是培育出这种变化的随机场景变量往往被忽视。

即便是明显地根据生物的发展阶段的仪式也至少部分地是传统的。所选择的合适的某个阶段,这些阶段的数量,以及围绕着每个转变的特定仪式,都是由社会确定的。例如,儿童和成人阶段的类型和数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所不同,在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也不一样。即便是青春期这一转变时间的仪式,似乎应当是根据生物时间的,可却仍有可能是部分随机的。阿诺德·范·热纳波(Arnold

Van Gennep)在他的经典研究“过渡的仪式”中,他区分了“生理青春”和“社会青春”,并且认为,由于二者“很少重合”,初始仪式不应被称为“青春仪式”。

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则走得更远,他宣称,“胚胎、胎儿、婴儿、幼儿、儿童、青春期、成年、老年之类的术语反映了非常随机的意义,既不能代表生物学的现实,也不能代表发展的现实”。蒙塔古认为,为了包含所有的发展阶段,我们传统的作法是,将持续和交叉的“阶段”随机地重新界定为有明显界线、不连续的“阶段”。结果我们将文化所确定的场景误认为是自然的。我们将非常相似的人分成了不同的社会范围,它们有着不同的义务、权力和角色(例如,18岁和17岁的人);而将非常不同的人合并在一生活的同一阶段(例如,刚来月经的姑娘和生殖系统发育完全的妇女)。这些随机区分对于社会的平稳运行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这使我们无法看到个体成长的连续性和社会化阶段潜在的广泛变化。

因此,社会角色类型的转变是“真实的”,但也是“随机的”,接触场景或信息系统的模式,与“自然”阶段相比,常常在社会角色和身份的建立与维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化成为群体的阶段的程度取决于独立的信息系统的数量。预测新媒介对社会化角色的影响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它将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分成不同信息世界的潜力。人们对群体信息的接触,所分成的不同阶段的数量越多,社会化成为成人或其他社会群体的阶段也就越多。相反,人们共享相似信息的数量越多,社会化的不同阶段就越少。

窥视帘子的后面

社会化也可以按照它与一个群体后台行为不断增多的接触关系进行探讨。社会化过程的开始总是将个体同他们的旧群体分开,然后将他们投入非常活跃但相对来说并不公开的群体场景中。对新角色的“基本训练”常常包括艰难而又花时间的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社会化的第一个阶段迫使有前途的成员接触该群体的场景和观念,却又不首先提供多一些该群体的后台信息。任务的艰难会过滤掉那些不打算加入群体的人们。

在社会化的大部分过程中,个人在获得足够、足以诋毁群体的后台信息之前,就已经同新群体成为了一体。在受训人员确实获得了

足够信息,并有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时候,任何试图诋毁群体或泄露群体秘密的行为都会同时危害他们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如,虽然法律系二年级的学生还不是律师,但他们已掌握了足够使律师尴尬的信息。但是他们如果这样做就会危害他们自己的“法律学生”身份,并损害他们将来的“律师”地位。社会化过程的缓慢和困难(有时需要完成相对无意义的工作)保护群体,免于遭到那些对群体没有承诺的个体泄密的潜在危害。

因此,新媒介通过影响群体来控制对其后台行为接触的程度,并影响到社会化的过程。媒介给予的私下后台行为越多,它越是支持循序渐进的社会化阶段。媒介所暴露的原本私下的群体活动领域越多,它越是会危害到缓慢渐进的社会化过程。

地点和晋升

身份的变化与获取新的信息的关系,解释了社会通道和物质通道的传统联系。一个群体共享而特殊的信息曾经主要是由那些处于这一地点中的人所获取。因此,社会化进入某个新的群体,在传统上是与群体领地及其知识和其具有的信息的新的接触相联系的。另外,社会化的各个不同阶段在传统上都是与其自身所处地点以及群体不同地点的接触程度联系在一起的。学生就如在爬教育的梯子,从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从一所学校移到另一所学校。当一个人从准医学院学生变成医学院学生,再成为住院实习医生,他就能获得对医院的内部信息的更多的接触。

然而,物质上的重新分布,对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仅在于,它们实际上只是将人们从一个社会世界和地点移到另一个地方。例如,社会上的“初入社交界”被设计成既是物质通道,又是信息通道。传统上,一位年轻女上的“出去”恰恰意味着进入一个更大的社交世界。詹姆斯·博萨德(James Bossard)描述了一个妇女的故事。她19世纪20年代第一次进入社交界:“在她第一次进入社交界之前,她说,她从未有过‘约会’。没有长辈的陪伴或女佣的陪同,她从未上过街。对她的介绍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危机。一夜之间,她与自己所处的全部社会群体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她立刻拥有了新的特权、责任和地位。”

当仪式不再是进入成人生活的信息传递的真正标志时,初入社

交界的重要意义也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正如我的一位学生曾经报告的那样：“如今，许多年轻女士都嘲笑她们的第一次进入社交界，因为它已没有任何意义。我听说过一群初次参加社交的‘上层社会’少女，她们在仪式前吸大麻，仪式后去裸泳。而一位女士在身着适于某一特殊场合的礼服下却穿着帆布鞋。”

伴随着物质的重新定位而引起的状态变化，通过新的穿着形式、新的名称、新的活动和游戏、新的恰当举止和姿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及物质现实所确定。在社会化的不同阶段，同一个人可能被称为，南希(Nancy)、南(Nan)、史密斯太太(Ms. Smith)、南希·史密斯·布朗(Nancy Smith Brown)和布朗(Brown)律师。作为一名大学生，南可以低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穿着有油漆的牛仔褲，对同学们的评论扮鬼脸。而作为一名律师，南希·史密斯就会觉得要被迫坐直，穿上整洁、得体的服装，对客户的一个问题和评论作出严肃的回答。

社会化过程中不同转变的数量部分地取决于人们可被孤立的不同“地点”的数量。为了使人们“穿过”某个阶段到达另一个阶段，并具有每一个阶段所需的不同的行为，则他们所扮演每个角色的场景必须是不同的。例如，如果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没有被分开到不同的教室，则可能很难清楚地区分他们。如果孩子和成人总是共享相似的地点，则很难明确地区分儿童语言和成人语言。每个社会化的场景都有其统一的定义，恰当的语言、穿着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希不能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既是“学生南”又是“布朗律师”。

因此，新媒介塑造社会角色的另一种方法，是影响物质地点和社会信息的获取的传统关系。物质隔离和信息隔离之间的关系对媒介的依赖越多，人们被分成不同的社会化“位置”对媒介的依赖也就越多。媒介越是允许人们在不离开旧的地点、不损害旧的会员身份的情况下，就获取信息，它就越能给出社会化阶段的同一性。

权威：神秘和神秘化

等级制度总是基于排他的观念，且当我们在一个社会中实施等级地位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等级制度的神秘化，用夸大的辉煌给低于我们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休·达尔齐尔·邓肯(Hugh Dalziel Duncan)

一种看待社会的方法是将其看成是上司、下属和平级的人之间的交往。虽然我们常常认为高的地位与财富、财产和个人天生的能力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等级的次序与特定场景的传播模式亦有很大关系。人们不仅在一生的社会化过程中从一种身份成为另一种身份,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都在不同的场景中改变身份。例如,公司的总裁,在与其雇员、配偶、子女、朋友和父母交往时,则采用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的不同有赖于场景的不同,以及对不同观众所能获得信息数量的限制。

大多数有高地位的角色包括表现和请求,而不是与生俱来和命令。实际上,最新的领导研究表明,“领导”可能并不是一个恰当的用语。因为这个词错误地指出,领导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风格和行动,而领导人强有力的性格、伟大的智慧,或特殊技能所产生的结果是:他人仅仅是追随者。正如默里·埃德elman(Murray Edelman)所指出,领导研究的新焦点是“追随者追随的意愿”。

因此,“权力”(power)和“权威”(authority)两个词有很大的区别。权力指一个人劝服别人(通过物质的、经济的或其他手段)去完成自己请求的能力。一个人可以拥有权力的手段:身体的力量、武器和金钱。但是权威需要表演。权威指一个人获得其他人的信任并且愿意遵从的能力。权力依靠威胁,而权威靠激励。

某人被看成是“伟大的领导人”后,他不能仅仅是伟大,同时他的行为举止也必须像伟大的人物。这种行为成功的措施并不在于领导人的行动,而在于对这些行动的反应。领导人的才能并不是一个人“拥有”的东西,而是存在于具体的交往和具体的社会场景礼仪中。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用来目睹或体验“伟大”。当然,如果人们都不穿衣、不说话,就不会存在社会等级,有的只是根据体型、高矮、肌肉和冲动所得到的生物性等级。

对权威的成功获取依赖于等级制度剧幕的恰当表演。而对与等级制度表演相对应的把握程度可以用控制场景及其信息的几种变量来表示出来。

对知识的排他性接触

高的身份的展示和维持是通过对知识、技能以及与角色相关的经验的控制来完成的。例如,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的身份显然与他

应当具备的解剖学、疾病、测试和治疗知识有关。驻外大使的身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对自己政府的政策和意图的认识；而在自己的国家中，大使的身份则依赖于他们对外国政府的了解。即使是一名汽车机械师的权威，也有赖于在其所拥有“权威”的领域内对汽车专业知识的掌握。

具体的场景常常会确定各种不同类型社会信息和知识的相对重要性，并由此场景来确定在场的人的相对地位。胃痛的机械师的地位要比他去看的地生的地位低。但是当一位世界著名的神经医生的Mercedes 450 SEL汽车开不动时，他则可能完全依赖某位离他最近的机械师。另外，知识获取本身并不足以判断其是否具有权威。在某个场景中某个人要比别人对知识有更多的接触。场景的边界通过界定还有谁在“那里”与之竞争，进一步地塑造了相对的权威。

当下级获得了接触相关知识的机会后，上司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危害。一位忧郁病患者可能在某种疾病的医学研究中超越了医生，因而扰乱了典型的病人/医生关系。类似地，如果一名医生告诉机械师某辆汽车哪里需要怎样的修理以及部件和工时的正确成本，可能会引起机械师的恼怒。为了保护各自的地位，常常通过使用行话编码或者对知识的其他获取途径进行限制，从而保护这些知识的传播范围。（例如，一本外科医生案头参考书，或简称为PDR，列举了当前能得到的所有药物的使用以及误用的标准，这本书直到最近，对普通市民仍是一本非常难懂的书。类似地，汽车备件常常用编码标识，这个编码必须与其编码书“分离”，机械师有时用一种书对部件编码进行解码，而用另一本来检查其报价和修理厂的折扣，同时还有一本以确定其经销商）。总体来说，当信息系统是孤立的时候，权威得到了加强；当信息系统融合后，权威就变弱了。

因此，虽然我们能够区分“社会信息”（有关行为和角色表演的信息）和“技术知识”（事物总体的事实和数据）的概念，但是它们二者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对技术知识的控制本身就是社会信息体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对知识的控制使某个人“有权力”扮演某类特定的角色。

而对那些非基于对知识进行特殊控制的高地位，则常常被看成是偶然的，有可能会遭到反叛。也许是意识到了这种威胁，15世纪的天主教堂开始压制将《圣经》翻译成本国语言。实际上，教会对《圣

经》和其他异端邪说著作翻译的关注,远远胜于对淫秘书的关注。卢瑟(Luther)和加尔文(Calvin)利用了相同的原理,通过鼓励个人阅读《圣经》,将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正如哈罗德·因尼斯曾经描述的那样,传播技术的改变有助于在专制君主、神父和人口其他部分之间摆动不定的权力的平衡。

为了维护信息控制的不平等,地位较高的人通常先开始与下级的人交往。老师开始授课,而不是学生。医生开始检查他们的病人。开始某一交往的权力得到了对知识和社会信息具有较大的初始控制权的支持。如果没有应有的尊敬,较高地位的人可能会限制相关的重要知识的泄露。但是,同时他们还有在不提供信息的情况下恳请信息的权力,以加强对信息的相对控制,进一步巩固地位。即老师能够向学生提出某个问题,但学生则不能反过来问老师。医生可以问病人私人问题或检查病人的身体,而自己不必接受类似的检查。只有在孩子们的平等游戏中,医生/病人的角色才可以互换。*

从单向交往向双向交往转变的运动,总体上反映了相对地位和信息控制的变化。例如当孩子长大时,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往就会越来越双向。当一名学生由在校生变成毕业生,或者同事之后,当一名员工得到晋升,或者成为老板的朋友、情人或者配偶后,老师/学生,以及老板/员工之间的交往也会发生类似的演化。因此,恋爱交往中男性主动的习俗淡化之后,就意味着变成了更加平等的性别角色。

因此,传播媒介越是倾向于将社会中不同人的知识分开,该媒介就会支持越多的权威等级;传播媒介越是倾向于融合信息世界,媒介就会越鼓励平等的交往形式。

隐藏后台的存在

等级角色比其他类别的角色更加依赖对后台演练、练习和放松的保密。例如,医生通常不会在病人面前阅读医学参考书,也不会

* 单向的信息获取可能会给那些名义上非高职位的个人赋予实际的权威。这样,甚至是汽车机械师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威,他们有权询问顾客的驾车习惯。类似地,秘书、接待员和护士所拥有的权力也远远超出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性质所匹配的权力。

显示自己的性冲动,或者承认自己的疑问、恐惧和焦虑。法官、律师和政治领导人也同样试图隐藏自己的后台区域。一个人越是能掩饰维持高地位角色所需的时间和努力,他就越显得有权力和无所不能。

在许多高级职位的“训练手册”中都明确了需要有仔细准备的舞台表现。巴尔萨沙·格拉什恩(Balthasar Gracian)是17世纪耶稣会(Jesuit)大学的校长,例如,他建议牧师“对所有的东西都加上一一点神秘”,因为神秘能“引起尊敬”。类似地,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认为,既然绝大多数王子都不能拥有全部的理想王子的品质,他们应当至少努力使自己显得像王子,“因为人们通常用眼睛来判断,而不是用双手判断,因为每个人都能看,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必须要感受”。

等级制度和高地位的表演性常常不被注意,或者未被研究,因为他们“不行动”本身就是高地位行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许多具有高权威的人必须仔细控制自己的形象,并且要像没有控制一样。所以,等级制度角色与信息 and 知识的关系不同于群体身份和社会化角色与信息 and 知识的关系。群体身份和社会化依赖于对信息和知识的公开控制。我们许多人都意识到一个群体的成员或者社会化成为其中一员的人,可以获得对“外人”保密的知识和经验。当然这种特殊渠道对于高地位的人同样如此,等级制度也常常涉及“超级控制”,也就是对控制需求的控制。等级制度角色比群体身份或者社会化角色更加需要超物质的方面,也就是他们需要外表是超越人性和道德的天生品质。高层人员——特别是很高地位的高层人员,与下属之间形成的鸿沟看起来不仅仅是知识和经验的差别。很高地位的人所拥有的信息必须显得是“别人不知道的”,而且不是“别人不可能知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等级制度的角色同时涉及了神秘和“神秘化”。*

* 等级制度的神秘化有很大的危险性。它可用来支持邪恶的政府,维护非杰出人物的权力。即使只是对神秘化手段的讨论都可能是令人不安又似乎是不道德的。马基雅弗利由于自己的这种建议,使他的名字成了虚伪和欺骗的同义词。然而这些手段对大多数的领导来说是必要的,当然不一定是。好的政府和杰出的人也可能会使用它们。如果忽略了对这些手段的研究,那么当这些手段被滥用时就会显得很无奈。正如邓肯指出的,“我们必须学会面对等级制度的神秘力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有意识地将等级制度用在好的方面。正如,并非所有的魔术都是妖术一样。”

扮演等级角色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信息的控制以及限制下级只能接触少数信息的台上场景。地位越高,越需要这种控制能力。为了在追随者的眼中保持敬畏,领导人必须隐藏自己的古怪行为和弱点、早期的训练和错误、自己身体的功能和障碍。与群体角色和社会化角色不同的是,等级角色不仅依赖于将后台行为列为隐私,而且需要否认有后台的存在。

对等级角色的一项研究显示,所有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普通的”。但是伟大的形象可以通过不显示这个人的普通性而得到维护。或者换种说法,存在“伟大的人”,但是这种伟大只能通过在恰当的社会场景中有控制的社会表演显示出来。高地位有赖于控制场景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策略。高地位的人只有通过仔细地控制信息以及隐藏自己对控制手段的需要,从而维护自己的地位。然而,如果一个人为了使其自身显得重要所采用的策略被曝光后,他的重要的形象便不复存在了。因此,所有制造敬畏的手段,同时也给他们带来受到羞辱的危险,这种羞辱是由于其所依赖的手段的可能泄露所引起的。

这说明,权威依赖于隐私。形成领导人私人行为和公众行为之间清楚界限的媒介,通常会支持等级制度,而暴露权威隐私空间的新媒介,则会危害到等级制度。

地点的权威

权威角色对秘密的需要,解释了地位程度与领土控制程度之间的传统联系。土地所有权也许象征着财富,同时这种所有权在社会剧中也发挥了它的作用。它使个体在现实中独立出来。一个人越是遥不可及,社会角色的象征性就越是抽象并能够超越这个人具体的(“普通的”)现实存在。

因为高地位的人需要的只是展示恰当的形象,所以下级的人必须远离这位高地位的人可能展示不恰当行为的所有场景。这里的“不恰当”可能仅意味着放松、玩牌,或者不能控制地大笑。对于中等程度高地位的人,如外科医生,这种控制只是在特定场景中才有必要。医生在医院里可能必须按某种方式表现,而在鸡尾酒会或在高尔夫球场就可以有很大变化的余地。而具有很高地位的人物,如罗马教皇和总统,则被期望在任何场景、任何时间都“处在角

色中”。

但是高身份地位并不缺少后区行为的支持,而是后区行为通常是不可见的。实际上,高身份地位的人通常需要较深的后区,以便形成非常正式的前区角色。另外,即使是非常高地位的人物,他们的密友、亲戚和顾问也会期望他们的行为采用“正常”的方式。然而,假如这些行为被“泄露”给了普通大众,可能会带来很大危害。结果,高地位就传统意义来说与身体上的不可接触性相联系。

在办公室的排列中可以反映出作为身份手段的不可接近性。个人办公室比公用办公室象征的地位更高。另外,两个人相对的地位不仅常常用他们每个人控制“领地”的相对大小来衡量,也常常用他们相互之间领地的相对接触程度来衡量。如果你无需敲门就可以进入我的办公室,而我要见你却必须预约的话,显然是你具有较高的地位。对领地和财产所有权的控制,不仅涉及到对这个人自身接触的限制,还使得他很容易接触到其“领土”范围内生活和工作的任何人。

显然传统上高地位曾与领地的控制相联系,但并不是“领地”自身在它内部形成社会权威,而是传统上与之相伴的信息控制。眼睛的行为规则证实了信息接触是更大、更具有包含性类别的观点。一个具有较高地位的人常常有权力长时间看着低地位的人,甚至盯着他或她看,或上下打量,而低地位的人则应当避开自己的目光。这种伴随着相对地位的单向信息流动,在座位的排列中也有反映。长方形桌子的两端是高地位人的位置,因为坐在那儿的人可以不用转头就能看到桌子边所有的人。类似地,《旧约》上规定不能看上帝的脸,这与精神分析医生传统安排的结果大体相似。上帝和精神分析医生的高地位是通过不可见来保护的。

因此,媒介的变化通过改变高地位人物的可接触性,也会影响到等级制度。支持物质隔离和社会不可接近性的媒介,会支持等级的神秘化;而危害这种关系的媒介,可能会降低许多角色的高地位。

第二部分 从印刷场景到电子场景

无论新媒介改变社会的方式如何,但是其最后形成的社会新秩序必须是建立在旧秩序基础上的。新媒介之所以会产生影响是因为它与旧媒介不同,它改变了依赖于早期传播手段的那些社会方面。例如,印刷媒介能够激励改革和科学探索,因为它绕过了抄写员缓慢而乏味的抄写建立起来的信息的相对垄断、新媒介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使用和固有的特性,而且取决于它绕过早期媒介的使用及特性的方式。因此,相同的媒介可能对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影响。电子媒介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其结果与电子媒介对我们国家(美国)的影响大不相同是毫无疑问。

虽然新媒介可能仅仅是现存旧媒介的一部分,但是当新媒介(或新类型的媒介)加入到旧媒介中后,在这个特定社会中“媒介矩阵”如何发生改变仍值得讨论。^{*} 为了研究电子媒介对美国的影响,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研究了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在特定的文化和经济环境中使用时所存在的差异。

本书中,在印刷这一大类别中,包括了书籍、报纸、杂志和小册子之类的媒介。而在电子媒介类别中,包括了电视、收音机、电报、电话、录音机和计算机等技术。不幸的是,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不可能详细地分析所有的媒介。因此,我主要侧重于每一类别中的一种主

* 在附录中进一步讨论了“媒介矩阵”的概念以及在“电子社会”是纯粹电子的这种限定意义上与之相关的话题。

要媒介：书籍和电视。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两种媒介都是它们所代表的类别中的完美典型。在新媒介的威胁面前，传统主义者集合在了图书的周围，电视则一直被批评和争议所包围。因为在一个社会中使用的媒介都是相互作用的，所有的印刷媒介都有共同的特征，这使得它们与所有的电子媒介有所区别，因此，我也从其他媒介中举了许多相关的例子。

在本书的后面部分以及本章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媒介作为某种类型的社会场所，它们以其特定的方式将人们包括或排除、联合或分开。因此，这种对媒介变化的讨论类似于对建筑或地理变化的研究，或者对移民和城市化的影响的研究。我关注于研究新媒介或新的媒介类型可能重新构筑社会场景的方式，这类似于墙的建立和拆除，或者在物质场景中将人重新定位，或将其隔离在不同场景，或将其合并进相同或相似的场景。在对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两者的差异的场景分析中，相关的问题有：在一个社会中，有谁能获取这个环境的信息，有谁不能？由于这种媒介，对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和教育背景的人来说，在获取相同或不同的信息系统后又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这个环境中能得到的信息类型与其他社会场景中得到的信息有何不同？总之，这种媒介的广泛使用是以何种方式影响着“谁知道关于谁的什么”？

第一部分描述了当场景的边界发生变化时行为是如何变化的。另外，我们已经看到，不同群体身份的数量、社会化阶段的数量以及等级制度的级别数量取决于不同的社会信息系统的数量，“后台”行为与“台上”行为保持分离的程度，以及物质地点与社会经验相关的程度。因此，本书的这个部分，根据“印刷场景”与“电子场景”的区别的三个主要方面，分成了三个章节：

1.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将不同类型的人们分成或合并到不同或相同的信息世界中。
2. 媒介所能够允许的人们在非正式的、私下的“后台”的行为与他们在正式的、公开的“台上”的行为的最大差异。
3.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削弱了社会场景和物质地点的传统关系。

新的媒介对社会信息系统的结构产生的显著影响，并不需要毁坏或取代旧的媒介。在这里的讨论中详细描述了电子媒介是如何使

得过去各不相同的社会场景融合在一起,如何模糊私下和公开行为的分界线以及电子媒介又是如何打破以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物质位置和社会“位置”的关联。



公共场景的融合

67

也许任何媒介的主要特征是它冲击我们感官以及联系我们思考和表达过程的能力。就某种媒介而言,如果没有一个人去接触它,那么就不会有人去发送和接收它的讯息。这个观点是显而易见的,不值一提。然而,不太明显的是,对不同的媒介来说,接触的类型以及获得接触所需的步骤是不同的。不同的媒介构成了不同类型和不同数量的信息系统。因此,新媒介的广泛使用可能会增加或减少社会信息的“共享”。一种媒介可能会为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信息系统,另一种媒介则可能会将许多不同的人包括进共同的场景中。本章描述并探讨了电子媒介的特征,特别是电视,它打破了人口中不同群体信息系统的分离。

正如许多媒介批评家所观察到的那样,造成电视观众混杂的部分原因是,电视经济体系的基础是:将观众“卖给”广告商。电视观众常常认为电视节目是“产品”,自己是“消费者”,广告是观看节目要付的“价钱”。然而电视业的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它的产品是卖给广告商的观众。一个节目越能吸引观众,广告商为了将自己的信息播放出去而愿意花的钱也就越多。由于这种体系,电视网播放者就失去了为满足观众中小部分人的特殊需求而设计节目的兴趣。

网络节目制作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最少反对的节目制作”(LOP),即设计节目的关键在于它被枪毙的可能性最小,而不是让节目的观众主动来寻找。毕竟,每一种人群中一部分人喜欢的节目(如,歌剧,先进的汽车设备,纯色情文学,莎士比亚,对量子物理的介绍等),可能会在大部分时间被大部分其余的人所拒绝。如果为了使节目能够吸引一定数量的观众,而使节目和广告的制作和播放成本超过了广告商愿意支付的价格(或者是另一个成本相同的节目能吸

引更多的观众),那么这个节目几乎肯定是会停播的。因此,大多数电视节目制作人有意识地将节目设计成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观众。

然而,电视传播的经济结构并不能完全解释电视观众比书刊的读者层次更为混杂的现象。不必为电视娱乐节目的低劣质量或对公共电波的可疑使用寻找任何借口,我们仍可以讨论其他导致电子媒介信息系统同化的其他因素。

媒介的“接触编码”

在一种媒介中对信息进行编码或解码所需的技能和学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这个社会中谁能使用该媒介发送信息以及谁能获取媒介所携带的信息。即使在一种给定的传播形式中,如书写,不同的符号系统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复杂的书写符号有助于文化阶层控制文化信息和礼仪。例如,汉语采用的“象形文字”书写系统。其中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词,这个系统要求基本的读写需掌握多达 5000 个符号,而进行学术研究则需要掌握 20000 个符号。这样的书写系统显然限制了能够完全接触该媒介的人的数量。

而其他符号,如腓尼基字母和希伯来文,则容易学习。但是由于它们缺少元音,所以仍然需要有特殊的阅读技巧。在字母表中,相同的书写符号,如“B”能有许多种不同的发音方式,包括“ba”、“bē”和“bo”。一组给定的字母可能用来表示意思和发音完全不同的词。要准确地阅读这些代码,一个人必须掌握文章以往话题的一些知识及其主题内容。”

书写系统的模糊性越大,需要记忆的符号就越多,能够掌握它的人就越少。因此,字母比象形文字更加“民主”,但是比真正的语言字母要有优势。另外,如果书写材料由于生产慢或价格高使其供应有限,那么就只能是数量有限的人能完全使用书写系统所提供的传播。

语音字母使许多书写符号的模糊性降低到了最低水平,而印刷

* 如果我们的字母是这种,那么书写符号“wtr wth brd”可能表示“侍者带着面包”,“水和面包”,以及许多其他词的组合(较白的,鸟,抚养,孵蛋,新娘等)。这种符号系统,只有那些已经有一些“准备知识”的人,知道这条信息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后,才能进行最好的解释。

技术的普及使原来买不起手抄书的人也能获得书。但是即使是印刷书籍相对丰富,且价格不高,阅读和写作仍然既是社会信息的获取手段又是限制手段。在印刷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想完全接触社会的知识和传播网络,就必须要有良好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即使是廉价的小说也需要有基本的阅读能力;给朋友留一张便条也需要简单的写作能力。因为我们是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阅读和写作其实是需要有相当复杂的技巧,需要多年学习和背诵的练习。

阅读和写作包括语意学上无意义符号的抽象编码,必须记住,固化,然后忘记。这里忘记的意思是指当有文化的人阅读和书写字母表中的字母时,他们“知道了这个词”,而不是去注意书写符号的形状和形式。

另外,阅读并不是“立刻”就能掌握,它需要多年的练习,包括许多不连续的熟练阶段。这些阶段的次序是根据语言、语法和风格的难易程度递增的。一个人在阅读难度较大的书之前,必须先读简单的书。即使在文化和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中,有文化的成人比例也从未达到过100%。^{*}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具有最高水平的阅读和写作技能。书写系统都比口语更具有选择性和排斥性。

阅读和写作所需要的技能以两种方式影响了人们对印刷品的接触:通过书写和书籍进行的传播“自然而然地”就局限在了掌握所需接触编码的人群中,哪怕是仅掌握基本代码的人;讯息可以通过编码讯息复杂程度的不同面向不同的群体。因此,非常小的儿童和文盲就被排除在了所有印刷传媒之外,而根据阅读水平的不同又将社会进一步分成了许多不同的信息系统。

与阅读和写作相比,观看电视所涉及到的接触代码,也就是一个代码而已。电视并不是展示了“现实”,但是电视比句子和段落看起来和听起来更像是现实。即使是两岁大的小孩也发现电视是可接触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电视这么易于充当“照看孩子的保姆”。据统计,2~5岁的小孩每周看电视时间超过25个小时。当字母表中的字母对他们来说看起来还仅仅是奇怪的形状和线条时——也许“芝麻街”

* 据统计至少有2300万,或者多达7200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不能阅读招聘启事,不理解汽车时刻表,不能填写工作申请表,或者写出所要寄出信的目的地。

节目中展示的动态字母画面除外,这种年龄的小孩就已经成了活跃的电视观众。

电视的电子信号代码,复制了日常生活的图像和声音,它的难易度基本上是1。只要你知道如何去看一种电视节目,那么你基本上掌握了如何去看所有的电视节目。你可能对所看到或听到的某些东西不能完全理解,就像在真实生活场景中你对人们的所说和所做可能并不完全理解一样,但是你不必为了“进入”传播的场景,去穿过印刷符号所附带的复杂的过滤器。^{*}

许多电视“技术”是基于自然的经验。例如,对物体镜头“向上看”的仰拍,通常用来显示这个主体的重要性和力量。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随机规则。在我们每个人还是孩子时候,都曾经仰着脖子看成人,从他们身上感受爱、敬畏和恐惧。他们就是我们所谓需“仰头看”的人。电视次序的结构和日常生活面对面交往的结构有许多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说明,学习理解电视的次序要比学习理解读和写的随机代码容易得多。

总体而言,观看电视节目并没有固定的次序。一个人没有必要在看“复杂节目”前,一定要先看“简单的”节目。一位只看了几个月电视的成年人与看了几年电视的成年人对电视的理解可能相差无几。即使存在什么差异,但它与成人文盲和成人读者之间的差异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观看电视节目没有具体的“前提要求”,而阅读《尤利西斯》(Ulysses)则会有许多准备要求。虽然电视内容的复杂性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不同电视节目内容的编码方式是一致的:图像和声音。因此,经常被使用的短语“视觉文化”是一个不恰当的名称。理解视觉图像与有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 有一些电视技术需要有比其他媒体更多的学识。例如倒叙,溶暗,平行编辑(两个或多个同时发生行为的前后剪辑)都是必须要掌握的常识。另外,研究也显示,非常小的孩子会认为同一物体的特写镜头和远距离拍摄的图像不是同一物体。但是甚至这些常规知识也可能由“系统的模型状态”来学到,不是按部就班的学到。一旦你理解了“倒叙”的概念,你就能了解所有的“倒叙”。一旦你知道溶暗是用来表示时间的流逝或地点的变化,你就不必“练习”去理解使用这一技术的其他系列。关键的问题是,与印刷的代码相比,电视的代码数量有限,你不必为了学习和掌握它们而去学校学习几年,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没有完全理解它的情况下,就来“体验”电视。与书本的内容相比,电视上出现的任何行为和语言都能被绝大多数的人接触到,而不必在意这些人的年龄和教育水平如何。当然,印刷品和电视都有“内容码”,例如就像不同类型和形式的结构单元,即使是获得了对媒介的基本接触,也不能马上掌握它。

毫不奇怪,不同年龄、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的人可以观看许多相同的电视节目。例如,近几年来,儿童喜爱成人的肥皂剧《豪门恩怨》(“Dallas”),而成人观众在儿童的木偶剧“提线木偶”(“The Muppets”)中找到了乐趣。实际上,1980年这两个电视节目是美国各年龄层,包括2~11岁,最受欢迎的节目。

虽然在印刷品中编码的难易对儿童的信息获取有极显著的影响,但是这个变量也对成人的知识和经验的构成有些许影响。印刷符号的复杂程度的不同提供了一种看起来很自然的信息分隔方法。所有领域都有“入门”的书或课本。通常在进入“中级”或“高级”课本之前,必须首先读这些“入门”书。知识被分隔成一块块的;读者也就被分成了不同的层次。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会用非常复杂的速记方式给同一领域的另一位专家传递讯息,而这种形式要求必须有大量的前期训练和阅读。在“高级”外语课本中,专业术语、词组、名称和引语的使用既没有解释,也没有放进上下文中。内容复杂程度的增加常常伴随着更长的单词,更小的字体,更少的图片以及使用更加复杂的语法结构。我还记得小时候对许多课本的前言非常生气。它们是写给“老师”的,它们使用的小字体和长单词使我很难对其进行解码。

印刷媒介的编码并不是为使所有的这种分隔成块成为必须,但却使之成为可能,并能满足某种要求。在人际传播中不礼貌的行为——只对部分听众说话,却成为印刷传播标准、有效和恰当的风格。编码的复杂性以及阅读所需的努力使得只有某些人能够读某些书。书籍将特定的读者“聚集”到特定的信息系统。

几个世纪以来,印刷媒介中不同信息系统的成长和维持,形成了“外人”不能理解的隐含假设和专门的行话。在印刷场景中,人们不能轻易地从—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这样系统引起的后果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用不同的“语言”探讨着相似的现象。印刷媒介所鼓励的这种传播模式使得某一学科的专家很难与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交流。想接触某一学科的“外人”常常必须再一次从头做起,然后再爬上另外一个不相通的信息系统的台阶。时间和骄傲的障碍通常使人们被限制在自己的“领域”之内。这样的系统允许许多所谓“私下公开的”交往,也就是说,场景在技术上是公开的,但在功能上仅限于某个群体的成员。例如,医学专家与医学专家

的交流,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人也不能“偷听”。*

因此,印刷编码的复杂在各种年龄群体内和群体间隔离了信息系统。要掌握印刷媒介中复杂信息就要求分阶段地学习,这造成了许多不同的群体,每一群体社会化的许多阶段,以及许多不同层次的地位和权威。

尽管我们对于这个系统很熟悉,但是知识的这种分割和分阶段根本不是“自然而然的”。例如,在正常的口语交谈中,并没有明确的难度界限。课本的阶段性和次序观念是伴随着印刷技术传播的一种革新。在口语文化中,教育包含了相对较少的课程“顺序”,也很少根据年龄和学习时间将人们分成许多不同的群体。但是在文字社会中,学校的制度就是根据不同的阅读能力将人们分成不同的群体。

一个人阅读能力的好坏通常标志着他的智力以及理解新观点能力。这类系统在印刷文化中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并不是组织信息和将人群分类的惟一理性方法。电子媒介,包括电话、收音机、电视,甚至电脑,则拥有较少的知识阶段和分隔。除非你将印刷内容直接植入这些媒介,否则电子媒介的信息则更接近声音、图像和动作这种非线性信息。

某些信息也许只能在“高级”书中找到,比如医学文章,但它也可以用一种许多观众都能接触的方式展现在电视中。例如,最近我看到一个30分钟的电视节目,详细介绍了“心肺”苏醒(CPR)的方法。这种救治心脏病患者的急救步骤被用语言、图像和动作进行了描述。电视节目中的医生反复强调,与早期的医学思想恰恰相反,学习这些步骤并不需特殊训练或预备知识。他说,这太简单了,连小孩子也能学会,他8岁的女儿已经完全掌握了。

我并不是说CPR的电视节目与阅读高级医学文章是等同的。CPR节目是在真空中展示的。这种信息并不与更基本的医学信息相联系,也不是掌握更复杂知识的一个步骤,片断信息通过逻辑上的联系形成了大的、复杂的,并有内在联系的论文和理论,这是书写和印刷的一个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CPR电视节目在相同的技术上

* 这种分隔知识的体系在我们的意识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新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如,“美国研究”,“大众文化”,和“传播”有时被认为是没有内容的,因为它们没有试图开辟自己的独立领地,或聚集知识。也因为她们所提出的问题其他学科的人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可悲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攻击,一些学者在自己的领域中提出了自己专门的行话和专业的方法,以便在其他学者眼中显得神秘,并因此而更有价值。然而这种防御性行为损坏了交叉学科方法的原始价值和可用性。

要比印刷文字简单得多。然而一本涉及了复杂编码和解码的书的内容可以通过电视更简单地展示出来,可以直观地理解。如果仅仅写在书中,普通电视观众所能获取的这一部分信息就会被限制且分散于不同的专家群体中。

书本和电视各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印刷媒介的复杂、循序渐进的特征促进了广泛而相关的描述和分析的发展,但也会造成能接触某个信息系统的人和不能接触的人之间的严格区分。印刷代码的线性结构使得不同的专家采用不同的探究“路线”。电视则打破了不同领域间的障碍,但是它更喜欢片断的信息,而不是长篇大论,有内在联系的讨论与分析。

从历史上看,知识的载体被当作了知识本身的形状。但是为了理解新媒介的影响,我们需将特定的观点和过程的固有复杂性与我们解码和描述他们所采用方法附加的复杂性区别开。可以相信,例如,如果人们学习系鞋带的惟一方法是通过印刷品上的描述,那么系鞋带就可能被看成是一种技术,并且“自然”局限于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间。

由于代码的不同,电子媒介打破了印刷媒介所塑造出来的专门的、互不相通的信息系统,现在各不相同的人群共享着更多的信息。许多人通过电子媒介学习和体验到的东西,与他们的年龄、传统教育和社会地位相对无关。譬如,就拿人们看什么电视,怎么看电视来说,不同的年龄、种族、性别和阶层的人之间,其共性较其差异则更为显著。^{*}

与印刷媒介不同,电视将它的内容提供给所有人。因此,电视不会帮助信息精英控制文化知识的解释,也不会分隔交流系统。虽然

* 例如,最新研究显示,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家庭每周平均看电视47小时3分钟;收入高于3万美元的家庭每周看电视47小时50分钟。报告中指出受过大学教育的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时间是整体观众平均水平的90%。男性和女性每周看电视的时间基本相同。观看习惯的最大差别出现在不同年龄组间。十几岁的人看电视的时间最短,平均“只有”每周22小时30分钟;55岁以上的人看电视时间最长,每周平均35小时6分钟。但是即使如此,关键点在于,尽管每个年龄群体——从两岁到老年人,每周都看很长时间的电视,超过22小时。所有的年龄群体和社会类别所观看的许多节目是相同的。但与电视观看的节目的相似性比较起来,不同的年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人在阅读习惯上则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1971年盖洛普(Gallup)组织发现,在过去一个月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成人有50%曾读过一本书,而在小学文化成人中的比例只有18%。年龄在21~29岁的人中为39%,而50岁以上的人仅占16%。另外读书本身也是一种“私人俱乐部”。因为调查显示,平均大约有75%的成人在上个月中没有读过一本书。

电视的内容仍然能被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掌握和控制,但是控制电视与控制印刷是不同的。不同的人读不同的书,但是对电视观众来说无论电视播放的是什么内容,只要他能理解,他就可以观看。与书本不同,电视不易被精英们用于仅属于他们之间或个人间的交流。

正如电视信息易于被观众解码一样,电视所播放信息的编码也相对简单。复杂的装备一旦建成,信息的播放就相对简单了。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站在电视镜头前或录音机麦克风前“发送信息”。实际上,近几年来最昂贵的电视内容——广告,越来越成为“真人”采访的工具,以及公司领导叫卖其产品的商业广告。类似地,“真人”和“人民的法庭”之类的节目是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它用名人但仍是“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取代了传统的智慧和表演形式。

这些商业广告和节目是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制作、编导和编辑的,但是脚本的内容可以由任何有兴趣的成人或儿童提供。与之相关的一点是,印刷媒介需要具有非常专业的技能的人对信息进行编码,而广播或电视信息则可以由“街上的任何一个人”制作,甚至“街上的孩子”来完成。在某些方面,演员的最佳人选是普通人,因为普通人的他或她看起来更为“真实”。也许是由于这些原因,采访普通人的这种技术成了电视新闻和纪录片的主要手法。许多广播电视记者在大街上收集对某些事件的即刻反应,而印刷媒体记者则寻找“知情人士”以获取官方“说法”和更全面的看法。一位对饮食紊乱和离婚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去阅读医生和心理学家所写的书,而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电视观众则常常会在电视上观看那些亲身经历过这些问题的人现身说法。

使用镜头或麦克风记录事件与使用纸和笔也完全不同。虽然你表弟婚礼的家庭录像与该事件的专业化纪录片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相比之下,一个7岁孩子在信中对这场婚礼的描述与专业作家的叙述之间的差距则要大得多。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能打开摄像机并“捕捉”到现实的许多画面。实际上,一个监控镜头无须任何有创造力的人的介入就能捕捉到行为的片断。

虽然广播电视为普通观众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但是按照目前电视的状况,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通过电视节目与别人交往。因此,电视易于接触的编码对于显示给普通人信息的影响要远超过其对普通

人发送信息渠道的影响。不过交互电视、CB 收音机、家用录像设备和计算机使用的不断增加,正在改变着这种平衡。同样,将电视媒介和印刷媒介区分开来的编码的区别,也使电话与写信区分开来。正如电视将不同年龄和层次的人带进单一的信息系统一样,电话也给了孩子和文盲一种新型的社会“活动方式”。父母允许年龄很小的孩子接电话或打电话是件很普通的事,而这种年龄的小孩是不可能全部参与家庭社交和商业通信的。

获取讯息

物理的特征

书籍与其讯息的联系不需一直存在于电子媒介中。除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外,每本书与其特定的内容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有形物体。作为物体,书必须被单独购买或借阅。每个或每组特定的讯息都需要人们主动地将它们找出来,主动地带回家中。

虽然有些电子媒介也是如此(声像带、唱盘和录音带),但电子媒介中媒介和讯息有一种潜在的完全不同的关系。成千上万条讯息可以用同一个接收器来获取,如收音机、电视或计算机。另外,电子媒介的特征并不因为讯息特征的变化而改变。一本内容长的书要比短的书重,而电视机无论是播放 10 秒钟的商业促销还是 10 小时的《战争与和平》,它自身的尺寸都不会改变。电视中的节目并不是具有独立物理尺寸或存在的有形物体。一个人拥有一台电视机、电话和收音机后,不必去购买或借阅任何特定的讯息。一旦这些电子媒介进入人家中,讯息就能无差错地持续地流入。”

书籍和杂志需要单独选择,再加上找出它们需要时间和金钱,这使得通过印刷媒介的信息具有了高度的选择性。人们去寻找印刷出

• 从物理特征看,电影院更像是书籍,而不像电视或广播节目。每一部电影都是独立的有形实体。一个人必需要找出一个特定的电影,然后到某个地方去看它。类似地,监狱管理人员很容易在监狱的图书馆或电影院里限禁《如何愚弄入室窃贼》(“How to Fool Burglars”)这本书和电影,但是,对监狱里的电视或收音机中这类节目的审查则困难得多。因此,虽然电影和电视有着相似的视觉编码,但是电视所具有的社会影响,电影却并不具备。

的信息是要付出代价和很麻烦的。一个人所收集的书籍再现了他长期以来煞费苦心的选择。个人“图书馆”常常将这个人 与某个群体或某类小型团体的信息网联系起来。因此，个人图书馆也会将个人与其他群体及其信息隔离开来。需要一本本地去找书，所以人们倾向于“寻找”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主题的书。

对电子讯息的选择则 是比较随意且较少有偏见的。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去决定收音机或电视机的型号，而在广播节目的选择上所花的时间却较少。因此人们会选择花大量时间去看电视，而不是选择花时间选择特定节目。例如，根据最近一项研究表明，观众所观看的电视节目中有 一半以上是一时冲动的选择。长达一小时的电视节目，只有三分之一观众能从头看到尾。同样，在英国和美国进行的研究发现，虽然从一集到另一集电视节目的收视率相对稳定，但是观众的构成却发生着很大变化。“某一天观看某个节目的观众中平均只有一半左右的人第二天还看这个节目”。令人吃惊的是，甚至在只有两集的情节悬念非常强的电视节目中也发生了这种继续观看与放弃的巨大波动。这种“对内容的不忠”在收音机的听众中可能更显著。这种习惯说明，与阅读书籍和杂志相比，人们在看电视或听收音机时更有可能偏离传统的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就像编码这个变量一样，书籍和电视物理特征上的鲜明对比对孩子的影响最大。孩子如果要想得到某本书在许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如书的大小和成本、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们、它们放在图书馆或书店的位置，应该问谁才能找到它们。另外甚至书架的高度也能极大地限制孩子对印刷媒介信息的获取。每本书都有其特殊的信息。电视则能够展示给儿童大量的“成人”信息。

在不同的媒介中，内容与媒介之间的不同关系常常被传统上关注媒介内容的人所忽视。例如，历史学家西奥多·罗萨克(Theodore Roszak)攻击麦克卢汉对媒介感兴趣，而对讯息不感兴趣。他说这种兴趣使他想起了“当有人问琼·哈洛(Jean Harlow)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时她所说的警句：‘别给我买书，我已经有一本书了’”。但是罗萨克并没有将他的这个说法贯彻到底。但对于电视、收音机或电脑来说，哈洛小姐式的恳求可能更符合逻辑：“别给我买电视，我已经有一台了”。不同的媒介对于“谁知道关于谁”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对某一种媒介不同程度的接触(一本书对一台电视)

会导致只能接触一种或许多种信息。

联合因素

作为一个物体,一本书不仅仅是传播媒介,它也是一件艺术品和财产。这样,它不仅仅是提供信息的一种渠道,而且也是自我和身份的象征。正如我们确定穿着风格不单单是为了实用,我们选择书也要能“恰当地”反映我们以及我们所加盟群体的形象。

我们选择的“摆放在一起”的每一本书都形成了我们物质环境的一部分。它必须在物质上被带回家中,放在某个地方,或者放在咖啡桌上或者放在席子下面。书是一种所有物。虽然唱片、录音带和磁盘也是所有物,但广播电视和收音机的信息是短暂易逝的;它的消费不会留下任何能触及的证据。因此观看电视中的某个节目就像在公园里停下来看某个事件一样。一个人不可能将它带回家中,放在自己的所有物中间,或者将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实际上,观看电视的参与程度还不如在公园里停下来观看某一事件。因为在公园里观看某事是一种公开参与的姿态,而观看电视则常常是私下行为,它不涉及任何类型的公开义务以及表明立场。

由于这种“参与因素”的差异,人们在电视上能看的东西可能不会到书或杂志上去看,或者也不会付钱在电影院看。许多人对去书店买有关有易装癖者的杂志可能会感到不舒服,而观看易装癖者的电视节目就不会有这种内疚感。脱口秀的主持人如菲尔·多纳休(Phil Donahue)的事业就是建立在不同媒介中相同内容的双重响应基础上的。

在印刷媒介中,讯息和媒介之间的联系为特定种类的书籍和杂志限定了特定的场景。我们可能将某本书说成“严肃”或“愚蠢”的,我们可能说某本杂志是“好”或者“坏”。但是电视机却是单纯的,除非有内容从中播出。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道德维护协会”(Moral Majority)组织的领导人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会起诉《屋檐》(Penthouse)杂志发表了他被两位非合约作家采访的内容,并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虽然福尔韦尔并没有因为同“不道德的”人——包括这些杂志的出版商和购买它们的妇女,共享电视论坛而有类似的内疚感。(在《屋檐》杂志中看到福尔韦尔就像是在红灯区看到他,但是从电视上看到他就像是在玄学地点看到他,既不是这

里,也不是那里)

参与的条件

即使是在私人场合,读书要比看广播电视节目或录像带需要更多的付出和参与。书必须拿在手中,主动地与之交流。然而对电视机则不然,打开、坐下,图像就会展现在电视观众面前。

即使对有文化的人来说阅读也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例如,页面上的黑字必需一个词一个词,一行行,一段段地扫过。为了获取讯息你必须认真阅读。为了阅读这些词,你的眼睛必须经过训练,就像打字机的滚筒移动纸一样沿着印刷的行进行移动。就像音乐家轻哼他们在某张乐谱上看到的音符一样,许多读者会在脑子里读那些看到的单词。由于牵扯精力,人们肯定不会去阅读他们所注意到的每一本书。人们很可能会寻找那些他们有兴趣并认为值得阅读的特定的书。但是电子图像和声音却是将自己注入到人们的环境中,接收讯息几乎不费什么力气。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必须主动寻找印刷讯息,而电子讯息却会主动出来接触人们。人们不想在书中阅读的某些信息,可能会通过电子媒介展示在人们面前。

因此,使用电子媒介时人们可能会用自己拥有设备的类型来代表电子媒介(或者用他们没有某个设备的事实来代表),但是人们不大可能用通过该设备传到家中的所有电视节目来代表电子媒介。

另外,虽然许多人相信看电视少的人比看电视多的人对电视节目更挑剔,但研究表明这是不正确的:看电视少的人通常看“人人”都看的节目,而看电视较多的人通常是“特别兴趣”节目的主力观众,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会看遍几乎所有播放的节目。正如大众传播研究人员丹尼斯·豪伊特(Dennis Howitt)所解释的那样,“一个节目如果非常受欢迎,它应当吸引人们主动去看它。而那些不太受欢迎的节目之所以吸引观众,仅仅是那些观众不想为关掉它操心而已。”

由于书中讯息的接触具有偏向性、选择性,因此在印刷媒介中编码的信息通常是从某个群体的某一成员传递给这个群体的其他成员。或者,换种说法,信息的有选择性传递,将人们划归到非常不同的信息系统,而创造出各个“群体”。对于你所知道的、书写的或阅读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显然是非常“不一样”。虽然电视和收音机可能不会明显提高人们对许多问题的真正理解,但是它们至少使人口

中的大部分人从表面上熟悉了许多问题以及生活在不同场景中的人群。”而这种熟悉有助于消除其他人的陌生感和“另类感”。

通常人们阅读能够反映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内容,虽然有许多例外,但它仍是有规可循。一本书的内容和写作风格会限制读者的数量和类型。一本详细描述某所全国性医院糟糕状况的书的主要读者可能是专家以及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个人。一本关于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经历的书,其读者面可能也是类似的狭窄。然而电视很少如此明确地将其观众分类。例如,1972年将纽约威尔布鲁克(Willowbrook)州医院的电视纪录片播放给了广大的观众,导致了公众的耻辱,使医院被公开置于窘境并引发了改革。同样,《大屠杀》(“Holocaust”)微型系列电视有1.2亿观众,这些观众中绝大多数人从未读过类似主题的书。

一些书的写作风格和促销可能会扩大它们的阅读面,超出对“该主题”有传统兴趣的人的范围。但即使是最畅销的书也是一种相对地选择阅读。销量超过115000本的精装书通常就能在该年度最畅销小说或非小说的前25位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仅相当于人口总数的二千万分之一。比较而言,黄金时段的成功节目应每集吸引2500万~4000万的观众,或者人口的11%~18%。即使是黄金时段最低收视率的节目所能吸引的观众也有可能比任何作家梦想的自己书的销量都多。

即使是最好的畅销书,其读者也只是观看相似电视节目观众的一小部分。《飘》(Gone with the wind)40年的销量才只有2100万本,而一个晚上在电视前看这部电影前半部分的观众就达5500万。与之相似,1976年电视节目《根》(Roots)在8天播放时间里的全部观众大约有1.3亿。即使在电视节目的刺激销售帮助下,《根》这本书在8年内的销量也没有超过500万册。

问题是,几乎没有一本书能像许多电视节目那样具有那么多的受众。也许与电视节目普及性最接近的是《圣经》(Bible),但是《圣

* 全国很受欢迎的“多纳休”节目最近讨论的一些话题是:喜欢穿女人衣服的男人,反对核战争的主教,儿童奇才,有专长的白痴,色情影星,男脱衣舞者,有疱疹的人。通过这样的节目,观众可以“遇到”并倾听了这些人以及许多其他社会类别的人。

经》在许多人的家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象征,而不是经常读的书。最后,即使成千上万人在长时期内阅读相同的书,但它与电视上同时观看某个事件的影响相比,它对群体身份的影响几乎可以被忽略。近几年来,许多单项电视节目观看的人数超过8000万。例如,“M·A·S·H”最后一集的观看人数为1.3亿,或者说是几乎占人口总数的60%。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之后,某个人可能会发现,第二天他在大街上遇到的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以上的人在前一天晚上有相似的经历。许多批评家将这种信息的大规模共享完全归因于促使广播成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但他们常常忽略这样的事实:在印刷媒介中这种广泛的信息共享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印刷媒介中,有女性书和男性书,有儿童书,也有成人书。实际上,每个性别的每个年龄组都有不同的书。每一个年龄/性别类型都倾向于被包含在自己的信息世界中。被别人看到阅读为异性或其他年龄的人写的书,是件很丢人的事。不久以前,一个小男孩如果阅读《南希·德鲁》(Nancy Drew)神话故事,而不是《哈迪·博伊斯》(Hardy Boys)神话书,他可能会受到朋友的无情嘲讽,指责他性别模糊。这种适应不同性别素材的区别在电视上就不明显了。例如,《哈迪·博伊斯》和《南希·德鲁》形成一个混合连续剧出现在电视上。因此,电视通过改变不同阅读习惯所建立的信息获取模式,可能正在影响着许多群体身份,社会化程度和权威的级别。

电视环境的共享性质引发了许多关于媒介内容的问题和关注。在书籍中,面向有选择的读者的内容是恰当的和无争议的,但是如果电视上播放这些内容就会成为批评家的话题。当电视勾画出主要的“正常的”白人中产阶级文化时,少数民族、亚文化、以及“不合社会标准的人”就会抗议自己被排除在外。但是当电视展示少数民族时,主要民族的许多成员就会担心自己所处的分离的世界正在遭到“侵略”。对少数民族进行刻画性质就成了陷阱²²。例如,如果有关同性恋的节目被以一种负面的、有偏见的方式播出,同性恋权利组织

* 例如,在50年代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盖洛普(Gallup)组织发现85%的男性和81%的女性从未从头到尾读过《圣经》,51%被问的人不能正确识别《圣经》第一本书的名称,79%的人不能说出《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的一个预言,53%的人不能说出《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四本书的任一本的书名。

就会提出抗议。如果同性恋被描述为“正常的”人,只是有不同的性取向,许多电视观众则会抗议电视将同性恋生活“合法化”和“理想化”。

同样,电视也不能完全排除播放注定只适合儿童的内容,因为成人观众需要更严肃更成熟的娱乐和新闻。但是当真正“成人”和“成熟”的节目在电视上播放后,许多父母会抱怨说孩子的头脑被玷污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脱口秀都包括了什么样的电视内容适合于儿童的讨论,但是这些节目本身则可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将许多成人的秘密泄露给了正在观看该节目的儿童(包括成年人对如何养孩子的迷惑和焦虑这种秘密)。

电视上甚至连喜剧结尾和“现实”结尾的选择也成了争论。当节目结尾是喜剧时,批评家会说为了在30分钟或60分钟的套路中完成主题立意,严肃的问题被琐碎化了。但是当结尾是现实的——罪犯逃脱了或者好人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批评家就会攻击电视没能给孩子们展示我们文化的理想和价值。

当然,从整体来看,就能清楚地发现困扰电视节目制作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来自电视内容本身,而是将所有内容同时传播给每一个人的系统的固有的问题。

作为一个共享的环境,电视倾向于包括我们的文化各个方面的一些特性。神化传说后面跟着的是对犯罪和腐败的勇敢披露;电视传道者与脱衣舞男共存电波;诗人和皮条客出现在同一脱口秀节目中。演员和记者竞争尼尔森(Nielsen)排名。然而电视上播放的信息却没有什么新鲜的,新的东西也只是原先分隔的信息系统变成了一个整体。以前仅限于特定年龄、阶层、宗教、性别、职业或其他文化亚群体中所共享的信息,现在全被送进了公开论坛,而且没有人对这种混杂状态感到满意。

很明显,电视所创造的信息系统的融合特征,是“起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有许多因素,它们单独的每一个都足以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一起发挥作用时,使得电视讯息比印刷信息更具有包容性。

一些观察者并没有认识到所有这些因素,他们认为新技术会很快使我们回到过去那种分隔的信息系统中。这些预测的理论根据是,电视频道的有限数量以及节目有限的选择范围是过去造成电子

讯息相对雷同的主要原因,因此选择范围的扩大会打破这种局面。有线电视、录像带、光盘也确实增加了电子媒介选择的范围。光纤(细的玻璃“电线”,可携带更多频道的信息),直接入户的卫星广播,以及计算机、电视机和电话的一体化无疑会继续这一进程。其结果是不可能再回到印刷媒介所造就的那种分隔的交往系统中去的。

接触各种媒介的简单认知机理认为,即使有几百种电视节目选择,也不会使一个家庭重新返回到原来的那种妈妈、爸爸、比利和苏珊聚集在家中的书房,各自读书的分隔的场景中。与书、杂志和报纸的交流是个人的和私下的。你可以将它拿近自己,触摸它的页面,或在空白处写点东西。任何人,即使是就在你的身后看,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你正在读哪一行,哪个字。然而电视不是握在手里的,它的讯息通常是被房间里所有人共享的。

即使每个家庭成员都回到自己的房间(或使用电视手表),也没有复杂的代码来限制儿童观看“成人”节目。另外,许多从电子媒介获得的讯息缺少强有力的“关联的因素”,这使得人们不断地跨越传统的信息界限。

即使是电子媒介的内容像书的内容一样专门化,它也仍比同样内容的书更易被广大观众所接受。有线电视节目制作中的一项未公开的秘密就是,许多内容专门化的电视台的所及范围并不是仅仅是专门的观众。根据一项大规模的市场调查研究表明,美国广播公司的赫斯特频道(ABC/Hearst)白天主要是面对女性,播放饮食、时尚、烹饪、运动和谈话节目,但它所吸引的观众中有三分之一是男性。(当你注意到白天最可能的观众是女性时,这个结果就更有意义了。)同样,虽然《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杂志的主要读者是男性,但同样的研究显示,娱乐和运动节目的网络(ESPN)观众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女性。虽然《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的订户几乎都是男性,但“花花公子频道”(The Playboy Channel)的观众的40%是男女一起看的。而更令人吃惊的是,“花花公子”电视观众的20%是单独观看的女性。结果,“花花公子频道”的制作商开始尽力调整节目,在吸引女性的同时也不失去男性。海伦·居莱·布朗(Helen Gurley Brown)或休·赫夫纳(Hugh Hefner)在书或杂志上,如《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或《花花公子》,教人们对付异性的策略(有时是误导),这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建议如果出现在电视上

就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有许多异性成员在那儿“偷听”。

因此,新技术肯定会打破电视网络的一统天下,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再将观众清楚地按传统的年龄、性别、宗教、阶层和教育进行归类。电子信息资源的增加不会使我们返回到印刷媒介的分隔系统,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可能轻易地接触任何资源。新的亚群体可能会出现,但是它们的差异、稳定性和可识别性都较低。

也许那些认为会返回过去分隔系统的人最容易忽略的事实是,电视的存在,并不是简单地将顾客定制的节目传送给个别的观众群体的低效的选择,也不只是用于分发货物的经济体系。无论是有意还是偶然,电视的单一信息网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共享场景”。除了观看特定的节目和广告外,这个共享的场景有其自身的影响和作用。电视的公开性,以及电视节目没有物质形状,不占用家里的空间,且是被动性地消费,这些导致了电视的“非人性化”使用,这与书籍阅读有很大的区别。

很多人读书是为了将自己与特定的网络联系起来,并且强化他们特定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阅读自己有特殊兴趣的内容。虽然人们也可能从电视上看到自己有特别兴趣的内容,但是他们看电视常常是为了看“其他人”的兴趣以及他们所做的事。^{*} 例如,约翰·默里(John Murray)在总结“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几个发现时指出,书籍通常用来满足与“个人身份”有关的特定需求的,而电视则满足更一般化的需求。如避免无聊、消磨时间、找点与别人交谈的话题,与世界上发生的主要事件保持接触。从这个意义上看,阅读常用来加强和纯化一个人内在的现实。虽然电视和读书的功能有许多交叉,但电视更趋向于将不同阅读圈子的人放进同一个公共领域。

电视被归入了市场和大街拐角,成了另一种需要监视,但无需认同的环境。虽然许多人单独看电视,但是电视能给人一种与外部世界以及其他电视观众相联系的感觉。同时人们对电视上看到的内容要比书中所读到的内容缺少“责任感”。看电视时,人们常常感觉自

* 人们还通过读报纸来监视外部发生的事件,但即使是这样,与电视也还是有区别。人们通常对带回家哪份报纸非常仔细。写作风格、印刷面、格式、广告等等都会反映出读者的个人身份。另外,在过去的20年中,调查显示,美国人感到他们从电视上获得“大部分”的新闻和最“可信”的新闻。

己仅是观察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们常常一边贪婪地看电视一边说,“天哪,我不相信世界会变成这样!”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将自己同电视内容分离的能力造成了人类文明历史上最广泛的信息共享。

因此,电视社会意义的重点不是在于电视播放什么,而是其作为一种共享场地的存在。电视为人类提供了最大范围的同时获取讯息的渠道,这是人类从未体验过的。通过电视,穷人和富人、年轻人和老年人、学者和文盲、男性和女性,各种年龄、职业、阶层和宗教信仰的人常常同时共享相同或相似的信息。通过电视,美国人相互之间能获得一种奇怪类型的共享。在出现危机的时候,无论是意图谋杀还是扣压了美国人质,都会有无数的美国人坐在电视机前一遍遍地看相同的材料。也许是努力寻找安慰,发现意义或者感受与其他未曾谋面的观众的联合吧。

这种大规模地共享信息的机会较少,也许一年仅有几次,然而这个共享场景的存在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大家庭”的存在。如同当发生危机或举行庆祝时,亲戚们自发地聚集在那里。它不必每天使用,也不必经常出现。”

认识到电视作为新的公共领域的角色,就解决了围绕电视观看的许多迷惑,包括为什么人们对电视的内容抱怨得如此厉害,却又继续没完没了地看许多节目;为什么许多美国人说开电视“主要”是看新闻,而按照客观标准,电视上只应有少量的新闻;“为什么买录像机的人常常发现他们并不想创建自己最喜爱的电视节目的“图书馆”。

电视机共享的论坛是一个宣布和确认“现实”事件的场所。未经收音机或电视报道的抗议、丑闻和灾难看起来就好像没有“发生”。

• 由于这种原因,开车时听录音机和听广播电台的巨大差别是,录音机将你同外部世界隔离开,而广播电台却将你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即使听的是地方广播电台,你仍然处于能获得全国和世界新闻事件“的范围内”。而收音机和电视大线就像我们用米监视外部环境的触角。即使电视或收音机中“普通”的讯息也是有重要意义的讯息,它的潜台词是:“我们没有打仗,没有政府官员被枪杀,没有灾难发生……。”也许美国人感到电视新闻如此可信的原因之一就是,“真正的新闻”在发生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后就出现在广播中,当然这不包括将30分钟的新闻扩充成60分钟。如果头条新闻不是惊天动地的事件,那么美国人会安慰自己说,至少地球又有一天远离了毁灭。即使是在真正危机的时刻,观众也不希望有很长的当日新闻,因为他们知道危机会制造出许多晚间特别新闻。

•• 例如,普通的网络晚间新闻报道的脚本中只能填满《纽约时报》首页的二栏。

“水门事件”丑闻变成“事实”，并不是发生在《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而是当电视新闻报道了《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这个事件之后。同样，民权游行和越战抗议并不是当游行人员走上大街才成为社会现实，而是当电视上播放了这些骚乱之后。尽管在任何新闻摘要的选择中都有其固有的失真，电视新闻的现实是一种自圆其说的预言。当瓦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在每一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广播结尾处宣称“就是这样”时，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此多的人同时看的任何内容，也无论它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如何，都会成为一个社会现实。所以，人们在全国电视广播中看那些通常不会选来阅读的东西，因为他们感觉与其他美国人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有了联系。

不明确的接触与明确的接触

对于不同媒介所造成的不同信息接触模式，我还有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观点：人口中不同成员可获取信息明确程度的变化，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即使人们接触信息的内容没有其他变化。

你可能会说，电子媒介并没有明显改变印刷媒介中可用信息的获取模式。因为虽然印刷媒介有许多限制和分隔倾向，但那些是可以被克服并也确实常常被克服掉。例如，一个聪明的孩子常常看很难的有关“成人”话题的书或杂志，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读另一个领域的著作，女性可能阅读男性杂志，一位黑人可能阅读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宣传小册子。因此，在印刷文化中信息系统并不是完全孤立或可靠的。虽然成人和儿童，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语言”，但是儿童和女性确实知道许多“禁忌”的单词和话题。

然而在这些论点中还没有被考虑的是，(1) 信息的简单获取和(2) 其他人知道这种获取，这二者之间的社会行为有着相当不同的意义。对信息的新的获取手段并不一定影响社会交往，除非有关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获取方式。或者换种说法，人们赖以获取信息手段的知识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社会信息。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能接触有关性的书，这种新的信息获取并不是一定会影响父母和孩子的讨论，除非父母知道孩子读了那本书（可能是在孩子的房间发现了这本书）。即使这样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发生,除非孩子也知道父母知道了那本书(也许父母发现书时孩子在场)。如果没有完全意识到,每个人都可能会给其他人带来“潜在无知的益处”,那么这个问题就一直不会被拿到表面上来。

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信息系统之间的传统差异曾经导致了无数的不同行为模式。在成人/儿童关系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行为场景:成人—成人交往,儿童—儿童交往,以及儿童—成人交往。同样,男性/女性关系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形式:女性—女性,男性—男性,以及男性—女性。对其他群体成员到底知道什么的不确定,会帮助维持成人行为和儿童行为,以及男性行为与女性行为之间的区别。父母不知道他们的孩子知道什么,孩子不知道父母知道他们知道些什么。同样,某种性别的人永远不能确定异性知道什么。儿童、成人、男性和女性可能在其群体内部总是诅咒或谈论禁忌的话题,但是他们通常不会在别人在场时谈论这类事情。

电视破坏了这样的行为区别,因为电视将儿童和成人、男性和女性,以及其他的社会群体包含进了一种单一的信息场景或环境。它不仅为每个人提供相似的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信息的提供是公开的,而且常常是同时的。

电视去除了孩子或父母对所了解的内容的疑惑。任何流行的情景喜剧、脱口秀、新闻节目或广告上的任何话题,无论是死亡、同性恋、人工流产、脱衣舞男、变性手术、政治丑闻、乱伦、强奸、鸡奸或者“高耸的分式”胸罩,第二天都能在学校、饭桌上或约会时被谈论到。这不仅因为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话题,而且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人人都知道这一话题,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人人都知道。实际上,如果不谈论或写这样的东西就会看起来有些怪。电视的这种公开的和包容一切的特征使得原先不同的场景融合在一起用。在印刷媒介分隔场景所塑造的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偷偷地讨论禁忌话题,但是有了电视后,“禁忌”的意义就消失了。

与印刷相比,电视倾向于将各种年龄、教育背景、性别、职业、宗教、阶层、种族背景的人包括进相对类似的信息世界中。不同“类别”的人的区别消失了。群体身份、社会化的程度和等级制度的级别之间的传统区别是建立在印刷媒介所形成的孤立场景基础之上的,从这种程度上看,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会模糊这些区别。

五 公开和私下行为的模糊

电子媒介对社会场景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重组早已存在的“公共”信息。电子媒介也并不仅仅是将印刷媒介中可用的信息拿出来,传播给新的受众。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所传递的信息类型是不一样的。

电子媒介通过将原来私下的场景融合进原来公共的场景中,从而进一步整合了信息系统。按照前面章节讨论的戏剧艺术的观点,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就是将正式的台上或前区信息变成了非正式的后台或后区信息,从抽象的非人性化的信息变成具体的人性化信息。这种转变与讨论的“主题”或麦克风前、镜头前的具体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完全不同的展示信息形式有关。

信息形式

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传递的信息类型的差别可以用三对矛盾的概念来解释:传播与表情,抽象与表象,以及数字与模拟。

埃尔温·戈夫曼在他的一项社会交往分析中,区分了“表情”和“传播”这两种概念。虽然他使用这种区别来说明的是面对面交往的特殊性,但这对我们在这里的研究很有帮助,因为它指出了不同媒介所传递的信息类型的差异。

按照戈夫曼的定义,“表情”指的是姿势、符号、声音、标记以及某个环境中某个人出现所产生的运动。大体上讲,一个人所流露出的表情并不能提供有关事物的明确“说明”或“观点”,但是它们却提供了表情器官的信息。例如,被采访人的语调和面部表情,使我们能够感到他对采访者提出的问题的感受和反应方式。从表情中得到的信息总是与表达之人和信息发生的具体场景有关。而且个人的表情在

过去主要是亲临现场才能得到。*

相比之下,戈夫曼将“传播”狭窄地定义为,使用语言或类似于语言的符号,有意识地传递“讯息”的行为。在这种特殊意义下,“传播”包括了对事物、事件和观点有意识地用符号的表述,或书面写出。与表情不同的是,传播可以是抽象的。例如,作者可以与关心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件,也可与关心发生在过去的行为,或者计划将来发生的行为,或者以“自由”和“幸福”之类的看不到的抽象概念进行交流。

按照这种区分的方式,一个人可以随意地开始或停止传播,但是他不能停止表达。传播是有意识地进行,而表情是无意识地“流露”。表情比传播更久远更不易控制。另外,传播的内容可以是任何事情,而表情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讲总是“有关”流露它们的那个人。表情是表现个人和个性的。我们观察它是为了发现对一个人的印象如何,他或她是“什么样的”。由于这些原因,涉及人际关系的重大决定的作出主要是依靠表情而不是传播。没有哪个公司可以不见面就雇用新的主管,一个人也不会仅仅根据个人履历表或者写的一段范文就决定嫁给他。传播可以提供重要“事实”,而表情则用来形成基本的“印象”。**

虽然戈夫曼在“传播与表情”这对矛盾概念之间,以及后区和前区的区别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联系,但它们显然是相关的。由于传播更容易控制和掌握,可以说它有一种“前区偏向”,而由于表情显示个人的私下感觉,可以说具有“后区偏向”。

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印刷媒介仅包含传播,而大部分电子媒介也传递了个人的表情。电子媒介将过去限于私下交往的信息全部公开了。电子媒介将过去人们直接而密切观察时所交换的信息也播放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印刷媒介具有“前区偏向”,而电子媒介具有“后区偏向”。许多“婚介服务”就是利用电子媒介的这种人性特征来赚钱,它们用录像带向客户播放他人的条件。

* 需要亲临现场的几个例外是,动物或人留下的气味,沙滩上的脚印,信的手写风格,这些可能会提供某个生命体精神状态的信息。

** 大部分传播理论家使用“传播”这个术语时包括了这两种信息。虽然在这里讨论的时候我使用了戈夫曼对传播特殊而狭窄的概念,但我在本书其他地方则使用了更典型更普遍的定义。

为了比较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戈夫曼对表情和传播的区分,非常类似于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所描述的另一对矛盾事物:抽象符号与表象符号。

朗格区分了抽象符号,如语言,与表象的符号,如图画。抽象符号与它所表示的东西的关系总是不同于表象符号与它所代表的内容的关系。抽象符号是抽象、随机的,它们在物理上与所描述的物体或事件没有相似性。例如“狗”这个单词看起来并不像狗。另外,抽象符号是由不连续的单元组成的,如单词,每个的意思都独立于元素的特定组合。相同的单词可以按不同的顺序排列,代表不同的内容(“狗咬猫”或者“猫咬狗”)。了解单词排列的意义,也包括大家遵从的语法规则,其中语法与描述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如果我试图用词来描述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我就必须先说一件再说另一件(“那个人走出房子时,猫咬了狗”)。抽象符号的结构与现实的结构没有任何关系。

朗格将抽象符号形式与表象(或非抽象的)符号,如图画和照片进行了比较。表象符号与它所描述的事情有直接的联系。一个物体的图片看起来像这个物体,它具有直接的物理上的相似性。图画模拟了现实世界的许多方面:形状、比例、阴影、颜色和纹理。即使是人物的单线白描,看起来也比“人”这个字更像人。人的图画和“人”这个词是不同的符号。

构成图画元素要远远大于语言的元素,但是图画的元素没有独立的意义。例如,将组成图画元素孤立出来后,图片表面的明暗点都不过是“污渍”。只有当这些明暗点的组合模式能反映真实人或物体的形状时,才有“意义”。相比较之下,句子只有按照某个任意给定语法代码规则的组合时才有意义。

由于表象符号必须代表现实的形式,所以它们比抽象符号难于“编辑”。一个人可以用多种不同的词句描述一幅风景,但他通常不能为了用不同方式描述,将风景画切成数块,然后组合成不同的图形。因为照片并不是由独立的单元排成线性的有意义的板块构成的,我们也不是按照一定顺序一块块地看才看懂照片的。照片只要看上一眼就明白了,它是以一种完形的方式给出的。

某个词和句的含义可以用其他的词和句来解释,但是一幅画的“意思”不能用看另一幅画的方法来表述。词可以描述其他东西(包

括图画和其他词);图画仅能展示自己。《独立宣言》可以被解释,甚至译成其他语言,而图画的要旨,如《蒙娜丽莎》,或者美国海军将旗帜插上琉璜岛的照片,或者小肯尼迪在他父亲的葬礼上对经过的棺木行礼的照片,或者任何一幅家庭快照等,都很少能用词语表达出来。“解释”是语言所特有的。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词表达相同的思想。但是很难用不同的方法表达相同的图画。因为每幅画都传达了惟一的讯息。就如虽然我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解释朗格的话,但是我不可能通过展示我自己的照片来表达朗格的形象。

另外,表象符号不能用来“讨论”具体的抽象的观点。“尊敬”,“爱国主义”,或者引力定律很难用图画表达。看一幅图画时,我们可能会想起这些观点(也就是说,图画使我们想起了某些词),但是就这些观点语言是首要的。

朗格争论说,抽象语言并不是我们传播时惟一的表述手段。非抽象符号是另一种同样重要的精神活动形式以及另一种描述现实的“智慧”手段。然而朗格又指出,表象符号的价值常常被低估了,因为它们不能直接翻译成抽象语言。图画、声音和音乐之类的符号仅仅“展示”了感觉和情绪,没有词语的长处。

抽象/表象这对矛盾提供了另一种区分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方法。印刷媒介去除了讯息大部分的表象形式,它仅传递抽象的信息,但是大多数的电子媒介传递的信息除了抽象符号外还有大量的表象信息。收音机传递声音和语音。电视又增加了视觉形式。就像表情一样,表象信息也直接与特定的人和特定上下文相关。电子媒介比印刷媒介更倾向于将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联合进个人经验和感觉的亲密网络。

表象,抽象的区别类似于另一对矛盾的事物——数字与模拟,保罗·瓦茨拉维克(Paul Watzlawick),珍妮特·比文(Janet Beavin),和唐·杰克逊(Don Jackson)在《实用人类传播学》(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一书中均对此有所探讨。数字符号是不连续的单元,如单词的数量。数字系统是基于连续的——是/否。一个数字或者是3或者是4,不能两者都是。某个词或是这个或是另一个。相比之下,模拟信息是连续的,它们基于多或少的原理。

现在所见到的手表和钟表的两种不同类型可以当作例子来说明数字和模拟形式的区别。一块数字手表用不连续的单位来显示时

间。它或者是 12:57 或者是 12:58(或者两者之间的不连续单位,如 12:57 过 10 秒,与 12:57 过 11 秒相对应)。但是,模拟手表中的时间是连续的。一个人看数字手表时是“12:57'10””,而看模拟手表时可能是“大约 1 点钟”。数字计算器和模拟计算尺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差异。计算尺进行“近似”计算时非常有效,但它不能得出精确的数字结果。

人类的传播也可以分成数字系统和模拟系统。我们所说的话或信中所写的字是数字讯息。词和句子是不连续的单元,有相对具体的意思。带空格的句子“我____吃鱼”中的空格可以用“喜欢”或“不喜欢”这类词来填写,只能是这个词或那个词。但是拥抱、握手和微笑则包含了模拟信息,即在握手时没有不连续的真诚表达。

瓦茨拉维克和他的同事认为,数字传播传递了“内容”讯息,而模拟表情传递了“关系”讯息。也就是说,数字传播的可能是总体事物,而模拟讯息倾向于显示人们如何表露自己对周围的人或物,或对于他们所说或听到的数字讯息的感觉。

这对矛盾事物也帮助区分了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形式。印刷媒介传递数字信息,大多数电子媒介同时传递数字信息和模拟信息。

个人的对非个人的反应

以上总结的三对矛盾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对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反应如此不同。印刷媒介的传播——抽象——数字讯息与电子媒介的表情——表象——模拟讯息具有不同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讯息描述了不同的事物。例如,电视用以“展示”一个物体或人的方式,语言描述做不到。因而,如果一名警察想抓住一名逃犯,在识别该逃犯时录像带要比语言描述有用得多。同样,没有人会将已经过世且深受大家喜爱的人的惟一一张照片来换他的一首诗。但是表象信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它们不能传递抽象的观点或概念。因此,“转瞬即逝的”和“公正的”观点不能够用录像图像来表达。我们可以给在一起吃饭的两个人照像,但是不可能用图画表达“慈爱”,“友谊”或“爱”的概念。可以展示某一特定女性的图片,但是不可能用图画表示“女性气质”。你

可以用图画展示一个球或结婚戒指,但是“玩具”、“圆形”或“连续性”则必须用词语来讨论。“伟大的领袖”这个抽象概念可以用语言来表达,而一位总统的照片则只是表示一个特定的人。

另外,除非用词来解释表情或表象符号,否则它们的含意常常是模糊的。表情讯息没有限定物来指明它的几种可能的解释中哪一个是正确的。“眼泪有悲伤的,也有喜悦的;紧握的拳头既可以代表侵略也可以表示克制;微笑能够传递同情或鄙视;沉默寡言可以被解释为老练或冷漠”。同样,人们常常依靠一幅画的文字说明来确定其意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电子媒介的模拟讯息既是较直接的,又是较模糊的,而且更加“自然”,但却缺乏精确。模拟讯息直接来自发送者/主体;它表明了发送者/主体“真正的感受”如何。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将合同建立在一个微笑或皱一下眉头的基础上。如果要理解讯息的准确含义,则需要语言的交流。

电子媒介表象讯息没有与其相对应的语言学语法或推演的逻辑。一个人的手势或说话的声调不能像处理文字那样进行重新排列或编辑,因为它们不能被分成不连续的单元。表情讯息没有像“如果……那么”或者“不是……就是”这样的逻辑的联系。表情讯息不能用来区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也不能用来陈述可被证实的正确或错误的观点(“明天要下雨”或“我有三只手”)。本书中的理论不可能用一系列的电视图像来表述。观点依赖语言才能存在。

然而作者通过抽象手段传递的讯息是高度“非个人化的”。例如,这书上的文字丝毫不能说明我个人的存在。我可能说话口齿不清或者口音很重。我可能有一双诡诈的眼睛并总是读错字。我可能高也可能矮,也许年轻也许年迈,或活泼或严肃。但所有这些你都不能从我所写的文字中看出来。甚至连古怪的用语和拼错的单词都不会直接归咎于我。这也许是编辑或打字员所犯的错误。印刷提供了共同承担的责任,印刷的书页就是一个屏蔽,在它的后面可以隐藏个人的个性和弱点。但是我们之间经过30秒的面对面的交往(或者在电视上看到我之后),你就可以知道我个人的一些东西,这是在读我所写的任何东西时都不会知道的内容。

电视上的许多表象讯息都无法翻译成抽象语言,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常常瞧不起电视。但是尽管按照传统(抽象)

的观点来看大部分的电视娱乐讯息几乎不是“现实的”或“有教育意义的”，但是它们确实为观众提供了人物、地点真实的图像和声音。这些表象符号丰富了我们的“经历”储备，而不是抽象的知识、争论或观点的储备。

抽象形式和表象形式的差异如此之大，这显然主要是由我们大脑的不同半球所产生和感知的。在大部分的左撇子人中，脑的左半球是语言中枢，右半球处理与视觉和空间模式相关的任务。大脑左半球主要用于处理语言、序列、和不连续的符号，而右半球主要是图像、形状、感觉、顿悟和直觉的领地。

这些区别造成了电视发送讯息所“描述”的主体与印刷品所描述的主体的不同。我们对语言讯息的反应（如报纸上发表的演讲）常常问，这是否是真的，并论证其是否具有逻辑性，写得好不好。印刷讯息是与“话题”和“观念”相联系的。但是电视上的表情讯息常常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它们更加具有人性，与说话人关系更加密切。表情讯息可以不断地告诉我们表达者对场景的态度，他们的感受，以及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情感反应是什么。因此，对电视演讲的普遍反应是对演讲者而不是演讲内容的思考。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某位政治家时，他们通常会想到或者说：“他看起来很紧张”；“她看上去好像要哭”；“我不信任他”；或者“她很坚强！”

当然，一个人可以选择去写非常个人的事情——就像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或一封写给《屋檐》杂志信中那样，但是与表象媒介不同，一个人肉体的自我则完全不在场。即使印刷的文字表达的是亲密的事情，但是讯息传递所采用的形式却是非个人和抽象的。有血有肉的人很少能展示在印刷媒介中。相比较，在电视上，一个人可以谈论非常个人的话题，并且不可避免在传递抽象“话题”的同时传递了大量的有关个人的暗示。

电子媒介比印刷媒介更多地将个人的私下领地投进了公共场所。电视所提供的信息类型是我们同家人或朋友在一起时习惯响应的那种。与印刷媒介相比，电视提供了大量传播者个人的外表信息。私人感情和公共传播的区分被模糊了。突然间的上气不接下气、眼中充满泪水、具有感情的声音，以及一往无前地克服困难的历程，所有这些所传递的信息都不是抽象的、数字的或传播的，而是表象的、模拟的和表情的。1972年当总统候选人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站在曼彻斯特“工会领导(Union leader)”大楼的台阶上反驳对他妻子攻击的一则新闻报道时,人们对这条电视讯息的反应主要是基于他的表情行为,而不是他传播的语言讯息。许多人能记得马斯基哭了,但却很少有人会记得他说了什么。

来自乔治·E·里迪(George E. Reedy)的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在不同媒介中语言和非语言讯息的重要性,里迪是约翰逊总统的新闻秘书。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吉米·卡特如何利用电视的文章中,里迪指出,“至少,[卡特]已经证明,一个人可以不需借助文字来沟通非常复杂的观点”。里迪认为最好的例子是卡特对能源危机的“炉边谈话”

我已经同许多地方的美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没有新闻记者,他们会写这方面的文章;也没有政府官员,他们可能会对此作出反应。我发现这些美国人没有人能记得他所说的任何内容。但是,他发表声明时穿了件毛衣这个事实,已经成了传奇故事。重要的是,同我谈话的每一个人都将复杂的意思归结为行为。

电视的表象特性影响了我们对总统竞选和辩论的反应。电视上的竞选运动很少关注问题本身,它们注重的是个性和风格。媒介顾问在竞选运动中常常发挥比政治顾问或演讲撰稿人更重要的作用。通常,政治家在电视上露面时应尽量避免显得沮丧或愤怒,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政治家在电视上的举止往往比他的政治计划更重要。在卡特—里根辩论的那天晚上,里根的助手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递给里根一张提示卡片,上面只有一个词“微笑”!当大多数人回想起这些电视辩论时,他们倾向于记住参与者的总体风格和情绪状态,而不是他们具体的语言辩论。

关注电视讯息的表情,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电视并不是在“不正常”的程度上削减了人们的语言讯息。在许多人际交往中这种对表情信息的关注也同样存在。人类学家艾伯特·梅赫拉宾(Albert Mehrabian)对非语言行为的研究显示,人们在面对面交往中给予讯息的相对比例分别是:语言7%,语调38%,面部表情55%。如果这些数据准确,那么一条讯息的90%以上的含义是通过表情表达的,而不是“传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两个人首次约会时,他们会仔细观察对方的表情,来感知对方是否过得愉快。客套的

语言讯息(“这是一部好电影”或者“我过得非常愉快”)提供的是相对较少的有关信息。

在书面语言中,文字本身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非语言的提示,就需要非常仔细的构想和修改才能表达出正确的“感受”。讽刺、嘲笑,以及其他有细微差别的意义很容易在书信或书本中丢失。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最亲密的情书也倾向于有一种“正式”的性质,而许多商务会议或电话交谈看起来却显得非常亲密和个人化。

在面对面的交往中,语言讯息的重要程度与语音和手势信息的数量成反比。当非语言信息很弱或者根本没有时,语言信息变成主要的。因此,对说话者语言讯息的注意会随着人际之间距离的变化而变化。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近,对语言讯息的注意越少。对一群聚集在餐馆饭桌旁的朋友来说,他们所进行的交谈,很少能从他们所说的语言字面上完全理解。在亲密的交往中,句子是不完整的,有时态的变化,也会产生无数的语法错误。当可以得到其他来源的信息时,构思和接收文字有可能被忽视了。

看电视时,对表情讯息的关注比面对面交往时更为主要,这里有如下几个原因。虽然在现场交往时身体靠得很近不是这种场景交往的规则只是例外。但这在电视上却恰恰相反。对某位观众来说只有在特写镜头中多次仔细看到某人后,他才会对这个人作出反应。另外,信息的单向流动,允许观众做一些在面对面交往时被看成是不礼貌的行为,如盯着某人看。另外,在现实生活的交往中,一个人不可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监视别人的行为上。因为对方也同样处于这种表情和传播之中,留心其他人如何监视自己行为过程。但是在电视上,观众可以放松地坐在椅子上全身心地关注所展示的表情行为。但其本身仍然不处于被观察的状态并且相对不需表达。(实际上,由于上述所有这些原因,电视可能是非语言传播领域最新成长的一个诱因。)

由于电视丰富的表情空间,所以电视上的采访完全不同于印刷采访。在电视上,即使是“无可奉告”或者长时间的停顿,也由于它富于表情信息而成为有意义和重要的“回答”。它显示了说话人对场景以及问题内容的反应,即使反应是以非语言为主。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60分钟”,就常常利用被采访者词语之间的长时间停顿或者口吃,使用非常近距离的特写镜头。实际上是太近了,以至一个人

任意的头部运动看起来都似乎是在试图逃避这种观察。这种镜头似乎在暗示着被访问者正在隐藏什么或不诚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镜头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因为头部的突然运动或者不舒服的表象符号并不一定意味着欺骗。它们可能仅仅表示镜头前的激动、紧张,或者是疲劳、记忆失误,或者是胃不舒服。)

虽然一些分析家将这种新的政治领导人的“个人”报道归因于记者或编辑的有意识决定,但是这种倾向更可能是因为电子媒介“捕捉”个人特性的能力所决定的。将领导人的个性“曝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所暴露出来的行为是领导人自己流露出来的,与报纸上的引用不同,表情信息不易被重新组织或编辑。如果一位政治家说到某句话时哭了,这在印刷媒介中就不一定要提到它,但是当你播放这些话的录音时就不得不同时播放哭声。在广播记者的行业术语中,录音的报道或采访是“事实”,这是名副其实的。这些表情允许为自己“说话”。

出于某些原因,播放某人录像带的决定不同于在报纸上引用某人讲话的决定。譬如如果我偷听到一位政治家的誓言,我又将它变成文字,我则似乎也要对这些文字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我用录音带或录像带录下了这些话或者表情,然后播放出去,那么这些话和表情则似乎是直接来自说话者,我的责任(虽然有争论认为这与前者是相同的)则似乎是基本消失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当杂志编辑刊登了1976年副总统尼尔松·洛克非勒(Nelson Rockefeller)对质询人作出淫秽动作的照片时,编辑就将这个姿势出现在杂志上的责任推给了洛克非勒先生。但是如果摄影师没有将事件记录在胶片上,那么这位记者就不大可能针对他这种姿势进行详细的语言描述。通过镜头或麦克风捕捉个人表情的能力,加深了这些表象信息进入公共记录的程度。

当然,行为可以排列成任何顺序或者被剪辑成任何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和录像带是可以被“编辑”的。但是你不能像编辑某页纸上的文字那样,自由地对电影或录像带上的人物的行为和语言进行处理。在印刷媒介中,一位编辑可以加词、减字、改标点符号,或许将美式拼写改成英式拼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改变作者的“口音”)。然而对于电影或录像带,删除一个词常常是非常明显的,增加词也几乎是不可能,从中间断开的句子听起来会特别奇怪。为了编辑出一个词组或者句子,录像编辑常常被迫切换到另一个镜头(比如采访者的点头)以避免“跳接”,否则一个人的头、身体和手会突然跳到了新的位置。但是,即使是最平滑的剪接工作也不能改变一个人说话的节奏或者编辑出它包含着的自负或不肯定的语调。

电子讯息表象的特征也解释了为何公众不再反对政治代笔人的作法。过去,总统和政治家都是自己写讲稿(或者宣称是自己写的)。毕竟,如果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只能阅读你所说的话,他们当然希望相信那些话真的是你写的。如果是别人写了那些话,就失去了直接来自你或关于你的讯息。但是电台或电视上的演说所伴随的表情是非常个人化的,并且本身也可以流露出许多东西,这样文字的著作权已不再显得重要了。^{*}实际上,电视上演讲的政治家即使引用了其他人的文章或诗句,这也能反映出他的个人哲学,这也会使观众高兴。相反,如果某位政治家让别人代替自己发表媒介演讲,他将会疏远观众,即使那些话都是政治家亲自写的效果也一样。在电视上,表情的重要性通常超过语言。

电视上对表情所暗示的个人的和情感的反应解释了一些原本令人困惑的政治民意调查结果。近几年来,民意调查人员发现选民的政治观点与他们对政治家的个人感情之间的差别。例如,1982年2月全国人口中只有47%的人肯定了“里根处理总统工作的方式”,而70%的人“作为个人”“肯定了他”。另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一被访问的人不赞同里根的政策,但是从个人观点上看“喜欢他”。因此,在电子时代,许多人很可能会选他们并不赞同其观点的候选人,或者在选举时反对与他们政治哲学相同的候选人。如果选民只能接触到候选人演讲和政治主张的文稿,这种投票行为会很不可思议;而只有当选民感觉他们个人“认识”候选人时这才有意义。

电视上丰富的节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表情内容而不是传播内容。脱口秀节目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谈话的脚本,如“今晚”(Tonight)节目或“家族宿仇”(Family Feud)的游戏节目,读起来可能会非常乏味和缺乏教育意义。除了大家普遍认同小测验节目在传统意义上是“有教育意义的”之外,这些节目中很少或根本没有“传播”内容。然而,游戏节目表情丰富。人们置身于有压力的环境中,并且他们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实际上,潜在的竞争者因为他们的丰富表情而上了电视。)这些节目中的“学习”来自于人类行为和经验所固有的“真实”和“现实”。

* 虽然我主要关注收音机和电视之类的媒介,但是扩音器也对公共演讲的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有了麦克风和扩音器之后,一个演讲者可以说得更温柔更亲密,并能出现更细微的表情。总统演说第一次使用扩音器,广播的诞生和总统班子中“演讲作家”的正式加入都发生在同一年,这也许并不是一种巧合。

电视上最昂贵的内容——广告,也更加依赖表情而不是传播。很少有全国性的产品广告活动,会以展示要他们产品的正式的、有逻辑性的语言的“论证”来完成,相反,他们将人们置身于具有高度表情的场景中:微笑、大笑、拥抱、接吻、唱歌、跑、玩,或者跳入水中(常常用慢镜头)。其中暗含的非语言观点是,购买他们的广告产品会使你感觉良好,使你更加可爱。即使使用了语言讯息,他们常常将这些抽象语言尽可能地推向非线性的表象讯息(“喝杯可乐有个微笑”;“我和我的 RC”;“可乐就是!”)。广告的表情讯息几乎无法规范。作为非抽象的表象信息,它们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一则减肥软饮料的广告说,“喝这个饮料你会漂亮,你会有漂亮的朋友陪你一起在海滩上玩排球”,那么这个广告商很可能会因为欺诈而受到惩罚。但实际上广告中很少有这样的语言。它们不诉求理性,而是诉求情绪和感觉。

广告商希望尽量避免理性的语言描述这毫不奇怪。但是当人们意识到电视新闻和纪录片也是如此时,就不免感到沮丧。与报纸报道相比电视新闻则显得非常不正式,其脚本中所包含的“信息”常常少得令人吃惊。电视新闻的风格常常更适于住宅附近的咖啡店,而不是新闻专栏。^{*}新闻纪录片中所包含的表情信息通常要远远多于传播信息。当麦克风或镜头对着失事飞机幸存者的面孔或刚刚听到儿子被杀的母亲时,只能发出很少的传播信息,但是却给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表情信息。

电视新闻内容的非正式性,常常是由于新闻广播人员之间闲谈

我仍然记得第一次读瓦尔特·克朗凯特的 C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脚本时所受到的震惊。该新闻节目 1972 年 10 月 25 日播出,开始如下:“晚上好。北越今天加大了对和平问题的宣传攻势。河内称尼克松总统诡计多端、狡猾,是印度支那地区和平的真正障碍,而障碍并不是南越总统阮文绍。同时在巴黎,越共声称在几小时内就可以达成停火,条件是尼克松先生或者抛弃阮文绍或者让阮文绍接受联合政府。”当这些话大声读出来时听起来很好,但是它们与受人尊敬的报纸报道风格完全不同。这里请注意它的非正式语言结构以及词语的使用,如“诡计多端的”、“狡猾的”、“抛弃”和“让”。稍后在同一天节目中克朗凯特开始了另一个严肃问题的报道,“今天出现了更多致命的小型邮件炸弹。”第二天《纽约时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报道了相同的事件,将共产党的指责隐含在整篇报道中,文章一开始写道:“来自不同方面的共产党声明集中于……警告,如果不能达成协议,他们会一直战斗到胜利。他们最新的指责认为,和平报道是美国的一个‘政治诡计’,是用来‘欺骗公众舆论的’”。而邮件炸弹的两则报纸报道中有一则是这样开始的,“通过邮寄的爆炸装置,今天在这里炸伤了一位阿拉伯邮递员和一位秘书,伤势严重。另有其他邮件炸弹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爆炸或者被截获。”

风格和非正式的交往所造成的。(地方性新闻节目尤其如此)。实际上,电视新闻“小组”之间所表现出的关系的性质常常是一个新闻节目成败的关键。双关语和相互交谈方式通常是低水平的传播,但是它们却是有意义的表情信息。这些新闻广播人员试图使观众觉得他们是“友善的人”,并且是另一类的朋友。

电视新闻中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新闻广播员成了新闻的一部分。但是报纸的记者却很少成为新闻的一部分。电视广播员和采访人员也将个人暴露在电视上。由于我们感受了他们个人的表情以及他们对事件的反应,所以现在他们变得与他们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一样重要。许多世界领导人和名人的个性及家庭被公开报道之后,老牌记者巴巴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感到,做一个她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生活的电视节目才是公平的而有意义的。类似的,瓦尔特·克朗凯特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退休本身也是一则重要的新闻事件。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如果表情信息是模糊的、不精确的,为什么许多电视节目,包括新闻节目,又如此依赖表情信息,而许多观众又为什么显然接受它们呢?因为表情看起来比语言更自然、更真实。表情直接来自于人,而发送人对它们的控制显然不如对传播信息的控制。一个人用语言撒谎很容易,而非语言“撒谎”则很难。一个不道德的人可能会说或写虚假的话:“我爱你。”但是他很难用非语言——特别是在长时期内——表达相同的感情,除非它是真的。但是撇开真实与虚假问题不谈,你“认识”或“了解”了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某人是一种基本的感觉,因为你感觉到了他们的个人表情。

让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改变或控制自己的表情行为也是非常困难的。威胁别人或者拧着别人的手臂也许会强迫这个人写出他或她不相信的内容(如承认犯罪),但是很难劝诱别人说出“听起来是真的”假话。另外,表情讯息是非常“个人化的”,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假装”,或精确地模仿另一个人的表情。作为愚人节的恶作剧,你可能会给朋友写一封信,然后签上你朋友老板的名字。只要你做得足够好,你的朋友肯定会当真。但是如果你打电话给你朋友,假装是他的老板,那你的任务就很艰巨了,因为你必须掌握他的老板的语音风格。而如果你来到朋友家门口(或者送一盘录像带)假装你是他的老板,那你愚弄朋友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

虽然文字传递的意思比表情更精确,但是当它孤立 在纸面上时,却常常显得缺乏信任感及表现不充分。当你看到印刷媒介上的文字时,很难说明它们被写下时是由于恐惧还是自信,被说出时是羞愧还是自负。我们也很难确定文字的真实作者,并且在表情讯息中甄别欺骗的方法根本不适用于用来检查书面声明是否是真诚的。即使是报纸上准确的引用也可能最终被说出它们的人否认。

由于这些原因,录像带中的表情“证据”是非常有力的。许多警察部门发现录像的认罪记录比书面的认罪记录造成判罪的比例更高,因为被告很难否认录像供状或者声称那是被逼出来的。同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亚伯斯塔(Abscan)录像带展示了议员接受了贿赂,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假如这是证人用语言叙述的,那所提供的证据就不那么有力。出于同样的原因,“录像遗嘱”——一个人在录像带中陈述自己最后愿望或证明,现在已是越来越流行。假如在一份遗嘱中,你富有的叔叔哈罗德(Harold)只留给了你一只备用轮胎,当你看见并听到哈罗德亲自说将那个礼物赠给你时,你就很难对遗嘱有异议。

控制或假造表情信息的相对困难解释了为什么电子媒介比印刷媒介更亲密,更个人化和更富有表现力。电视中充满大量的表情信息说明了为什么许多美国人都宣称,他们发现电视是所有新闻来源中最“可信的”。^{*}这是因为虽然电视上的新闻是高度包装的,它大部分的信息来源与报纸和广播电台的来源一样,但是至少有某位你“个人认识”的人告诉你。表情讯息的力量也许是造成“隐蔽镜头”的采访,对大街上的人的采访,以及其他“真人”节目可信性的一个原因。

不同的电子媒介所传递的表情提示范围是不一样的。例如,收音机只传递声音表情。那些能够很好控制发音的人可能会很有效地使用该媒介,即使他们不能同时控制其他表情也一样。一个紧张的发言人可能会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但是却不能控制腿的颤抖或者身体的晃动。收音机比印刷品更富于表达,但是收音机也是活跃的过滤器,它过滤掉了所有视觉的表情提示。

* 根据罗波尔(Roper)的调查,自1961年开始,电视被看成是所有新闻来源中最可信的。自1968年开始,它比下一个最可信的来源——报纸高出的程度超过2:1。

因此,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潮流(以及从收音机到电视机),是由正式的社会前区讯息到非正式的、个人后区讯息的潮流。印刷媒介展示了经过修饰的有风格的讯息,而电子媒介展示了自发的和“自然”的讯息。即使当新闻和娱乐节目的“内容”脚本经过严格的编写和策划时,节目中个人的表情信息仍展示了“一部分生活的”的景观,这与印刷讯息是不能比的。在其他各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电子媒介倾向于将个人场景融进公共场景。

个人场景和公共场景的融合对于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教育背景的人的信息系统有着双重的影响。电子媒介传播信息的表情特征同化了对信息的获取,并且将不同人所展示的大众形象类型都融入了公共领地。

表情讯息的获取比语言或印刷讯息的获取更加平等。正如瓦茨拉维克和他的同事指出的那样,小孩子、精神病人以及动物都能准确地获取表情的一般含义,即使是当语言的提示对他们没有意义也是一样。同样,两位非语言行为研究人员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和瓦利亚塞·弗雷森(Wallace Friesen)指出,门外汉对表情讯息的解释常常与专家的解释相吻合。

虽然人们根本不可能通过阅读某本用陌生外语写成的书就学会那种语言,但是人们一般有可能理解一些电视上相互交流的外国人所展示的信息含义。行为、语音和交往“语言”充满了有意义的表情信息。波兰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瓦文萨,通过电视成了世界英雄,虽然他的许多崇拜者既不理解他所说的语言,也不理解他的工会所处理事务的复杂性。同样,普通的美国人可能不理解一位政治家政策主张的全部含义,但是任何人都能抓住展示政治家同自己家人一起吃早餐这一竞选运动的广告“含义”。任何人都能理解记录政治家往口袋里塞钱的那盘联邦调查局录像带是什么含义。

表情/传播的区别对于阅读与看电视习惯之间的差异更有启示,这在最后一章中有详细讨论。一本有关精神病院的书可能包含特殊的抽象数据,只有在这个领域受过训练的人才能看懂。虽然电视节目也会讨论类似的专门话题,但是节目通常展示的是非专业化的信息。总之,所有展示人们行为的电视节目都是关于相同的东西:人的手势、感觉和情绪。电视的表情特征使得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能被广大观众所接受。

由于电子媒介对表情极其依赖,使得不同人发送的信息趋于平等。虽然某些人会比其他人的表情风格更使人愉快、更具有说服力,但是表情能力并没有明确的等级。一个人即使是去哈佛大学也不能学会“作表情”。其实动物和小孩也会有“有效的”表情,虽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或许有办法教会人们具有更愉悦的表情,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对这类行为领域不以为然。’

每个人的五官都可以流露出表情信息,有时候孩子和文盲的表演比著名的学者及诗人更令人愉快。不同年龄和教育背景的人写作风格的差异是可以预测的,但他们表情风格就不那么容易预测了。散文、文章、书必须要受过专门训练的“作者”来写,但是一个录像“散文”的内容,大多数路边的男人、女人、孩子或动物都能提供。按照这种说法,不同的人在电视上所展示的讯息有着内在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只在面对面的交往中存在,而不存在于其他的传播形式中。由于无需入门的技巧,那些被排除在印刷媒介形式的社会论坛之外的群体,现在则可以参加电子媒介所创造的公共场景。

当然也有表情的“超级巨星”,他们的个人风格能取悦人口中的大部分人,他们不仅能表演,而且许多人发现他们的表演方式很有意思。脱口秀主持人如菲尔·多纳休,显然有着罕见的表情能力,这使得他们成为公众“人物”。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纳休节目的一部分吸引力是,来自他主持的节目演播室中每位观众几乎都能提供一些喜剧或戏剧效果。

另外,优秀的表演者不一定是优秀的“传播者”。例如,得到上帝恩赐的瓦文萨在人际交往中、在电视上都是很有能力的表演者,但是在印刷的讲演稿或者书中,他就无法引起人很多注意。正如《时代》周刊中报道:

他那种工人阶级的波兰语很粗糙并且常常不合语法……他的演讲中常常充满着混合的比喻和歪曲的类推,让人很难理解。统一党

· 演员是有意识地学习表情技巧的少数人之一。但是与舞台表演相比,电视“演出”常常意味着学会如何“自然地”表现,假装没有镜头存在。现在许多商业领导人接受在电视镜头前演讲的训练,这样他们可以通过录像带对其雇员发表演说(或者成为公司电视广告的名星)。但是需要再次说明,他们接受训练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学习如何在镜头前显得自然。我们从电视系列片“真实镜头”中知道,许多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演员”表现得多么好。

的领导人承认,瓦文萨……是直觉的而不是理性的。他非常强硬地宣称他一生中从未读过一本严肃的书。

但是瓦文萨将他希望传达的讯息传递给了他的同胞。一位华沙记者说:“有时他传递的讯息甚至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总是在保证着什么。”

与精英主义的抽象传播相比,表情更具有可接触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感到,他们并不需要政治专家帮助解释和理解电视播放的政治“演讲”。任何人表情讯息的“真实”和“现实”性,也解释了为何在新闻节目和电视纪录片中所播放的街上行人的反应如此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电子媒介的信息形式正在改变着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理解。通过电子“文档”,未来的子孙后代就能体验到一种全新的历史。过去的“历史”是由有钱、有权和受过教育的人所写成的抽象文稿。由于这种抽象性,历史资料也常常充满了论证、提议、观念和理想。然而声像带档案的不断增长,也将普通人带进了历史,同时,它们也显露了普通的东西,甚至是我们领导人的普通一面。这些记录的“语言”是表情的——表象的——模拟的形式的姿态、感觉和经历。在过去30年中,许多历史学家发现,我们在理解过去时存在着一个真空,那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经历。他们虽然没有写下自己的思想,也没有创造历史,但是他们是历史的一部分。一种全新的历史工程已经启动,它包括分析教区文件、墓碑,以及其他“我们失去世界”的踪迹。

“印刷的”对“报道的”

所有的媒介都像是过滤器,排除了“现实”的某些方面。但是,每种媒介又都是互不相同的过滤器。编码的过程越是抽象、有阻隔和缓慢,则讯息越不像它们所代表的东西。讯息与现实越不相符,则媒介就越能用其来展示事件典型的和理想化的形象。相反,媒介越是无需花大力气简单地就能“捕捉”到一个场景内所发生的事情,则讯息越能真实地反映行为。讯息与真实的行为和事件联系得越紧密,它们就越不易被操纵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缓慢而有阻隔的媒

介有着“前区偏向”，而快的、没有阻隔的媒介具有“后区偏向”。

手写或印刷的讯息一般比通过电子手段传播的讯息更正式。坐下来写一封信要涉及抽象的、有阻隔的编码。因为你必须将信息“翻译”成它的形式，所以很难忘掉这种介入的媒介。但是在麦克风或者电视镜头前的人并不涉及复杂的录制活动。你只管“行动”，“讯息”会自动地被“捕捉”。

当媒介是双向交互的时候，电子讯息的非正式性就更强了。例如，我们给别人打电话时非常自然，常常会忘记所介入的媒介（我常常说“我昨天晚上跟____说话”，甚至没有想到要补充说是通过电话交谈。但是当我们给某人写封信时，我们很少用“我说”。）由于电子媒介及其代码的非阻隔性，电话交谈与大多数的书信交流相比，更具有自发性，并缺少设计性。给最好的朋友写信比同陌生人的电话交谈更公式化。人们常常会将一封信重写好几次，但是很少有人会在电话上说：“让我们重新开始这次谈话”。

该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电报”这种后印刷媒介比印刷更正式、更缺少表情。电报的莫尔斯代码是一种代码的代码。一位学生写信向父母要钱时，其中包含的表情信息比通过电话要钱时要少。而用电报是三者之中最缺乏表情信息的。它像是象形文字，处理着块状的传播短语（“有麻烦逗号寄五百美元逗号爱你的鲍波”）。同理，当电脑用于抽象传播而不是表象信息时，电脑讯息就更加“呆板”。

电报与电话相比在正式性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从这两种媒介传送的第一条讯息中就能看出来。莫尔斯的首条电报讯息是“上帝作成了什么？”或者“宇宙请注意！”两条讯息都非常正式和抽象，它们显然是前台讯息。它们很少传递个人的表情或影响。而首条电话讯息则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报道它是：“沃森，到这儿来，我需要你”，这里显然是个人的后台讯息。

如果一种媒介的内容需要复杂的编码，那么编码人则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来组织讯息。编码的时间和精力使讯息发送者脱离了现场正在进行着的场景。在现场交往中，你在吃饭的同时可以夸奖厨师，而要用文字来赞美一餐饭非常可口，你必须要等到用餐结束之后。

但是书写的烦琐也可有其可取的一面，你写东西时必须花的时间也可用来对最终讯息进行仔细的精简和调整。时间也能用来消除

错误,去掉模糊,并可以将你花时间来组织和编辑讯息这一事实隐藏起来。因此我们感觉到,做客一周后你给主人写明信片以示感谢,比道别时自发地咕哝的感谢,更能表达我们对做客的想法。

书写最大的危害被该媒介所固有的延迟性掩盖了。誊写和校对一篇文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焦虑、修正、疑惑、汗流浹背、发誓等都在这个缓冲时段内被隐藏了起来。书写不仅排除了所有的表情行为,而且也隐藏了产生讯息的物理过程。因此,文章的最终定稿有着自信和正式的语调,与笨拙的第一稿大不一样。

讯息编码发送和接收的越慢,它们的内容就越正式。慢的讯息必须“总结”事件,而即刻的讯息则展示事件的“抄本”或“印本”。现场叙述的组织性差,包含许多不重要的细节,还包括角色扮演者通常希望保密的许多行为的某些方面。即刻信息“更混乱”,更具有后区的味道。

例如,当你给一位好朋友写信时,可能会总结过去几周或几个月的事件。你可能告诉朋友天气曾经怎样,你的孩子开始会说话了或者你开始自己种菜了。然而,如果你写信过程中,这位朋友给你打来电话,那么你要传递信息的类型通常会发生变化。书信给出了过去的一般总结,而电话交谈则面对的是现在发生的具体的事件。你可能会朝窗外望去,告诉他你的摇椅被风吹翻了,或者将电话放下一会儿,告诉你的孩子不要在另一个屋里大叫。在电话里,你说话的语调可能会说明你今天累了;你可能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因为吃了变质的西红柿,你的胃有点儿不舒服。即使相同的主题,都是关于你和你的生活的,书信倾向于提供一个较正式的前区观点,而电话交谈则包括非正式的、即刻的和后区的经历。

同样道理,电视对事件的现场直播比报纸的叙述更具有后区风格。电视对人质状况、蓄意刺杀、工会谈判,以及机场事故的报道,包括了大量的即刻流言、猜测、六神无主、焦虑以及不正确的假设。1982年,某人威胁要炸掉华盛顿纪念碑,现场直播则不断改变方向,无组织、无新的信息量,它证明了警察和记者对正在发生的事件实际上所知甚少。而第二天的报纸报道则展示了较清晰的画面。

同样,当小约翰·W·欣克利(John W. Hinckley)意欲刺杀里根总统时,录像带显示了围绕刺客和被害人的无序的混战。电视新

闻随后报道说新闻秘书詹姆斯·布雷迪(James Brady)也死了,于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发表声明说,根据宪法,他要主管白宫,副总统的返回尚待决定。然后,电视新闻又报道说詹姆斯·布雷迪还活着,黑格宣称其拥有权力是错误的。再后来,错误的信息以及记者和官员的错误本身成为了新闻故事。

大多数的电视新闻并不是“现场直播”,但是与其他媒介不同,电视一直具有即刻进行视觉和听觉报道的潜力。因此,在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期望电视能利用这种潜力。欣克利意图刺杀里根总统的录像带在第一枪开过4分钟后就播放了出去。新闻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迫使其其他行为也变得迅速起来。根据随后的报道,亚历山大·黑格是跑着去新闻发布会发言的,因为他害怕政府的沉默会被国内外看成是疑惑和群龙无首的表现。结果是,他确实跑进了新闻发布会,并上气不接下气地出现在镜头前,浑身是汗,这样就造成了他所期望的先发制人的印象。同样,电视记者也感受到了压力,他需要迅速地对布雷迪之死的传言加以确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莱斯莉·斯塔尔(Lesley Stahl)看到了白宫的助手们“满眼是泪”,她立刻对观众推测说也许这意味着布雷迪已经死了。当时她不知道,白宫的助手们刚刚从另一个电视新闻网中听到了布雷迪死亡的错误报道!

从一种意义上说,电视的这种即刻报道制造了其中某些“事件”。在早期,较慢的报道会过滤掉许多类似的故事。例如,类似詹姆斯·布雷迪死亡的传言,可能根本就不会被报道,那么,自然布雷迪死亡的错误报道就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了。小的细节、错误和疑惑在较慢的印刷媒体所形成的不可见的后台中被隐藏起来、被忘掉了。(就像你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可能不会提起草地上吹翻的椅子,尖叫的孩子,变质的西红柿,以及某个下午的劳累)。另外,由于政府官员如不能给整个国家即刻的反应,几小时的延迟可能被看成是疑惑的象征。

当然,缓慢并不能确保准确无误。(如看到标题“杜威打败了杜鲁门”),但是电视的解码速度加上大量的非语言信息,就导致了許多细节的波动和不确定的大暴露,而在报纸的传统报道中这些都被过

滤掉了。曾经是生活中后区的一部分的东西现在被展示为“新闻”。^{*}

因此,虽然大部分的新闻内容是由记者以及政治、经济因素所决定的,但是新闻的形式常常受到媒介性质的很大影响。无论你认为美国的电视新闻是有偏见的、还是没有偏见的,是受控制的还是自由的,它们的形式仍然与印刷新闻相当的不同。

现在讯息从发送者到接收者的传递速度,限制了许多社会表演者的练习和准备时间,(并且使任何的后区时间显得很明显)。即使一个人坐下来“马上”写信,他可能也需要几个小时来准备讯息。但是如果你被电话、电台或电视台采访,讯息则必须是直接形成,必须是在句子全部形成之前,就开始说这个句子。如今我们的许多领导人显得口齿不清,这可能与媒介的变化有关,而不是我们的领导人基本智力水平的下降。

无论使用什么具体的符号系统,所有的文字讯息都将行为和行为的报道分离开来。但是电子媒介更加直接地展示了行为和经历。我们很多人都愿意与朋友分享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详细语言或文字描述。但是我们不会期望我们的朋友出现在描述的所有场合中。同样,我们没有人会愿意自己的好朋友通过音和/或像系统一直监视我们的行为和交往。

对事件进行的文字或语言的叙述可以被“包装”和“整理”。一位主管可能会告诉自己的配偶,雇员的训练课程进行的“非常好”。但他或她可能忘记提到,自己在某个地方被椅子绊了一跤。他或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话所犯的错误,前

* 按照这个变量,电影介于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之间。电影在放映前必须要做准备、电影新闻片和采访能够在这种延迟所形成的后区中,进行审查和编辑。但是电话、收音机和电视允许(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必须)“现场直播”报道和传播。例如,如果约翰·欣克利对里根的袭击被拍成电影而不是录像带,那么秘密机构和联邦调查局就有时间在电视播放前,要求审查该电影。当局就会有时间要求延迟播放,或者确定哪些地方太清楚,不适合播放。由于电影永远不能被立刻放映,公众就没有必要被告知存在有这样的控制和审查。由于电子影像可以立刻传送,任何控制或审查的企图都会非常困难和明显。电子媒介的这种“偏向”有时甚至在政府严密控制新闻的国家也发挥了作用。例如,1983年当罗马教皇访问波兰时,政府受到批评,“现场”报道教皇行程可能性的存在似乎至少需要有部分现场报道。结果,波兰人民在政府自己的广播和电视中听到了对他们政府自身的严肃批评。

后来回走动,或者是在有次序的论述中忽略了应有的步骤。很显然,无论后来他或她对该事件怎样解释,都不能等同于让配偶直接去经历该事件。因此,即使是技术上“公开”的表演,比如在自己雇员面前讲话,可能也会有许多“后区”的个人特性和错误,表演者不在乎这些信息在发生的场景之外公开。然而,主管行为的录像带会将这种具体场景中的行为带到当时场景以外。

当然,电子媒介并不是简单地“展示”事件。例如,无论何时当你将镜头或麦克风对准某一方向时,你就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其他各个方向上的事情。但是事件的电子版本不允许一个场景中的“行为传递”与没有亲身在场的人在当时或后来可获取的信息之间有明显的隔离(实际上,一个事件的录像可能会使事件的参与者感到震惊和失望,他们不习惯像“别人看自己”那样来看自己)。镜头和麦克风倾向于迫使人们对事件的记忆和叙述类似于电子媒介所捕捉到的图像和声音。正如最近许多政治家发现,否认他们以前说过并被录制下来的话是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由于这种原因,许多法官和立法者很不愿意让电视播放审判或者立法会议的镜头。书面的声明或者短暂的公众露面允许密切控制的表演。但是在几个小时精疲力尽的审判和立法争论中,一个人很难一直维持良好的“台上”表演。在这类事件中镜头可能会“捕捉”到政府官员的疲惫不堪、发怒、打哈欠、挠痒、挖鼻孔,或者没有集中注意力的形象。想像一下,如果我们拥有过去领导人几千个小时的录像,而不仅仅是他们演讲的文稿以及对他们行为热情洋溢(去除掉不良成分)的描述,他们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会有怎样的变化呐,这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大多数电子传播的现场和持续特性,使得所经历的公众线索与私下线索很难分开(有时是不可能的)。大量的行为都是通过电子媒介传播的。情绪和感情也通过电视“泄露了”。一位沮丧的人可能会写出愉快的便条,但是不能打愉快的电话。不仅电子媒介的特性使人很容易忘记其行为是有中介的,而且即使你能记住,你也很少这样选择。因为当镜头捕捉到你在如何动作时,以及你决定怎样在镜头前动作时,也就是你在那个场景中真实的行为,而你在场景中的行为,也就是镜头所捕捉到的你的行为。录下一场婚礼,或者被绑架的人质同其家人团圆的情景被电视播放后,事件的记录就变成了行为

本身的记录。显然,电子媒介中私下行为和公开讯息的关系在印刷媒介中是不存在的。

在第一部分我们提出的一种理论,而在这一部分中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它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会对社会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传统上不同群体身份的差异,不同的社会化阶段,权威的不同等级都依赖于公众讯息和个人表情行为的前一电子时期的差异,我们将会看到大量社会角色的显著变化。

这个分析表明,电子媒介产生的交往形式以往都无一例外地出现在了亲身接触的交往中。因此,所有这些已经讨论过的内容,将我们带入了本书最后一章。因为当电子媒介提供的信息是以往只有当参与者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遇时才能获得的信息,这就是电子媒介开始重塑“地点”本身的含义。

六 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的分离

《圣经·创世纪》里讲了上帝去看望亚伯拉罕和撒拉时,这对夫妇已经年老了却没有孩子。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一年之内撒拉会生一个男婴。撒拉在自己的帐篷中偷听到了这个许诺,心中暗自发笑,因为她早已过了绝经期。因为撒拉是独自呆在自己的帐篷里,所以她认为自己的笑不会被察觉。但是上帝马上问亚伯拉罕:“为什么撒拉要发笑?……是不是她认为有什么事情对上帝来说太难了?”撒拉对自己私下行为的暴露非常吃惊,于是她否认笑过。

我们对这种偷听命运的敬畏和惊异在电子媒介时代基本上消失了。在某个给定的地方“独自一人”,曾意味着你处在别人监视的范围以外。人们为了相互间的直接接触,必须跨越距离,一同相处一段时间,并被允许进入房间和建筑物。这种物质地点的规则适合于帐篷,也同样适用于宫殿。

虽然口语与印刷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对二者来说其物质地点和社会地点之间的联系,却都是一样的。印刷与所有的新媒介一样,也改变了在地点间传入和传出的信息的传递模式。结果,它也改

变了处在不同地点人们的相对地位和权力。过去,媒介的变化总是影响着地点之间的关系,它们影响了人们带入某些地点的信息以及在那些地点人们原有的信息。不过地点与社会场景之间的联系仍然很强。而电子媒介则更进了一步:它们几乎完全断绝了物质地点与社会“地点”的联系。当我们使用电话、收音机、电视或计算机进行交流时,我们身体所处的地方不再决定我们在社会上的位置以及我们是谁。

物质通道和社会通道

物质地点和社会场景的关系看起来仍然显得那么自然,以至于我们继续将物质地点和其中所发生的行为相混淆。例如,“学校”和“家”两个词都用来代表物质建筑以及某种社会交往和行为的类型。

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忽略物质地点和社会场景的区别。地点决定了大多数的社会信息系统。一个给定的地点场景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其他地点场景相隔离。距离是封闭和隔离社会的手段。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需要花费时间。因为只能通过固定的门才能进入房间和建筑物,所以人们过去以一种可明确地观察和可预测的方式被接纳或排除于某个场景。但是现在电子媒介介入了原先由物质地点所确定的场景。

传播和旅行过去是同义词。最早的传播渠道是公路、水路和铁路。因此传播的速度就受制于人旅行的速度。即使是神话传说中的快马也要十天半的时间才能将一条讯息从密苏里传到加利福尼亚。电报的发明引起了信息运动与人体运动的第一次分离。复杂的讯息传递速度第一次远远超过了信使的速度。而随着电报的发明和使用,不同地点之间的信息差异开始消除。

正如今天的学生,他们对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大学的担忧减少了,因为一个电话就能直接打到家里。同样,电报对西部前沿的定居者也有很大的帮助。它在信息上将西部和东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信息“距离”的缩短作为社会障碍的物质距离被绕了过去。西部和东部的相互监视使得国家似乎变小了,各个地方和人们更接近了。

过去,从场景到场景以及从社会地位到社会地位的移动涉及到从地点到地点的移动。一个地点确定一个独立的场景,因为它的边

界限制了理解和交往。与所有的电子媒介一样,电报不仅挑战原有的距离所设置的限制,而且也绕过“渠道”的社会仪式,即绕过了物质上和社会上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移动。

如果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的行为差异很大,那么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就需要某种明确的移动形式。如果庆祝活动和纪念活动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进行,则两个场景中的行为是没有差别的。它们的入口和相关的仪式,无论是正式(带着新娘跨过门槛)还是非正式(进屋之前请敲门),在传统上允许从场景到场景以及从行为模式到行为模式的有序过渡。

由墙、门和铁丝网所标记的,以及由法律、警卫和受训的狗所维护的边界,总是通过接纳或排除参与者来确定场景。但是现在这些边界对确定社会场景的职能只是:通过限制物质上的接触来限制信息扩散。虽然许多社会信息仍然只能通过到特定的地点或与人面对面相遇才能获取,但是过去的信息获取与地点接触的协调关系,由于传播媒介近来的变化,有了很大的削弱。

所有早期媒介及其讯息——石头、泥板、纸草、羊皮纸和纸,都有其物质体积和重量。当它们很重无法被移动时,人们只得到其所在的某个地方去体验它们。即使它们能够携带,就物理上讲它们也仍需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与拥有它们的人一起移动。它们必须被带入某地,存放在某地,以及带出某地。这些媒介与携带它们的人相似,受到社会 and 物理通路的限制。

不管怎样电子媒介并没有制造社会入口;它们偷偷溜进各个地点就像夜晚的小偷一样。孩子通过电子媒介接待的“客人”不会被拦在门外等待房主人的许可。一旦家中有了电话、收音机或者电视,空间的隔离和入口的防卫就对信息的传递起不了任何作用。电子讯息穿过墙壁并传向远方。实际上,在我们对进入家中的电视、收音机和电话讯息还不是很习惯的时候,它们可能是噩梦和恐怖电影中重复出现的主题。无论这种媒介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或是中性,我们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都是革命性的。

电子介入交往的结果,场景和行为的界定不再取决于物质位置。身体与某人单独在一起,并不表示在社会上也一定是单独在一起。当电话,或收音机,或电视中有其他人在“那里”时,亲密的交往就发生了变化。

电子媒介通过改变地点的信息特征,重塑了社会场景和社会身份。例如,“监狱”的社会意义由于电子传播媒介的进入而发生了改变。过去,监狱不仅仅是禁闭身体的地方,同时也是隔绝信息的地方。一个犯人不仅身体活动受到限制,而且在社会上被“取消会员资格”。过去,将犯人置于安全、隔离的地方而导致了他们在身体上和信息上与社会隔离。但是今天,许多犯人与全社会共同享有对收音机、电视和电话的权力。这一点是好是坏还很难说,但它毕竟是与过去不同了。

犯人对世界的接触改变了监狱内外的社会环境。监狱外的人不能将电视当作“私下”论坛,用它来探讨犯罪问题和犯罪预防;而犯人们可以通过电话线进入社会。对208位住在一起的犯人进行调查显示,10个犯人中有9个“通过观看犯罪节目学到了新的技巧,提高了犯罪专业知识”。一些特殊出版物如《犯人黄皮书》(The Prisoner's Yellow Pages)就是用于帮助犯人接触法律图书馆,咨询服务机构,以及就业机构的。

无论好坏,能接触电子媒介的犯人们不再与社会完全隔离。电子媒介的使用导致了“入狱”性质的重新界定,以及监狱分类系统事实上的重新制订:“高信息”监狱对“低信息”监狱的传播参数现在已被列入了“高安全性”和“低安全性”的物质参数之中。

用监狱作例子可能有些极端。但是电子媒介对犯人的影响与电子媒介对儿童、妇女、穷人、残疾人以及其他类似群体的影响相似,他们的社会地位曾经或至少是部分地,因为与整个世界的物理隔离而受到影响。

电子媒介将信息和经历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国葬、战争、人质危机,以及航天飞行,现在已经成了可以在任何客厅里上演的戏剧。而且对这些剧中人物的体验似乎他们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当然通过电子媒介的交流并不等同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现场与他人的交往,但是电子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则比书和信传递的信息更类似于面对面的交往。实际上,通过电子媒介与其他人建立“联系”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而无需关心其物质位置和社会“位置”如何。

媒介“朋友”

电子媒介对地点的入侵,在广播业的一句陈腔滥调中得到了反映:“本节目是来自……的现场报道。”过去,亲临现场是经历“现场”正在发生的事件所必须的。你“必须在那儿”才能经历非正式的亲密交往。地点一度决定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传播类型。但是电子媒介已经改变了直接及有中介交往的相对意义。通过电子传播媒介,社会表演者现在可以“前往”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去的地方,而观众现在“亲临”远方的事件中。

仅通过媒介相互交往的人们之间形成的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950年在一篇媒介展望的文章中,唐纳德·霍顿(Donald Horton)和R.理查德·沃尔(R. Richard Whol)认为,即使信息传播是单向的,如收音机和电视,其所形成的特殊关系也不可能存在于印刷媒介中。他们认为,新的大众传媒非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它们提供了表演者和政治人物面对面交往的图像。“对表演者的反应场景类似于原始群体中表演者所处的场景。认识相隔最遥远和最著名的人,就如同他们是我们朋友圈里的人。”

霍顿和沃尔指出,新媒介引发了新型关系,他们称之为“副社会交往”。他们认为,虽然这种关系是有中介的,但是它在心理上类似于面对面交往。观众开始感到他们“认识”在电视上“遇到”的人,这与认识朋友和同事的方式是相同的。实际上,许多观众开始相信自己对某位表演者的认识和了解超过其他所有的观众。有趣的是,这种副社会交往能够与“数百万人建立亲密关系”。

霍顿和沃尔的理论框架解释了一些脱口秀主持人的成名缘由,如杰克·帕尔(Jack Paar),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和迪克·卡韦(Dick Cavett)。根据霍顿和沃尔的说法,这些人并不具备传统的表演技巧,他们不是歌手、音乐家、演员或者甚至谈不上是专业水平的喜剧演员。他们所“表演”的内容大多数是小话题和插科打诨。然而他们受观众喜爱和感到有趣的方式非常类似于亲密朋友之间的受人喜爱和有趣。观众相信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正如霍顿和沃尔所指出,纯粹的副社会表演者仅仅是“因为被认识而出名”。按照这个理论框架,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约翰尼·卡森威胁要从“今晚”节目

辞职的故事。由于涉嫌酒后开车而受到拘捕,以及他的离婚问题出现在电视网络新闻中并成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即使是具有传统技艺的表演者也常常利用新媒介的亲 and 性(或者发现自己无法避开它)。作为细致的个人观察的结果,现在对许多运动员、音乐家、记者和政治家的评价不仅仅根据他们自身的“才能”而且还要依据他们的个性。副社会的理论框架可以解释为何歌星们随着他们事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地转向自己创作的抒情的歌词和旋律,以及为什么政府官员随着知名度的增加会在公开讲演中加入私人的信息。这个理论也可以应用到扮演虚构的角色的演员身上。而对许多观众而言,肥皂剧和其他电视剧的演员是确有其人,他们可以从演员身上获得激励和启发。虚构的“马可·韦尔比(Marcus Welby)医生”在电视网络播放的第一个5年中收到了25万封信,多数是医疗咨询的。

霍顿和沃尔没有将自己的理论与分析电子媒介对物质地点影响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确提供了支持这种分析的观察结果。例如,他们指出,副社会关系对“社会上孤立的、笨拙的、上了年纪的、有残疾的、害羞的以及遭到拒绝的”人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电子媒介所提供的交往和经历的类型过去仅限于面对面的亲密交往,可以理解,这会对那些在日常社会交往中身体和精神被隔离的人产生极大的影响。(一位研究人员发现,随着观众年龄段的增加,副社会关系的力量也会增加,许多上年纪的人会觉得新闻播音员是他们的朋友,而且一些更老的观众则通过语言的响应与这些新闻播音员“交往”)即使在“普通”人中,副社会关系也在与朋友、家人和同事日常生活的面对面交往中找到了位置。事实上,“现实的”朋友常常讨论他们的副社会朋友的某些古怪行为。

在分析霍顿和沃尔没有特别探讨的许多现象中,副社会理论极为有用。例如,该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当一位“媒介朋友”,如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约翰·肯尼迪,或约翰·莱纳恩(John Lennon)死后或被杀后,无数的人体验到的失落感就像是(有时甚至超过)自己的亲戚或朋友死去所感到的失落。即使是意识到副社会机理,也无法逃避它的“魔力”。例如,约翰·莱纳恩之死对于我和我的同事来说是异常奇怪的痛苦,我们都“认识”他,而且他“伴随”着我们长大。社会学家康迪斯·列纳德(Candice Leonard)曾经指出,这

种有中介的关系产生了一种“新型人类悲伤”。

与失去真正的朋友或亲戚不同的是,媒介朋友的死亡并不提供传统的礼仪或者明确的方式来安慰失去亲人的人。实际上,对副社会朋友的哀悼充满了矛盾与无助。对陌生人来说,试图用语言或鲜花来安慰死者的家人是很唐突的。深切感受到的个人悲伤会因群体分享的程度而相应地强化或弱化。为了驱逐悲伤和无助,成千上万的人守候在副社会朋友家或死亡地点附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媒介提供了最合礼仪且非常恰当的悼念渠道。广播和电视各自推出特别节目或回顾性节目。许多人打电话给那些也同样与副社会朋友关系非常亲密的“现实的”朋友。最后还有一个讽刺。因为大多数人最早认识副社会演员的途径是唱片、电影和录像带,而现在人们仍然可以得到那些东西。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副社会演员并没有死。因此这种关系是被冻结了,而不是被毁坏了。实际上,死去的是增加亲密的潜力和希望,悼念的是永远不能形成的面对面的关系。

副社会关系也导致了谋杀的新形式以及谋杀电影的新类型。警察通常将谋杀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谋杀者认识受害人,谋杀者不认识受害者。但是,现在又有了第三类:副社会谋杀。媒介和警察指出,谋杀约翰·莱纳恩的凶手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意思是指受害人与凶手从未面对面相遇过,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二人之间强有力的副社会联系。马克·戴维德·查波曼(Mark David Chapman)非常熟悉约翰·莱纳恩,有一段时间他认为自己就是约翰·莱纳恩。而差点儿成为总统刺客的约翰·欣克利与女演员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复杂关系。欣克利进行“他历史性的行动”是为了加强与福斯特的“私人”关系。

副社会关系在爱与恨,正常与混乱中是一种新形式的交往。它具有面对面交往和通过书籍传播这两者的某些传统特征,但实际上又两者都不是。

为了建立副社会交往的概念,霍顿和沃尔指出了“旧”媒介和“新”媒介的差异。但是他们忽视了整体的演化趋势,甚至在每种媒介的内部,面对面交往与有中介的交往之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书写系统朝着更大程度地复制口语的方向演化(从象形文字到拼音字母);摄影和电子媒介则朝着更加全面地代表面对面感觉经历的方向

演化。

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详细描述了媒介长期演化的过程。他认为演化趋势是对媒介和技术存在前的传播手段更加全面的复制。莱文森的理论为我们的直觉提供了证明,总有一种形式的媒介要优于另一种形式的媒介。电报中加入声音,或无声电影中加入声音,或电视加上颜色,这被看成是一种“改进”。他认为这仅仅是因为媒介越来越不像媒介,而是更像生活。

莱文森使用他的理论框架否定了许多社会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人认为媒介使人类一步步远离“现实”并扭曲了人类的生活环境。相比之下,莱文森认为人类利用媒介尽可能地重建“自然”与“符合人性”的传播手段。同时克服了传播的前技术限制(缺少永久的记录,不可能远距离看和说,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点,等等)。

莱文森对媒介历史有趣的描述说明,早期形式的媒介为了克服空间或时间限制,最初是如何放弃了“真实世界”的某些方面,以及媒介的后继形式又是如何再次捕捉自然传播的各个方面的。例如,电报为了能跨过大陆和地域迅速地传播,它放弃了语言。但是当后来电报演化成了电话之后,又重新获得了声音。

但是莱文森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他完全忽略了早期的空间和时间“限制”也帮助确定了社会交往的特征。为了说明媒介再现现实,莱文森将“现实”定义为传播的感觉功能——看、听、说。他忽略了当场景的分隔去除后,人类交往的实质发生了变化。

在这里,莱文森的理论以及霍顿和沃尔的理论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们认为面对面交往不再是私人以及亲密交往惟一的重要因素。媒介的演化淡化了陌生人与朋友的区别,弱化了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的人之间的区别。这些理论认为电子媒介在去除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之间的差异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当人们实际上不在同一个地方时,他们能够“好像”就在同一个地方那样交流,这些理论都忽略了此时社会行为有怎样的变化。

讯息混入上下文中

上述讨论认为,电子媒介弱化了物质地点作为社会场景决定因素的重要性。有趣的是,许多电子媒介也加强了讯息与物质地点联

系的某个方面。由于表情信息和表象信息总是涉及发出这些信息的人,所以它们也与发送者的物质地点联系在了一起。报纸上引用时可能与说这些话所在的地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演讲的录音则捕捉到了演讲所处的物理环境的特征。

罗斯福总统与报章杂志的会面常常是他在白宫刮胡子的时候。只要罗斯福愿意,他就可以形成一个正式的、非个人的“声明”公之于众。这样的声明则是抽象的,并且避开了个人表情。它可以与当时的场景完全无关(也就是说,与刮胡子无关)。但是电子讯息通常是与“上下文”相结合的。一位总统可以躺在床上起草正式声明,然后送交报纸刊登,但当他发表类似的电视声明时,则要选择起床洗漱,穿好衣服。另外,对电视而言必须要做背景的选择——办公室、火炉,或国家纪念碑。甚至收音机和电话也可以传递来自发送者周围环境的声音。因此,通过电子媒介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面对面交往,它们都将人和讯息与所处的环境结合在了一起。正如一些观众会感到,他们“遇到”过在电视上看到的某人,也会感到“去过”他们看到的地方。(实际上,通过电视我们对事物、地点和人物有着无数未记起的“经历”。如果我们最终在真实生活中经历过它们,它们就会成为许多记忆错觉的来源。)

另一种描述印刷“声明”和电视讯息差异的方法是,电视将讯息产生的场景与讯息展示的场景结合了起来(并且常常还有讯息接受的场景)。例如,在印刷媒介采访中,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同处在同一地点,但是采访的展示和接收的结果却在另一个“地点”。在进行印刷出版的采访中,被采访者能够区别录音机的“开”和“关”。他或她可以与采访者建立一种交往关系,而与采访结果的读者建立另一种交往关系。如对巴尔布拉·斯特赖桑德(Barbra Streisand)的杂志采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采访者劳伦斯·格罗贝尔(Lawrence Grobel)在描述采访过程时写道:

有时采访过程变成了战斗。当触及到对她来说不舒服的话题时,她就会闪烁其词、油腔滑调地回答。当我告诉她,我对她的回答的看法时,触到了她的敏感神经……事情常常变得情绪化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周[采访阶段结束后],她会经常打来电话,添加她的其他想法,而我则会笨手笨脚地拿来录音机与电话相连……然后我们会再次分开。

……她显然认为这个采访是特殊的。这会是她最终的声明。她说,她会在里面谈论以前她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的流言蜚语。

这段描述说明,在印刷媒介采访的长期准备过程中,被采访者与采访者的私人关系(“战斗”、“躲闪的回答”)显然与其和读者的公共关系相分离(“她最后的声明”)。

但是,电视上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所在的“地点”,常常与电视观众所经历的地点是相同的。被采访对象必须同时对采访者和观众说话,于是一种新的场景和行为风格出现了。正式和非正式、亲密和疏远在电视中则有着奇怪的组合,这是由于以往不同的社会场景融合的结果。

印刷允许场景的隔离。一个人拥有的经历和他所写出的经历是不同的。印刷媒介保存了地点的神圣以及明确的不同行为应变的分离。但是电子媒介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地点发生作用。它们冲破了它的边界并改变了它的社会重要性,但电子媒介仍使用地点作为社会事件的背景。电子媒介将表情信息与物质场所相混合,并融合了许多原先各不相同的行为场景。

时间和空间的“饱和”

物质地点具有天生的隔绝性,它曾是场景的限定的主要决定因素。一个物质地点对空间和时间的隔绝造成了“充满”时间/空间构架的场景界定。戈夫曼将“饱和”看成是英-美国社会的一个特征,社会表演倾向于在室内进行,“表演所形成的表情信息与对信息的理解会充满某个时空范围,因此处于这个时空范围的任何个人都处于观察表演的位置,并受到表演所形成的场景的限定的指引。”

任何媒介都可以将某人拉出场景的限定之外。但是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场景界定以及对场景与地点关系的影响各不相同。

印刷媒介倾向于形成新的、费时的限定。完成阅读最好是单独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并排除其他活动。实际上人们为阅读设计了专门的地点。这些地点的设置是为了隔离人们,并且常常是隔离至单人的小空间。当然,读者可以阅读其他人所写的东西,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内容,从而与他们“取得联系”。但是读者通常是被排除

在亲临现场的人之外。(实际上,即使当某人递给你一张贺卡时,为了阅读它,你也必须暂时忽略这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是“反社会的”,它将读者从面对面交往中独立出来。阅读是线性的、且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阅读时很难进行散步、说话、运动、做爱,或者开车,然而在看电视时,这些行为的大多数都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而在听收音机时上述全部行为都可以做。

电子媒介以上述这些方式进入地点,但是并不像书刊之类的其他媒介那样“占据”位置。电视不但改变了地点的场景限定,而且是以一种不稳定、前后不一致的方式改变的。

例如,休伯特·汉费莱(Hubert Humphrey)议员的葬礼于1978年1月14日“进入”了美国人的家中。这个场景(“受爱戴的政治家的葬礼”)不仅与某个家庭原已存在的各种场景相混合(例如“吃周末晚宴”),而且也可以通过改变频道使这个新场景消失或再现。在纽约城区,ABC(美国广播公司)和NBC(全国广播公司)现场直播了汉费莱的葬礼;9频道播放的是恐怖电影,其中有几百人被杀;5频道播放着音乐以及舞蹈节目“灵魂列车”(Soul Train);11频道播放配音的日本恐怖电影;2频道的节目是卡通片《泰山》(Tarzan);13频道的是《放大》(“zoom”),表现一个小男孩怎样帮助他的父亲捕鱼。普通观众为了观看汉费莱的葬礼(以及以往只有参加这样的事情才能获得的表情信息),不必前往某个具体的地方,而且葬礼的经历不再允许充满时间/空间构架。另外,混合场景(在观看葬礼期间吃晚宴)的性质本身是不稳定的。观众通过旋转频道可以轻易地改变他们的“地点”。*

使用电子媒介所固有的对地点和场合的“不重视”被更富有戏剧性地展示了出来。当时一个电视网中途停止播放汉费莱的葬礼,转而播放一场重要的高尔夫球比赛。与之相似,另一个电视网对萨达特前往以色列的戏剧性和平使命进行了播报,其中还交替地“现场直播”以色列的洛德机场,以及俄亥俄州——密歇根的足球比赛。

* 有关电视习惯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某1小时长的典型电视节目的观众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看到节目结束;具有有线电视家庭的40%左右的观众在播放商业广告期间“总是”或者“常常”搜寻另外的电视节目,40%~50%的电视观众“看电视”时,吃东西、洗盘子、打电话或者读书。

电子媒介破坏了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性,电视、收音机、电话,使私人地点更易于为外部世界所接触,从而将其变成较为公开的地点。汽车立体声收录机、手表电视、个人音响系统,如索尼“随声听”,使公共空间私人化。通过这种媒介,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在我们所处的任何地方。但是当我们无处不在的时候,也没有了特定的地方。

“只要有电话就有家”,一则电话公司的广告这样说。这一分析表明,“只要有电话,家就不再一样”。那些到过许多地方的人们不再发现他们在信息上有什么特别。如果在电视上看到过(某地或是类似的地方),那么你第一次访问该地时你会觉得它看起来很熟悉。由于各地都有电视机、收音机和电话,原来完全不同的地方现在显得更加地相似。有了电子媒介后,大多数的地方——从儿童的房间到牧师的家、到犯人的牢房,现在都有了强大的共同的基础。群体身份、社会化、等级制度,过去依赖于特定的物质地点以及其中可获取的特殊经验,现在这些方面已经被电子媒介改变了。

第三部分 新的社会风景

本书的这一部分研究了电子媒介重组社会场景后所引起的大量社会角色的潜在变化。它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融合在了一起。我们在第四章中研究的三类角色(群体身份、社会化和等级制度),在第五、六、七章中用勾画的电子场景的三个主要特征(公共场景的融合、后区的暴露、相关地点的逐步削弱)对此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导致了对社会冲突以及角色变化的大范围的重新解释。

前三章的每一章描述了三大角色类别之一的变化。第四章分析了“恰当的”行为观念、媒介内容,以及物质地点接触规则的调整使媒介的影响变得可见并加强的方式。对“反复影响”的分析指出,虽然这种调整常常被看成是社会变化的自然原因,但是它们自身却可以是媒介和场景变化的结果。

目前,电视在融合公共场景、暴露后区以及将物质地点同社会地点分开方面是最有效的一种媒介。因此这里强调的是过去30年中社会的变化,而在这种架构中电视占据主要地位。^{*}但是仅仅研究电视而忽略与它一起发挥作用的其他电子媒介,会使其影响失真,由于电话和收音机一直是当前媒介模式构成的一部分,而电脑也开始重新调整无数美国人的媒介经验,所以它们都在电子媒介和社会变化时发挥了一定作用。

* 研究电视为主的媒介矩阵的影响较合理的起点是1954年,当年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首次超过了美国家庭的一半。

从许多方面看,排除其他因素,仅讨论单一变量所引起的普遍的社会影响是荒谬的。世界是复杂的,有成千上万的重要因素在影响着每个人和每个群体。然而,变量的隔离以及寻找因果关系是绝大多数科学调查及公众关注的核心。在实验室中,变量可以被分离出来,并作为最有力的因果关系观察和实验的证据展示出来。但是社会行为实验室研究的长处——对变量的分离,同时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因为在解释实验研究时,你必须考虑到实验室是非自然场所,而事实上生活中并不存在分离的变量。为了能在所有实验结果中维持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其他所有因素保持不变”这一限制是必须的。而使用分析研究法的研究人员在探讨单一变量的影响时,也常常要使用类似的限制说明。

通过对媒介、场景及社会角色变量进行有逻辑的分离之后,我的分析表明,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是特殊类型的。在此我勾画出了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所引起的社会行为的变化趋势。但是其他所有的因素不可能是恒定不变的,我并不否认许多因素影响了我所描述的场景,我也知道其他因素对电子媒介所产生的许多影响起到了加强或减弱的作用。

对于我在这一部分中分析的许多行为、运动和潮流,很多读者可能对它们的发生有自己习惯的理解和看法。我仅仅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所描述的场景变化可能对上述这些事件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其他的解释,就像其他的分析没必要否定这一分析那样。

换种说法,这里讨论的主题不是“社会行为及其所有产生的原因”,而是“电子媒介及其潜在的普遍影响”。可以这样认为,我的“调查结果”应该被认为是与对已知在全国范围内的饮用水中加入某种化学物质所产生影响的调查结果是同样的。例如,这种化学物质可能被发现可以加速人的心率和代谢,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他药物没有相同的效果,也不意味着其他药物、食品或个人习惯会减弱、抵消此种化学物质的效果。

在本书这一部分中,我试图绘出一幅近期社会变化的图景。不过为了看得清楚,观看它时必须通过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形成的变化的场景理论的镜头。我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上述分析

正确,它们能帮助解释过去 30 年中的哪些潮流、事件和运动呢?我发现在每一句话中使用“或许”、“可能”,或者“如果我们相信如上所述”,是一种非常笨拙的风格。尽管大部分句子我采用的是简单的陈述句,但这些讨论不是仓促地提出硬性的结论,而是提出一个实验性的理论。

七 新的群体身份

123

群体经历的融合

正如第一部分所讨论的,群体身份是基于“共享但特殊”的信息系统。不同社会信息系统的数量越多,不同“群体”的数量也就越多;不同信息系统的数量越少,不同群体身份的数量也就越少。因此,由于电子媒介所引起的许多原来不同形式场景的融合,将对群体身份产生同化影响。

例如,电视的广泛使用所产生的后果是,贫穷家庭所能得到的社会信息与中产阶级家庭所能获取的信息更为接近;女性所能获取的信息与男性所能获取的信息更为接近;不同的群体现在不但在总体上共享了非常相似的社会信息,而且相互之间也共享了更多的信息,而在过去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区分“内部人”和“外人”。这样,传统的群体联系被削弱了,群体之间的传统差异也部分地模糊了。

传统群体信息特征的改变导致了两种互补现象的产生:传统的群体联系重要性降低,其他联系类型的重要性上升。

电子媒介所形成的日趋同化的信息网络,为个体提供了相对完整的社会观点,以及检测自己命运的更广泛的领域。按照乔治·赫伯特·米德的说法,电子媒介改变了一个人的“一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也就是其他人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个人行为的一般感觉。“有中介的一般化他人”包括来自传统群体场景之外的标准、价值和信仰,因此它展示了一种新的观念,人们可以用它来观察自己的行为 and 身份。新的有中介的一般化他人绕过了家庭和社区中

的面对面交往,并被数百万的其他人所共享。*

观念共享以及更加公共的场景造成了原来孤立、不同的群体成员开始要求“平等”的权利和待遇。因此,这一分析解释最近“少数人群”意识的突然崛起并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黑人、妇女、希伯来人、美国印第安人、同性恋者、儿童、犯人,以及残疾人,所有包含在这些群体中的人现在都感到或被看成是孤立在大环境的某个角落里,受到限制并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

事实上按照这个分析,少数人群意识的出现标志着传统观念上的少数人群身份某一方面死亡的死亡。少数人群阵营,在过去依据孤立的信息系统并具有非常不同的群体经历。对角色和权利完全平等的要求,就某方面而言加速了群众性团体的“大多数”的发展,单一的大“群体”中的成员将无法忍受角色和权利的任何大的差别。

如今的少数人群意识陷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地步。许多人对自己特殊的身份重新感到了自豪,但这一特殊群体意识的增强是由于可以由外人的角度来观察这个群体所产生的结果;即不再是完全处于群体中来观察的结果。如今,少数人群的成员因他们感受某些权利和经历受到限制而团结在了一起。人们之所以感觉到自己是处在一个少数人群,是因为他们感到被排除在大的参照群体之外。“少数人群”这个词中“少数”的含义并不是指某个群体中的少数人,而是这些成员感到他们对大社会的接触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少数人群”这个术语有时用来指妇女——人口中的大多数,这一点用其他办法理解是无法解释的。

在塑造当前群体身份中,信息限制的重要性可以由“少数人群”的极端例子中清楚地看出,像战争中失踪士兵的家庭所组成的群体,或“被收养者解放运动协会”(ALMA)的成员,希望知道自己亲生父母的身分。正如目前的许多少数人群一样,其成员因为某种融入主流社会的“特殊”愿望而组织在了一起,他们希望知道所有其他人都

* 在形成我们一般化他人和教给我们有关“一般”和“正常”行为的过程中,媒介所起的作用解释了关于许多流行的电视游戏节目如“家庭宿敌”的结构和内容。这些节目的内容与“客观事实”毫无关系,只是内部主观的群体信仰、传统和行为(“惩罚孩子的办法”,“急救箱内的物品”,“妻子们为了取悦丈夫所做的事情”,“孩子们喜欢的某物之一”等等)。另外,在演播室中裁定回答是否正确的人上并不是受过很多培训和教育的“专家”,而只是演播室的观众,是就像你我一样的人。

知道的事情,经历所有其他人曾经历过的事情。

按照这种说法,很多少数人群在他们有意识地宣布其特殊身份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期望至少部分地丢掉这种身份。例如,当同性恋者公开要求在法律上得到平等对待,包括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对同性恋婚姻的认可的时候,他们不仅说,“我是不同的,我对此感到自豪”,而且还说,“我所受到的待遇应当与别人相同”。因此呼吁对差别的注意与不注意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少数人群的成员感受到限制,可能是因为对更广泛的、更丰富的信息环境的接触突然增加所造成的。而且因为知道并暴露出了某些你不能到达的地点或你无法做的事情,会使你感到比以前更为孤立。我的叔叔曾多次告诉我,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家有多穷,因为他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穷。而通过电视,贫民窟的孩子有了更多的参照点和更高的比较标准,他们在每一个节目和商业广告中都可以看到自己被剥夺了什么。

信息的整合使社会一体化看起来更为可能、更为人们所期望。地位的差别常常要求对场景的接触有所区别。人们共享的相似信息系统越多,对平等待遇的要求就越大。

但是信息系统的融合并不意味着会导致即刻的社会一体化或社会和谐。实际上,信息整合的最初结果是加剧社会的紧张。信息整合本身使人们更加意识到物质的、社会的,以及法律上的分隔。原先被排除的人群不再接受“他们的地方”的说辞;他们试图取得平等,而许多有特权的人群则试图维护旧的排除方式。因此,当电视完成了对美国家庭的“入侵”后,种族之间的紧张感及其他形式的整合达到顶峰时,就不会那么令人吃惊了。^{*}

这项分析说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意识”部分地是一种“有中介的意识”。由于电视,原本属于本地的问题变成了全国性的问题。当原本分隔的场景展示在公共论坛中后,人们常常感到自己必

* 虽然这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不能证明这就是理由,但是民权运动和电视的普及都遵从了一个极为相似的成长曲线。民权运动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出现,在 60 年代其重要性大大提高,与黑人人权运动一起在 60 年代末达到顶峰。与此同时,电视在美国人家中的拥有率从 1950 年的 9% 增加到 1970 年的 96%。

须表明立场。例如,有的父母对婚前性行为有着矛盾的感情,他们可能会小心地避免与孩子们谈论这个话题。但是当他们遇到有关十几岁的孩子性行为的明确信息时,特别当信息展示在他们的孩子、朋友或者邻居面前时,这些父母则会感到需要被迫“给出一个裁决”。用一种模拟的方式来形容。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全国的不和谐,可以认为是,人们感受到要被迫公开地对许多社会问题选择立场,而这些问题在过去是“隐秘的”。而令人感到讽刺意味的是,分裂可能是信息系统新合并所产生的结果。“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则口号是 1968 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会议的示威者唱出来的,它给出了对电视的一个文学的描述,并暗示了电视对道德和政治观点的影响。

电子媒介所形成的共享信息环境,并不表明会导致所有个体行为和态度的一致。但是它确实导致了在选择上的公共的意识以及更大范围的共享。对服装、发式、讲话模式、职业和生活的一般方式的选择不再像过去那样与传统的群体联系相互关联。因此,信息网络同化的另一个结果是产生了许多新的、更为表面化及临时的群体划分,它们的形成与现有共同信息相对统一的背景相对立。在传统上人们被分成的群体其主要是与社会阶层、民族、种族、宗教、职业和邻里关系相对应的,但是现在群体的划分则是根据穿着相似的服装、参加相似的体育运动、拥有相同品牌的计算机、欣赏相同类型的音乐,或者上相同的课而定的。通过进行类似的选择,形成了现在的许多子群体。(许多“少数人群体”的形成是基于他们感到在某些通常可以选择的选项方面被限制了部分或全部)

基于短暂的会面以及共享肤浅的经历而形成的关系和群体并不少见。而在当前社会群体划分中较少见的是,这种肤浅的和偶然的经历共享模式现在有着相对较强的社会影响。因为按照这种方式在公共场所相遇的人与暴露在大众媒介中的情形已经非常的相似,且来自传统上非常不同的群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在其初次会面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持续下去。过去,在学校或其他地方偶然会面的人不会维持长期的关系,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但这种很经典的感觉现在消失了。个人的不能共事已经取代了群体身份的冲突,成为结束一种关系的首要判断标准。实际上,现今维持长期的爱情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困难在于,似乎有许多人与自己有很多共同之处。即便是自己的传统群体中的成员也一样。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爱无法持

续到永远,是因为有许多其他人是永恒爱情的潜在人选。

许多过去不同的群体共享相同的场景,产生了要求全体人类共享单一的“居民”身份的压力。即使是从长远来看,由共享的电子信息所创造出的“群体”规模太大,无法维持传统的群体凝聚力;它包括的人太多,以至于无法让其成员有特殊和独特的感觉。不去管其所有的潜在含义,将整个国家或者世界当作是自己的“邻里”或“村庄”是不可能的。因此,依据共享信息的“子集”,有了子群体的产生或持续存在,但是它们的界限则由于电子媒介的大量共享信息而模糊了。实际上,现在人们必须有意地努力维护群体身份的区别,而这在过去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最近非常流行的寻“根”和“民族身份”,可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群体身份兴起的标志,而是没落的标志。非常有力的群体身份是无意识的和直觉的。对祖先和背景的主动追溯可能意味着意识到身份危机以及相对无根的感觉。另外,寻找某个人独特的背景,在当今被表达为对其拥有遗产的人所共有的权利。

当然,有许多群体的宗教传统和信仰使他们抵制改变自己的行为去适应新的场景。例如,原教旨主义信徒的宗教群体会站出来反对群体身份变化和其他社会变化,就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了。这正如快速飞行的鸟儿站出来反抗静止的天空,一块固定的大石头同样对抗着快速流动的溪水。“道德维护协会(Moral Majority)”组织亦曾经站出来反对本章所描述的大多数的变化,他们使用了电波使自己的观点为人们所了解。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是“道德维护协会”组织的行为也非常类似于其他的“少数人”群体;因为它要求在电视这个共享的场景内有“平等的机会”来影响“人权”的立法以及表明他们自己特殊的身份。正如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在《新权力:我们已准备进行领导》一文中所写:“自由主义者现今所抱怨的那些保守的部长们正在做着的,与‘自由主义’的部长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完全相同。”

后台群体行为的暴露

电子媒介曾经暴露了许多群体的传统的后台行为。过去只有群体成员才能获取的信息现在群体外的人员也能得到。正如前面所

述,电子讯息与印刷讯息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电子媒介如电视,它们所展示的“表情”信息过去只有在面对面的亲密交往中才能得到。通过电视,每个美国人都能“接触”到来自全国或全世界的人的个人表情,并且他或她接收到了许多过去只有其群体成员才能得到的信息。有了电子媒介,群体就失去了对自己后台情况的独有接触,并能看到其他群体的后台行为。

另一个群体后区的暴露可能会对你的态度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影响,这主要取决于你对其他群体初始看法的性质是怎样的。受到高度崇拜的群体可能会因为暴露了其成员的“普通性”而失去一些光辉。但是被人痛恨和使人害怕的群体,会显得并不那么危险或邪恶,因为其成员显得较有人性。

对敌方后区表情信息的接触有时会减弱对其的敌意,即使是语言传播的内容有明显的敌意时也一样。这个原理表明在公众态度的各式各样的转变之中有着共同的元素,否则这些变化会令人困惑不解。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巴尔诺(Erik Barnouw)曾经写过,当20世纪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开始出现在美国电视上时,他的人性减弱了国务院反苏宣传的力量,并迫使美苏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赫鲁晓夫的话常常是极其反美的。“穿着一种宽松下垂的裤子,双手展开,愉快的态度,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四处旅行的商人,而不是神秘的独裁者”。

同样,越战电视的播放可能对支持战争的进行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电视使美国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密切的方式看到了“敌人”。在收音机和报纸的故事中,“敌人”、“朋友”或者“共产党”和“自由战士”是非常不同的。但是从电视上看,我们在越南的朋友与敌人非常相似。这使得人们对越战很难维持一种传统的“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喜剧作品和专题电影中的形象是仔细塑造的,其目的是塑造理想型的好和坏。)在近距离内发生的交往,或在特写镜头中,它并不一定是正面的,可以是非常个性化和热情的。一些美国人希望“这些烂泥从地图上消失”(其中常常包括我们在南越的“盟友”),其他美国人恳请“停止种族屠杀”,这两者都可以部分地用从电视上近距离观看越南人来解释。

其次,电视暴露了我们的军队和战争机器总体的后区景象。战争的无序和血腥的场面可能对战争的努力有很大的破坏性。电视上

的作战镜头看起来与约翰·韦恩(John Wayne)可能采用的作战方式非常不同。电视镜头所提供的“你是一名军人”的场面只有很少战争行动的感觉,没有明确的“前线”,也没有“推进”的感觉。这里没有抽象的语言,如“激烈的战斗”、“胜利”或者“为自由而战”(过去报纸和广播上是这么说的),而有的只是受伤的士兵和平民、尖叫的小孩、脱叶的丛林和恐慌的难民的真实影像。在电视上,“从共产党手中解放了一个村庄”常常意味着清点年幼越共尸体或者将一个村庄烧毁,这样就没有人会再去争夺它。这种由抽象信息到表象信息,从前台报道到后台暴露,这可能会造成对“我们的男孩”以及鹰派和鸽派战争方式的不满大大加剧。一些人希望打一场“常规”战争,将北越炸光;另一些人则希望停止干预这一块土地上的“内战”。但是经过对越战大量的电视播放之后,几乎没有人对战争的状况感到满意。^{*}

这种相同的机制可能在美国对1979年伊朗人占领美国使馆,挟持美国人质事件中的矛盾反应起了作用。这些反应的主流是显而易见的敌视及爱国的,但同时一些美国人开始对伊朗人抱有一种奇怪的同情。这个事件引发了人们首次广泛公开地讨论美国政府对伊朗所做的错事(颠覆一届民选政府,以及其他事情)。一位著名的总统候选人评论说,被迫下台的撒阿(Shah)曾经统治了“人类历史上最暴力的政府之一”,并且从伊朗人民身上窃取了几十亿的金钱。由美国前检查总长率领的美国十人代表团,打破了卡特总统对前往伊朗旅行的禁令,参加了伊朗举行的抱怨美国的会议。这些行为被许多人谴责为是对美国统一的破坏,但是它们明显地缺少标志着极端的“他们对我们”的感觉。另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同情。例如美国学校的儿童在危机期间对伊朗有着正面的反应,寻求伊朗笔友的人数创了纪录。伊朗后来驱逐了所有的西方记者,这可能是它所犯的最大的策略错误,因为在一定距离以外很容易创造出魔鬼(或者天使)。

在所有的电子媒介中,电视对过去的私下场合与公开场合进行了最有力的融合。广播和电话刺激了视觉上的想像,但是它们并没有提供人物和事件的精确图景。而通过电视,陌生人所经历的事情

*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英国和美国军方不允许全部报道他们最近各自对福克兰群岛和格雷纳德的突袭。在没有后台形象的情况下,这些行动就可以被简单地记成一种台上的语言标签:“救援行动”。

就像是亲密朋友所经历的那样。因为新媒介所创造的信息环境很可能对在其中成长起来的人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当第一代电视儿童长大成人时,我们应该预料到将会发生重大的群体重组。*

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突发的社会“爆炸”,并持续地通过我们的文化而兴风作浪,我在分析中给出了新的解释。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相邻的两代人站到了对立面上,他们对恰当的社会角色观念以及对公开和私下行为适度的看法上分成了两个阵营。

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不同寻常的特征都可以归因于传统的后台行为进入了前台场景。引起抗议的许多话题背后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就是“可信度差异”。这个“鸿沟”可能与前区行为和(最近暴露出来的)后区行为的不平衡有关。“可信度”指所有可见行为的一致性。但是由于所有的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展示着不一致的行为,而电视又将以以前不同的场景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伴随电视长大的一代人——直接观察年长者的行为——哪些看起来是欺骗或者不道德的。这导致了总体上对父母、政府官员和权威的普遍的不尊重。如果你在报道的字里行间读到学生的动荡,那么电视的潜在影响就变得清晰了。例如一份有关1968年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骚乱的报道中写道:

在我们学校中,当代年轻人是信息最多的人,也是这个国家已知的最聪明和最理想的人。这是所有本校教师的体会。

他们对公众话题最敏感,在政治策略中最复杂……

今天学生的能力、社会意识和社会道德、政治敏感,以及真诚的现实主义是引起学生动乱的主要原因。正如在我们的调查中一位学生所观察到的那样,如今的学生非常严肃地对待从学校、教堂以及家中所学到的理想观念,然而他们所看到的这个体制在实际生活中却

* 准确地说究竟哪个年龄段应被认为是“最初的电视儿童”并不清楚。一个合理的建议是,当至少有一半家庭拥有电视时,那些还没有上学或者被引入识字或印刷媒介的年龄段的儿童可被认为是“最初的电视儿童”。换句话说,1953年时年龄为4岁的群体(当年,有5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有50%拥有电视)。这个群体的成员在1967年时18岁左右,正好是“整合运动”的时间。该运动关注于民权,后来让位于“青年运动”,它大规模地抗议战争,在总体上拒绝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当然也可以研究年龄稍大一点的群体(1953年上1~3年级的人,他们能体会到电视所提供的信息要远远超出课本所提供的信息);或者研究年龄稍小一点的群体(在上学前很早就面对电视)。无论怎样,所有这些“电视儿童”的长大成人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社会冲突的加剧有着极大的关系。

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种族的不平等以及越南战争成了我们社会离开它所谓的理想的一个主要例证。

这篇报道中提到的许多问题都与电视有关(“信息量最大”、“对公众话题最敏感”、“在政治策略中最复杂”、“真诚的现实主义”,以及他们看到一个体制在实际生活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电视的暴露是隐藏在社会意识和社会道德下的某一共同的元素。电视将传统理想与种族主义及战争的生动画面并列地播放了出来。而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一代被看成是非常“理想化”的,他们自己也是这样看。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要比上一代人看到的多得多,所以他们要求其看到的所有行为能够具有某种平衡。在所暴露的社会场景中的极端不一致性,可能是抗议者道德劝戒和乌托邦政治的首要源泉。

这一“可信度”和一致性的分析,为20世纪60年代所提出的“别相信30岁以上的人!”这一口号提出了合理的解释,而这口号在其他环境里毫无意义。这种呼吁常常被老一代人引用为青年运动目光短浅和非理性特征的证据。难道喊出这一口号的人不明白自己很快也将会超过30岁吗?但是实际上这个口号可能仅指在当时超过30岁的人,他们在前一电视时代已到达成年,^{*}且这些人试图维护传统后台行为和台上行为的清楚的区分。一旦有冲突的行为或者更公开的行为他们会试图控制行为的可见性,这就显得非常的不可信了。相比之下,年轻的一代则“全部公开”。这个信任口号的提出可能与代与代之间的行为差异有关,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年龄差异。

因此,前台与后台区域的模糊,就是联系抗议者政治观点及其行为风格的共同基础。所谓“运动”的参与者们所感到的紧密团结,则是由于突然共享,那些以往仅限于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之间共同交换的大量信息所产生的结果。使许多“内部人”高兴的是,原来后区的特征被公开地展示出来,如非正式的服装、淫秽、裸体、亲密的自我泄露、情感,以及承认脆弱。这种舒适的亲密氛围被突然地扩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花朵般的孩子”穿着睡衣上街,与陌生人拥抱,好像他们是在自己家中一起玩的兄弟姐妹一样。而“外人”在这种展示中所感到的厌烦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后区行为向前区的移动。正如

* 例如1967年31岁的人在1954年时已经是18岁了,这一年美国半数以上的家庭有了电视。

戈夫曼所指出,后区行为与进攻性行为有相似性。实际上,戈夫曼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对恰当后区行为的一般描述,也可以用来描述60年代后期抗议游行和静坐示威的“令人震惊的行为”。

后台的语言包括相互之间的直呼其名、合作决策、褻渎、公开谈论性交、故意用力握手、吸烟,以及很不正式的服装、站姿和坐姿“松松垮垮”、使用方言或讲不太标准的话、咕咕唧唧和大声喊叫、有侵略性的玩闹和“开玩笑”、在细微的有潜在意义的行为中对别人的不体贴、轻微的自身介入,如,哼唱、吹口哨、咀嚼、小口小口地吃东西、脸色苍白或胃肠胀气。

戈夫曼想知道是否是后台交往允许人们有倒退行为,或者客观的倒退是不是根据具体的环境产生的,也即倒退是一种后台行为,要在社会没有限制的场景中进行或者其动机不受社会的限制。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外在人在静坐示威等场景所看到的显然是倒退的行为。这似乎显示了在新一代人身上开始出现了文明的倒退。这种新行为的神秘起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不愉快和不舒服。60年代的新精神就像是一种奇怪的瘟疫,改变着人们的行为而不顾人们的宗教、种族,或者显而易见的其他形式的早期教育如何。^{*}

“民权运动”组织成员之间的纽带对内部成员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外部人员强烈的负面响应只能加剧“他们对我们”的感觉,这是一切坚固的群体纽带的基础。内部成员分享他们的食物、金钱、汽车、恐惧和欢乐,而外部人员似乎是衰老、冷淡、呆板和没有感情的。

因此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可能是信息运动新模式的一个直接结果。人们现在更多地了解了其他人的私下行为,并感到自己可以如他们所知道那样除掉旧的面具来行动。

从这种意义说,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60年代的延续,而

* 记住这点很重要,即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后期,抗议的风格及语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民权示威者中有许多人是短头发、穿着夹克、打着领带,他们要求“黑人”也应分享美国馅饼中的一块。但是60年代后期的示威则带来更多的后台的风格,他们要求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行以及社会情感方面发生根本改变。这种变化与本分析结果相一致。许多早期的示威者,用电视所展示的国家和世界的新形象,去抗议某个特定的问题,但是他们对恰当的私下和公开行为风格的感觉,已经在电视面前得到了调整。只有当年轻一代改变了这些相同的问题或其他的问题的处理风格之后,电视的全部影响才能被人们所感受到。

不是倒退。60年代的“完形”可能已经消失,乌托邦式的政治和社会修辞也可能已经不见,但是基本的场景动力一直促使着社会行为的调整,以适应信息的获取。以往的后区行为持续不断地流向前台。静坐示威、T恤衫、口号、要求自由、平等和公正仍然是日常的景象和声音,但是已经没有了喜悦或者惊异。警察、残疾人、没受过教育的人、农民、同性恋以及老人都使用了这些策略。民权运动已经不再,但是它还活在各种不同的“后代”之中。现在大规模的单一冲突(以及团结一致)不见了。不再是年轻人相对于长者,雅皮士相对于“猪”,嬉皮士相对于没受过教育的人。正如一位横穿全国的旅行者1978年所写:

当披头散发的旅行者在怀俄明州被扔进有洗羊药水的大桶里、在佐治亚被枪杀……的时候,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日子消失了。

“如果你在5年前到这里”,一位友善的奥克拉荷马的家庭主妇邀请我到她家吃午饭并告诉我,“他们会把你按倒剪掉你的头发。不过现在他们都不这么做了,而且他们自己也留起了长头发。”

与许多看法相反,从前的抗议者并没有简单地安定下来或者“售空”,恰恰相反,他们的“冒犯行为”以及“不爱国的信仰”中已有许多融入了社会体系中。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的标志是反战抗议、对当局的不信任、开放的性规则以及使用违法毒品。这些行为和信仰中的许多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行为主流的一部分。

例如1967年初,只有32%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出兵越南是错误的。到1971年5月,民意调查显示62%的人赞同反战抗议。到1978年,这个比例更高且感情更强烈,72%的人认为“越南战争不只是个错误,它从根本上就错了,是不道德的。”

在1966年只有25%的公众感觉到“治理国家的人并不关心像我这样的人怎样了”。到了1977年,这个数字跃升到了60%。1958年55%以上接受调查的民众同意他们“能够相信华盛顿政府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到1978年,只有不到30%的人对华盛顿有相同的信心。

在1967年,85%的公众感觉婚前性行为是不道德的。到1979年只有37%的人有类似的感觉,而被调查的人中有超过50%的人认为未婚同居并“不是道德错误”。

在1962年,人口中只有很小比例(4%)的人曾使用过非法毒品。到1982年,12岁以上的所有美国人中大约有1/3曾使用过大麻、可卡因、海洛因或其他非法毒品。国家毒品滥用研究所发现1981年高中毕业生中大约66%的人曾使用过一种非法毒品。最重要的是,虽然毒品文化是最初“放弃”的文化,但是《新闻周刊》最近报道了“备受尊敬的职业者在工作中吸食毒品的大曝光”,《纽约时报》观察到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中,“公众对于使用非法毒品的容忍水平持续上升”。

在许多方面,民权运动和国教融合成了一个“中区”系统,它包括有来自两者的元素成分。20世纪60年代,极端主义者竞选公众职位,而法官和公司主管吸食大麻,使用可卡因。议会完成了驻扎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的抗议者开始的工作:调查对CIA和FBI的滥用,迫使一位总统辞职,并试图阻止政府暗中对付其他国家的行动。黑人占据了一些重要城市的市长宝座,如亚特兰大、芝加哥、费城和洛杉矶,而过去的种族主义政治家恳求黑人的原谅和支持。对政府和当局的不信任是民权运动的特征,现在它已遍及整个人口的大部分。”

“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许多方面是抗议的对象,至今仍未改变,但是公开行为的风格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显然是企图让所有可见的行为达到平衡。在我们的电视上现在看不到南方警察用水龙头和狗镇压黑人的野蛮场面,或类似1968年民主党会议期间在芝加哥对抗议者野蛮殴打的场面。“杀死那些猪”的喊声也消失了。现在的抗议者常常被小心地放在担架上。“芝加哥七人”之一的德维德·德林杰(Devid Dellinger)被指控引发了芝加哥的骚乱,他仍然走在抗议队伍的最前面。可是现在他向将他带走的警官道歉,并对媒体的镜头微笑。德林杰说:“没有人再将警察称为‘猪’。今天的抗议者对警察常常出语友善,而反应也常常是积极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稍长的“甲壳虫发式”引起成年人强烈的抗议(1965年盖洛普调查的人中80%认为在学校里应当禁止它)。今天“朋克发式”与穿着风格以及许多摇滚歌星兼有两性的外表则说

。当前的潮流不仅说明极端主义政治和保守政治的融合,而且也融合了传统上与社会不同阶级相联系的各种行为。婚前性行为、高私生子比例、同居、使用毒品,过去主要是与社会中较低层次的社会经济群体相联系。这些行为现在向上传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例如20世纪70年代早期,根据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宗教和居住地就能预测十几岁少年的性行为的差异。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些区别大部分都消失了。

明,年轻人为了显得“与众不同”能走多远。而老一代对此相对轻描淡写的反应说明,人们对奇形怪状的衣着和外表已不惊讶。20世纪60年代后期,留着长发的男性青年常常因“不像男人”的外表而被警察、建筑工人以及其他“真正的男人”所取笑。但是现今事情发生了变化。例如在纽约市布朗克斯44区的男警官,最近抱怨说没有头发吹风机的电源插座,他们中还有许多人戴了耳环。

如果现在的年轻一代的成员显得冷漠,可能并不仅仅是他们与60年代的那一代人有所不同,也是社会同样发生了变化。

随着两代人之间大冲突的消失,社会理想和社会问题出现了互补的变化。抗议大部分已不再涉及全国或国际性的问题,并且立刻朝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大的单一性的全球问题——核裁军,它在1982年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另一个是具体的、详细的,并且常常是以当地或自我为中心的问题。60年代占领伯克莱市“人民公园”的年轻人宣称要与不公平的当局、种族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宣战,但是10年之后在那里静坐的人,包括许多老年人,是为了在北方重开“人民的消防站”,布鲁克林人在为拯救布鲁克林北方而工作。

60年代所表达的情感和理想早已不见,但是内在的社会动力仍是相同的:对行为进行大调整以适应新的信息流模式。公开和私下群体场合之间平衡的不断变换对群体的行为产生了两种影响。电子媒介更多地暴露后台行为的结果使一些“私下”的群体行为被推到了“更深”、更不可见的后区。同时,群体真正的形象和行为也会改变。例如,当女性能接触从前仅限于男性的后区时,一些有关女性的笑话可能被迫进入更为隔离的、纯男性的场景。同时,男人开始在这个变为混合的场景中以与原来不同的方式对待女性。所有场景结构上的变化都会引起随之而来的行为的真正变化。

一个群体后区持续增加的暴露以及对它的关注导致了一种新的“中区”替代行为。在新混合场景中的行为既不是原有的台上行为,也不是过去的后台行为。例如,可以肯定三K党是最极端的社会群体之一,它最近有了一个新的形象。三K党某派系“大巫师”(Grand Wizard)中的戴维·杜克(David Duke)是一位年轻的长相平凡的大学毕业生。他有理性、平静地宣布,需要有一个群体来保护美国白人的权利。他说,三K党仅仅是另一种人权组织,它维护自己的利益。

许多组织对后区行为的意识不断增加,迫使它们的进程和步骤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海军训练科目,不得不减少了海军新兵训练基地的野蛮性。因为对外人对内部接触不断增多,内部人员对外部的接触也同时增多了。对单一的标准和道德的要求已经超越了美国的边界(最近在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时,对恰当的“人权”角色的争论反映了这一点),它甚至超越了人类环境(对实验室中动物待遇的关注不断升温,就反映了这一点)。将所有地方联接起来,电子媒介改变了过去的特定社会场景中的特定规则。

群体地点的破坏

电子媒介对物质地点与信息获取之间关系的破坏,对群体身份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群体类别的人如妇女、贫民窟居民、犯人和儿童,他们从前由于被隔离在特定的地点,因而“自然地”被限制在许多社会信息之外。许多群体和组织的身分 and 凝聚力是由如下的事实所造成的:成员被“共同地隔离”在相同或相似的地点——家或者办公室,贫民窟或者郊区,监狱或者商店,操场或者酒吧。只要地点和场景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物质的隔离就会形成社会的隔离。然而现在电视、电话和收音机中的电子讯息使人们在地点隔离的情况下仍能相互体验和交往,从而使地点平民化和一致化。结果物质地点现在仅形成信息系统的一种类型,仅仅是共享而特殊的群体经历的一种。电子媒介基于“同在现象”而跨越了群体身份,它们创造出了许多与物质地点无关的接触形式和“群体”。

电子媒介通过使人们远离传统的群体景观,从而对群体身份产生影响。使用“景观”这个词意指一个人从一个给定地点所看到的景色及其社会态度。它们都说明物质地点和社会信仰之间有着稳固的传统联系。共同的物质地点产生的相同的看法,又加强了群体的团结一致。物质地点的改变通常会引起态度的转变。最普通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从行人变成司机后对街道和交叉路口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这一观点也为一种精致的以电影手段宣传的技术提供了基础:改变景色和位置,而不是内容。例如在值得称道的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中,没有人要我们相信黑手党家庭成员是好人;我们只是被“放入”他们的家中,并了解他们的世界观。结果我们发现

自己处于一种鼓舞罪犯的特殊位置,而且当政府人员被杀时感到快慰。相似的技术也应用于战争影片中,无论“情节”怎样,西方的观众总是倾向于站在视角所展示的那一方。

通过对真实和虚构事件的视觉描述,电视为我们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展示了一种五花八门观点的模式。而无论物质地点和传统的群体联系如何,人们从其他地点和其他角色的角度,去感受这个世界看起来或感觉起来是怎样的。当然电视的景象是失真的和不完整的,并且常常出于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原因而故意造成偏向。但是无论如何电视将观众从他们的物质地点“移开”,并且为他们提供了其他人和其他物质环境的另一种景象。电视允许一种“无地点的景观”,也许刺激了“特赦国际”之类组织的成长,促使了有关生态问题意识的不断增加,以及对核裁军的要求越来越多。这些问题要求有一种“总体观念”,对传统群体破坏的关注,以及绕过从特定地点进行观察的需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角度观点的“自由化”影响可能仍然为保守派、反对改革派,以及特殊利益群体提供了政治上的优势。毕竟,多角度观点常常会引起许多人大量的同情,因此会导致政治上的矛盾及无法实施。

电子媒介对群体身份的影响可能在大城市中最为明显。在大城市中传统的社区联系常常是已经变得很脆弱,人们并不认识所有的邻居,也不是与遇到的每一个人说话。然而小城镇也正在经历观念的变化。媒介纽带与家庭、教堂、学校和社区相竞争。媒介创造了新的“社区”,其大部分内容被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所共享。电视上看到或听到的许多笑话、短语、表述和事件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共同的“经历。”^{*}因此,社会学家所指的美国“城市化”,不仅包括人口向大城市的移动,也指全国范围内人们态度和行为的一种城市化,这一点儿并不奇怪。电子媒介在信息上将人们移入到相同的“地点”。

* 过去的例子包括:“晚上好,切特;晚上好,戴维”[出自亨特利·布林克利(Huntley-Brinkley)的报道]以及“我无法相信自己吃掉了所有的东西”(出自一则阿尔卡·塞尔策(Alka Seltzer)商业广告)。最近的例子是:“但是,不……”(出自首次播放的“星期六晚间生活”),“回答得好,回答得好”(出自“家庭宿敌”),真(热、冷等)?”(出自“今晚”节目),“吃我的杂粮早餐”(出自“艾丽斯”),以及“牛肉在哪儿?”(出自温迪的汉堡商业广告)。这些短语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们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一种公共的和不断变化的“传统”而使用。

当然地点场合的同化仅仅是一个程度问题。不同的地点仍然不同,但是并不是像过去那样的不同。州和地区的心理距离在过去非常大。20世纪40年代,美国一侧海岸对另一侧海岸来说还是很神秘的地方。跨越全国的旅行是真正的进入未知地方的冒险。但是电视除去了这种神秘感觉的大部分。

电报开始打破了不同地点传播的障碍。但是它所提供的简洁的编码讯息,必须遵守电报的规则。而收音机强化了这个过程,首先是通过空间发送莫尔斯代码,而不是通过电线,后来又加上了人类的声音。但是收音机广播仅仅是对世界其他地方或美国其他地方发生事件进行语言上的报道,信息仍然是描述性和“第二手”的,是一种语言学的抽象。收音机提供了“世界画面”,但是这些画面必须在每位听众的想像中重新勾画。不提供画面去想像新的、神秘的东西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与你已经看到的东西存在着差异。另外听广播时,听众会创造他或她自己的独特而主观的画面。相比之下,电视似乎使观众直接而“客观”地体验远方的事件和地点。当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的广播节目“现在请听”变成电视上的“现在请看”时,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播节目描绘的是加利福尼亚和纽约之间的直播的联播网,观众在屏幕上同时看到了金门大桥和布鲁克林大桥。有了电视,美国其他地方最后的神秘开始消失了。

当然电子媒介并不是引起场景融合的惟一原因。高速运输、相同的服装、用品及其他产品的批量生产也对其产生了影响。正如丹尼尔·布尔斯特在美国历史中所指出的那样,电子媒介的发展和使用,可能是这里和那里的同化大潮流的一部分。只是电子媒介的影响超越了其他的因素的影响。旅行可以使人们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完全相同的产品使得不同地点有了相似的外观。这些变化是物质上的而不是信息上的。相比之下,电子媒介完全改变了不同地点本身的意义,共享而特殊的经历。同其他人“在一起”与使用相同的产品或吃类似的食物是非常不同的。

去远方旅行的人,适应“当地人”的行为风格,或者至少部分地适应是很普通的。例如某个在纽约的主管飞往加利福尼亚去完成一份合同的谈判,可以预期到那里会以一种“加利福尼亚风格”做生意。但是电子媒介创造了一种新的无地点的场景,其中没有传统的行为模式。当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生意主管通过电视电话会议“会面”

时,他们会采用一种既不完全是加利福尼亚风格,又不完全是纽约风格的混合的风格进行他们的谈判。

数百万人观看了肯尼迪的葬礼、尼克松的辞职,或者是刺杀萨达特镜头,但人们所看到的这些事件发生的“地点”根本不是地点。同样,每晚看电视的数百万人(在美国几乎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与数百万的工作或开车时听收音机的人(大约占80%的人口)一样,他们所处的“地点”并不是由墙、街道,或者邻里所确定的,而是由一种易逝的“经历”所确定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地点”会有怎样的行为呢?电子媒介影响着社会的角色,因其绕过了一度使特定地点非同一般的传播网络。人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信息系统中,而不是当地的城镇或城市。

“全国范围的覆盖”的电视网对地方媒介的内容和行为产生了影响。例如现在地方新闻节目中甚至包括全国的天气预报。而其他州发生的灾难——如加利福尼亚的山体滑坡或佛罗里达州的地陷,常常在地方新闻和评论中比某人家乡一所房子着火引起更多的关注,这种全国性的,有时是国际性的观点造成的结果之一是,所有“陌生人”的陌生、“邻居”的特殊意义都消失,这些曾经在群体身份,“他们对我们”的感觉中是很重要的元素。

任何人很难将自己隔离在电视所创造的玄妙场景之外。在电视出现的早期,低劣的电视节目使得教授和其他“有教养”的人羞于承认拥有电视机,更不要说他们花宝贵的时间去看电视了。但是今天,电视大规模地进入了每一个美国人的家庭,使得看电视具有了多种层次的社会意义(因此也提供了方便的调节装置)。看电视现在是体验“美国经历”的一部分。一个人看流行节目时可能不仅仅是看这个节目,同时也是看别人在看什么。一个人可以观察美国人但并不一定要盯着他们的眼睛,至少从美国人肩膀后面看他们在看什么。看电视也许不会让你直接触摸到国家的脉搏,但是它确实允许你触摸到国家手指所按的脉搏上。

现在电视的社会功能类似于天气。天气常常很坏,没有人对它负责,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注意它并将它看成是共同经历的一个基础,也是谈话话题的来源。

收看国家电视论坛或者用电话与其他人联络的便利和速度使人们很难将自己隔离在某个特定的地点。有了电子媒介,一个人总是

在“区域内”，而其他人则总是处于“可接触范围内”。今天“无法联络上”是不正常的。许多人度假或者“离开”时带着便携收音机或电视机，而许多隔离的宿营地广告中，宣称他们有带电视和电话的房间。而一个人生活或度假的地方没有电话常常被认为是给朋友、亲戚和同事的一种侮辱暗示。将自己的电话切断可能被看成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标志。有些职业中的人被期望随身带BP机，这样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他们在做什么，都能被联络到。因此过去依赖分隔的许多“地点”的传统行为特征就被放弃了。实际上，电子媒介曾批评了思维和地点的偏狭，完全没有意识到或无法接触这在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很不自然的。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电视机和电话最近成了一种固定物，即使在修道院的娱乐室，或者过去苦修会修士们寂静的大厅里也是这样。

电子媒介创造的纽带及联系与特定地点中面对面交往所形成的纽带及联系产生了竞争。面对面交往当然更为“特殊”，它能提供更强烈和更深的关系，但是它们的相对数量在下降。许多商业的、社会的，甚至亲密的家庭交往，现在都通过电子媒介进行。（“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远距离是第二好的事情”）虽然家中密切的身体联系很重要，足以成功地与少数的电子联系竞争，但是通过收音机、电视和电话的接触在绝对数量上已开始超过了个人交往。实际上，许多的“家庭交往”现在发生在电视机前。媒介是否影响了家庭交往的数量并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它们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家中发生的事情的独特性。因为在某个给定家庭中的许多电子讯息同时也能被其他许多家庭所体会，这种家庭单元共享且秘密的行为被进一步淡化了。当朋友、同事和亲戚的家庭在相同的时间共享许多相同信息的时候，一个人对核心家庭的精神归属感就减弱了。电子媒介所提供的社会经历的共同背景创造了更宽广（因此更浅薄的）纽带和联系。

电子媒介对家庭交往独特性的影响说明，20世纪60年代共同居住的风尚与现在单独居住的不可忽视的潮流后面有着相同的原因。^{*}共同居住和单独居住都标志着传统家庭关系的打破，二者都代表着用同样亲密的态度对待为数很多的其他人。公社运动中对待

* 1960—1981年美国单独居住的人数几乎翻了3倍。1982年，美国统计局报告说，美国每4个家庭中几乎就有一个家庭中有人单独居住。

陌生人像对待家人一样；单独居住者对待家人部分地像陌生人。在电子社会中，很容易理解，单人家庭的情形是两个潮流中较强的一个。就物理意义上来说，单独生活更加深刻地反映出，电子信息系统所形成的联系模式。公社就像是在他们面前扩大的家庭，涉及与某一其他的稳定群体的深层的、长期的与地点的联系。但是在电子传播与单独居住中，联系方式的选择范围很大且是共享的，但选择却是个人的和有个人特征的。因为电子交往并没有充满某一时间/空间框架，所以它在生活中的许多关系是短期而松散的。

社会场合的融合并不是简单地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地点来上演旧的角色，它也改变了正在上演的角色。由于地点的接触与信息的获取是没有联系的，所以具有地点特征的行为和活动开始消失，物质地点的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也开始消失。结果使得学校和饭店的穿着显得陈旧、虚假。当今天的人们确实穿着“奇装异服”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被看成是一种“戏装”，而是个人身份的一个明确的标志。另外，人们一般不会因为特定地点的角色而像从前那样穿着“适当的”服装，因为地点和角色的联系不再与过去相同。总统可能会在公开场合穿牛仔裤，修女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习惯。

由于不同的地方在信息上的相似性，因此不同地点的社会限定开始融合。现在，因为地点与群体身份和交往没有多大关系，工厂和过度装修的居民阁楼可以处在同一座建筑物中。又因为商业交往和信息流现在很少依赖同事或客户的亲临现场，所以工作地点开始转移至家中。由于从前不同的场景组合在了一起，原来不同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融合。例如，在家里设立办公室可能就需要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它既不是“在办公室的主管”，也不是“在家中的配偶/父母”。

传统的群体关系是根据长期共享地点和生活经历而形成的。工厂里的工人、家庭的主妇、学校中的孩子以及某个商店里的购物者，常常用物质上确定的“群体”来给自己下定义：工厂、家庭、学校和邻里。过去与监管人员、丈夫、老师或店主发生的问题可能被看成是个人之间的私人问题，但是现在有中介的“来自上层的观点”将许多问题重新定义为“社会问题”，以及“社会不同类别”之间的争斗。例如，现在当某次晋升被否定之后，就可能会联系到性别歧视或种族主义；与配偶之间发生的问题可能会被定义为虐待配偶或大男子主义。一

个孩子在学校里出现的问题可能会在法庭上以教育不当行为而告终;与店主的交往可能被看成是“消费者”问题。我并不是指这些观点一定有错,只是想说明它们显然是非常不同的。虽然交往仍然在特定的地点发生,但是现在它们被认为是发生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舞台上。

许多现在的群体划分是基于共享单一的、浅薄的,而不是基于复杂交往及长期的共享经历。例如,当前有关“吸烟者”对“不吸烟者”的权利斗争说明,许多现在的群体与传统的与地点相联系的群体有巨大的差距。

某个特定群体行为的观众不再由亲临现场所决定,这使得角色表演在社会的层次上发生了变化。例如,警察通过媒介与城市谈判,他们无法清楚地区分无私奉献的人民的公仆这个前区形象,与后区中为了更多病假、假期和高薪而讨价还价的形象。同样,当美国议会讨论巴拿马运河条约在巴拿马现场直播时,美国人和美国人处理事情的后区与美国人和巴拿马人交往的前区融合在了一起。美国不可能在进行激烈的内部争论时不会侮辱巴拿马人,也不可能在不消除内部的争执和讨论的情况下提供对巴拿马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群体地点的破坏导致了传统群体行为的淡化,并形成了妥协的“中区”行为模式。



“成为”的新方法

社会化场合的交叉

社会化涉及一个群体信息的有控制的获取。不同社会信息系统
的数量越多,建立和维持社会化进入某一群体的清晰阶段的可能性
就越大。例如,印刷媒介的信息特征形成了对儿童、移民和其他“外
人”精心构造出的社会化步骤。正如早些时候所讨论的,印刷媒介的
复杂性使得仅掌握其基本的接触代码都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因此,
年幼的孩子、文盲,以及移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被排除在了印刷媒介
的传播之外。另外,不同信息的组合可以分别针对阅读能力不同的

人。如此,印刷媒介“自动地”控制了人们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速度。

但是电子媒介使这些社会化的阶段变得模糊了。与印刷媒介不同,电视的表现形式使其无法清楚地区分学龄前的、六年级的或成人所能获得的信息。电视上的区别相对来说比较模糊。实际上,不同的年龄群体都在看着许多相同的节目。例如 1980 年的“达拉斯”(Dallas),“灾难公爵”(The Dukes of Hazzard),“爱之舟”(Love Boat),“M·A·S·H”,“提线木偶”和“又是快乐的日子”(Happy Days, Again),是美国每个年龄群体,包括 2~11 岁的儿童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并且被报业辛迪加在多种刊物发表。当考虑到即使儿童群体最大的成员——11 岁大的儿童,仅仅是学校六年级的学生时,儿童社会化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清楚了。针对六年级学生的书和课程通常展示了一个非常遥远非常理想的成人生活观念,而并不是像在“达拉斯”或“M·A·S·H”中所展示的那样。

书籍有一个内在的审查员,而电视没有。印刷将儿童与成人分隔开来,并且将不同年龄的儿童区分开来,而电视则将所有的人带进了同一个信息系统。当然电视并没有消除阅读的阶段性的,但它确实是破坏了印刷物所建立的不同信息系统的编狭。虽然儿童仍需从书本中找到许多东西,但这仅仅是阅读技巧,并不能决定将“成人”信息展示给儿童的顺序。某一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只取决于其最小的开放程度。通往书本信息的门仍然很厚很坚固,但是电视给儿童提供了一个大的钥匙孔,从中可以观看到成人的世界。

过去一个儿童的年龄是他或她能知道东西的决定因素。相似的信息被展示给了完全不同类型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处于相同的年龄群体。现在,通过电子媒介,“各个年龄”的社会信息被展示给了不同年龄的儿童,这远远超出了印刷文化所带来的信息,儿童现在将其带回到自己的个体认知和社会发展中,并成为维持自己社会地位的手段。行为、角色和知识的严格的年龄划分已显得不太适宜且没有必要了。

信息系统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到了儿童,也影响着各个年龄的人。印刷媒介的物理特征、参与的条件,以及印刷媒介的“把关人”——如图书馆员、教师和书商——进一步限制了信息仅出现在“适宜的”生活阶段。一个 16 岁的男孩不可能买有关照料婴儿或老年人问题的书,虽然他读这些书可能没有丝毫的困难。同样,刚刚结

婚的年轻女性不大可能买有关停经或离婚的书,老祖母也不可能买有关最新避孕技术的书。即使当某个人对于阅读距离自己的生活阶段较遥远的书感兴趣,但若将这种兴趣暴露在商店店员或图书馆员面前时,他们也会感到难堪。当人们被隔离在印刷媒介的孤立信息系统中时,生活的阶段变得更加不同。任何职业,只要是通过书本学习,而不是通过相对非线性的观察与模仿,就会倾向于随着阅读难度和掌握高级内容的步骤而形成初始与提高的不同阶段。

书籍提供了许多领域的知识,但是印刷媒介分隔的信息系统常常形成了思想和经历的褊狭。相比之下,电子媒介一致化的信息网络导致了一种选择余地较小的信息“食谱”,因此在不同的生活阶段提供的是区别较小的知识和观点。任何主动的电视观众都暴露在关于婚姻、不育、离婚、停经、儿童和配偶暴力、年老、疾病和死亡之类的讨论中。对于生命中其他阶段的体验和问题的意识不断增加,造成了生命不同的阶段角色、权力和责任的许多明显的区别变得相对模糊了。我们对社会化其他阶段的人的行为知道得越多,我们就越能为自己选择行为的准则。当我们知道了自己还没有直接经历过的场景的限时,“按适合自己年龄的方式那样的行为”或者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表现自己所处的阶段”,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

无论年龄如何,朝着共同化的社会地位前行,在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反叛”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一代的孩子们比前面一代显得更孩子气,同时也更成人化。他们所表达的行为风格自由而散漫,并以娱乐为中心,而且是利己主义的。他们躲避传统的成人价值和责任,但同时,他们有时又有高度的纪律、社会和道德意识,并且很有知识。他们听音乐时听它的社会“讯息”,他们的行为以有意识的和利他主义的哲学为基础。这些儿童——成人在突发事件时,可以集合数千人,既没有暴力,也没有内部争吵。当父母和警察发怒时,他们能手举蜡烛安静地游行,只为了证实和平是可能的,为和平游行。

鲍勃·迪伦(Bob Dylan)成了20世纪60年代抗议者有力的象征。也许这是因为他早期的歌曲,并因唱歌形成了成人与儿童的混合体。他很年轻,衣衫褴褛,他的风格是纯真的,然而他又有老智者那样嶙峋的声音、洞察力和“旧事”。

因此,虽然60年代所显示的社会紧张说明了年龄群体的隔离,

但是潜在的动力涉及了将传统上与不同生命阶段相联系的行为的融合。抗议者证实,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可以同时既随意又有责任感,也可以同时既是孩子又是成人。

虽然60年代常常被看成是早已消失的变异,但社会化同化的阶段却仍在我们的文化中持续着。当与60年代进行比较时,这些变化几乎是不可见的,因为它们太广泛。成人和儿童的行为不断地融合,年龄地位的反叛在“儿童权利运动”和“老人解放运动”两方面都扩大了。而这一点在下述方面被推到了极致,即温柔地对待新生儿,因其也“有人类感觉”,以及“死亡意识运动”不断增加,像死亡本身一样引出了死亡这一问题,更接近社会行为的中心。《新闻周刊》之类的杂志特载“年龄增大,感觉年轻”和“养育超级婴儿”为封面故事。第一个故事展示老年人登山和跑马拉松;第二个故事描绘了幼儿和正学走路的孩了“被人”教以数学、音乐、计算机,以及大脑的构造。退休年龄的延长,选举年龄的降低,以及对儿童正当权利的放宽,这都是朝着单一的全年龄行为模式和角色观念发展的有力标志。

这些变化必须看成是某个单一过程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对其有全面的理解。仅观察孤立的变化,会使整个潮流的意义和重要性失真。在表面上,继续让老年人处在劳动大军中或者处于社会活动中,大体上可以反映对老年人新的尊重。但是在传统意义上显然不是这样。今天的老年人通常并不是被称赞为经验丰富的“老者”或者具有特殊的智慧。他们仅仅是被看成是还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被容纳在“活跃公民”这一单一角色的类别中。老年人能够像年轻人那样行动,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尊敬,也就是说,这种程度就是他们能够工作、享受性爱、锻炼,以及照料自己。

随着越来越多社会地位的同化,有争议的“整合”问题进一步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人工流产、家庭护理丑闻、“死亡权力运动”成了政治与社会关注及争论的焦点,因为上述每一类中所涉及的人已不是,或者不再是“活跃的公民”。结果,对于胎儿、年纪很大的,以及垂危病人的恰当地位和权力有着争论。而有关杀人犯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也涉及到了类似的冲突:即杀人犯的“公民权力”和他们融入一般社会的最低能力。上述所有问题都关系到我们越来越无法将生活看成是界限分明的不同阶段和类别。

后台接触和角色转换的模糊

公开场景和私下场景的融合使得过去正式群体成员之间的区别和社会化进入某一群体的阶段,以及外人的状态变模糊了。通常,社会化进入某一群体中,其个人首先学习该群体的理想(如前台的行为),然后随着社会化的进程,他们可以更多地接触到后区。但是,电子媒介改变了信息的顺序和数量。个体在成为某一群体的真正成员之前,就知道了该群体的许多后区行为。结果就是绕过了受控接触的各个阶段。部分社会化的成员和外人获得足够的“有害的”信息,逐渐破坏着群体的角色和行为。另外,由于部分社会化的成员并没有将自己完全投入到群体中,因此当他们“暴露”群体成员时很少或者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当群体成员意识到自己共享而秘密的信息被泄露给外人时,就会发现很难再扮演传统的群体角色。因此,群体成员的传统角色与那些被社会化进入群体的人一样开始消失,新的、综合的角色开始形成。

例如,儿童通过电子媒介知道的成人生活要比通过印刷媒介知道的多得多。实际上,电视是为儿童展示其父母详细的后区景色的第一种媒介。但儿童对成人团体并没有任何义务。最初的结果是儿童反对成人的许多角色;而后来,成人则感觉他们不能维持自己传统的成人表演。从长远来看,成人和儿童的角色移向了一个“中区”的全年龄角色。

过去的儿童通过印刷媒介得到成人的台上表演。父母和其他成人以无所不知、冷淡、平静和镇静的形象出现。而成人的后区——疑惑、焦虑、恐惧、性行为、争吵、疾病、准备“成人”行为,以及孩子气的冲动——都被隐藏了起来。儿童也无法获取有关后台区域大小及深度的知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将成人的台上角色看成了单一的现实。

在印刷文化中,这个体系很容易支持和维护。传统的儿童书籍展示了风格化、理想化和一成不变的成人行为:看妈妈做晚餐;看爸爸下班回家;看乔治·华盛顿从不说谎。换句话说,展示给儿童的是父母和成人总体上试图在他们面前表现的行动的方式。在跨过学校的年级以及相应水平的印刷材料的过程中,孩子们慢慢地越来越多

地接触到了成人生活幕后的景象。这种阶段性的接触维护着成人与孩子角色的区别。当他们被允许了解成人的大部分秘密时,他们自己已经是成人了,而且他们转而开始防止年轻的兄弟姐妹或孩子们获得这些信息。阅读能力的阶段性使这种信息的划分显得“自然”而必要。

另一方面,即便是非常传统的电视节目——比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场景喜剧——创造了一种非常不同的信息环境。许多电视节目为各种年龄的儿童展示了成人的后台景象。它们显示了成人是如何演练父母的角色,又是如何放松的。老师、警官、政治家和所有成人权威的类似的后台行为都被暴露了出来。与印刷媒介教育出的孩子相比,电视儿童在家中或学校学习理想的角色典范(常常是相反的)之前已经知道了沮丧的父母和狡诈的警察。针对那些酗酒者、需要“父母压抑热线”帮助的父母,或者对“VD 热线”提出问题的人的公众服务声明被孩子偷听到。(实际上,一些声明暗示,孩子应当在家中发出消除紧张的信号,例如他们可以要求父亲停止饮酒。)

从这个观点来看,通常被排除在“电视与儿童”的有争议的讨论之外的许多类型的节目,也许对儿童和成人的关系有巨大影响。传统的戏剧和喜剧节目、新闻节目、纪录片以及公益广告都将成人的秘密泄露给了儿童。因此,虽然电视上出现的大多数是低水平的娱乐且从传统意义上讲是没有“教育意义”的,但其向儿童展示了成人行为结构和内容的许多事实,而这在印刷媒介中是被隐藏起来的。

同样,电子媒介影响了新移民对美国的看法。无论是到哪个国家的移民,都会对其所去的那个国家的公民怀有理想化的形象。而电视改变了这一形象。当移民所学到的语言还无法阅读报纸和书籍时,美国抽象的理想——“自由的土地和勇敢者的家园”——就与种族冲突、犯罪、政治丑闻和酒后开车的图景并列了起来。另外,几千小时对人的特写镜头显示了这些人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各个地方的人都一样,如此,美国人“与众不同”的感觉就消失了。

任何训练和社会化过程中神秘性的一部分是由于经历这个过程的人所持有的信仰,他相信当过程完成后,自己就会成为“另外”一个人,一个有特殊品质的人。神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会一直对牧师和医生怀有某种敬意,除非他们与这些人在一起亲密地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在书中,崇高和可敬的抽象语言

使各种其他职业的人都处于很低的地位。“法官”、“警官”、“律师”、“医生”、“牧师”——这些都是受尊敬的标签。但是在电视剧中,这些高贵职业中的任意一种都是通过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标签而展示的。新闻、纪录片和脱口秀中,某个人在特写镜头中常常有着具体的脸、某种鼻子、某种方言,也许有的人还有点儿紧张或口齿不清。经过许多这样的描绘,对于那些已经通过了我们刚开始或考虑着要通过的社会化序列的人来说,电视会使我们降低对这些人的敬畏。许多社会化过程的终点看起来不再那样神秘或特殊,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与他们知道得一样多,而仅仅是因为现在他们在我们面前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角色。通过电视,各种年龄和各种社会化阶段的人都暴露在了其他年龄和其他阶段的人面前。

电视强调个人表情的特征使得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平等化”。一些人在电视上可能看起来比其他人更可信,但是人的可信度的差别并不一定与社会化进入某个群体的传统阶段或传统社会地位的不同级别相一致。例如,在电视上,一位学法律的学生可能与律师没有明显的差异,一位蓝领工人的表现可能会超过一位公司的总裁。电视将每个人所“表现”出的简单人性和普通性都展示给了观众。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暴露会使人感到可信和舒服,但是它也消除了神秘,有时甚至使人失望。

在书中或戏院的舞台上,即使是“坏家伙”也因为距离和抽象而维持了对它的某种敬意。但是收音机,特别是电视将我们在其中体验的所有人的表情、脆弱性,以及普通性都暴露了出来。我们可能喜欢或者不喜欢我们在电视特写镜头中看到的人,但是我们很难用抽象的角色类别来考虑他们。他们首先是人,是偶然扮演某个角色的人。

电视对后台角色信息的暴露,影响了对社会化阶段和个人身份的一般认识。当人们不是处于他们的主要角色观众之前的“舞台”上时,就会远离自己的前台角色。例如,当医生、律师和主管与自己的家人及朋友一起时,他们可能拿自己角色的某些方面开玩笑,或者拿他们的“观众”严肃对待他们的方式开玩笑。由于表演者实际上还没有在自己主要角色的观众面前时,电视戏剧、新闻节目、脱口秀就将他们展示了出来。因此这些后台行为的许多方面开始显现。

当然真人(对虚构的而言)“深后区”的行为是极少暴露的。我们

通常看不到人们洗澡、真正的后台幽默,甚至在真正的后区交往中与同事会面。(两个明显的例外是水门事件的录音带以及 FBI 的 Abscan 录像带。)由于电视的暴露按其定义来说是“公开的”,虽然角色的表演者仍在表演,但由于他们处在不同的舞台上,他们的表演中包含了許多过去是属于传统角色的后台行为。另外,由于暴露了存在着“后台”——表演者不“处在戏中”的时间和地点,这影响了角色与人的关系的传统观念。脱离角色的放松,以及需要前区的表演准备及演练的暴露,使得许多社会表演者的台上行为被看成是“仅仅是一个角色”,是一种可以与个人相分离且能被打开和关上的东西。

许多不同角色部分后区的暴露,去除了围绕角色转换的神秘性。观众和表演者都因此而受到影响。那些地位改变了的人不再似乎显得或感觉那样“不同”。

也许是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正在经历着更频繁更灵活地进入和离开生活阶段与角色的运动,如婚姻、牧师、各种职业以及它们总体上的关系。现在当其他人发生这些转化时,人们感到吃惊或震惊的程度小了,因为每种社会化阶段或过程只有很少是抽象的。同样,个人发生这些转变时也较少有负罪感或者焦虑。人们现在对其他角色和其他社会化的层次及类型了解得更多了。角色被看成是个人选择的暂时阶段,而不是自然的发展。所以,虽然人们仍然通过许多社会化阶段,但是这些阶段在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减少了,而且重要性也降低了。从整体上看,其结果是出现了适应所有社会化阶段和类型的大体相同的语言、服装、权力、角色、说话形式以及适当的讨论题目。

社会化地点的弱化

传统上社会化的每个阶段都与它自己的物理地点相联系。年幼的儿童通过被隔离在家中或者教室里,而与许多成人世界分离开来。在学校里,不同年龄的儿童被隔离在不同的建筑物中从而置于不同的信息世界。法律、医学、神学的学生都在身体上被隔离在自己的原有的世界中,与自己的同类人在一起。从社会化的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升学,毕业,工作上的晋升——传统上都包括身体也进入一个新的地点。新的身体的接触导致了对新环境中可以获得的信

息的接触,并造成了与其他环境可获取信息及经验的隔离。

然而,电子媒介绕过了地点隔离的特性,因此使不同社会化阶段的人与不同社会化过程的人的差异变得模糊。例如,家中的儿童不再像印刷时代的儿童那样被完全地与其他环境分隔开来。实际上,因为成人常常忙于工作,今天的儿童通过电视,常常比成人更多地获取着各种环境的信息,过去年幼的儿童几乎完全依赖父母和老师作为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但是,今天的儿童有时可以帮助成人与外界保持联系。

电子媒介使得学生和受训者同自己的旧环境分离开来非常困难。神学院的学生在课间休息的一个小时里,可能突然发现自己通过收音机、电视和电话又回到了世界上。

人们也许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位朋友或亲戚必须“离开”,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去“成为”一名医生、律师、警官,或者牧师。但是由于现在无论人在哪里,都能很容易与他人进行联系,人们期望用电话与正在进行各种角色培训的朋友或亲戚保持联系。电子媒介使信息流同化的一个结果是,处于各种社会化过程的人们无论其身体之间处于怎样的隔离状态,他们都部分地融合进了大的社会中。

电子媒介通过将地点接触和信息获取分开,导致了由角色到角色的社会渠道与由地点到地点的物理渠道的关系破裂。特殊生活阶段对应特殊地点的观念正在消失;地位变化要求地点变化的观点不再具有社会意义。某人现在在什么地方与他是谁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现在一个人在哪里与他所知道或经历的东西没有关系。社会渠道与物理渠道的分离是近几年来一些潮流之下共同的原理,如学生对于参加自己的毕业仪式以及仅“同居”而不结婚都不太在意。一个人不参加自己的毕业仪式涉及了不经过物理渠道的社会渠道。而同居涉及了不经过社会渠道的物理渠道。与此相似,还有一些运动将生和死带回家中,使医院的房间看起来更像家中的卧室,通过工作程序使犯人更容易返回社会,以及将精神病或精神障碍的人从特殊的机构移出来,将其融入社区。高中的“同等学力”以及承认“真实生活中的优秀”的教育计划进一步证实了基于特定地点和与地点相联系的信息系统的社会渠道的重要性正在降低。

信息和地点正在变化着的关系产生的显而易见的影响是,人们在通过社会化阶段时不必经过物理过程,或者他们获得对地点的接

触时不用改变其社会地位,而潜在的影响则是,社会化转变重要性的整体降低。对成人社会化,对“季节”和“渠道”的兴趣不断增加,可能意味着这些转变更加具有社会重要意义。但是对有关生活阶段的表面陈述和声明的关注掩盖了其背后的社会动力。将某个人的生活看成是一系列的转变,就要求有一个“来自上方的视角”,一个不同于任何特定生活阶段观念的视角。人们不再被限制于一个给定的社会化阶段的信息系统。电视使处于社会化各个阶段的人更好地体会社会化其他阶段人的“感觉”是怎样的。矛盾的是,因为现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太特殊,也不再包含一切,因此人们更加意识到社会的转变。

社会转变重要性的降低使得社会更能包容模糊的社会类别。“到了年龄”仍没结婚、“生活在罪恶中”、没有爱的性、举行婚礼时已怀孕,这些不再是了不起的社会耻辱。同样,大学毕业后从事体力劳动不再像从前那样令人奇怪。即使是私生子在近几年也获得了某种程度上事实子女的权利。1958年只有15%20岁以下的妇女生育是非婚姻的;而1977年这个百分比为44%。另外,十几岁怀孕不再会被勒令自动退学。

近几年来我们对社会渠道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这可以通过回顾刚刚过去的事件而得到证实。例如1968年,巴纳德(Barnard)大学二年级女生与一男子未婚同居的故事曾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九 质疑权威

高低身份场景的融合

权威基于信息控制。高地位角色通常依赖于对当时主要信息渠

• 这个事故所涉及的琳达·勒克莱尔(Linda LeClair)违反了巴纳德住房条例,与男朋友住在一起。这个事件及其引起的反响(包括学生抗议威胁赶走勒克莱尔以及学生要求新的住房条例)实际上导致了1968年《纽约时报》上总计20篇文章的报道。许多文章,包括封面故事(巴纳德大学的领导征求提出抗议的女孩父母的意见),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是荒诞和家长专制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生游说议员及诉讼则有了很大的增加。在60年代运动的高潮时,极端的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仅有6000名交纳会费的成员,还有全国其他地方当地人会的30000成员。10年多一点之后,一个州的一个学生群体,如纽约公共利益研究群体(NYPIRG)就有12.5万交纳会费的成员。使得60年代抗议游行的数量相对较少的大的社会话题被大量地方的和自我相关的问题所取代,但是从利他主义到利己主义的转变并没有随之被动性地增加。学生在工作中的参与仍然很多,甚至超过了60年代。

电子媒介通过改变信息流的方向和模式而影响了传统的等级制度。一个商业的比喻有助于说明我们的社会总体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个公司的地位的阶梯是由信息“通过渠道”来支持的。如果公司总裁直接通知低级秘书或者看门人工资,或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被允许直接到董事长那里抱怨工作条件,那么中层管理人员的地位和权威就被削弱了。为了在等级制度中维持某一地位,个人必须将来自上面的信息通过自己传递到下面。对传统公司中的管理人员而言,最糟糕的事情是常常由等级制度中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员告知公司的重要信息。如果等级制度中的人不按固定的顺序或模式获取和发送信息,那么等级制度的线性结构就会瓦解。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电子媒介对我们传统等级制度许多角色的影响。

我曾用公司来比喻总体的社会变化,但是由于公司也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它们也受着信息流新模式的影响,出现了明显地远离传统等级制度的秘密以及权威的“线”。新的技术被采用,如“矩阵管理”(在这种管理下部门主管向多重监管汇报),以及“质量圈”(在相同领域工作的雇员群体开会讨论解决共同的问题——而不是依据来自上面的命令)。线性的和分离的场景变成封闭的整合的信息系统。另外,电子公司如数字设备公司和英特尔公司在许多这类革新中都是领导者,这也许并不是巧合。在一些高技术企业中,很少有个人办公室或者会议室,许多部门主管向多重监管汇报,项目通常由来自不同办公室的人所组成的混合“小组”来完成。他们常常有非常重要的“地方决策权”,这对同一企业不同的分支在程序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他们有极高的灵活性(在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等级制度的“向上”),雇员们常常会选他们下一个想去的位置。重要的是,诸多的变化不仅影响高层的管理,也影响了传统上公司地位中“较低”

的人。许多高技术公司鼓励工人参与所有层次的决策,所以工会发现在计算机工业中“组织”工人非常困难。这些工人没有传统上的有关雇主“他们对我们”的态度。

通过电子媒介获取信息的新模式绕过了传统渠道和把关人,并且危及了以往由印刷媒介所支持的地位的金字塔。父母、教师、医生、公司总裁、政治领导人,以及各种专家正在失去着在印刷社会中支持其传统地位的控制元素。因此许多这类角色的地位在降低。

从前,教师和父母几乎绝对控制了年幼儿童所能获得的一般社会信息。这便形成了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等级制度的层面。现在这些权威所处的职位就是对通过电视直接传递给儿童的社会信息进行解释和响应。父母试图与自己的孩子讨论节目,或者一些教师试图调整学校课程以便将儿童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节目包括进来,这是通过跟在孩子后面尽可能跑来“领导”孩子的新方法。

对于信息流的方向和顺序的失控也导致了政治地位的平等。例如,旧的线性政党机器正在失去其重要性,因为信息不再沿着政党等级制度固定的顺序传递。党外人士比以往有更大的机会赢得选举,因为他们可以绕过政党这个渠道,通过电话、收音机和电视直接面对民众。人们不再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来继承他们的政党。始自 70 年代初期的这种潮流跨越了政党政治和利益群体政治。

过去选民将政治留给政治家。50 年代对投票行为的研究显示了一幅非常稳定的政治图景,选民感到对某个政党有终身的义务,他对政治过程非常满意。研究也显示,大多数选民仅仅“轻微地参与”了政治,他们看待政治事件“非常天真”,并且他们对不同问题的态度显示了极少的一致性。

但是自 60 年代以来的选民研究显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选民深入地参与政治问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政党和政治过程。在 50 年代,政治精英(将政治当作职业的人)的“争论点的连贯性”与大众态度的连贯性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后来的调查显示,60 年代中期普通公民所展示的政治观点的连贯结构超过了 1958 年的政治精英。另外,选民态度的变化与教育程度的提高无关。虽然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显示了最大的争论点的连贯性,但是“复杂的政治评价”最大的增长比率发生在高中学历以下的人中。这种变化可能与电视所形成的政治信息获取新模式有关,并且与政治领导人和政治仪式

失去神秘性的结果有关。

在所有的社会角色中,等级制度的角色受信息流的新模式影响最大。信息的失控危害了传统的权威人物。另外,由于信息控制是高地位人隐蔽而非明显的特征,所以等级制度的变化常常为混乱和失望所包围。

当低地位的人失去支持其功能的信息时,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如果一位商人的顾客名单被偷,他无法挣钱则可以直接归因于他失去了信息的控制。但是正如前面所讨论,高地位的角色部分地依赖隐藏信息控制的重要性。高地位的人常常显得是因为其个人天生的品质,甚至高地位角色的扮演者自己可能也将自己的角色看成是个人重要的部分。当高地位的人失去确定其地位的信息控制时,所有相关的人都会感觉到深奥难解的变化发生了,个人和社会都变坏了。如果一名医生不熟悉他或她的患者在电视上看到的一种最新的神奇疗法,那么也许会推测出,他或她不再是位好医生——实际上,医生不像他们过去那么优秀。

突然增加的各种不当行为(包括教育的不当行为和父母的不当行为),以及美国历史上总统的首次辞职,都说明人们仍相信某些角色的伟大,但对个人扮演者则有根本性的失望。实际上,最近盖洛普(Gallup)和哈里斯(Harris)公众舆论调查显示,许多人仍然对社会机构(如高等教育、军队和医疗职业)抱有信心,但是不信任其领导者。1966—1980年间,公众对高等教育领导权威的信任从61%降至33%;对有组织的宗教领导的信任从41%下滑到20%;对主要公司领导人的信任从55%降至19%;对军队领导人的信任从66%降至33%;对医疗机构领导人的信心从73%一下跌至30%。从长远来看,对诸多权威角色的持续失望可能会导致我们社会大多数机构新的、低地位的观念。

不久前,传播环境的自然偏向是限制有关政治家和其他权威角色的信息。政治家为了将讯息发出去必须做某些工作。实际上,公共关系和广告的主要作用曾经是将信息传播给大众,目的是为了使人的一些方面、机构、观点和产品成为可见,而其他方面则由忽略而隐藏了起来。但是现在的公共关系变得越来越试图限制信息,或者是对付已经被别人得到的信息,譬如最近石化公司进行的公共关系运动。同样,政治家发现对自己的信息以及国家事务的信息总体上

的控制能力变差,他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在对已知的信息进行评论而不是向公众公布新的东西。

自约翰·肯尼迪任总统以来,听到抱怨总统“控制”新闻是常有的事情,但事实是,新闻一直是被控制的。“新闻”是物质和影像的混合物,正如社会交往涉及了对应该展示什么和应该隐藏什么的控制。最近发生的变化不一定是政治新闻的“真实内容”,而是政治家对信息的控制,以及对控制的控制的结果。我们现在更加意识到了对公众印象的操纵。

157

公众对信息获取的增加导致了公众有更多的权力(与“权威”相对),这又导致了信息的更多获取,等等。为了响应特殊利益群体的压力,政府自身就提出并且强化了有关“公开”和“透明”的法律和政策。1977年,议会的政府运作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指南,要求使用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案和1974年的隐私法案。指南的目的是允许普通公民“知道联邦政府总体上在干什么以及政府了解了个体公民哪些情况”。指南是用通俗的语言写成,是“用来……使政府的工作更加透明”。随着公众要求对政府文件有更多的接触,以及影印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顺从这种要求成为可能,于是这一潮流得到了推进。

电子媒介中信息高度的可接触性导致了要求所有的信息——无论是什么样的来源或形式,都能为普通人所接触。极其专业化的语言或行话现在弄得人们困惑不解。而天主教的集会现在使用当地语言进行,消费者要求在法律合同中使用通俗的语言。商业、政治和宗教领袖现在必须拥护对“公开性”承担义务,这样才显得可信。最近几年中,电视镜头展现了白宫和梵蒂冈的内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于权威角色做什么和知道什么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显得不胜任全能的权威角色。从医生对身体的了解到神圣的君主拥有通向上帝的渠道,高的地位受到了特殊而排他的信息获取的保护。一旦权威角色“放弃”他们的信息,他们的专家身份及地位可能也会消失。不(或者不再)基于特殊信息获取的高地位通常会遭到反对,失去对信息进行控制的政府首脑有时也失去自己的职位。

所以当今的领导必需要玩一场精细的游戏。在试图显得开放的同时,也要试图对信息施加控制。卡特和里根总统都试图显得诚实

和“可接近”，但是他们也努力阻止白宫的“曝光”。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白宫的“门缝”开得太大，以至于阻止这种曝光的企图也被泄露了出去。例如，1983年4月，《新闻周刊》报道说，泄露以及显示出的试图控制，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是可以谅解的白宫政策的一部分，目的是“测试公众的反应，向政治过程中其他对手发送信号（常常是编码的），以赢得媒体的喜爱，或如一位白宫官员所说，仅仅是‘为了说出我们对事情的看法’”。由于显然不能阻止信息的流动，权威角色们尽最大可能试图操纵和利用这种流动。但是甚至这种操纵也成了公共讨论的话题。

相对开放的信息流动新模式导致了对美国权威角色的普遍不信任。《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莱昂斯(Richard Lyons)描写了这个变化，但是在解释时他迷惑了：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政府官员和著名科学家的发言充耳不闻。他们中许多人继续抽烟，拒绝开车系安全带，而给自己孩子接种疫苗的人数在减少，抗议禁食糖精的建议，并且相信苦杏仁苷治疗癌症非常有效……

产生这种明显的逆反性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对民意和学者的观点进行抽样调查显示，原因可能是对政府持有某种怀疑以及对权威普遍不信任导致的。

获取信息的新平衡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美国人很深入地“参与”政治和政治问题，却又对大多数主要的候选人以及政治过程本身的幻想破灭。由于美国人对远方的权威（他们在信息上不再遥远）失去信任，于是出现了“自治政府”、“社区控制”和“自我帮助”的潮流。例如，在淫秽问题上出现了按“社区标准”发展的动向。另外，在社区内部，并不一定是要社区的领导者来判定淫秽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俄亥俄州的克莱韦兰研制了一份问卷对普通的公民进行调查。另外还有一种不断成长的趋势是“选民立法”，即由公民而不是选举的代表表决法律的实施。公民不断地寻找有关自己“权力”的信息，并寻求保护以避免高地位的人、大公司或政府的入侵。“自助护理”、女权主义者对医学机构的批评、非专职助产师的回归，以及“另类生育中心”的兴起，表明从前万能的医生角色已不再神秘。

后台的可见性与权威的衰落

因为失去了对角色功能直接相关的知识的绝对控制,以及公开场景和私下场景的融合,等级制的角色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比任何角色更依赖于对自己个人生活的接触限制。人类活动的大部分内容对所有个体而言都是相同的,如果高地位的人不能将这些行为与他们在台上作为高地位身份的表演区别开来,那么他们就会显得更加普通人。电子媒介扩大了对后台行为的接触和意识,这会危害到地位的传统抽象性。

目前与领导保持密切的关系涉及到一个原则上自相矛盾的说法。当我们期望继续“靠近”伟人,或通过更多的暴露后区来确认他们的伟大时,我们常常毁坏了他们当伟人的能力。“伟大”存在于台上的表演中,而且按定义讲,是存在于同后台行为的分离之中。其实当我们说想看看权威角色“到底像什么”时,我们通常所指的是想看他们最不像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想看的是他们在我们面前所扮演的角色中最不常见的行为以及社会上说的他们最不可能的角色是什么。在亲密的场合中,人们常常都是很相似的:吃饭、排泄、劳累、睡觉、做爱、修饰,以及沉迷于一时的幻想和自我陶醉。

当电视为我们展示政治家、专家、医生、心理学家、教师和其他权威角色的特写镜头时,这里存在一个与之相矛盾的固有的“逐渐消失的真相”。当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和地点看到我们的领导时,当他们响应自发采访或工作或竞选一天后显得疲惫不堪时,我们观察他们,并不仅仅是为了对他们了解更多。由于对表演者后台的探究,我们也改变了那些可被表演和观察的角色——以及高地位表演者拥有的自身的形象。

高地位表演者后区的暴露,明显地改变了社会信息的相对流动。例如,对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我们已经极大地逆转了在传统上支持他们高地位的非往复性信息的流动,领导们以前可以轻易地接触到别人,又能控制别人对他们的接触。20世纪20年代之前大多数数人从未听到过总统的声音或得到有关总统人性或个性的直接证据。40年代后期之前,几乎没有记者能够得到便携式录音机,用以记录可以证明采访中曾引用的话(所以引用可以被否认)。实际上,

艾森豪威尔当总统前,媒介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引用总统的话,意识到这一点多少有些令人吃惊。现在通过电视“公众”对领导者的个人表情行为接触得较多,而领导者则对人们的个人行为了解甚少。最近公众要求对官员“全面的暴露”,并同时要求免受政府监视以及控制政府对个人记录的接触,于是这种逆反的状况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随着这种新的非往复信息流,我们目睹了自己对总统、议员、情报机构及首脑看法的巨大变化。

大多数对后区行为的调查都有其固有的讽刺意味,这在议会的“水门事件”听证会中变得非常明显。在这个过程开始时,议员对白宫后区的错误行为义愤填膺。对许多人而言,这些议员是美国新的英雄,他们会纠正不正确的事情,用持之以恒和诚实的双手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议员们也为不断增加的暴露付出了代价,听证会之后,开始了对议员的调查。正如记者沙纳·亚利山大(Shana Alexander)观察的那样,舞台灯光对任何旧式英雄来说都太明亮了。

华盛顿没有成为英雄。流传的谣言不仅毁掉了我们全国的领袖……而且也除去了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的面纱,律师、起诉人、调查员,以及议院委员会的委员……

我这不是在抱怨。有必要不断地抛弃旧的英雄,以使头脑清新。但是在这个国家的脉络中我们触到了一个独特的死角,几乎没有脉搏。在雷达的荧光屏上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微弱的令人尊敬的闪光点,但他们并不是英雄。

权威角色后台行为的暴露引起了震惊,公众要求对道德及标准给予更多注意。信息环境结构的变化常常被误认为是个人性格特征方面的某些变化。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需重建距离感和神秘感,或者对许多过去高地位的角色重新给予一个低级的定义。

领地/地位相关的危机

过去所有媒介的变化都是通过改变信息流和信息控制,而影响了社会等级制度。但是电子媒介对等级制度的影响是任何其他早期媒介所没有的。它们绕过了过去高地位和领地之间强有力的联系。

过去领地直接与权威角色相联系,不仅因为土地的控制展示了财富和权力,而且因为过去的领地控制形成了当时领地内部信息的控制,并且以其作为一种屏障,不让其他人仔细观察到。这种安全的领地形成了私人后台演练和放松的场所,因此它支持了高地位角色的台上表演。

隔离的地点仍然支持权威角色,但是电子媒介绕过了领地的许多地位特征。某人的物理位置和领地控制不再能确保对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信息控制。例如,自从约翰·肯尼迪遇刺之后,电视新闻一直维持着被可怕地称为总统“死亡观礼”,以至于尽管媒介报道不全面但最高主管也不会出什么事(肯尼迪遇刺的主要记录是家庭录像)。现在只要有可能就会播放这位总统的录像,所以里根的“假期”也常常是处于台上的表演状态,因为他被远距离的镜头监视,有时甚至当他放松或骑马时都感觉到有义务向远处的镜头挥挥手。但是,无论他怎么做,人们现在更加意识到总统并不总是“在工作”。

物质控制和信息控制的分离,影响了所有的权威角色,即使是那些不像总统那样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人也是一样。能观察到外面的办公室在过去是商业中角色的高地位的重要象征,但如今这样的办公室假如没有电话(按趋势来看并且没有联网的电脑)就毫无意义。实际上,公司地位的高低也常常与自由使用长途电话的权力相关联(并且近来又与计算机档次的高低有关)。某人能“看到”或者“接触到”的人物不再是主要由物理的地点和移动所决定。贫民窟或者郊区十几岁孩子卧室里的电话或者电脑与公司套房内的电话或电脑一样有潜力。反过来说,墙、铁丝网、门、卫兵和外间的办公室并不能完全确保一位主管不会被接触到。电话绕过了物理屏障。当然某种程度上用电话接线员和自动应答机可以不让某人进入,但其所需努力的增加说明了有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在起着作用。

对接触与信息控制的新平衡,常常被在极端情况下看起来令人敬畏的力量所掩盖。正如《华盛顿邮报》编辑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所描述的,他的朋友约翰·肯尼迪对白宫电话接线员的能力非常自豪,他可以确定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可能的地点。

一次,他挑战让托尼(Tony)[布拉德利的妻子]、杰克和我想出一个接线员找不到的人名。杰克建议杜鲁门·开普蒂(Truman Capote),因为这人的电话号码未被列出。肯尼迪拿起电话说:“喂,

我是总统,请给我接杜鲁门·开普蒂好吗?”——他没有提供其他的任何资料。30分钟后,开普蒂就在电话的另一端……不是从他自己在布鲁克林·海茨(Brooklyn Heights)那个未列出的号码打过来,而是在其加利福尼亚帕姆斯普林(Palm·Springs)一位朋友的家中打过来,而这位朋友的电话号码也未被列入。

总统接触的范围是广泛的。但是它代表的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接触数量,而不是接触程度。由有电话的普通人可以大致地看出总统职员在许多技能。30分钟内接通位于远方的开普蒂电话的能力并不是证明了总统强大的权力,而是证明了电子媒介的灵活性与其可到达的范围,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有了电子媒介,总统和其他权威角色的权力与过去相比绝对是增加了,但是相对而言却是降低了。当旅行对社会接触变得非常必要时,就连总统也必须旅行或者派一位信使。但是这种没有中介的接触仍然为总统和其他高地位的人物所喜爱。只有他们有资格和时间与许多远方的人保持频繁的接触。普通人被限制在日常生活的局限和琐事之中。通过电子媒介,对每个人而言接触都变得简单了,传统上高地位人物的相对优势消失了。

高地位的人不再能通过物理上将自己隔离起来的方式使自己在信息上也隔离开来,这引起了无法划分场景以及进行恰当的行为。现在,对总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行为范围有了某种限制。总统很难隐藏他们在“私下”地点的行为,这导致了他们“公开”展示的形象必须加以改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子媒介越是威胁领导人的地位,许多人越是认为权威角色的行为傲慢自大。由于我们的领导人因其后台权力诡计暴露,使他们在信息上受到了损伤,暴露的行为显得这些领导人过于权力主义。许多人要求对信息拥有更多的控制,用以对付“滥用权力”。我们的领导人现在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不得不通过显得大众化来获得并维持其高地位角色,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缺少动力和权力就要面对批评。因此“水门事件”丑闻与通常的“信任危机”,可能涉及到了比通常想像更为复杂的伦理和哲学问题。

地点场景重要性的降低对于线性传播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线性传播支持着传统的等级制度。例如政治信息不再由国家领导人至地方领导人再到公民这样传播,现在常常是直接从国家领导人那里

传到公民的家中。结果,许多人不知道自己区里领导的名字或者议员的名字,并且如果在大街上遇到自己的“代表”也会认不出来。

许多情况下,电子媒介不仅绕过了当地的和地区的代表,而且绕过了国家政府。美国人过去向政府询问其他国家的信息,而现在许多国际的信息可以直接到达公民那里。收音机广播使我们接近英国,因为我们使用同一种语言。而电视甚至使我们“靠近”地球的两极以及阿富汗。虽然政治因素经常影响对他人的不同电视节目的播放,但是我们看到的各种报道形式也影响了我们的政治敏感性。与其他东西相比,我们现在发现将“人民”同“政府”区分开非常容易。实际上有时我们甚至能在头脑中将政府首脑同他或她的政府所代表的理想区别开来,于是我们对他或她的个性做出反应(正面的和负面的)。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勃列日涅夫、萨达特、贝让、撒切尔和其他一些人就是这种情况。

使具有惯性的外交人员不悦的是,从赫鲁晓夫开始,许多外国领导人和公民绕过了国际外交的许多渠道以及美国政治的等级制度直接而有效地接触到美国人民。例如卡特总统是在电视上观看安瓦·萨达特对耶路撒冷进行历史性访问的许多美国人之一;里根总统过分忙于宣誓就职,没能同其他美国人一起通过电视看伊朗扣压的人质的返回。美国领导人不再向美国人民传递所有的国际信息;在许多情况下,向公众演说国外事件的美国政治家现在处于一种向目击证人描述事件的不利位置。

电子媒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政府间的冲突中表现得最明显。吉米·卡特在就任总统的早期攻击菲德尔·卡斯特罗支持了非洲的屠杀;卡斯特罗在芭芭拉·瓦尔特斯(Barbara Walters)的电视采访中则给予了回击。这个反应并没有经过美国政府渠道的过滤。毫无疑问,卡特不得不同其他美国人一起观看这个回应。另外,美国的攻击和古巴的回应也都在同一个论坛中发生。双方领导人都是“直接”对美国人民说,他们都是在相同的“地点”和“距离”说。与共享相同的“位置”的人站在一边这种自然倾向消失了。美国人有机会接受或者相信“另一方”,这超出了早期任何时代。

由于信息方向的改变,传统的等级制度和传统的谈判形式被绕过了。这种情形使我想起了《星际旅行》电视系列的一个情节。一位外星的领导人通过飞船的电视系统对柯克(Kirk)船长提出了一项要

求。柯克没有被这位领导人的信息说服,所以这位外星人直接对柯克的乘客发表演说(他们也能接触传播),请他们自己来决定。无论这种对权威角色的破坏其最终结果是好是坏,它都值得成为热烈争论的话题,但是意识到变化的首要性质和范围非常重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子媒介绕过大等级制度中当地的成员后,最终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地方控制。人们不太可能敬重身在远方的领导人,部分的原因是他们看到过这些领导人的特写镜头,他们看起来并不值得特别信任,还有部分的原因是,许多领导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地位的必要和可行的信息。结果,许多地方社区要求独立控制自己的学校委员会和其他社区事务。但是这种新的地方控制与旧形式的地方政府有很大区别。地方政治家过去是政府代表线性等级制度的必要等级。电子媒介不仅绕过了许多旧的渠道,它们也破坏了分级的等级制度和权威角色代表团的整个体制。电子媒介促使地方政治诸侯的新封建体制的成长,中央集权的相对权力和影响在降低。电子时代的一个讽刺是,新媒介使技术上的完全中央控制成为可能,而在社会上却无法被接受。

十 影响圈

正如我在本书有关这部分的介绍中所说,除了新媒介场景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因素影响这里所讨论的问题。然而其中一些因素看起来似乎与媒介无关,但可能实际上与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本章简要地研究了三个重要的过程,它们常常被看成是自发的人类决定,独立地引起社会变化:“恰当行为”观念的变化,媒介内容的变化,以及接触地点规则的变化。在这里我认为这几种显而易见的原因常常是其本身对新媒介创造的新场景的反应。

我将这三个变量称为“影响圈”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1)因为它们不仅对媒介的变化作出响应,而且还增强了新媒介的影响;(2)因为它们就像“反馈圈”那样运作,在信息流模式和其他社会规范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平衡。也就是说这三个变量的变化是为了使社会回到结构平衡,不过当其变化时,引起了真正的变化。

礼仪圈

很难看清电子媒介与行为变化的关系,原因之一 是媒介并不是在真空中发挥作用。电子媒介并不是行为变化最根本的制造者。旧的角色结构可能被信息流的新模式所破坏,但是新的角色结构永远不会由媒介创造出来;它们必须由人来创造。正如库利、米德和戈夫曼所指出,当个人将自己看成是“社会物体”时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当他们从别人的角度来看自己时对自己才会有真正的了解。新媒介可能会影响到谁在谁面前表演,表演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对信息所能施加影响的类型,但是表演者和观众依然是人,行为仍然是在社会中确定。新媒介可能会破坏旧行为模式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是新的角色必须在人类交往和响应中形成。

由于这些原因,媒介的影响常常被忽略,社会行为的变化常常被看成是自然的“现代化”。但是“恰当”角色和行为观念的变化常常可以追溯到社会场景的结构变化。例如,如果男性和女性经常坐在一起看相同的电视节目,那么我们区分“女性话题”和“男性话题”,或者“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一旦男性和女性共享大量的信息,而这种共享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他们可能开始使用相同的语言,讨论相同的话题,并且期望相同的权力和特权。新的信息系统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而且必要,但是它必须在人际交往中形成和加强。这样,电视不仅影响了电视所播放的人的行为和观念,而且也改变了许多看电视的人对恰当行为的一般看法。

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电子媒介打破了原有的信息系统,而且通过将信息系统的变化结果在人际场景和地点构成场景中的传播,使之得到了加强。一个具体的教室里可能没有电子监视器,也可能没有电子接收设备。但是所有参与者在教室之外的生活的新信息环境会破坏学校中传统的角色结构和目标。在小学里有关政府机构理想功能的历史课上,假如孩子们了解有关最近总统丑闻的详细信息,他就会打断这节课。而这些信息孩子们可能通过电视来得到,因为这些孩子们的年龄可能不够大,无法从其他渠道接触到这类信息。类似地两个十几岁年轻人的语言和性坦白可能会令他们的父母震惊。学校儿童和十几岁青少年的行为反应延伸了电子媒介所形成的混合

信息系统。因此,在媒介既没有出现也没有被注意的地方,新媒介亦可能对其中的交往产生影响。

传统上对媒介内容以及观众模仿的关注,很难看到新媒介如何产生了旧媒介中并没有描述的行为。例如,在“混合人群”中某个四个字母单词(脏话,译者注)的使用不断增加,这又是怎样与电视相关的呢?这样的单词几乎从未在电视上听到过。然而,电视对社会交往中后区/前区结构的总体暴露,可能会使观众进一步意识到后区行为的存在,并且更喜欢将它们暴露出来。角色表演者后区和前区行为的不一致(表演“很难弄到手”的女性,行为好像很自信而实际上很恐慌的男人等等),电视暴露了这种明显的“伪善”,这可能会鼓励观众自己形成一种更加一致的“中区”风格,其中包括许多来自自己后区的词汇和行为,而不一定是电视上所展示的理想化的明确的后区行为。

随着社会信息系统的融合,原来“禁忌”的话题被包括进了男性和女性、父母与孩子的讨论中,公众人物在公开演讲时包括了个人的信息,老师和年轻的学生谈论以前认为不适合在教室讨论的话题(如使用毒品和对儿童的性虐待)。

我们行为和语言的新模式不一定反映了对品味和礼仪置之不理。它们确实代表了某种来自混合场景新意义上的礼仪。正如埃米·范德比尔特(Amy Vanderbilt)所写:

在当今的社会中,世界上的任何话题都是可以谈论的,只要有理由谈论它,且讨论的过程是有品味和谨慎的……世界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不能再希望男性围绕她们的谈话是处在与画室相匹配的水平……有品味的人一点也不后悔去谈论怀孕、流产、离婚、分居、政治的以及其他流言之类的东西……不久以前,这些东西被认为非常不适宜作为混合谈话的主题。

因此,新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行为的方式,而且它们最终影响人们觉得自己应该怎样行为的方式。正如下面所说,行为和态度的这种变化,在“更新”共享媒介环境内容时对系统进了“反馈”,这加强了电子媒介的整体影响。因此也进一步打破了私下和公开信息系统的区别。

媒介内容圈

新媒介所带来的信息系统结构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而且它们也影响了媒介的内容。所以,媒介内容的变化和社会行为的变化可能常常是相关的,不一定是因为它们之间直接而偶然的联系,而是因为它们都受到了相同因素的影响。社会场景结构的变化。电子媒介对信息系统的影响引起了媒介内容几种不同类型的变化。

原有各种不同内容的同化

因为电子媒介倾向于向所有群体暴露相对类似的材料,所以节目的内容开始遵从混合观众和融合场景的结构设置。过去每个人都看很大范围的节目,每个节目又都是为一个群体设计的,如今各个节目的内容开始改变。“男性节目”和“女性节目”之间或者“成人节目”和“儿童节目”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少。做完全不同的节目或主题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信息都已暴露在了所有人面前。即使面对女性的有线节目也谈论汽车机械,而针对儿童的有线节目也讨论与父母探讨性问题。

儿童和成人共同话题的被接受,反映在1976年联邦法院拒绝设立“家庭观看时间”概念。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在许多儿童看电视的较早的晚间限制电视中的性和暴力。当时美国西部作家协会的主席戴维·林特尔斯(David Rintels)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群体反对特别针对儿童的节目。他的论证中隐含的观点是孩子们对成人话题的知识已经有了显著的增加。林特尔斯说:“我认为现在电视上没有什么东西看时会令人尴尬,甚至被儿童看也是;实际上我认为反面的则更加真实。电视在展现性方面并不诚实,我们应当能够很深入地研究性所带来的严肃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我们就都能在这方面有更丰富的知识。”

电视的共享环境产生了节目新的“中区”内容。如果鸡尾酒会客人名单扩展到包括各种年龄、阶层、种族、宗教、职业和民族背景的人,其谈话演化的方式与电视内容演化的方式相同,从婴儿护理到乱伦没有什么话题不被触及。然而技术行话、高度集中的观点和讨论

被驱逐到更专业的场合。至于玩笑,“混合人群”问题可以采用下面两种方法之一来解决:或者选择的笑话不冒犯种族团体或人群中大的群体,或者反之,笑话对每个人的冒犯都是相同的[后面的这个技巧是诺尔曼·利尔(Norman Lear)“家人都在”(All in the Family)和其他节目中的革新]。这两个策略反映了针对电视混合观众的调整。

新的角色行为被描述为节目内容

信息系统变化所引起的群体身份、社会化及等级制度的变化在电视上被展示了出来。新的社会行为在新的节目、纪录片、脱口秀、电视听证会以及其他的非虚构节目中播放。另外,为了与行为的变化匹配,虚构节目继续有意识地“更新”内容。“嬉皮士”和“解放的妇女”成为场景喜剧和戏剧中的人物(如“家人都在”和“莫德”(Maude))。社会潮流,如“同居”与非传统的家也被播放了出来[“三人同行”(Three's Company)、“不同的抚摸”(Different Strokes)]。另外,传统角色被展示为一种新的“中区”形式,与能够获得的有关角色和角色表演的总体信息相一致。例如,M*A*S*H中的医生被展示出做手术时开玩笑。公开和私下场景与行为的原有区别正在融合[“玛丽·泰勒·穆尔节目”(Mary Tyler Moore Show)、“希尔大街布鲁斯”(Hill Street Blues)、“圣·埃尔斯温尔”(St. Elsenhere)]或完全融合了[“欢迎科特回来”(Welcome Back Kotter)、巴尼·米勒(Barney Miller)]。

节目内容演化以匹配新的信息形式

与印刷媒介相比较,电视不允许对所“表达的”和所“传播的”内容进行控制。例如,电视新闻节目除了“客观事实”外不可避免地展示了大量丰富的个人表情。电视制作者并不是试图对抗电视新闻的这一方面,而是他们不得不将很难隐藏的后区部分地带入节目本身,地方新闻节目中尤其如此。后区的表演、个人的感觉、非正式的交往、即席的笑话已经成了表演的重要方面。同样,许多电视小测验和脱口秀已不再试图隐藏起麦克风、镜头操作员、“鼓掌”信号及提示卡片。最近一个夭折的节目走得更远,观众在节目的开始和结束时能够听到节目导演给镜头师和其他人员“暗示”的声音。表情、“个性”

及台下行为已经成了许多新闻节目的隐含主题。一个新的“新闻”节目——“今晚娱乐”(Entertainment Tonight)则将它作为明确的主题。

与此相同,电视广播的体育比赛,在运动员的成绩中插播了许多后台风格的情绪,结果后区的情绪成了舞台的中心。例如奥林匹克举重选手在一次举重失败后被记者跟随着进入了“热身室”,要求选手描述他对失败的“感受”。这种比赛情绪变得如此显著以至于好的“表达者”取代了一些体育节目中真正的运动员。所以“庆祝体育竞赛”被表现为电视娱乐,而表演者是业余的运动员却是职业的表述者。

“没打好的球”和无意的笨拙,在过去对传统演员和表演者来说是致命的。但是这种错误在“现场”表演时出现在大量的收音机和电视观众面前,已是非常普通、非常公开,它们已经成了节目本身的一部分。首先,一些节目如“今晚”或“美国露天音乐演奏会”的周年庆祝就包含了“大的错误”,并且许多唱片和电视专辑专门采用废弃的拍摄影片和众目睽睽之下所犯的大错误。现在有几个定期电视节目将这种错误作为每周娱乐的一部分。同样,家庭信箱办公室“不一定是新闻”的新闻愚弄,使用政治人物或者他们家人在演讲中出错,或做出愚蠢的事——被绊了一下然后摔倒在地上的“新闻废弃片”,并从中取乐。但是对后台行为态度的转变意义在于,许多政治家和专业演员几乎从不在“后台”。一部电影的废弃片可能再次出现,作为黄金时间的娱乐。总统演讲前测试麦克风时,对总统嘲弄的描述可能出现在一份全国性杂志上。有了这种潜在后果的新知识,演员必须开始将他们自己后台演练看成是一种间接表演。精确地区分真正的后台行为和扩展的前区之间的新界限是很困难的,但是将电子媒介创造出的新的社会场景与之相联系起来看,就能很好地理解媒介内容上(真实行为)的这些变化。

印刷媒介以电子媒介作为标准来决定“恰当的”内容

在我们的社会中,电视占主要地位的一个标志就是,印刷媒介常常与电视所提供信息的种类和形式进行竞争。传统上很正式和抽象的印刷媒介变成了“个性”问题,如新杂志《人物》“People”探索公众人物的个人生活,印刷媒介记者和学者则采用了更加个人化更加主

观的风格。现在报纸描述事件经常采用的方式是模拟一个人可能在电视上看见的和听到的。例如,印刷媒介中的引语现在可能包括了更多的“啊”和“嗯”,而语法的和其他的错误可能会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实际上,现在印刷媒介中对事件的描述更倾向于报道听觉和视觉现象,而这些现象在实际的事件中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但是看电视的人却能清楚地看到。一位政治家肩头的汗水、一滴滚下脸颊的眼泪,或者一个紧张的扭动都可以成为印刷媒介描述的一部分,因为现在“事件”被定义为它在电视上是怎样显示的。如果仅从书面的记录来看,将来的子孙后代可能看到的则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我们的领导人才出现了身体和语言上的笨拙。

现在,天生具有显露性的电视采访也为许多印刷采访的风格和内容设定了标准。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埃尔温·戈夫曼观察到印刷采访中录音机“开”和“关”的平衡有令人惊讶的变化。戈夫曼指出,从前认为任何交往的大部分即便是同记者交往,也仅仅是针对谈话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采访的人物,因此常常可以将他们的活动和词语流动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忙于记录”,一个是“不用记录”。但是“在过去的五六年中……采访者变成了监视设备,记录下了他们看到的通常不用记录的事情。结果被采访者稍后会发现自己被监视了”。戈夫曼对这个变化并没有加以解释,但是记者成了“监视设备”的观点说明印刷媒体记者现在试图再现电视采访的“感觉”。

电子媒介所创造的“假定的亲密”不仅影响了印刷媒体采访,而且也影响了自传和回忆录的撰写。描写伟人非常隐私的生活、泄露旧的秘密、旧的绝密,现在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实际上,没有作者或其他人泄露隐秘的回忆录现在看起来呆板而不现实。近几年中,著名的女演员和政治家以及他们的家人已经出版了不少反映后台交往的故事,家庭暴力、酗酒、滥用毒品,以及沉溺于性爱。《新闻周刊》只对这种潮流进行了评论,但没有解释,它写道:

70年代后期,隐私是一个肮脏的词……全部承认常常有助于那些已被小报将其丑事完全报道的人……

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其中。尽管坦白的程度不同,但目的至少是为了满足已经变得很大的要求个人暴露的胃口。

总体上看,电视似乎使后区和前区之间传统的界线无法形成。

在印刷文化中能被书籍接受的内容可能在电子文化中不被接受。在印刷文化中儿童的书中可以包含成人选择了的任何信息,儿童被展示了一种理想化的有偏见的成人观念以及去除不良形象的社会现实。但是一旦儿童可以通过电视得到许多“成人”的信息,传统的儿童书籍就似乎对儿童是一种欺骗。所以最近几年中,儿童书刊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包括了许多新话题,如性和毒品,这些在过去是儿童禁忌的话题,现在由于电视媒介被儿童知道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模仿电子媒介所追求的亲密时,印刷媒介常常显得处于领先的地位。因为印刷论坛更具有私人化(较少限制)的性质使得书籍和杂志能暴露更深的后区行为。如果一位女演员在电视上暴露出她的乳沟,那么一份杂志则可能展示她的裸体。如果广播媒介倾向于融合私下的和公开的领地并且告诫人们,私下和公开行为的传统区别是偶然的和虚伪的,那么书籍、杂志和字典的编辑和出版商可能会觉得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包括四个字母的单词(脏话,译者注)时会更舒服(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相对私人的电影以及非广播电子媒介中,如唱片和录像带,甚至半私下的有线电视中)。当儿童书籍的变化、杂志中的新画刊,以及其他的新内容成为电视新闻、娱乐和脱口秀的主题时,这种非广播内容的变化可能会反馈到广播媒介系统中。例如,菲尔·多纳休采访了色情影星以及由于在《花花公子》杂志展示裸体而失去工作的女性。

这些媒介讯息变化的共同点是信息系统结构和它们的内容之间的环形关系。社会信息流整体模式的任何重要变化都影响所有媒介的内容。

领地接触圈

虽然电子媒介破坏了社会场景和物理地点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同的地点显然依旧存在,且地点仍然是许多种类交往的主要决定因素。身体的交往——从做爱到谋杀——通过电话甚至是可视电话仍是相当受限制的,收音机、电视或者电脑所提供的“陪伴”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形式的孤独限制。即使媒介提供了过去只能通过亲临现场才能获得的信息,且通过媒介显然能够接触其他人。但身体的移动仍会受到限制。女性可以与男性共享大量信息,但是仍然会受到限

制不能进入某些纯男性的场景，犯人可能通过媒介被展现给外面的世界，但其自身仍然呆在监狱里；一个小孩可能会接触到全世界的信息，但是却不允许离开房间。因此仅仅是信息接触所提供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信息系统的变化倾向于伴随着旅行规则和接触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信息流的变化似乎造成了增强个人的信息地位与他们仍然受限制的身体移动之间的不平衡和紧张。因此身体移动和接触的新规则，作为调整空间配置和新信息流的模式由此而形成了。由于精神病人和犯人获取了更多社会环境的信息，于是“两地间中途歇脚的小客栈”的概念和找工作的计划就形成了。残疾人虽有身体的隔离，却越来越能监视大环境并且与之交往，于是他们进一步要求平滑进入大街特殊的停车场、坡道，以达到相应的身体接触。当——解释电话广告——人们能够通过电子媒介让他们的手指、眼睛和耳朵“动起来”，社会上的每个人就获得了相对平等的“活动性”。

电子媒介为原先孤立的群体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接触和运动。结果，身体接触的限制在过去似乎是正常而必要的，而现在似乎是偶然和反应的。一旦女性在电视上看了几百小时纯男性后区场景中男性的交往，那么对于女性而言，某些酒吧、俱乐部和工作上排除女性则似乎不再有任何意义。一旦儿童在电视上看了上千起死亡和葬礼，那么在家中的葬礼上排除小孩子就似乎不再合逻辑了。

要获取一个环境中的信息就是要部分地“处于”那个环境中。信息的接触为身体接触打开了大门。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抗议示威的一种主要形式就是“静坐”，这一点儿也不奇怪。静坐常常涉及身体占据一个通过信息接触已失去神秘并且被“征服”了的环境。

我在“礼仪圈”讨论中写过，电视不仅影响其所暴露的行为概念，而且改变了观众恰当行为风格的一般概念。类似地，电视不仅使其实际展示的地点失去了神秘，而且还促进了接触新观念及其所有地点的开放。由于这种新的态度导致了对许多物理地点更加开放的接触，接触规则的变化通过电视上不同地点的首次播放（众议院、精神病院、白宫、法庭、急诊室、福利办公室、梵蒂冈等）而反馈给了电子媒介。并且这些暴露进一步消除了“地点”神秘化。

信息的同化导致了对空间接触的同化，这个观点可从历史上获得某些支持。印刷媒介传播到西欧前，并没有将不同的阶级、性别、

年龄或活动,严格地隔离进不同的房间和地点。工作可在家中,进行,房间没有特殊的功能(厨房除外),佣人们和主人们吃住在相同的房间里,房间对大的社区而言是相对开放的。房间的专门化开始于中产阶级和贵族,他们也是最先成为最有文化的阶级。而专门化“满足了对隔离的新要求”。

也许这种对隔离的新要求部分地与印刷媒介的隔离趋势相关,一旦印刷媒介允许子群体形成自己的“私下论坛”,那么就需要有隔离的物理环境维持面对面交往中类似的区别。一旦书籍建立的一套信息系统仅能被成人接触而孩子通常不能接触,那么成人可能感到更需要区分成人环境和儿童环境。一旦王子和牧师能够阅读如何在“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书籍[如马基雅弗利和格拉西安(Gracian)所写的],那么也许就会有更强烈的要求来维持更大的距离和隐私,这既是为了阅读和台上角色演练,也是为了从中放松休息。

相反,今天的电子媒介可能与地点差异减少这个趋势有关,不仅因为电子媒介融合了许多社会信息系统,而且因为电子媒介削弱了以地点作为安全信息系统的作用。如果他人能够接触到你试图隐藏在私人物理空间的信息(或信息类型),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去维护地点的隔离。

从这个观点来看,在接触地点的许多最新变化中有着共同的元素。工作和生活空间的融合,男女住同一宿舍的增长,“解放观念”办公室的潮流,犯人夫妻探望的实验,医院垂危病人的移动(鼓励医生和家人允许垂死的人死在家中或者类似于家的环境),许多医院探视规章的废除,以及返回印刷时期“家庭床”(父母和孩子睡在一起)——所有这些都代表了物理场景的融合以匹配融合的社会信息系统。

新信息系统造成的物理地点新观念还有另一个潜在的证明,法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过去独立解决内部争端和问题的场景中,养老院、学校、监狱、精神病院、武装部队最近都被其内部不满自己待遇的人起诉。

儿童过去害怕远处抽象的权威人物,有时用叫“警察”来威胁约束他们的行为。但是最近几年形势发生了转变。在许多情况下儿童有许多关于警察工作和法律的知识,他们叫来警官和律师获取保护

以免受到父母的侵害。

通过让每个人对其他地点有更多的接触,电子媒介同时也从社会上和心理上将人们从他们自己的物理场景中走开。由于电子媒介很容易“离开”某个地方,使得儿童、雇员、犯人、政府官员和其他人很容易绕过他们物质环境中的信息渠道和等级制度。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公用电话来打匿名电话,以警告权威角色的错误行为或者问题。因为内部人员不再需要“去”某个地方和外人谈话,所以现在私下群体交往的信息或问题被“泄露”给公众论坛就更加普遍了。成员可以不必离开群体领地就可以“背叛”,业余与专业的调查人员不用靠近就能“渗透进”某一组织的领地范围。

电子媒介“传播”的灵活性和速度造成了对物理地点接触的灵活性和速度。通过收音机、电视和电话,讯息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传送着。而由于“日程”而限制于某个地点或将某个地点排除在外,在目前显得更加偶然和不被接受。这也许是“弹性时间”潮流的一个原因之一,“弹性时间”允许雇员长期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或业余工作,更多的商店星期天整夜都开门。甚至货物运输的过程也由于即刻新观念而发生了变化。最近全国最大和最有竞争力的行业之一是“夜间递送”服务,这使得包裹的运输尽可能靠近了电子媒介所负担的信息即刻移动。

场景开放一般来说是来自于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这使得所有封闭的社会系统都有了坏名声。秘密会议现在遭人怀疑,某一俱乐部的入会,因其任何社会角色类别——性别、种族或者宗教而将他们排除在外,都是任何政治上有抱负的人所不为的。近几年,“阳光”法案使政府会议向公众开放,女性被允许进入过去纯男性的酒吧,而男运动员的更衣室则向女记者开放。不仅法律开始进入原先与之无关的社会场景,而且法律也开始吞食掉了人们拥有隔离交往场合的权力。这些变化是好是坏仍有待讨论,但也许我们应更加仔细地研究其原因和意义。

由于接触地点的新规则,将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场景融合在一起,许多旧的行为模式开始无法维持。物质接触规则的变化导致了新的“中区”行为的形成。这些接触和行为的变化影响了人们“恰当”

行为的观念。地点接触、行为和礼仪的变化开始成为媒介内容的新主题,这个循环一直持续进行。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类似的变化也妨碍了电子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当谈起新社会行为的形成时,许多观察者指向了礼仪自然的“现代化”,媒介制造者、编辑和作者的决策,以及有关接触物质地点的新法律和非正式习惯。对社会变化根源的分析常常是直接关注这些变量,而不是影响所有这三个变量的媒介传播的变化。

第四部分 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

下面三章为“个案研究”，每一章都仔细研究了前面分析的一般角色类别的一个具体实例。第十二章研究了近来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群体身份)观念的变化；第十三章探讨了成人和儿童(社会化)观念的变化，第十四章研究了全国性政治领袖(等级制度)的表演的变化。

我选择男性和女性作为个案研究是由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男性和女性是两个最大的人类“群体”，因此他们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点关系到每一个人。其次，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取代了种族问题成为最主要和最有争议的“整合”运动。但更重要的是，在传统上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是由生物性质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假如性别角色的传统差异被证明与社会信息系统的差异有关，并且如果目前男性气质行为与女性气质行为的融合能够与信息系统的融合相联系，那么就有更多的证据支持以下的论点，场景的变化对所有其他群体都有影响，这些群体被普遍地认为是由社会的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生物因素(宗教、阶级、种族、民族和职业等)。

我选择了儿童和成人角色作为社会化个案研究的焦点，因为从儿童到成人的社会化过程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另外，在社会化的所有过程中，儿童阶段与生理和认知发展的“自然”阶段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分析相类似，儿童社会化对这里所提出的理论发出了最艰难的挑战，但也是最有希望为其他角色变化研究带来重要发现和应用的一种变化。

在等级制度的个案研究中,我选择了总统和总统候选人的角色,这是由于最近有关总统职位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一位美国总统史无前例地辞职,而接下来是选举出一位政治上的“外人”,再后来是选举一位老兵演员。与其他事例一起,本分析将说明,最近有关总统的信任和特别的风格问题,部分是新信息环境所造成的结果。现在国家领袖要在这个新环境中表演自己的角色。

这三章可能解答了广泛的和具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这就是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一方面,这些解答的应用进一步证实了本书前面所提出的角色变化这一广泛理论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它们也描述了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具体问题。

十一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融合 ——群体身份变化的个案研究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也许是最终的女权主义运动。在过去,曾经有过为妇女的某些具体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战斗——拥有财产的权利、选举权、实行生育控制的权力、进入某些职业的权利,等等。但是现在的运动是争取与男性完全的平等,实际上是为了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分界线最小化或将其消除。在语言、服装、教育和职业方面,女性所要求的仅仅是“人”的地位,而不是“女性”这个独立的群体地位。

反对基于情绪、稳定性、智力、理性和进攻性方面差异的传统性别歧视的战斗,曾在多条战线上展开。现有的论点和研究有力地说明,虽然存在着明显的生理差异,但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许多传统行为差异是偶然的,更多的是由于社会化而不是生理因素决定的。但是这些论点和研究常常含糊不清的是:有关男性和女性角色的革命仅仅是对社会角色的斗争,并不一定是“自然的”运动。

生物学从来都不像社会规范那样统一。在我们18岁生日那一天,我们在生理上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这一天会标志着我们“成人”生活的开始。所有人的身高、体重、力量、敏捷性,以及自然智力都不一样,但是《独立宣言》中宣称“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社会规范常常使我们忽略和强化人们之间的各种共同点与不同点。从这种意义上说,要求所有男性和女性社会平等的新驱动也是很偶然的和可信的,

与将所有男性与所有女性分开的旧系统一样。它们都仅仅是在复杂的现实中有交叉的社会规范。

无论是否存在显著的生理差异将男性和女性“自然地”区分开，都与本书的讨论无关。如果男性与女性存在着生理差异，那么当前角色融合的趋势说明，社会力量有超越生理差异的能力。如果男性和女性生理上类似，那么传统上的行为之间的巨大差别说明，社会规范能在自然现实的伪装之下保护自己。无论怎样，社会规则似乎比生物学更重要，因此社会规则本身值得仔细研究。

我们许多人可能感到性别角色的同化运动趋势是正确且渐变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研究这种发展的可能原因并寻找支持旧的性别行为差别的动力是合乎情理的。本章简要地描述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融合的最新趋势，同时指出，性别角色观念的变化可能与电子媒介广泛使用后男性与女性信息系统的融合有关。

性别解放

她们的纤细阻碍了她们的，不适合参与和经历伟大的生活、残酷的战争，以及费力的国家统治。另外，她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孩子的养育方面，这种特征使她们最适合照料家庭。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776

不久前，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被认为是仅有的适合妇女的“正常”角色。传统性别角色的灌输开始得很早。几乎没有人仔细想过男性和女性婴儿的服装，对其所说的话或其所受到的对待是非常的不同。给小男孩准备卡车、积木和枪，而给小女孩准备洋娃娃和茶具，这都被认为是正常的。这些性别相关活动的差异又被孩子对父母的现实经历所强化。

总之，家庭是女性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属于男人。一些女性可以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好这份工作是在结婚前，也许在这个工作中她们会“钓到”一个男人。而一位整个成年生活中都工作的女性，几乎无一例外地担当男性职业的助手，在一个处于下级的地位中

• 当然，许多这样的行为今天仍然继续着，但是它们已经引起了许多争议和关注。

发挥作用。她们是护士而不是医生；是秘书而不是主管；是中小学教师而不是教授。不以丈夫和孩子作为生活首要目标的女性似乎很古怪的看法，是受到了误导的结果。一位女性对职业的渴望将她从正常的生活结构中分离开；这意味着她将做母亲和夫人的福气换成了作为“男性替身”的不幸存在。例如，《生活》杂志 1948 年的一则封面故事将“职业女性”的生活描述成孤独、绝望和不合常规的。与其他东西一起，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她不能与她在工作中遇到的男性亲密，因为“受到了他们与她存在职业上竞争这一事实的危害”，并且“仅需一封来自有幸福婚姻的朋友的信就能使她停下来——并且想入非非。”

政治和商业是男人的领地；做饭，打扫卫生，养育孩子是女性的天地。男人走出去探索和征服残酷的世界及工作“丛林”；妇女则呆在家里烧饭暖床等待着去慰藉她们男人受伤的身心。女性被认为是娇弱的、非理性的、情绪不稳定的，不能做男人所做的工作。因此，从定义上看，被证明强壮和有能力的男性可能不是真正的女性，而她们许多人被认为是无性别的高大强壮的女人。无论怎么说，女性都输了。许多女性知道与男人竞争通常是一条更孤独、更冒险的路。许多书籍和电影中描述的教训是，为了赢得一个男人，女性必须放弃与他竞争。

这种体系实际上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从儿童图书到学术论文，都得到了强化。学校课本中将女孩描述成需要保护者，而男孩则是保护者；女性适于在家作母亲，而男性才是职业中人。有影响的“功能主义者”学派的社会学家通过描述体系“工作”的方式和原因，暗中支持角色的区分。与其他因素一起，他们指出角色分工的功能是促使社会和家庭的团结。妇女离开商业集中地，丈夫一妻子的关系就会更加和谐；商业世界中残酷的竞争会被家中所有的舒适所抵消。并且隔离的家庭空间会成为儿童养育的必要环境。

妇女应当因为家庭和社会的缘故而放弃自己的愿望，这一观点也在很流行的非虚构作品中表达出来。例如，在《她的鞋中有六分钱》(Six Pence in Her Shoe)中，菲莉斯·麦金利(Phyllis McGinley)，一位获普利策(Pulitzer)奖的作家，对“家庭职业”给予了赞扬。

总之……当男人和女人保持他们自己的空间时，世界运转得较好。我并不是说妇女会富有，但是总体的社会会是。也就是说，毕

竟,妇女神秘的荣誉和义务就是让这个星球在轨道上运行。我们是自我牺牲者、奉献者、给予者,而不是吃掉生活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值得去打破家庭生活,除非是整个家庭受益,而不是家庭主妇本人。

男性和女性角色区分的必要性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男性和女性的个性有着固有的差别。“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被认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特质。女性气质的特征是谦虚、温柔、谦卑、坚忍、有同情心、移情、温和、关爱、直觉、敏感和无私。相反,男性气质的特征是意愿的力量、勇气、野心、果断、独立、进攻性、硬心肠、情绪控制强,以及“理性”——使用逻辑、抽象和分析思想。

几个世纪以来,女人和男人生活在相同的世界,但是却处于不同的社会、心理和法律中。正如让娜·邦克·罗尔博(Joanna Bunker Rohrbaugh)写道:“在生活的许多领域中并没有真正的人类经验,只有女性经验和男性经验。”男人与女人由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并用不同的需求来检验。

一些人坚持认为,女性传统的特质和经验曾使她们生活得比男性好,但是也有许多事实说明情况并不是那样。希腊人更可能杀死的是女婴,而不是男婴。古罗马允许男人将不想要的新生女婴抛弃在山上让她们死去,丈夫可以诅咒他们的妻子去死。在许多社会里,妇女先被认为是她们父亲的财产,然后又属于她们的丈夫。例如,在圣经时代,强奸被认为是一种破坏财产罪,而不是对一个人的攻击。一位“强奸者”即使是在妇女愿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性行为,也必须为损失进行赔偿。到今天为止,东正教的犹太男性每天早上都要感谢上帝没有“将我做成女人”(妇女感谢上帝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她们)。这个祝福直接模仿感谢上帝“没有将我创造成一位奴隶”的祝福。

按照英国通用的法律,妇女一旦结婚就在法律上死亡了。她像犯人一样,不能起诉,不能拥有财产,甚至在成了寡妇后也没有监护自己孩子的权利。一旦结婚,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就成为“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丈夫。

在西方文化中女性权利的争取有起有落,但是直到最近根本上的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1872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低等法庭的裁决,禁止女性从事法律行业。1894年最高法院的另一项裁决允许

一个州在解释“人”这个词时排除女性。1948年最高法院支持了一个州的权利,排除女性成为酒吧招待,除非她们是酒吧招待的妻子或女儿。

目前的女权主义革命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并且在70年代早期开始盛行。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以及“新左”(New Left)的女性发现,当她们的男性同事为重组社会而战斗时,许多男人希望一些东西保持不变。他们期望自己的女人做饭、打扫卫生,看护孩子,免得他们添乱。许多男人认为异性之间的劳动分工是理所当然的,当妇女的解放运动从人的抗议“运动”中出现时,许多男人把它看成是一个笑话。当年轻的女性扔掉自己的胸罩就像年轻男性扔掉他们的征召令时,即使是极端的男人也像粗野的人对反战抗议那样做出了反应。战争抗议者面对的是“美国,爱它或者离开它!”而迎接“妇女解放者”(这是对她们蔑称)的反应实际上是,“爱男人,或者离开他们!”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所谓的丑陋,缺少女性气质,以及被假定为女同性恋而受到嘲弄。正如狡猾的征召令逃避者,如果不为他们的国家而战就不能是真正的美国人一样,如果女性不剃掉腋毛,打扫房间,被动地接受性,生孩子,以及用食物填饱其丈夫和孩子的肚子,那么她就不是真正的女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极端的男性正在拒绝有义务参加光荣战斗的骑士这种传统男性角色,但是他们对女性传统观念的束缚却相当不敏感。妇女们应当看着与她们类似地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其他群体为其解放而斗争,这看起来是很可笑的——即使是对被压迫群体的成员也一样。当施托克利·卡迈克尔(Stockely Carmichael)被问到妇女在黑人权利运动中的地位时,他的回答是“视而不见的”。

不到20年,恰当行为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变化是不完全的,并且有许多阻力,但是从前清楚区分男性和女性角色的障碍出现了明显的解体。

从建筑工人到最高法院法官,妇女现在已进入几乎每一种职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人曾目睹了许多的“第一”,包括:首位女民航飞行员,首位女将军,首位女矿工,第一家妇女的银行,第一份女性参议院法案,第一位女消防员,第一位按照自己的权利竞选出的州长,第一位女公司总裁,第一位女性牧师、部长和犹太法学博士,首位女航天员,以及首位女总统候选人。

但是最显著的变化是在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中。从1970年到1977年,24~34岁的女学生增加了133%。女性运动员已走出了早期的梦想。过去进入法学院和医学院所见到的几乎全都是男性,现在男性和女性有了更加均衡的比例^{*}。警察和武装部队曾经是按照性别组织起来的。1972年至1982年间,每6个新的公司中就有5个是女性开创的。“Ms.”不久前还被看成是可笑的“人造单词”,现在却成了与“先生”对应的标准词,许多女性结婚后仍保留她们原来的名字。

自60年代以后这段时期的特征是妇女权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8年对政府承包人的不歧视和“肯定行动”政策被扩展到反对基于性别的歧视,并于1972年扩展到了所有联邦政府支持的教育计划中。许多城市通过了法案,禁止在公共场所如酒吧中有基于性别的任何歧视。最高法院裁决,公司不能拒绝有小孩的女性申请工作,除非他们也拒绝有小孩的男性申请人。童子军也允许女孩进入其侦察分部(15~20岁)。法院废止了要求女性说明她们是“夫人”或者“小姐”的选举条例。而“信任机会均等”法案禁止根据性别或婚姻状况有信任歧视。而统计局已经去除了“户主”的条目。

由于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变化和发展,有关求爱、婚姻、孩子养育,以及休闲行为中,过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有行为已经被无数的人看成是“男子主义”而被揭露和拒绝。甚至国家气象局也不得不改变其程序;暴风雨——非理性的自然力量,也不再以女性名称命名。许多传统的开玩笑方式和谈话主题在许多圈子中成了禁忌。

你只需拿出任何一本1970年以前男性或女性所写的书,就能了解到我们今天的理智与那时相比有多么地不同。那些书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他(he)”,“他(him)”和“男人(man)”来指每一个人,这是拿男性与女性的特征开了个小玩笑,而使用“男人和妻子”之类的短语则是背叛了这些书,就好像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今天,这种性别歧视的内容和术语已成为禁忌。它们被看成是妇女的传统“标志灭

* 例如1952年ABA许可的法学院中女学生的百分比仅为4%。10年后,这个比例实际上降至3.5%。但是到1972年女法律学生的比例翻了3倍,达到12%;而到1982年这个比例又翻了3倍,超过36%。医学院的模式也很类似。1969年,仅有9%的医学院学生为女性。5年后这个比例翻了一番,达到18%。1982年几乎30%的医学学生为女性。

绝”的证据。例如,社会科学的专业期刊不再发表采用“男性结构”的文章。在这些地方现在是使用联合词组,如“他或她”或是复数。从前脱口而出的许多名词现在在许多场合中成了“禁词”:邮递员(mailman),警察(Policeman),发言人(Spokesman),主席(Chairman),门外汉(layman)。它们被新的术语所取代,如信使(mail Carrier),警官(Police officer),主席(Chair person)和门外汉(lay person)。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有一个程序不仅能检查通常的拼写和语法错误,而且能检查“性别歧视的术语”。

妇女解放运动决不是简单地解放“受压迫的少数人群”。妇女对角色、权利和责任变化的要求也必然要求男性角色、权利和责任的变化。性别体系的一部分在整个体系不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变化的。许多男性抵制这些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在社会旧的劳动分工中,男人负责“工具的”任务,女性负责“表达”的工作。这些在女权主义者男女平等地参与挣钱、照料孩子和料理家务的要求中被改变了风格。结果,私下与公开场合、居家与上班,董事会套房和保育室之间的分界线开始模糊了。

随着女性要求越来越多地接触男性权利和角色,男性开始从其中的某些方面解放出来。正如女性现在被告知,她们在办公室和家中有进攻性是可以接受的,而男性则被告知他们可以哭,可以公开讨论自己私下的恐惧和其他个人感受,可以表现他们对孩子的爱。由于妇女假设了除“妻子”和“母亲”之外的其他身份,男性也可以开始考虑事业、财产和权利之外其他“成功”的意义。

在许多方面男性气质的变化要比女性气质的变化困难得多。正如玛格丽特·米德认为的那样,在每一种文化中,男人的工作是由女人的工作来衡量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对于女性来说,进入评价很高的男人的工作是很容易的,而对男人来说从事女性的“低等”工作却是很难的。无论如何,许多男性正在找到作父亲的乐趣,以及不再需要冷淡和无畏之后的情感放松。

因此,妇女解放运动也许可以更恰当地称为“性别解放运动”。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在融合,不仅仅是妇女变得更像男人,而是两种性别的成员变得类似。因为害怕打乱其家庭生活,现在的男性很可能会拒绝可能有助于其事业的加班、晋升或者改变工作。因男人从男性角色中的解放以及“父亲”对男人和孩子的重要性,出现了全新的

解放文学。新的解放组织如“争取平等公正的父亲联合会”出现了，其目的是离婚时为男人争取平等的孩子监护权。法院也已经意识到父亲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父母的职责中。虽然许多法官会“自动地”偏向母亲，特别是他们有很小的孩子时，但是变化却仍然是迅速和巨大的。例如，1980年，据调查每10个争夺孩子监护权的案例中，只有1个是父亲获得了监护权；到1982年在上诉法院判决的案例中，有51%获得了监护权。在过去10年中，离婚的夫妇更多地要求对孩子共同监护，并且有30多个州已经有了共同监护法律。

现在许多男人发现自己面对过去仅使女权主义妇女愤怒的相同的传统性别歧视观点。呆在家中照看孩子的男人被看成是懒惰和“失业”。晚上和周末花上大量时间与孩子在一起，而不是将工作带回家的男主管可能会被贴上“不专业”或者“缺少竞争锐气”的标签。感到与自己孩子的生活密不可分的父亲们可能不得不忍受1974年犹他州法官所说的那种评论，他说，离婚的男人不应当获得平等的监护权，除非他们能够分泌乳汁。

许多男性和女性发现，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妇女是否在过去以男性为主的商业和作战中“有能力”而成为强有力的主管或军官，而是商业和军事世界是否能够被修正，意识到家庭、感情和父亲的存在。如果贝蒂·费里丹(Betty Friedan)最近对西点军校夸张的男性气质的疑问描述准确的话，那么男人以及女人意识到的这些革命甚至在过去似乎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生了。

最近几年在商业和外交场合需要传统的男性风格“竞争”的假设被仔细地审视着。而传统的女性风格“合作”现在被认为是传统公司和国际交往中某些令人不快甚至有时是危险的问题的可能矫正方法。彼得·施瓦策(Peter Schwartz)描述了“ α ”(男性气质)和“ β ”(女性气质)解决问题风格的差异，认为两者对于有效的管理都是必要的。一种超越性别角色研究的全新研究领域出现了：认知或心理上兼有两性特征的领域。这种兼有两性特征与模糊的性器官或外表无关，相反它关注的是传统上与男性和女性相联系的认知风格的混合。“一位兼有两性特征的人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是强壮的又是有教养的，既是果断的又是富有情感的，这要根据场景的需求而定”。

姿态、法律和行为的变化是如此的突然和广泛，以至于它们使每个人都感到某种程度的恐惧。许多四五十岁的人们环顾四周看到的

是自己婚姻和梦想的破灭,实际上是“生活是怎样”的整个信仰体制的死亡。许多年轻人不能确定应采用何种角色。虽然很容易找到一位异性,但是找出有互补性别取向的人是非常困难的,这使得某些关系变得更有问题。男性和女性关系中过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方面现在需要不断地、明确地“谈判”。即使女权主义者自身对变化的定义也有很大分歧。例如,对于目标是否是仅仅在过去完全属于男性的权利和地位之中为妇女争取到相同的权利和地位,或者是否妇女有特殊品质,当妇女处于“女性化”公共场所时是否会使男女都受益,这些都有很大争议。

许多老年的“普通”妇女感觉受到运动的威胁,这个运动似乎将她们过去值得珍视和尊敬的母亲和妻子的角色重新定义为相对无用的、边缘的和辅助的。许多年老的男人感到被出卖了,他们一直相信自己奉献了生活的许多方面,目的就是工作和供养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现在这些男人被告知那些看起来似乎是他们个人勇气的东西实际上只是“男性精英”有组织的压迫。

即使是年轻人中,变化也是很难的。许多年轻男性坚持传统角色为他们提供的权利。另外许多男性赞同妇女解放,但是却逃避他们自己性别角色的相应后果。也许对男性而言,比那种将妇女作为生意、体育运动和其他的公共场合中与自己“平等”的想法更有威胁的是妇女解放运动中暗含的要求,即男性放弃自己对成功、挣钱、成就和事业近乎排它性的关注,以及分担家务和照料子女。男性也许能够相对容易地理解为什么妇女希望有自己的事业,但是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就很难了,而且也很难平衡重要商务会议与照料生病的孩子恢复健康的需要。

许多年轻的女性希望从新的意识中受益,如自由工作和同工同酬的权利,或是在性行为中主动而不受羞辱。然而获得完全平等的延迟也给她们提供了必要时则坚持“受保护”女性阶段的旧特权的理由(例如,女性仍然被排除在政府、军队和商业权利内部核心之外时,为什么应当自愿地在军队拥有被杀伤的权利?如果女性在就业中受到歧视,为什么失业的年轻女性不将自己庇护在旧的观念中,也就是女性失业与男性相比不是耻辱呢?)另外,即便是那些相信抽象解放的人可能也会因为逻辑上和“个人”的日常决策而又被迫不明智地进入传统角色(一生中一直受到忽略或者恐惧机械教育的女性可能会

发现,让自己的丈夫去修汽车而自己去做晚饭非常简单)。

由于各方在获得新角色全部好处之前都坚持旧角色的好处,这样,变化的滞后就会导致更大的滞后。

了解所有这些模棱两可状态及混合情感后,就不会对变化的不彻底感到奇怪。但是与“道德维护协会”和其他反应群体的期望相反的是,妇女不大可能停下来再回到“家中天使”这一旧角色,或像今天这样保持性别的隔离。现在仅15%的美国家庭符合工作的父亲和专职的妻子/母亲这样的“正常”模式(20世纪50年代时的数据为70%)。现在即使拒绝“女权主义”标志的女性也常常认为上一代人的只限于女性的机会和选项是理所当然的。变化的趋势似乎很明显。民意调查显示,人口中的大多数对“妇女问题”的支持越来越多。^{*}

为了看到在过去20年中大多数美国人的理性的改变程度,我们仅需看一下那些刚刚过时但似乎有几个世纪那么古老的保守做法。例如,很难相信,1961年NASA(美国宇航局)的发言人曾亲口说“与美国女宇航员谈话使我大倒胃口”;还有1967年,一位官员试图将一名参加当时全部为男性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妇女直接赶走;在1973年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前,分类广告是按性别来划分的;1976年前,已婚的妇女不可能在电话号码簿中列出自己的名字。现在我们很难相信,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南方的参议员将禁止性别歧视的修正案加入到民权法案中,仅仅是作为迫使其他人否决这样“荒谬”法案的一种手法。如今已是没有回头路了。

* 例如1982年,哈里斯调查发现,显示大多数人赞同宪法中平等权利修正案(ERA)的通过。当阅读过修正案的所用措词后,73%的被调查者表示赞同,22%的人反对,5%的人态度不明。即使当围绕ERA的一些争议问题被引入后,63%的接受调查者仍赞同ERA。路易斯·哈里斯观察到“很少有这样具有争议的措施会得到这样明确的支持”。而其他的调查显示,在过去20~40年的时间里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8年,75%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一位已婚女性的丈夫能够供养她,就不赞同这位女性去赚钱;到1978年仍坚持这种观点的人降至26%。1957年,80%的被调查者认为一直不结婚的妇女肯定是“患有疾病”,“有精神病”或者是“不道德的”;到1978年仅25%的人持有类似的观点。1937年,只有大约30%的被调查者说他们会投票给合格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在1970~1980年的10年间,离婚案中的被告感到父母双方都有责任照料小孩的百分比从33%升至56%。最后,在1979年,回到过去的有关性道德和男女劳动分工标准的观点受到了大约80%的被调查者的反对。

女权主义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任何社会运动的倡导者常常需要在他们所争取的变化的关系上采取一种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为了使追随者发动起来并给他们以力量,他们发现必须提出广泛的运动目标。另一方面,运动绝对不能被描绘成太具有革命性,以防止普通民众会害怕正常社会生活方式被彻底抛弃,害怕未来会是奇怪和不合常规的。运动的倡导者常常借助在推动大范围社会变化的同时将变化勾画成远离非常规的,趋向正常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矛盾。妇女运动也不例外。行为和信仰的旧体系被描绘成“受限制的”,“被压制的”和“性别歧视的”;暗示着运动的目标:性别完全平等,恰恰是“普通的”和“正常的”。

将性别平等刻画成“正常的”这种比喻的策略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但它也使得美国过去 20 年中所发生的性别角色变化的非同寻常的重要性降到了最低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另外,由于没有必要研究“正常的”现象的发生,因此妇女解放运动的根源并没有得到广泛研究。或者换种说法就是,运动的“起因”常常被简单地由旧体系限制性地描述确定下来。

大多数女权主义文献认为,只有人们注意到旧体系的结构(也就是说,提高他们的意识),他们才会发现旧体系偏离常规。但是事实上,旧的社会秩序被有意识地观察和讨论,并且常常受到赞扬。例如,希拉·罗斯曼(Sheila Rothman)指出,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从“妇女恰当位置”观念变化的历史上看,60 年代和 70 年代有关角色变化的斗争“与早期态度与做法的和谐特征形成了巨大而显著的对比……我们的祖先认为,相互独立之处恰恰是我们认为竞争和冲突的所在”。类似地,人类学与历史的证据显示,性别的差异和不平等几乎是所有文化的共同特征。当代文化研究指出,“性别的不对称性是当前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事实”。

性别的适合行为的新观念并不是简单地从更伟大的意识中成长出来的,而是从新的意识和新的价值观中成长出来的。在研究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起源中,真正的问题不应当是旧体制的荒谬性,而应用新的观察方式“透视”旧的现象。

为了赋予目前妇女运动更多的延续性意义,许多女权主义者转

向了历史,去寻找过去描写性别平等的那些女性的作品——如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夏洛特·佩尔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等其他人的。同时,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也被看成是斗争延续性的证据。

但是,如果将时下的女权主义运动仅仅看成是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一种延续,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回顾历史,然后找出某个人作为运动的先驱,这对几乎任何社会运动都是可能的(正如,总是可以在我们的童年找出“原因”来解释我们可能选择了的几乎任何职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女权主义者情感过去的表达,并不一定说明女权运动的延续性。例如,早期的女权主义作家是不寻常的女性,而作为不寻常的人物,她们则不能展示当时普通女性的情感,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能是任何运动的领导者。

即使是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其与当前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共同点也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少。“绝大多数的妇女或者与女权主义没有关系,或者嘲笑女权主义是没有必要和方向错误的”。*即使是那些支持妇女拥有选举权的人当中,许多人并不是将选举权作为使妇女与男性平等的手段而进行争取的,而是作为允许妇女将她们道德监护人的特殊标准引进社会这个大“家庭”的手段。对许多人而言,选举是妇女志愿者在家庭之外改良工作的延伸。类似地,其他人反对这种选举权是害怕它会使家庭和公众领地分界线消失。

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是长期的、艰巨的。实际上它花费了70多年的时间——是美国历史上为选民扩大所作的最长时间的斗争[参加1848年在塞尼卡(Seneca)瀑布召开的宣布妇女有平等权利会议的250名妇女中,只有夏洛特·伍德沃德(Charlotte Woodward)一位活到了参加选举美国总统]。即使是获得了选举权,它也许曾更多地被看成是种族的、宗教的和人种纯洁的胜利,而不是性别平等。选举权被一些男性作为保护那些受到男性移民与黑人威胁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政治的一种保守措施来接受。最后,一旦取得选举权后,女性的选举与男性的选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女性选举”基本上变成

* 相比之下,当前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基础广泛的,有许多不同的组织,没有集中领导。其中一个这样的组织 NOW 很自豪地拥有 25 万名交纳会费的男女成员。

了她们生活中男人选举的影子。事实上,男性和女性选举少有的几个主要区别之一是,直到给予选举权 36 年之后,人口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妇女投票数量才与男性相同。*

斗争“胜利”后,选举权组织就被解散了,但是女性选举权之后并没有产生男性与女性关系的任何重大变化。职业型女性如医生和律师仍然是几乎没有。相对而言,许多年来,很少有女性受到的教育超过家务的范围。而男女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有着不同的技能和需求的观点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公立学校的某些课程仍然将男孩和女孩分开。例如,我认识的一位妇女告诉我,1968 年她在纽约市一所学校 6 年級的班中,每周有一个下午男女生是分开上课——男孩做额外的科学方面的题目,女孩绣围裙。

即使 20 世纪上半叶,妇女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力大军,“这既没有复活也没有点燃妇女心中的女权主义思想火花”。除了全国一个很小的妇女党之外,2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没有一个女权主义组织,而且在“60 年代末期之前……女权主义者是一个肮脏的词,会使人想起老处女、‘蓝袜子’和‘痛恨男人的人’”。

在这里,我并不是在说过去所有的妇女都愉快地接受了只做母亲和妻子的角色,而是大多数的妇女并不是主动地拒绝她们在“男人世界”中“特殊的位置”。在卡尔·德格勒(Carl Degler)对美国女性角色综合的历史分析中,他将 20 世纪 70 年代的妇女运动描述为女性与家庭之间“长期紧张”的一个延续。但是德格勒也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不连续而感到吃惊。在过去家庭中,变化的发生像“冰川那样慢”,然而著名的女权主义运动“在 60 年代一下子在全国爆发。几乎没有任何男性或女性预测到它,或者说甚至没有想到会那样”。类似地,希拉·罗斯曼指出,虽然对于妇女的定义曾有许多争论,但是女权主义的理想是将妇女作为在许多方面与男人相似,没有特殊的品质或者需要特别保护的“人”来看待,这令人吃惊地显示了“与过去的女权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延续性”。虽然没有延续性,而且没有任何确定的政治基础,但其仍像德格勒所写的那样,“获得了……大众媒介、学术团体、政府,甚至商家的支持”,而且“相当迅速”。

* 有趣的是,在总统选举中首次出现男女投票率相同的 1956 年,恰好是电视刚刚在美国家庭中普及率超过了 50% 的一年。

如果当前的女权主义运动不仅仅是早期斗争的延续,那么有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社会意识中如此革命性的变化如何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为什么妇女运动能在一代人之内就迅速成长起来并且开花结果?为什么男人与女人之间存在的差别类型,在发生了很多观念的变化之后,人们才开始对是否存在任何显著差异表示怀疑?并且为什么要求变化的运动发源于社会中传统上“被动”的成员?是什么改变了妇女的意识,是什么使得这些变化成为合理的——之后——对许多男性也是合理的呢?

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当前的革命是勇敢的女性个体冲出家庭的束缚,与所有的不利、压力和传统斗争,并且在原来纯男性的世界里建立起一块滩头阵地的结果。女权主义运动的这种解释既是动态的又是有吸引力的——传奇故事的材料——但它也是不充分的。因为,虽然文化上的态度一直在演化,但是在一代人之内如此大范围的人群中女权主义意识的突然兴起有力地说明,在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时,它们可能赋予了人们恰当性别角色的一个全新的观念。

所有像妇女运动这样复杂和多方面的运动,显然不可能只归结于单一的起因。男性和女性角色的变化是由许多其他方面的变化所造成的: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身体力量作为社会地位决定因素的重要性,医疗保健的改善使得生孩子不再是严重地威胁生命的以及造成分裂的经历,还有许多家务工作的自动化,以及计划生育的进步^{*}。在最近几年中,经济条件、妇女受教育人数的增多,以及高离婚率也鼓励着妇女“依靠自己”。

在没有排除所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本书提出的理论提供了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模糊的另一种可能的重要原因:通过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特别是电视,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场景或者“信息系统”产生融合。

* 许多同我谈论男女角色改变的人们都将变化归因于“避孕药”的发明以及能得到婴儿食品配方这样的因素。他们辩解说,由于这些技术,做母亲,对于大多数性主动的妇女而言不再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孩子出生后的存活不再依赖于母亲的亲身参与。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权主义者对避孕药于身体的潜在危害以及母乳喂养的潜在好处方面的攻击最多。避孕药和婴儿食品配方有时被看成是允许男人继续占有女性身体的扩展,它使得妇女在性方面更容易为男性所获得,并且使妇女的乳房变成了没有任何自然功能的纯粹性器官。女权主义和许多女权主义者在没有这些发明时也一样繁荣。

正如前面各章中所指出的,任何“群体”的身份,是由群体成员共享而对外部群体保密的经历所支持的。因此,分析角色变化的场景方法说明,男性和女性的区别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对社会场景及其中可获得的信息接触方面存在的差异造成的。男性和女性领地的隔离一度造成了社会化的不同角色,以及台上性别行为及私下后台的演练和放松。

实际上,与绝大多数其他群体的不同经历及不同地点所不同的是,许多年代以来,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隔离是被明确告知的和接受的宗旨:“两个场合的宗旨”。而隐含在这个宗旨中的观点是男人与女人完全不同的天性占据着不同的心理和情感世界,因此拥有不同的自然职权以及各自不同的恰当位置。妇女的位置是家庭与居家的场合;她们的职责是培养和照料孩子,保护家庭,减轻有工作的丈夫的负担;她们的权利是确定家庭的道德规则,塑造孩子的个性与行为,以及指导她丈夫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男人要进入公共场合,挣钱供养家庭。他们的权利是自由旅行,决定家庭的居住地,并且领导家庭的公共事务。妇女从商业化的重担中解放出来,男人从照料孩子和家务的负担中获得解放。

隔离场景的观念得到了工业化的支持,它在物理上将工作地点与家庭分开,因此使男性和女性领地的进一步分离成为可能。对物地点接差的差异造成了透视方法、观念以及理性方面的差异。因此,在受到电子媒介使用的刺激后的工业信息时代中,可能整合了许多男性和女性的场景。例如,除了性别歧视的内容,电视以几种方式攻击了男性和女性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它融合了传统上不同的性别信息系统,模糊了性别的公开与私下行为的分界线,破坏了物质隔离作为性别隔离决定因素的重要性。如果男性和女性角色的传统差异主要是由社会信息系统的区别以及妇女被隔离在家中所决定的,那么电视可能是性别行为融合的一个动力。

但是为了理解电子媒介对妇女意识的潜在影响,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男性和女性场景的隔离对于传统角色结构的延续有多么重要。既然许多女权主义者首先会怀疑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形成以及电视在其中的作用,我将在下面的讨论中对女权主义文献中的许多理念进行场景的再解释。西蒙尼·迪·波伏瓦、贝蒂·费里丹(Betty Friedan)、杰曼·格里尔、舒拉米史·费尔斯通和其他一些人

的著作是被用来定义早期运动的。我希望显示出,这些文献与许多女权主义学者的分析中都暗中涉及了“信息接触模式”这个变量,并且因此不经意地描述了媒介变化所引起的性别角色变化的原理。

女性气质和隔离场合的宗旨

妇女传统的形象是纤弱、胆小、富有感情、超凡脱俗,以及需要男人保护的,这与妇女同男性信息系统传统的隔离有很大关系。男人通过将妇女排除在世界之外的方法保护她们不受世界的侵害。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差异不但是通过场合的隔离而得到强化,而且也通过男人比女人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而得到加强。前者造成了所有群体差异的特征。传统上,男人能够去绝大多数妇女能到的地方,但女性就不能去大部分男人能去的地方。参与孩子出生的医生以及给女人举行临终仪式的牧师是男人,但是妇女却被排除在了许多男性所要通过的社会仪式以及有关的详细信息之外。妇女也被排除在许多纯男性的场景之外,如工作、战争和体育场所。然而男性常常可以随便接近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姐妹的厨房及家中。女性的私人空间常常有男人介入。

男人对各种社会场所的介入允许他们发展多重的社会自我,练习从一个场景中解脱出来,当他们在另一个场景中时,并可以获得自己角色所需的距离和看法。男人也可以将这种状况与其他男性共享。相比之下,女性在家庭场合中的隔离使她们很少了解关于社会和自己角色的状况,因此是一个更有局限性和模糊感觉的自我。

性别差异的这些场景分析得到了许多性别角色专业分析人士的支持。例如,人类学家米歇尔·津巴利斯特·罗萨尔杜(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认为,“家庭与公共的取向的对立……为任何社会中男性和女性角色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她认为,女性与公共场景的隔离使她们离开了公共决策,使得她们幕后的权利显得神秘、魔幻,且不合法。

信息隔离与“女性气质”的关系在许多流行的女权主义著作中也是不明确的。例如,在《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一书中,

杰曼·格里尔描述了女性对其传统隔离方式的无奈*。

她从外部现实撤回回来，并因自己游荡而受到的惩罚使之得到了强化。当小男孩形成群体或者团伙去探索或者威胁一个区域时，她隔离在家中，听有关恶意的陌生人的故事。她相对的监禁却被冠以保护的名义……她受到的教育是要害怕并且讨厌世界，但却从未被清楚地说明原因。

将男人和女人训练成不同的角色需要依赖社会化的隔离环境。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西蒙尼·迪·波伏瓦认为，当小男孩被扔进或者推进男人的世界，而女孩被留下来呆在家里时，行为的差异就开始了。当兄弟没有了某些权利的时候，女孩仍可以坐在父母的膝上，或者允许睡在父母的床上。

这正是小女孩首次作为有特权的人的开始，……。男孩有意地一点一点地被拒绝他们曾经习惯的吻和抚摸。而小女孩，她继续被哄着，被允许粘在母亲的裙子后边，父亲将仍会把她放在腿上抚摸她的头发。

迪·波伏瓦认为所有的孩子都害怕长大。但是“特权”给予了女孩仍然做孩子，使她在将来有性格缺陷。她注定要呆在家中，而男孩则被推拉出女性的世界。“莫拉斯(Maurras)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嫉妒母亲和祖母正在哄他的小弟弟。他的父亲拉住他的手将他带出房间，对他说：‘我们是男人，让我们离开这些女人’”。

因此，对于男孩来说无论离开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他很早就从女性的世界中分离出来。结果，他体验了一个不同的而且是更大的世界。正如夏洛特·佩尔金斯·吉尔曼所写的：“有一千种影响波及到了他，而从未波及到她。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塑造着个性。男孩很少有保护、监管和限制；他白天有更多的自由，并且天黑后他仍有任何行动的自由。”

外面的世界是男人的世界，与之相比，妇女却由于无知和恐惧而纤弱。这不是由于生理所造成的。而是由于隔离和神秘。吉尔曼认为女性的懦弱是一个很“明显的家庭产品”。

* 我在这节的剩余部分使用了现在时态是为了与女权主义作家的时态相匹配。但是我的论点是，她们所描述的隔离大部分是过去的事情。

从出生开始将男孩包在更多的布中,避开天空和太阳、风和雨,持续地用单调的小事不停地使他的神经精疲力尽,并且从来不用各种适当的运动来发展他的肌肉和技巧,他也会很虚弱。未开化地区的妇女们并不虚弱,女性农民亦不虚弱……而呆在家中的女性是虚弱的,就像呆在家中的男性一样。同时他也是无知的。当然不是现在,不一定只是对书籍无知,而是对整个生活的无知。

吉尔曼看到了物质的隔离导致了有限的理解能力。她将妇女的不幸状况看成类似于生活在小的岛屿并因此有着“狭窄观念”的经验。吉尔曼也不明确地提供了物质限制和信息隔离关系的例子。例如,她认为孩子在家中的隔离类似于穿着很紧的衣服,她还描述了妇女裹脚的束缚与面纱之间的关系,这些都限制了妇女的活动和交往。

当妇女因为生活中缺少有意义的事而烦恼时,对她们身体和精神“问题”的解决方式常常是多休息。例如,在19世纪,“休息疗法”在许多妇女中实施——包括夏洛特·佩尔金斯·吉尔曼。正如埃伦赖希(Ehrenreich)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Deirdre English)写道:

休息疗法依赖于我们现在熟悉的20世纪洗脑技术——完全隔离与感觉的剥夺。病人要在昏暗的房间里躺上大约6个星期,并不许读书。如果她的情况特别严重,她甚至不许起床小便。除了一名护士和医生外,她不能见任何人,也不能有任何拜访者。

由于女性总体上的被隔离和限制,她们保存了许多孩子的特征。她穿着有饰边、精制的服装。她被鼓励成为幻想的、胆怯的、情绪化和非理性的人。她的丈夫像她父亲一样照料她。男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家庭的主人”,是因为他自己掌管着外面的领地,而这些对妇女来说是未知的、危险的和禁止的。她依赖他去处理涉及外部世界的事情。作为一名成人小孩,她被称为有小的意义的名字,如“宝贝”,“孩子”,“我的女孩”,“我可爱的”,甚至与她同龄的男人也这样称呼她。她像受人喜爱的猫或狗那样受到保护和养育。当她抱怨自己的待遇时,为她“奉献”并且珍爱她的男人就感到被出卖了。她没有他怎么能够生活?!确实,在这个体制中,她没有他怎么能够生活?

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内容说明,妇女的“不同”是因为她们不被允许像男人一样去接触男性的公众领地。但是这种说法假定,男人的行为是“正常”的,女性的行为是“缺乏勇气的”。正如人类学家

南希·霍多罗夫(Nancy Chodorow)认为,男性和女性社会化的差异并不简单。由于男孩和女孩都是由母亲所养育的,但在他们社会化过程中却有着根本性的不对称。一位女孩被教导长大后要像妈妈,而妈妈又作为经常的例子和角色模式出现在家中。但是男孩被教导长大后像爸爸,而爸爸是一个远方的形象,在家以外远离家庭的地方度过大部分的时间。

由于对孩子养育方法的不均衡,男孩开始拒绝自己所有的“女性”特征,正如女孩拒绝她们潜在的“男性”特征一样。霍多罗夫分析认为,男孩倾向于用抽象的权利和义务来发展自己的男性特征,因为男性世界不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世界,但是女孩以具体的和情感的日常接触和联系的方式来发展女性特征。另外,要想成为一个男人,小男孩必须拒绝的超过他所必须接受的,因为他已经体验到的是他不能像怎样,而不是他会怎样。所以小男孩必须通过“等二次出生”才能够进入男性世界,并且拒绝他的母亲、家庭以及所有深切的情感和关系。霍多罗夫认为男孩需要脱离家庭以满足他的性别目标,这引发了他的自强不息和无牵无挂。但是女孩在去除男性特征的一生中倾向于强调人类的联系、感情和关系。因此,在经过传统的社会化过程中,两种性别都失去了人类思想、情感和行为中的一部分。

米歇尔·罗萨尔杜在评论霍多罗夫的理论时指出,女孩的易于完成的社会化既是“不利的又是特权的”。“它的不利是因为女孩可能在认同母亲时形成自我怀疑以及较低自我形象。母亲是弱者形象,受到大的文化的贬低。”“同时,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她们可能享受到轻松、爱和接受的感觉”。相比之下,男孩发现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很难得到,为了“成为男人”他们必须斗争、竞赛和抗争。

男性和女性的隔离使他们可以扮演互补的角色。他们也可以相互保持神秘。西格蒙德·弗罗德(Sigmund Freud)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洞察力的男人之一,他问道:“女人需要什么?”这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十几岁男孩很好理解的问题。在传统的性别隔离的世界中,男人和女人无法完全理解相互之间的经历。他们的会面是对未知的探索和冒险。正如格里尔指出,“性行为本身就是询问的形式,就像旧时用委婉的说法弄清楚‘肉体的知识’”。

神秘成了男女交往的核心。虽然求爱仪式是发展亲密关系的手段,也常常起到了保存或者增强异性之间神秘感的作用。

男性和女性相互之间的隔离支持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手法和策略的发展。男人谈论如何控制和引诱妇女；妇女探讨如何避免被引诱，如何嫁对男人，或者在男人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如何控制自己和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社会世界的这种区别造成了纯男性和纯女性世界观的形成；造成了对“异”性的迷恋。而且因为与男性世界完全不同，女性世界在公众观点、教育和历史中被隐藏了起来，所以特别是女性，仍然是一个谜。

西蒙尼·迪·波伏瓦认为在社会上传统女性角色的核心是做“另类”。一位女人，至少“真正”的女人，对男人来说是一个谜。而男人所熟悉的那些女人，按照她的定义，不是真正的女人。一位女人存在于她的不可思议和分离中。相反，迪·波伏瓦说，男人的世界对女性而言充满着敬畏和神秘。可以理解，当女性通过结婚认识一位男人之后，他就失去了他特殊的气息，“但是无论如何男人仍然是宇宙的真理，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伟人、主人、眼睛；是掠夺、快乐、冒险、解放；他还是卓越的化身，是每一个问题的答案。”

类似地，罗萨尔杜认为，“男人的旅行以及与其他男人自由组合的能力促使男性对自己的行为、情感和形象控制方法的形成。因为男人可以被分开，他们也会感到‘恐惧’；通过避免某种亲密和无中介关系的介入，他们能够形成一种整体的有价值的形象和外表。”相比之下，一名女性几乎无法控制与谁在一起，她不能获得带有隐私或者距离的权利，因此，她在自己的眼中或社会的眼中很少形成个人的价值。“当男人由于明确的成就而获得地位时，妇女之间的差异通常被看成是个人习性特征的结果，如气质、性格和外表。”并且罗萨尔杜承认，公共场景/家庭的分离事实上确实导致了男女思考方式和推理方式的真实差异。由于女性的工作是重复而亲密的工作，她们个人的兴趣和目标常常被忽略，所以她们形成的“观察、感觉和行为的方式似乎是‘直觉的’和不系统的——对他人非常敏感，这使她们得以生存”。另一方面，男人崇尚抽象的、“理性”的思维，将一两个变量隔离出来，并避开情感和亲密生活的复杂和模糊。

男人漫游公共领地的自由使他确定了文化的公共价值，并在完成如此确定的任务中取得成功。男人工作活动“超越”了生理状态，而女人却从事着生孩子、喂奶、做饭和打扫卫生的事情。谢里·厄雷内尔(Sherry Orener)指出，事物的这种区分就是许多文化相信“女

性对于男性就像自然对于文化”的原因。

家庭与公共场景的分离可以看成隐含着许多传统的女性气质观念,包括被动性、有限的能力、“非理性”、直觉思考、接近自然、神秘和较低自我评价。

男人和女人经历的差别创造了两性隔离的场景,因此相互都有某种不信任和嫉妒。正如罗萨尔杜等人指出,男人下意识地嫉妒女人丰富的情感生活以及她们在家庭中的安宁生活;女人嫉妒男人可以漫游、占领世界,自己决定负担和冒险的自由。不过男人的优势很明显。正如杰曼·格里尔写道,他有着与她 and 他们的家庭完全分离的友谊和社团世界。

她不能玩飞镖、喝啤酒,或者踢足球。她对这些活动的不信任不是她的男人会与其相伴的其他女人结为伴侣,而是她知道他喜爱这些活动和依赖它们的方式,胜过了对她的喜爱和依赖。

男人知道当他们觉得公共世界对他来说过于繁杂的时候,他总可以“回家”。事实上,女人表演的“台上”区域——家——却是男人演练和放松的“后台”区域之一。

每位女性必须有这样的认知,除了家庭和家人之外她一无所有。而她的房子是一个理想的小巢,她的疲惫的狩猎勇士能够退回巢来,发泄他最坏的情绪,进行最没有意义的交谈。当他舔着自己的伤口时,应该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衣服、卫生间和午餐,以备他们进行另一次出击。

然而由于许多女人只可能接触到她们男人的一个后台区域,所以男人的台上行为在其自己的女人眼中可能会失去其可信性。从女性所在的后台角度,女人可以发现男人一到台上就改变行为,这很有意思。例如,舒拉米史·费尔斯通指出,女人非常清楚地知道男人在台上会否认自己的个人需要,即使他们需要爱,也许这可以解释女人对男人一贯的特殊鄙视(“男人如此木讷”),因为她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男人在外面的世界中装模作样。

费尔斯通的评论暗示了男女场景的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女人在家中的隔离使她们几乎没有机会或必要去扮演许多各不相同的社会角色。女人不必或不能像男人那样“装模作样”。女人后台与台上的行为及场合之间的分界线不像男人的那样清楚。女人台上的场

地——家——也是她们的后台区域。只有当她们离开男人和孩子，单独一人时才会有真正的个人的后台。传统上，女人并没有将自己分隔进多重的个人与公共的场合。

就男人与女人角色扮相中偶有的不同，可以在杰曼·格里尔评价性别角色的字里行间中看出：

我们的文化中的男人通过设定一个不可能达到的一致性标准而使自己有了缺陷；而女人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愚弄自己。自从有了文明的曙光，女人就被冠之以狡诈和欺骗的字眼，所以她们就从来没有能够假装说她们的面具不是面具。

男人指责女人公开表露情感以及女人指责男人常常“拒人千里之外”和“冷淡”的行为，这些都可能与男人的和女人的公共角色与个人角色之间的分界线的清晰程度的传统差异有关。

虽然女人特别的后台角度使她们对男人的行为模式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女人与台上世界的隔离也使得她们软弱和胆怯。由于不同于其他“阶级”也不同于男性，女人与女人之间甚至也是隔离的，这样又使她们的软弱大大加强。因此，一位女性对自己经历的了解常常是个人的理解，很少能得到群体共同看法的肯定。迪·波伏瓦指出，女人没有历史、宗教以及共同的地点可以使她们结盟。“她们分散地生活在男人中间，通过居室、家务、经济条件，以及社会地位依附于某个男人——父亲或者丈夫，其紧密程度远远超过与其他女性的联系”。迪·波伏瓦认为，中产阶级女性倾向于更加认同中产阶级男性而不是较低阶层的女性，白人女性更加认同白人男性而不是黑人女性。

由于缺少与其他女性的频繁接触，女性常常将其他同性成员看成是竞争者而不是同志。另外，由于不接触其他女性，她就无法详细知道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生活。女人对男人而言可能是一个谜，正如男人对女人也是一个谜，但是女人对她们自己其实也是谜。格里尔观察到“女人的性器官充满了神秘”，与小男孩不同，小女孩不被允许研究自己的身体或者了解自己的性器官。“在没有看到一本18世纪解剖教科书中所详细描绘的解剖之前，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阴道器官是完全正常的。”

类似地，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描述了她和其他女

人麻醉生孩子的经验——或者缺乏经验。“我认为我们中没有人能真正把握这个经验。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一无所知，在生孩子方面（还有许多其他的方面）我们就像是 19 世纪的女人。”

正是由于缺少经验，结果女人被认为在某些话题上是无知的，太天真，有些话不能对她们说。她对“真实世界”的无知使得她的权利被置于男人之上的位置，但是无法处于一个公共层次上跟他们对话。^{*} 女人的纯洁可以使她试图维护其家庭的道德，但是这也给了男人以监视和控制所有女人与“现实”交往的权利。

作为男人的“后台队伍”中隔离的成员，女人被认为是忍耐的、被动的，并且接受她的丈夫和儿子有更多的知识和经历。正如阿德里安娜·里奇指出，如果女性拒绝这个角色并且与男人的意见相左，那么她就要冒着被贴上“敌意”，“重锤破碎机”，或者“阉割的母狗”这些标签的危险。“用女人的方式干净地说出的普通事实也常常被看成是指向男人生殖器的尖刀”。

夏洛特·佩尔金斯·吉尔曼谴责了这样的事实，“在同女人说话时男人必须选择采用一种不同的说话方式”。吉尔曼认为，如果女人的“女性气质”和女人的“魔力”、“愚蠢和无知”，却能让一个男人说“他爱，他羡慕，他崇敬”这样的女人，那么女人则是被“教导去崇拜无知的东西”。

男性和女性语言的这种区别是基于不同的世界观。女人受到保护，接触不到男人世界的阴暗面。费尔斯通认为，即使女人在理论上知道全部男人世界的话题和语言，在传统上女人与那个世界的隔离也没有给予她们谈论这类事情的“权利”。“男人可以谩骂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属于他，他就可以去骂——但是如果是出自女人口中相同的诅咒，或者出自年轻人的，即世界还未属于他的某位不完全的‘男人’，这就会被认为是胆大妄为的，因此是不适当的言语行动或者更糟。”

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此之大比例的女性为什么会突然要

• 19 世纪中叶，在女性黑奴制废除者要求反对奴隶制度的言论权之前，实际上“没有任何受尊敬的女性……曾在公共场合露面”。即使那时，公理会教堂 封牧师的信仍谴责了格里姆克(Grimke)姐妹的“非自然”行为；“女人恰当的职责和作用在《新约》中有明确的表述。那些责任和作用应该是谨慎的和私下的。”

求拥有和诅咒世界的权利呢？本书所提出的理论给出的答案是，电子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已经削去了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之间的分界线，破坏了支持传统的“女性气质”观念的隔离场所。

电视与女权主义意识的兴起

正如无数的女权主义作家曾经指出，在现有的女权主义运动之前，大多数的女性并没有将她们看成是一个“群体”。她们将自己看成是个体或是家庭的成员，每个女人都感到她是与“她的”男人站在一起的。每位女性都倾向于将自己的问题看成是独特的，是与其个人条件相关的。她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与她接触的男人谈判。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观察发现，工作的女性“受到鼓舞并且相信，所有的进步都是通过向上认同，通过使自己为能够遇到的最有权利的男人服务来获得的”。斯泰纳姆认为，女性没有想到与其他女性以及其他的“外部群体”联合起来以带来政治上的变化。相反，她们认为个人成功的机会是嫁给“正确”的男人，或者在男性为主商业世界中做装点门面的女性。

在许多方面，女性作为“少数人群体”的观念是一个奇怪的新观点。正如希拉·罗斯曼指出，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镇压”与镇压黑人之间几乎没有概念上或政治上的联系。类似地，珍妮特·佐林格·吉尔(Janet Zollinger Giele)拒绝了女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因为不同于其他阶级，女性与她们的“镇压者”生活在一起，因此会从男性高等的地位中受益。罗斯曼指出，“整个19世纪和大部分的20世纪中，将女性的幸福直接与她们的孩子、家庭和社会相联系，并且认为女性最大的利益与所有这些其他的利益一致，这是合情合理的”。

斯泰纳姆说，“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以及女性在等级制度中共同利益的显示”带来了女权主义。例如，斯泰纳姆谈到了她自己缓慢地认识到，作为记者的她所遇到的问题对其他女性来说也会有。她说，曾经有过做“古怪的传声筒”的经历，我认为这是个人性格，并且仅仅是我的”。她继续说，“成千上万的女性，听到准确地描述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和令人灰心丧气的专职人员的经历之后，她们得到了力量，并且开始走上了一条终身都在变化的道路”。类似地，贝蒂·费里丹

指出,在过去,当女性没有像她们应当去感受的那样去感受时,“我们都认为她是怪人”。

但是斯泰纳姆和费里丹等女权主义者在描述是什么使得女权主义以新的方式进入她们与男性和女性关系的概念时,并没有将其解释清楚。这一代的女性如何以及为什么将她们个人的问题看成是共同的问题?身体上散布于男性之间的女性怎样能够停止认同这个男性?这个男性每晚穿过门并且开始认同隔离在其他男性家中的其他女性。妇女之间有什么样的新联系突然允许她们将自己看成是一个“外部群体”?毕竟,即使是一个人被关押的感觉也要求从外部去观看。

在描述女权主义意识兴起的许多文字中有一个暗含的理论,女性突然能够“看到”超越她们个人问题并对其表示关注,亦能够获得外部的观点,对全体女性问题有共同理解,以及尽管有身体上的障碍却仍能具有与其他女性“联系”的意识。例如,芭芭拉·埃伦赖希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所持有的新观念。

就像她们那一代的男性一样,她们所看到的超越了郊区田园生活的平静,到达了周边的战区——城市贫民窟的起义,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战……不可避免地,她们将女性与黑人、女性与所有其他“被镇压的人民”进行对比。

类似地,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描述了“女性之间及内部界限的打破”,以及“精神绿地”的创造,这打破了女性没有自己领地的现实。伊莉莎白·詹韦(Elizabeth Janeway)认为“女性所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世界的突然扩大:我们头上的天升高了,阳光照了进来”。

虽然许多女权主义者用比喻的形式使用了“看”的新方式以及障碍被打破的观点,但是她们的描述却与20世纪60年代女性和其他人在电视上所看到的内容相符,并与无论物理位置如何,人们都能获得的新经历相符合。她们的描述非常类似于本书前面对电子场景变化的分析。

过去女性与男性隔离,并且女性之间相互隔离,她们没有“可以认定的外部标准”。“家中的女性……失去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意味着失去了事物如何运作以及如何评价一个人的真正标准的知

识”。作为两性共享的新闻和娱乐的场地,电视改变了女性的看法。电视使女性能接触到“外部标准”并且提供了“事情如何进行”的知识。电视这个共享场景也推动了其中所展示的男性和女性的公开比较,按照电视所提供的男性标准,女性软弱、孤立,并且相对无用。如果一位男性处于大多数电视中的女性人物的位置,他可能会被认为是“失败者”。

在《女性气质的神秘性》(The Feminine Mystique)中,费里丹描述了一些奇怪的感觉,这是女性在她门被告知应当怎样去感受和行动,与她们感到生活中失去了某种东西这种新感觉发生冲突时产生的。费里丹描写了妇女被隔离在家中,享受妻子和母亲角色的理想状况与许多女性被束缚并不幸福的实际感觉之间的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分离”。“分离”观点中暗含着妇女被排除在一个宽广世界之外的新观点。

费里丹说女性应当是幸福的生物,她“在给厨房地板打蜡时就会有快感”,但是女性并不快乐——也许是因为当女性杂志或书籍给她们上述这种“教导”时,其他的信息正在用其他的可能诱惑着她们。

费里丹写道,1960年,女性杂志如《麦考尔斯》(McCall's),将女性描述为“年轻的和爱享乐的”,几乎像个孩子;毛绒绒的,且有女人气质、被动的;而活动于卧室和厨房、性、婴儿及家的世界里都是快乐的。但是就在同一年,“没有自己名字的问题像开了锅似地在快乐的美国家庭主妇中爆发了”。这“问题”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爆发?费里丹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是她对女性60年代“恰当”角色与世界范围对事件描述的不一致性说明了电视可能起到的作用。

费里丹写道,女性不庄重的杂志形象出现的同一年,“卡斯特罗领导了古巴革命,人类接受训练进入了外太空旅行;这一年非洲大陆出现新的国家,一架超音速的飞机打断了一次峰会。”。她列出的单子很长。而对于所有这些事件,女性被告知与己无关,她对此感到非常强烈的愤怒。

有趣的是,费里丹列举的事件为当年电视头条新闻做出了小结。电视与《麦考尔斯》杂志以及报纸的女性专版不同,它为男性和女性带来了相同的信息和“外部世界”。到1960年,电视已渗透到几乎90%的美国家庭。此时女性的角色形象和她们的信息世界突然出现分裂。妇女杂志上提供给传统妇女的“特别场景”与电视提供的更宽

广的世界事件的景色之间产生了明显的不一致。

电视暴露给女性许多“男性话题”，而在印刷媒介中她们可能不会选来阅读，因为电视的信息是采用一种“表演”的形式，它的内容——尽管是“抽象”的“主题”——可以无需任何特别的预培训或知识就能为绝大多数女性所接受。另外，男性和女性常常一起看电视，这样男性和女性都不可能再假装女性对某个世界事件一无所知。看了很长时间电视新闻的女性在听到一位男性对她说“你对这样的事情一无所知”时，她会非常气愤。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在信息上解放了妇女，种下了不满的种子。而这些种子会以其他反叛的形式开花结果。

由于被分隔在家中，对于女性，“我们”过去的观念是以存在于她的物质环境中的人来确定的：丈夫、孩子和邻居。其他的男性和女性是“他们”。由于电视使女性直接接触了更大的社会环境（她们知道自己与无数的其他女性共享这种接触），她们旧的归属观念变得模糊，并与其他一些人的身份发生了重叠，这些人也同样被排除在外且不能完全参与可以看得到的大环境。

正如第3章所讨论的，“平等”的观念常常是由场景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期望与处在“我们环境”中的人平等，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人拥有相同的权利。例如，如果我们正在一家餐馆就餐，我们接受了与屋里所有的人相同的服务和食物，我们一般就会感到满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大的玻璃窗户，看到另一个房里用餐比我们更优雅，如果我们被告知，我们由于生理方面的特征而不能在那间房子里接受服务，我们则会狂怒。类似地，电视提供了有着男性话题、男性冒险和男性机会的男性世界的画面，而女性却被禁止入内，这可能与女性新发现自己是“少数人群体”——被隔离在世界之外，只能看不能进入的群体——有很大的关系。电视对公共男性领地的不断暴露鼓励了女性要求在所有的公共场合进行性别融合。

性别歧视内容/解放结构

在过去15年中，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的电视娱乐和广告片中男性和女性有偏见形象的数据。研究显示电视节目中的男性角色远远

超过了女性角色。在一些节目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高达5:1。在许多流行的冒险系列片中,几乎根本没有重要的女性角色。男性的角色常常是格外刺激和有趣;他们扮演了几乎所有的专业人士、英雄和罪犯。相比之下,女性角色则倾向于依赖男人,智力和能力要比男人差,非常感情化。女性也被演得格外被动,在追求自己目标时很少成功。电视内容的性别偏见在成人娱乐片、儿童节目甚至新闻和纪录片中也非常明显。近几年虽有一些改善,但是变化仍然很小,一些观察者认为,对女性的展示虽然看起来略有好转但实际上更糟了。

研究人员也得出结论,电视中男性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能够影响儿童对恰当性别角色的理解。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看到女性扮演传统男性角色的儿童比那些仅看到男性演这些角色的孩子更可能宣称,这些角色对女性是“恰当的”。因此,这样的研究似乎说明,典型性别歧视的电视内容不仅反映了当前文化中的性别偏见,而且通过向下一代的灌输而维持了这些偏见。这些数据曾被用来起诉电视。这些研究的结论被表述为电视性别歧视影响的“坚实科学证据”,但是从这些收集的数据中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基于许多没有验证的假设。这些研究的绝大多数仅仅是“内容分析”,只是计算了电视上男性类型和女性类型角色的数量。在这些研究中,内容对行为的影响并没有被验证。许多研究人员似乎认为,性别歧视的内容会强化看电视人的性别歧视行为,这是合乎逻辑的。

某些不寻常的实验研究本是为了寻找其对行为的影响,但是由于许多道德的和现实的原因,大多数仅研究了行为对电视内容的即刻反应,如孩子们对什么样的行为对某个性别是“恰当的”所做出的口头上的反应,或者儿童对“按性别分类”玩具的选择。这些研究的结果随后就被推广到了电视对性别行为的大范围和长期的影响。

不幸的是,电视对性别角色社会化影响的分析常常没有深入下去。很少有人研究时考虑到性别歧视内容非模仿的其他影响;几乎没有研究探讨当这些性别歧视的形象在电视上公开展示给两性后,长期而潜在的影响。实际上,许多观察电视中性别歧视内容的人们,对于电视给年轻姑娘赋予“二等公民”的力量表达了恐惧,这是极有讽刺意味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问为什么当这种强有力的媒体的性别歧视在全美国传播的时期,创纪录人数的女性进入劳动大军,并要求平等的权利和角色。

虽然在电视上看到任何社会群体——无论是妇女、犹太人、黑人、希伯来人，还是美国印第安人，受到偏见都肯定是一种冒犯（并且使人厌烦），但是根本没人弄清楚，在电视上展示不同群体显然“恰当”的行为会导致那些受到偏见的人长期模仿这些行为。

当然，了解其他人如何看待恰当的角色是对行为研究的有力贡献。“有中介的一般化的它人”进入到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就能知道自己行为的哪些方面会被看成是正常的或不合常规的。但是电视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可能比单一的内容模仿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冒险中的英雄，所以我们会认同电视上看到的任何冒险英雄。从长远看，观众可能认同电视上成功的和受到奖励的角色，而并不简单地是那些与他们有类似标签的人。观看传统牛仔电影的印第安儿童可能被打动。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像牛仔那样去思考和行动，而不像印第安人——即使他们知道印第安人“不应”有那样的行为。类似地，电视上有偏见的性别角色可能会导致女性开始模仿现实生活中男性风格的行为，即使她们也可能知道像男人那样的行为对女人来说是“不恰当的”。

任何社会群体中决定长期社会化模式的关键变量，可能是那个群体中儿童对经历、冒险、奖励，以及其他群体成员的惩罚的接触程度。为了考虑电视对性别影响的其他观点，我们需要超越讯息内容和短期模仿的影响，去研究电视重组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传统“场景的地点”。

正如南希·霍多罗夫对性别社会化的分析时指出，并不仅仅是性别角色内容的“教导”引起了典型的男性和女性特征的差异。男孩和女孩都由女性养育，传统体制中固有的结构不对称，也有着极大的影响。男性世界的不可见性影响了男性和女性气质的分配。女孩只有母亲这个榜样去学习，男孩则被告知要去模仿他很少能看得到的父亲。如果霍多罗夫是正确的，当电视将理想化的男性世界带进家庭中时，会以两种方式冲击传统的体制：赋予女孩另一个直接的角色榜样，而对男孩则减少了男性世界的抽象性。这样的暴露也许从结构上中和了一些旧的不平衡。例如，研究显示，儿童观众比较喜欢，并愿意更多地参与、关注自己性别角色的节目和画面，但是这些研究也显示所观看的节目和画面的三分之一是关注异性。与大多数女孩的书如《小妇人》(Little Women)和《海迪》(Heidi)不同的是，当中心角色是女性时，电视就给女性提供许多男性榜样以竞争。

实际上电视的内容可能同时在两个相反的方面发挥作用。在短期内,这些内容为儿童提供更多的性别歧视行为的榜样,可能会强化旧的偏见。但是从长期来看,男孩和女孩都接触暴露的男性和女性角色榜样,这可能会削弱传统中社会化模式的区别。

真实生活交往中模仿行为的研究,为这个论点提供了一些支持。它们指出男孩和女孩都在模仿象征着权利的和成功的榜样行为无论榜样的性别是什么。由于电视一般对男性的奖励超过对女性的奖励,这样很可能女孩会开始模仿她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受到奖励的男性行为。

其他对“榜样”行为的研究发现,男性榜样和女孩行为之间有着稍微复杂的关系,但是它们也同样支持下面的看法,即电视所展示的文化态度是女孩应当像女孩那样行为,但它也可能教给女孩男性和女性的行为。例如,对电影进攻行为模仿的研究显示,男孩对进攻行为的模仿远远多于女孩,也就是说,除非是女孩因模仿这些进攻行为而得到奖励。当女孩清楚地知道,她们“像男孩那样行动”会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时,模仿才会在两性中大体相等。这个发现说明,电视教给女孩了男性的交往风格,一旦她们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恰当的,她们可能在以后就会模仿*。

由于面向年轻女孩的书和面向年轻男孩的书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和理念,过去男孩和女孩不同的社会化模式就会因为他们所阅读内容的差异,以及由于缺乏对异性所阅读内容的直接知识而得到强化。因为到目前为止,有关电视节目的大部分决策都是由男性做出的,所以电视内容倾向于男性文学、想像和神化。然而这种男性的内容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影响,因为无论男孩女孩都接受着这样的信息。无论其具体的内容如何,共享的信息越多,就越是难以维持行为和世界观的传统区别。

借助剧院和戏剧艺术的比喻,能帮助解释为什么相同的性别角色教导会由于传递方式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遵循方式。想像一下两

* 贝蒂·弗里丹的《女性气质的神秘性》(The Feminine Mystique)有时被看成是现代妇女运动的一个“起因”,在某种程度上(卡尔·德格勒将其称之为“社会炸药”),它可能是与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对她的著作以及其他女权主义作家作品的近乎爆炸式的反应,可能是对其所表达的讯息的反应。实际上这个讯息是女性模仿男性角色榜样,是合理的。而这些榜样是女性过去在电视上看到的,但她们被告知那是禁忌。

个很小的儿童——譬如说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坐在舞台中间的表演区。由于他们处在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中，他们都很小很害怕。他们都在时断时续地哭泣。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父母来到舞台上，将他们分开，并分别带到后台的两侧，教他们恰当的台上性别行为。

父亲告诉男孩，他必须做一个男人，强壮、大胆，并保护他弱小的妹妹。在另一侧，母亲教导女儿说，作为女人，她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依赖她哥哥以得到安慰和支持。演练过他们的角色后，他们都回到舞台上。

非常可能的是，哥哥和妹妹在很大程度上会遵守所给予的明确的教导。男孩发现，是的，他比自己感情丰富的妹妹强壮，因为她仍在哭并且似乎需要和欣赏他的男子汉气概。女孩发现，是的，女性是弱者，因为她感到害怕，而她的哥哥没有显示恐惧也没有哭，并且还安慰她。如果没有听到对异性的教导，也没有看到掌握这些教导潜在的困难和所需的演练，男孩和女孩都会将对方的行为看成是“真实的”。

进一步讲，如果在后台区域，父亲向男孩演示如何打开和关上暖气器和灯，以及在什么地方如何挣钱，而母亲向女孩演示怎样打扫房间和做饭，每个性别将会更加敬畏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奇妙差异。每个性别与异性后台区域离得越远，就越对异性隐藏更多的疑惑、焦虑、演练以及对一个性别角色的暂时拒绝，对方就似乎更神秘而不可测，且“不同寻常”。

在大的轮廓上，这一景象类似于电子媒介存在之前的性别社会化结构。每个性别都秘密地接受性别角色教导。当然也会有一些交叉，特别是在有异性兄弟姐妹的孩子中（实际上，这可能是为何有异性兄弟姐妹的孩子比只有同性伙伴的孩子在心理上更兼有两性特征的原因）。但是通常也有来自长者、同龄人和书本的大范围的私下教导。每种性别的人都是在自己成员之中计划着如何在异性面前做出行为。有时每个人可能对自己表演的有效性心存疑虑，但是异性成员的行为看起来却是“真的”。

但是如果舞台的脚本稍微改动之后会是怎样呢？如果父母来到台上，在两个孩子都在场的情况下给出每种性别类型的教导，结果会是怎样呢？如果异性观察对方的问题或者抗议这些指导又会怎样呢？当异性目睹了演练再看到表演之后，对性别角色自然性的看法会是怎样呢？毫无疑问，儿童在一段时间里可能继续遵从父母的“命

令”。他们也会意识到“事情应当是”这样，但是由于孩子们现在看到和听到的是相同的信息，由于他们都相互暴露了后台的训练和教导（例如女孩可能会看到男孩试图战胜眼泪），他们会非常可能，至少从长远上看，将对方的角色看成仅仅是一种角色，是一种覆盖在本是相同的人之上，并使此人看起来不同的东西。

另外，听到针对异性的指教后，现在各性别都对异性的“秘密”信息有所了解。因此每个小孩都有新的选择，他们可以采取异性角色的某些特征。最后，由于孩子们都公开地共享相同的信息，他们甚至可以在一块明确地讨论这些指导。例如，男孩可能说，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并不强壮；而女孩可能说，为什么我不能开灯或者外出挣钱，我也知道如何去做呀。从前仅在同性成员之间表达的疑问和愿望，现在可能会在异性成员面前表达出来。从长远上，共享“性别歧视”的教导可以潜在地危害这两种性别的行为，并且产生更加平等的角色。

电视同样也减少了“异性”的神秘。在相同的信息环境中包括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使得两种性别的行为公开地让公众进行详察和分析。由于电视结束了文化中“女性场合”的女性信息的隔离，那么它的最大影响是女性对自己角色的认识。例如，20世纪60年代，当费里丹描述女性所感觉到的“精神分裂”时，她可能正在描述前面所说的舞台比喻中女孩所面对的情景，她的母亲正告诉她应有的有限的角色，但她也偷听到父亲告诉她哥哥的更大的角色，还有他的冒险和特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传统角色区别的电视内容越“直接”，越具“训导”意义，在日常交往中对这些相同角色结构的危害可能就越大。因为它是公开为人所体验的，所以极具性别歧视的电视内容可能正在种下毁灭自己的种子。

在过去，人们主要是暴露在异性的台上行为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台上角色被看成是现实。但是许多流行的电视节目，从“我爱罗西”(I love Lucy)到“达拉斯”，为人们提供了每种性别角色的“侧台”景色。而许多电视商业广告也是如此。它们显示了男性在后台区域带着疑惑和恐惧，一旦进入前台就成了无所畏惧的男子汉。它们也显示了女性在自己人中间谋划着如何去吸引和控制男人，以及增强神秘女性气质的氛围。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性别现在不仅能偷听到异性的后台区域，并且在这样做时也知道对方同样也知道自己。电视对丈夫—妻子交

往以及求爱传统礼仪的描绘可能告诉人们这些就是所期待的文化规则,但是传统角色新形式的暴露使其显得有些荒谬。所以电视对社会化的环境以及异性暴露的重组,可能比它所传递的具体内容更加重要。电视这个共享的论坛支持了男性和女性从旧角色中解放出来,即使当它的讯息是传统的或反动的也一样。目前兼有两性风格行为的这种潮流可以看成是向“中区”性别角色的靠拢,它混合了两种性别传统的前区与后区行为的某些方面。

有文化与家长制的强化

如果电子媒介对男性和女性角色有巨大的影响,那么西欧印刷的发明和文化的传播应当对男女关系有着同样深远的影响。正如伊丽莎白·艾森斯坦曾经详细描述的那样,印刷媒介和文化的传播拆除了传统的传播网络,并将我们带入一个改革和科学的时代。但是由于传统上的科学发现、宗教改革,以及历史是由男性领导和记录的,因此并没有全面地研究文化的传播对于男性和女性相对地位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各种资料显示的许多结果是,16世纪和17世纪文化的传播,可能加大了男性和女性之间权利的差距,并且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

安妮·奥克利(Anne Oakley)将1540—1640年这段时间描述为对妇女权利有争议的第一个主要时期。但是,女性的斗争不是为了获得新的权利,而仅仅是维持她们已有的权利。按照奥克利的说法,在中世纪,男性和女性共同分享许多权利和责任;而到16世纪时,妇女的地位开始衰落。

当强烈质疑女性权利减少的全部含义时,历史学家德维·洪特(David Hunt)将法国的事实总结如下:

她们失去了参与管理事务、坐进某些法庭或者在那里做证,替代失踪或者发疯的丈夫,以及继承死去的丈夫的特权的权利。女性被迫与配偶生活在一起……被迫屈从于他们的统治,即使涉及体罚也一样。到16世纪时,女性的话(例如在一份合同中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除非她的丈夫或者法官连署。她是这个“家庭君主制”家庭中没有能力的、低等的臣民。

类似地,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指出,尽管有英格兰女王的“荒诞统治”,16世纪女性的地位和权利仍在走下坡路。“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非常明确,妻子对丈夫的服从是一个原本应该平等的社会中的权利主义特征。一些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唤醒了柏拉图的疑问,女性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理性的动物;而其他的人则怀疑她是否有灵魂”。

斯通也描述了16世纪和17世纪国家和社区生活中突然发生的变化。有君主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在一个低水平上类似于将核心家庭从扩展的家族和邻居社区中分离出来。斯通说,这个时间以前1000年中,家庭的结构是一个“开放的血缘家庭”,是以“外部影响的渗透性,以及其成员对祖先和活着的亲人忠诚的感觉”为特征。将“他们”和“我们”区分开的边界是围绕着社区和家族的,而不是围绕着核心家庭。丈夫和妻子以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比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实际上,按照我们的标准,婚姻生活是相当的冷淡和有距离的。家“既不是城堡也不是子宫”。它缺乏有力的边界,它的居民很少有隐私或个人主义的感觉。提出建议、解决问题,以及解决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争端是社区的事情。

但是大约在1530年,另一种家庭类型——斯通称之为“受限制的家长式核心家庭”——在某些阶层中开始与旧式家庭重叠。斯通的观察认为,这种家庭的标志是更多的边界意识,更大的隐私感觉,以及家庭中男性头领对妻子和孩子更多的权利控制。家长式核心家庭的成长类似于在全国层次上,像国家的“父亲”那样实行统治的中央君主的成长。

斯通指出,“……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妻子的地位和权利降低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是他所描述的“边界”、新的个人主义观念、民族,以及与家庭变化相伴的等级制度,与麦克卢汉等其他媒介理论家对于从口语向文字转变的看法有着惊人的相似。另外,文字在男女权利平衡的变化中可能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斯通对于文字对妇女影响的评论支持了上面的这种解释。例如,斯通说,印刷媒介的发明以及强调阅读是智慧的源泉和宗教的救恩,“不可避免地具有将能阅读的人与不能阅读的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及文化距离增大的影响。”他接着说,虽然有些高贵的女性能够阅读,但是“新的学习为男性所垄断,并因此而增加了他们的声誉和影响,却减少了女性的声誉和影

响”。他评论说,其他方面还有,《圣经》的阅读是改革后超度的渠道,女性被置于“一种新的严重的不利地位”。

从16世纪到前不久,对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有着巨大的差距。戴维·克雷西(David Cressy)在英国进行的文化研究发现,到17世纪时,许多男人至少有最低程度的读写能力(根据职业和地点的变化比例介于33%~100%之间),但是“17世纪在英国将近90%的女性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克雷西又补充说,“各种资料显示,在所有地方的任何时期,女性的读写能力都远远落后于男性”。他指出,做家务使得女性学习读写成为不必要;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她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即使当有文化被看成是通向解放的道路时,丈夫——作为家庭的领导——被假定应当承担这个责任。

16世纪和17世纪妇女权利的削弱,首先产生的是严厉的家长惩罚制度,但是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婚姻关系开始变得更有情感和更被在意。女性虽然仍受到家长政治式的待遇,但是她们开始作为天真的动物受到珍爱,而不是当成家庭奴隶受到嘲讽。但无论如何,从16世纪到20世纪早期这段时期是处于中世纪和我们自己将男性和女性场合强制隔离的时段。

尽管这种关联需要更多的探索,但是很可能是男性和女性之间读写能力的差距不断增大,使得女性更像孩子,无法与男性相比。男性和女性读写能力的不平衡,肯定是来自已经存在的不平衡,因为如果有同样的机会,女性肯定会像男性一样有文化。但是已是大权在握的男性显然可以将有文化作为一种工具,进一步分开男性和女性的世界,并且强化着家长制的体制,正如南方的农场主不仅用铁链而且用无知来束缚他们的奴隶,16世纪以来,许多男性也同样限制他们的女人接触历史、文学、哲学和科学等大量的男性领地。例如,瓦尔特·翁曾指出,当拉丁语不再是“母语”之后,继续教给男性拉丁语就成为一种完全排除女性的男性“青春期仪式”。读写传播使得男性有“更深的”后台区域来演练“更前”的舞台上的表演。但是女性却在一个混合行为风格的世界中落后了。^{*}另外,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

* 当然,许多“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的”女性学会了“像男性一样思考”和“像男性一样行动”。实际上,她们许多人开始拒绝妇女“隔离场景”的整个观念。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并不是所有受教育的女性都会反叛,但几乎每位反叛者都受过教育”。

读写可能也创造了一个有高度依赖性的阶层——儿童的新意识。当社会考虑也许应当有更多的责任照顾和塑造这些“新”儿童时，女性——本身被看成部分是孩子，部分是成人——似乎是合理的选择。

20世纪中期之前一直存在着男性和女性之间受教育的差距。某些人可能还会说这种差异现在仍然存在。1830年以前，没有一所美国大学接收女生。在英国，剑桥大学在1920年以前为男性和女性授予不同的学位。直到1978年——进入现代女权主义运动之后——进入美国大学的女性才超过男性。

即使在较低的水平上，妇女的教育也与男性不同。通常，教育女性的理由不是让她们与男性平等，而仅仅是使她们的教育水平达到她们丈夫所能忍受的伴侣以及她们孩子合格的母亲这样一种必要的程度。当第一所妇女大学瓦萨(Vassar)1865年开办时，一群医生严厉地警告了管理者试图把她们看成男性一样进行教育所具有的危险。因为女性的身体通常被看成是子宫和大脑的战场，一位医生曾得出结论，教育女性会导致子宫的萎缩。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将男性和女性教育上的差距看成是我们社会里“内部殖民化”过程的一部分。她认为，差距还没有消失。“她们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个重大因素，是家长制施加在妇女身上的非常系统化的无知”。米利特认为，即使是现在，男女教育之间仍存在着轻微的，但是很明显的差异。科学、数学和技术仍然是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女性占据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名声较低的领域(实际上，甚至“硬科学”和“软科学”这种的分类也是回应“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类别的标签)。男性领域被文化赋予了更高的价值；政府和公司的捐赠也大多数进入了以男性为主的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妇女仅仅是部分地社会化，进入读写文化领域。她们学习读写的基本技巧，但是“读写思想”的扩展——科学和技术——仍然是男性的领地。米利特指出，“为了与妇女在家长制中一直受到限制的低等的文化场合保持一致，目前通过人文的学习对她们‘艺术’兴趣的鼓励，实际上就是她们过去为在婚姻市场中所做的培育准备‘成就’的扩展”。

因为妇女在读写中所诱导出的文化、科学和哲学中进展较少，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这种可能性：西方文化中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的一些传统区别类似于口语社会和文字社会成员身上所观察到的某些区

别。我们已经看到,在基本隔离的社会场合中对于不同的性别角色有着其他的足够的解释,但是读写能力可能引起的传统“男性气质”的思考方式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区别。

J. C. 卡罗瑟斯(J. C. Carsther)在他的文章“文化、精神和文字”(Culture, Psychiatry, and the Written Word)中说,“发展得非常好的时空关系与机械论线性的偶然关系”的高度依赖“相对于听觉的视觉与综合”的读写习惯。他认为,口语文化存活在万物有灵的神秘世界中,但当部落文化中开始出现文字,并且强调线性、连续和理性时它就消失了。他认为书写引出了更多的内省,更大的个人主义感觉,以及与邻居和族人之间更大的距离。因此,所描述的口语人和文字人之间的许多不同——非理性/理性;神秘/开放;有感情的/冷漠的;具体的/抽象的;与物理环境相关/脱离当前环境——与女性和男性特质的传统差异极为相似。女性就像是口语文化中的成员,她们以缺乏个人化的感觉、“非理性”,以及她们在当前物理环境中与其他人和其他事物的有力联系而著称。相比之下,男性像文字人,他们以高度个人化和距离感,抽象、理性、数学的和机械论的思考方式为特征。非常明显,女性常常被认为在语言能力上非常优秀,而男性则适合空间作业。这个联系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分析,但是这不禁使人想到这样的可能性,通过限制读写形成的女性“内部殖民化”,可能曾使每一位“文明”的男性“从厨房中解放出来”。

文字思考强调线性论证,因果关系,抽象和分类。在高度文字化的社会中,这是惟一恰当的思考方式。文字前社会以及女性直觉的、整体的和“非系统的”思考曾被取笑为“非理性”的。但是电子媒介的使用,使非线性传播形式再次重要起来,可能模糊了男性和女性传统思考方式中带有偏见的区别,并且带来了对于非“理性”思考的新兴趣。女性在传统上被指责太关注个人的感受,她们的判断总是个人的和情绪化的。正如伊莉莎白·詹韦曾经写道,女性“被认为将一般的评论个人化,因候选人英俊而投此人的票,轻易地改变主意,且看电影时会哭”。但是,通过电视将个人和政治场景的融合,使得这些特征在整体人口中更加典型。正如第6章中所写的,电视表演、表象和比喻的偏向,倾向于使政治对每个人都是个人化的,许多人现在投票给他的“个人喜欢”的候选人,而不是在某些问题上与他们立场一致的人。类似地,在20世纪60年代,男性和女性中间开始重新强烈关注

好的和坏的“气氛”。这种兴趣继续表现在当时对解决问题和管理的“β”风格的着迷。有趣的是,电视是男性例行公事地戴上面具,主要按照举止和外表而不是按照他们的“成就”进行判断的惟一的公共场所。表象媒介形式的广泛使用也许正在支持人们对传统上由女性所把持的表达技巧兴趣的再生。

当一所房子不是家(也不是工作环境)时

这是家的真正性质 它是平和安静的地方……只要还不是这样,它就不是家;只要外部生活的焦虑渗透其中,只要丈夫或者妻子允许外部世界思想不一致的、未知的、无爱的或者是敌意的社会进入门槛,它就不再是家;它仅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而你在里面住和生活而已。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65

电视重塑男性和女性传统关系 由读写的差别和工业化所支持的能力,可以从“家”作为与“外面世界敌意的社会”分隔开的领地这一浪漫的观念中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将这个世带入家中并且改变了公共环境和家庭环境。

有了电视之后,家中四壁不再将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公开场景与私下场景分开。通过电视女性突然被“拉了进来”。在电视上个人表情及其他人行为的特写镜头开始公开,而公众问题和政治问题开始成为家中的个人经历。电视可能是联系“个人问题政治化”和“政治问题个人化”的共同基础,它们都以妇女运动为特征。

即使许多女性身体仍然被隔离在家中,电视已允许她们“观察”和“体验”更大的世界,包括纯男性的交往和行为。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第一次共享了大量有关自己和“他人”的信息。电视使得异性私下形象公开并更有说服力。通过电视的特写镜头,男性和女性在一个月内所看到的“亲密距离”内异性的数量超过了早期各代人一生所看到的数量。另外,在面对面交往中凝视可能意味着想进一步密切关系,与此不同的是,电视中的形象允许你盯着看并且仔细检查异性的脸、身体和运动。电视形成了一种轻松的不必介入的亲密。

电视对性别取向的影响既不是即刻的也不是全部的。最大的影响是对于“第一代电视人”——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刚刚开始性别社会化过程的儿童,因此它的影响直到60年代末才显现出来。

另外,电视对场景结构解放所支持的新意识不得不与其他传统的社会化教导和经历的来源竞争,包括电视明确的性别歧视内容。

如果电视融合男性和女性社会观点是真的,那么早期的媒介如大众报纸、电话、电影和收音机肯定也曾有过显著的影响。但是电视是男性和女性场合最有能力的融合器。与电影不同,电视将世界带给女性,而女性不必离开家。虽然报纸和收音机也开始将男人的世界带入家中,虽然电话将家的一部分带入世界,但是严格地说这个世界仍然“没有暴露给”女性。

一些学者提出,战争、体育和政治意味着男性同志关系和联系的地点,是由排除女性所确定的。但是电视将传统男性的领地暴露给了女性,而且完成得非常偶然,不用鼓吹,女性没有被迫去阅读这些话题的文章和书,也没有离开家去看某个特定的事件或电影,甚至不用停止做传统的家庭事物。与抽象的词不同,如书上或收音机上所说的“像运动员一样”或者“勇敢”,电视给出了一个实际的、明确的和去除神秘的男性世界形象。实际上,电视甚至可能强化了早期媒介的解放潜能。一旦电视在通往外部世界的门上开了一条缝,其他媒介就习惯于将它开得更大。一旦电视上展示了收音机上听到的或电话所接触的人物和地点的形象,这些媒介就会被女性用来创造一个信息领地,或者“精神草坪”,同其他女性分享。由女性为她们自己所写的书和文章就成了讨论和研究世界新扩展的意识以及女性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场地”。

因为电视通过将外部世界带入家中,打破了公共环境与家庭的区分,它首要的和最强烈的影响是女性对公众男性世界的观念以及她们所处的地点或缺少地点的观念。电视在团结女性方面极具潜力,因为电视通过女性传统的对个人表情、情绪和感觉的特别关注将公共领地带给了女性。但是由于电视使得男性和女性越来越难扮演旧时的互补角色。从长远来看,电视这个共享的环境对两种性别的行为风格都有影响。

米歇尔·拉萨尔杜和路易斯·拉菲尔(Louise Lamphere)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所有已知社会中典型的劳动分工都是因女性能生孩子和分泌乳汁的结果。由于涉及的许多其他任务可能无法与怀孕和哺育相比,因此许多重要的活动全部由男性承担。社会越复杂,家庭与公共世界的差别越大,女性就越多地负责所有的家庭事物,即使那些

超越生理必需的地方。例如,照料孩子并不像生孩子那样是由生理决定的,但是如果女性已经远离了公共领地,她们可能要负责所有这些事情,而出门在外工作的男人则不大可能做这些事。相反,女性对所有家务无关的任务都不负有任何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媒介对家的入侵不仅使女性从家庭信息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而且倾向于将公共和家庭场景重新整合并且形成一个“兼有两性的场景”。现在男性可以在家中的计算机上“猎取”信息,女性在电话中做生意的同时可以给孩子喂奶。即使当男性和女性仍然在身体上隔离在地点不同的工作和家庭场景中时,电子媒介也创造了信息和经验更大的统一感觉。

过去社会依赖物质地点作为接触或隔离其他人的首要决定因素,受到了电子媒介的破坏。电子媒介弱化了男性场景和女性场景的观念,特殊小屋或建筑物观念,以及或神圣或世俗的地点的观念。电子媒介改变工作和家的新潜力,可能最终会去除家庭和公共领地分开的必要性,将男性和女性整合进工作和家庭单一的社会场景中。随着地点或场景联系的结束,男性和女性可能在身体上分开,但在社会上却是一体的,或者是共同隔离在家中,但是与其他社会场景相联系。有了电话、收音机、电视和计算机,家在许多方面成了大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仅仅是在其中“居住和生火”。

十二

成年和童年的模糊 ——角色转换的个案研究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心理学家使我们更多地知道了当儿童长大成人时所经历的心理、认知和语言的阶段。他们曾致力于描绘人类生长和发育的过程,阿诺尔德·格塞尔(Arnold Gesell),让·皮亚热(Jean Piaget),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和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只是其中的几位。这些研究的许多方面都证实,儿童和成人以及各种年龄儿童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程度的问题,而且是明显不同的现实能力和对现实的看法。

但是这些研究通常都忽略了“童年”时期社会显示出的最新演化。社会规范和研究结果的公布与流行一起变化是很平常的。但是

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变化的方向与研究推动的方向相反。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待儿童要与对待成人完全不同,然而目前的趋势却是更像对待“小大人”那样对待孩子,并且使不同年龄的人比过去共享更多相似的角色、权利和责任。

我们可能会将当前的潮流称为“童年的终结”。但这仅说明了故事的一半。因为没有清晰的童年观念,就不会有明确的成年观念。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正在发生着童年与成年的整体同化,或者融合。本章简要地总结了儿童和成人社会角色的最新变化,然后探讨了这些变化可能至少部分地与传播媒介的变化有关。

像成人的儿童和像儿童的成人

在 20 世纪上半叶,童年被认为是天真的和与世隔绝的一个时期。儿童被隔离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快之外,且穿着与成年人不一样的衣服。儿童和成人有着不同的“语言”,有一些话题和词语,如出生、死亡、性和钱等被认为是不宜让儿童听到的。学校的结构支持了严格按年龄分级的体制,它规定了每个年龄段的儿童应当知道什么和做什么。

但是在过去 30 年中,儿童的形象和角色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儿童作为人生中受保护和隔离的时期一点儿也没有消失。今天的儿童似乎更不像“孩子”。他们说话、穿衣和行为比过去都更像成年人。实际上,反面也是正确的。有证据显示,在过去 20 年间长大的许多成年人还像成长太快的男孩那样说话、穿衣和行事。当然,所有的儿童和成年人不会也不可能行为完全相同,但是与过去相比,行为上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传统的分界线消失了。

一个文化中地位差别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外表和服装的差异。授予儿童的低等地位,也在服装上——无论是灯笼裤,还是水手服,还是卡通人物的 T 恤衫——表现了出来。重要的不是儿童穿什么,而在于儿童的衣服与成人不同。

现在你在任何城市的街道上或者公园散步都会看到,不同年龄群体穿不同衣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儿童有时穿三件套衣服或者正式服装一样,许多成年人也穿得像“大孩子”:穿牛仔裤,即有米老鼠或超人的 T 恤衫及帆布鞋。除了穿着对方的传统服装之外,新

的“无年龄”风格的服装也出现了。例如年轻人和老人都穿设计人牛仔褲。“设计人牛仔褲”这个词组在过去可能听起来像是一个矛盾的术语；现在它代表着儿童随意的、玩耍的牛仔褲与成人时尚服装风格的综合。一些生产商通过生产设计人牛仔褲尿布将服装的同化推到了极限。

最近与年龄相关的服装的同化看起来可能仅是一个表面现象——仅仅是相似的服装包装了完全不同的社会人。但是儿童和成人的行为也开始变得更相似。即使是偶然的观察也能说明，姿态、坐的位置及手势变得更趋相似。看到成年人在公共场所交叉双腿坐在地上或者参加“儿童游戏”已不再是稀奇事了。事实上，最新一代的“玩具”——录像和计算机游戏——是成人和儿童共有的贪婪玩耍的对象。

不同年龄的语言和词汇的差异也在消失。许多俚语的单词、词组、猥亵的话，以及语法结构被各种年龄的群体共同使用。儿童说话更像成人，成年人说话则有些像儿童。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对方在场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说话。相对儿童而言，成年人权威的语言学证据也在消失；儿童越来越多地直呼成年人的名字（在许多情况下，包括他们的父母）。

社会所赞同的不适合与儿童讨论的话题越来越少。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儿童似乎在接受正式教育以前就知道了过去是禁忌的话题。例如，性和毒品教育计划不得不追寻不断增多的十几岁怀孕和滥用毒品的逃跑者”。近几年中，酗酒、流产和自杀已开始成为“儿童问题”。

• 20世纪70年代起十几岁孩子的性行为有了快速增长。15~17岁的白人女性的增长最为显著，她们性行为比例在9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总体上来看，十几岁未婚女性中性活跃者的比例在70年代增加了2/3。到1979年，在美国2900万的十几岁孩子中有1200万是性活跃者。15~17岁男孩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有过性行为，而这一年龄的女孩中将近1/3的人曾有过性行为，并且大约有100万13~14岁的孩子也是性活跃者。十几岁的孩子中每年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怀孕。而十几岁孩子中毒品的使用也有类似的快速增长。例如，1972—1979年间，12~17岁人群中使用过大麻和可卡因的比例翻了一番。1981年，毒品滥用国家研究院报告说，被研究的高中高年级学生中2/3的人承认至少有过一些毒品非法使用经历。实际上，在上完9年级之前有一半以上的人曾使用过非法毒品！1/3毒品使用者仅使用大麻，但是有66%的人也尝试过其他毒品。研究院认为这些数据还是“很保守的”估计。

对孩子们来说,出生一度是一个隐藏在鹤和卷心菜菜圃神话(孩子出生问题的骗小孩的说法,译者注)中的问题。但是现在心理学家和许多有关儿童出生的畅销书都建议,儿童应当被纳入小弟弟或小妹妹出生的过程中,也许甚至可以出现在生孩子的现场。

互补的变化也在成年人中发生了。教育、职业选择和成长阶段曾主要是有关儿童的探讨,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人加入了成人教育计划,人到中年改变职业,并且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阶段”。

成年人心理的承受力可能也在变化着。例如,备受讨论的“我这一代人”的态度可以看成是成年人对利己主义的表白,这种利己主义在传统上是与孩子相关联的。实际上,调查显示,成年人对孩子的责任感正在萎缩。父母为孩子奉献的情愿程度也在下降,考虑未来时关注孩子愿望的父母的数量也急剧下降。美国人现在考虑“好生活”时将汽车排在孩子之前。

虽然许多人的头脑中依然保留着童年与成年的旧观念,但是地位的同化已被记录在我们的娱乐和法律系统近期的变化中。

儿童和成人所扮演的电视和电影角色在过去4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雪莉·坦普尔(Shirley Temple)所扮演的人物不过是一个聪明而坦白的孩子,但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儿童明星——布鲁克·希尔兹(Brook Shields)和加里·科尔曼(Gary Coleman)——曾经扮演了关在儿童身体内的成人的角色。类似地,现在在电影或电视中找到传统的成年人也很困难。在“反对英雄”的时代,成人角色——包括迪亚娜·基顿(Diane Keaton),伯特·雷诺兹(Burt Reynolds),舍维·蔡斯(Chevy Chase)和加里·科尔曼(Gary Coleman)所塑造的许多形象——常常拥有长得太快的男孩的需求和情感。不仅成年人有时在当今的动画片中被机智的孩子战胜,而且孩子有时也被塑造得更加成熟、敏感和聪明(就像在动画片“E. T.”中一样)。

儿童和成人的相对法律地位在最近几年中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在1967年,最高法院赋予儿童请律师的权利,宣布“第14修正案和权利法案都不能仅限于成年人”;而接下来的决定又为儿童提供了许多成年人的法律权利。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案例中年龄较小的孩子自己接触律师,以便同父母或学校当局进行斗争。

随着离家出走并拒绝返家的儿童人数的大量增加,法院常常要面临着对儿童权利和父母权利的裁决。这时权利的天平倾向于孩子。在超过 12 个州中,法院现在许可“解放”年龄较小的孩子,这样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就能同父母分开。例如,康涅狄格州允许 16 岁的孩子同父母“离异”,并受到成年人一样的法律待遇。在加利福尼亚州,14 岁就可获得自由。

由于儿童正越来越多地犯下“成年人”的罪行,如武装抢劫、强奸和谋杀^{*}，“儿童”的法律意义进一步混乱。结果是,许多州不再对少年进行特别宽大的处理。例如,1978 年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 13 岁以上的儿童杀人犯受到与成年人相同的审判。1979 年,美国律师协会批准了一组新的少年法庭标准。与原来关注儿童的“最大利益”——少年法庭的最初理论——恰恰相反,ABA(美国律师协会)建议,儿童受到的惩罚应当与他们罪行的严重程度成比例。

成年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观念在最近几年中也开始模糊。例如,“暂时失去理智”或者“失去行为能力”的恳求越来越多地用来当作成年人在愤怒时刻犯罪的借口,它说明试图使“大人”发脾气合法化^{**}。

即使当儿童和成人正式的法律地位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儿童已经得到了法院、医疗机构和政府部门一种新的尊敬。现在法庭在解决监护权问题时更倾向于考虑儿童的看法,而对儿童和少年进行医疗和心理帮助前常常要征得他们的同意。纽约市决定提名由两位养子——分别为 13 岁和 16 岁——作为城市陪审员中有经验的成员,以改善对养子的照看。这反映了一种新的态度。这种变革代表着远

* 联邦调查局(FBI)的犯罪报告显示,1951 年,15 岁以下的儿童仅占因谋杀而被捕者中的 2/10 个百分点,占因抢劫而被捕者 4/10 个百分点,占因强奸而被捕者 1/10 个百分点。但是在 1981 年,15 岁以下的儿童占因谋杀而被捕者的 1/100(增长了 500%),因抢劫而被捕者的 7/100(增长了 1750%),因强奸而被捕者的 4/100(增长了 4000%)。如果 15 岁以下的人占人口的比例在 1981 年高于 1951 年,那么这些激增可能就不太重要了,但是事实却是相反:15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在这 30 年中由 28%降至 23%。儿童犯罪活动的明显变化,可能至少部分地归因于儿童犯罪报告的变化,但是即使这样的趋势也说明“儿童”概念的显著变化。

** “失去行为能力”的一些例子包括“越南压力综合征”,“经前综合征”,“被打妇女综合征”,“职业压力”,甚至还有“通常的生活状况”(如贫穷)。

离那种传统的父母观念的趋势,过去以为成年人总是知道什么是对儿童最有益的。

在某些圈子中,儿童开始被看成是另一种被剥夺权利的“少数民族”。社会学家埃莉斯·博尔丁(Elise Boulding)认为,儿童权利运动“应当被包括进人类状况意识觉醒的一般过程”。儿童保护基金主席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Marian Wright Edelman)写道,“在白宫召开七次有关儿童的会议以及儿童问题无数的报告和演讲之后,儿童仍然是美国社会中最贫穷的,最未被代表的以及受到服务最不够的群体”。

虽然某些对儿童权利最新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不挨饿或不被打(儿童福利)的方面,但是其他的儿童权利倡导者则推动了儿童在社会中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全面的参与(儿童解放)。作为后者阵营中的一员,理查德·法森(Richard Farson)曾充满感情地为儿童基本的“出生权”辩护,以对抗他认为是成人对儿童系统的歧视。类似地,在《逃离童年》(Escape From Childhood)一书中,教育家约翰·霍尔特(John Holt)勾画了儿童的“权利法案”。他提议“成年公民的权利、特权、义务和责任也应让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得到,无论他们的年龄多大,只要在需要的时候能使用它们就行”。霍尔特所列举的权利包括选举、工作、拥有隐私、拥有财产、签订合同、选择性伴侣、旅行、拥有自己的家以及选择自己监护人等权利。

假使上述提到的这些变化似乎是很难获得的,而且也许甚至是令人害怕的,我们就必须意识到,它们是对儿童态度广泛变化的一个指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拯救儿童运动”是一个隔离的运动,只是用于满足儿童的“特别需要”并确保他们有“童年的权利”。但是现在的趋势是朝着儿童和成人的再融合方面发展。实际上,父母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儿童的卡耐基委员会主席肯尼斯·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曾指出,“父母和儿童之间更多的平等感觉显然已经形成。如今的家中有更多的民主,父母也会向自己的孩子承认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再有自发的‘父母总是知道得最多’的态度”。

儿童和成人的这些变化的利弊还很难说。儿童“逃离童年”应当被看成是解放还是过失,还是两者皆有一些,也说不清楚。但是,无

论如何,按照从前的定义,童年和成年已经不复存在。

年龄决定论的神秘

童年与成年的融合曾经是很难观察的,而一旦观察到,又是难以接受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描述它的精神模型。在发展心理学中寻找这样的模型,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有帮助。直到最近,发展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和理论才开始注重描述个体在不同的年龄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的能力。而且大多数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研究导致年龄变化或有关阶段变化的因素,或者与之相关的因素上。不同年龄群体的各种区别被找了出来,并且描述了某个给定年龄群体中的人的典型特征。但是预先存在的不同生活时期,如“幼年”,“童年”,“青春期”,“成年”和“老年”通常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大多数情况下,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并没有与可能改变不同人生时期的社会特征因素的研究相结合。

大多数的发展心理学家曾致力于寻找人的一生中行为和思想的普遍差异;直到最近,各种年龄的人的行为的潜在共性还被普遍地忽略。寻找普遍的发展阶段曾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但是这种研究是不完整的。显然,对人类发展中常量的描述,倾向于忽略能带来儿童和成人角色定义广泛变化的诸多因素。即使能完全理解发展的普遍特征,这也不一定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与年龄相关的角色,在不同的文化中或者在同一文化中的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化。为了发现童年和成年观念变化产生的过程,我们必须超越个体发展的顺序,研究影响所有人行为和地位的更大的社会变量,不管他们是什么年龄段,或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熟悉主流发展的研究——而没有心理学科内部或外部其他观点的相应知识——这使得许多美国人可能会忽略掉:认知和其他的发展水平可能并不是唯一一种塑造我们传统上给予儿童和成人角色的因素。

发展研究的结果通常用发展阶段与年龄范围相匹配的方式来报告。虽然许多心理学家解释说,用年龄范围所描述的结果意义有

限”，但是这些解释极少在发展研究的发布总结中出现。因此，许多父母、老师和其他人都认为发展研究已经证明，年龄本身自然地“决定”了儿童的行为以及儿童和成人交往的恰当风格。有关成人“生活圈”、“季节”和“通道”等流行的学术出版物强化并且扩展了“年龄决定”行为的观念。这些著作描述了诸如“30岁的转变”和“40岁的考验”之类的阶段。总之，在发展中有明确的与年龄相关的“阶段”的看法似乎为我们传统上不同年龄的人的角色、权利和义务的区分提供了科学的支持。

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传统的发展研究培养出了一套人类发展的流行观念，它不仅不能解释近期的童年和成年的变化，一些人还认为它甚至也没有给出与年龄相关的角色的这种剧烈变化的可能性。虽然许多人意识到，对待儿童的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以及在不同的时期，有着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对文化和科学的信仰使我们认定，只有现代的美国和欧洲社会已经知道并且理解了儿童的“真正”性质，也只有我们知道“恰当”的成人与儿童角色。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对儿童渐进的社会态度与思考和研究儿童行为的“发展的方法”之间有一个象征性的关系。发展心理学的许多发现支持了“儿童拯救者”的行为，他们试图为儿童创造一个完全隔离的社会领地，而儿童的社会可隔离性又支持了发展心理学家的发现。但是这个时期的童年和成年近期的融合需要我们反思发展研究和行为规范的关系。诸如此类的反思已经开始。

·例如，心理学家谢尔顿(Sheldon)和芭芭拉·怀特(Barbara White)指出，年龄是“个儿童非生理的事实”，它仅代表了自从儿童出生后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圈数。那么，用年龄范围来描述发展仅仅是发展变化的小结和平均；同龄的儿童常常有着非常不同的能力。怀特认为，皮亚杰的与年龄相关的认识阶段是他理论中最薄弱的环节。“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任何年龄儿童的思考都没有突然的和全面的转变”。其他心理学家也曾指出，将行为描述为年龄的函数的所有研究中存在着问题。与其他认定的行为“原因”不同，一个人的年龄并不是研究者能够控制的东西，因此年龄的影响不能进行实验验证。另外，由于许多实际的原因，大多数的发展研究甚至没能追踪受试者的生活很长时间。相反，在一个给定的时间，X岁的人(如4岁)与Y岁的人(如9岁)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中没有直接证据说明，5年以后，4岁的人会与现在9岁的人反应方式一样，或者9岁的人与现在4岁的人5年后相似。发展过程肯定是被推断出来的，并且有可能会有重大的错误。例如，许多年来，人们被告知，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是这种观点的基础是在同一时间给不同年龄的人进行智力测试的结果。分数的差异被认为是与年龄相关的，而实际上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或社会的变化所造成的。

例如，著名的耶鲁儿童心理学家威廉姆·克森(William Kessen)最近警告他的同事，他们对儿童“真正特质”的研究可能是徒劳的。克森认为，“从本质上和长远考虑儿童是文化的一个发明，儿童定义的变化并不是一个不完全的科学中可去除的错误”。

克森没有详述近期童年的任何变化，但是他攻击了儿童心理学的某些主要的基本假设。虽然儿童心理学以其理论、模型和方法的多样性而著称，但克森认为儿童心理学家应当仔细研究公众持有的一些观点。克森认为，儿童心理学本身是“一个特别的文化发明，它与更大的文化波浪一起移动。我们对这种方式最多也只是模糊地理解，并且常常忽略它”。他又补充说，儿童心理学还受到了大量的有关童年的天真、家庭和母亲的中心性、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以及儿童和社会完美性这些未被证实的文化假设及信仰的影响。儿童心理学曾支持了该领域诞生时的文化态度，包括相信儿童需要给予特别的照料、对待和保护。

克森认为即使是儿童心理学所欣赏的“客观”实验室方法，也是基于一个主体的文化规范。美国人极端的个人主义导致了美国心理学家将个体儿童看成是恰当的分析单元；更大的社会背景却被忽略了。“我们基本上观察了儿童能移进我们的实验室或者我们的测试地点的那些发展部分”。通过隔离儿童，我们知道了很多，但是却有“统一教条的通常代价”和“夸张而重要的遗漏”。

看一下年龄跨度的另一端，老年学家伯尼斯·诺伊格特恩(Bernice Neugarten)曾描述了一个涉及与“年龄无关社会”的概念。经过多年研究老年人的角色、行为和需求，诺伊格特恩宣称，“时间年龄成了人们生活方式越来越差的一个指标”。她指出，“我过去所写的使我们守时间的内部时钟，它告诉我们结婚、上学、找工作，或者退休是太年轻还是太老，它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力或者有强迫性”。

在有生之年目睹了年龄相关规范的巨大变化之后，诺伊格特恩开始研究社会“从生物时间转变到社会时间”的方式。诺伊格特恩的分析说明，每个社会中年龄的区分与传统的奖励和惩罚、劳动分工、机构和其他社会体系纠缠在一起时，被看成是自然的该有多么地偶然。

在重新思考年龄相关角色的时候，研究人员发现的更多证据表明，幼儿和儿童拥有的某些技能比原先认为的年龄要早，老年人维持

某种行为能力的时间比过去认为的要长,而注意到这些非常有趣。在报告这些发现时,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他们仅仅是“纠正”原先“错误”的结果。例如,一些人争论说,让·皮亚热在使用易使人迷惑的说明,或者无意识地测试语言而不是认知能力时曾低估了儿童的认知能力。但是也有可能,这些研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无意间检验了年龄相关行为和角色观念的历史变化。也就是说,较新的研究可能记录了儿童和成人受到鼓励的或者许可的行为方式的重要变化。新的研究在另一种意义上可能也是“历史性的”:即使这些研究反映了儿童和老年人能力的普遍真理,这些结果可能反映了研究人员新的社会态度,他们现在更加开放地寻找和观察这些过去认为不存在的能力。

近来不同年龄的人的社会行为变化以及一些发展理论观念的变化说明了我们对于年龄差异决定社会规范的相信程度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规范。正如现在许多人都相信,过去关于黑人和妇女智力低下的理论是由社会偏见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应当开始质疑传统上与年龄相关的角色的观念。

当然我们不能将儿童随社会规范这盆洗澡水一起倒掉。因为儿童的心理和经验的现实显然与成人不同。无论给予儿童何种“自由”或解放,儿童都不可能是成人。除了心理的成熟之外,还需要有多年的经验和社会交往才能完全发育成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成员。但是,我们需要区分儿童的生理存在和“童年”的社会构造。虽然儿童可能永远是儿童,但是童年的概念却是永远的变量。成人和“成年”、老人和“老年”之间的区别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生理的发育,我们可以测定在具体的地点和时间不同年龄人的认知能力。但是发现社会发展中个人差异的极限,社会因素所能消除或模糊“实际”差异的程度,或者决定特定社会角色所必须的不同年龄人之间的可观察心理差异的程度,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可以观察儿童和成人,但是我们不知道童年内部以及童年和成年之间最终的分界线在哪里。这些神秘疑问的最终解决是不大可能的。正如新出现的学科——年龄社会学——认为,不存在“‘纯粹’的年老过程”。

儿童进入幼儿园,或者青春期进入成年,或者老人退休的方式并不是注定的……人的一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非常灵活多变的。

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不仅随着家庭、学校、工作地点、社区性质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也随着观念、价值和信仰的变化而改变。当新的一代(或者团队)进入历史长河中,其成员的生活就标上了社会变化的印迹,并在随后又留下自己的印迹。

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媒体环境的变化。许多研究都检查了媒介信息对处于社会化不同阶段的人的影响,但是几乎没有人研究媒介的变化为何会影响社会化过程自身的结构。一种方法是,超越具体的讯息去研究不同的媒介怎样为童年和成年的世界创造不同的“场景地理”。

电视和儿童的融合

如前所述,社会地位的区别部分地是通过将人隔离进不同的信息世界而形成的。从一个社会地位移入另一个社会地位,通常都涉及了学习新地位的“秘密”以及进入可以获取这种信息的地点或场景。

从童年到成年的社会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涉及到暴露更多的新信息以及继续受制于其他社会信息。例如,传统上,我们告诉三年级学生的知识内容对二年级则保密,而还有一些知识是不让三年级学生知道的,要等到四年级时再告诉他们。儿童爬上成人信息阶梯是缓慢而分阶段的。一个儿童的认知发育对这个爬升有所帮助,但它并不是影响儿童学习或社会化的惟一因素。另一个重要的变量是,不同年龄儿童所能获得信息的数量和类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将不同年龄知道的内容分成许多小步骤,它就能建立童年的许多阶段或层次。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将不同年龄的人所知道的内容做清楚的区分,在社会化进入成年时就有较少的阶段。例如,如果我们一直在同一教室里教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我们就会很难将他们清楚地分出三种不同的社会地位。

这个观点说明,童年“天真”的传统看法可能与儿童被排除在成人的社会场景,或者信息系统之外有关;相反,在儿童眼中,成人似乎是“无所不知”的,这可能是由于成人能不让儿童知道他们的秘密,能维持私下的“后台”区域来演练他们的“台上”角色,能隐藏自己的恐惧、疑惑、焦虑和孩子气的行为,并能“私下”讨论带孩子的技巧。但

是当不同年龄人的信息系统的区别模糊以后,我们会期望儿童和成人的行为差异也变得模糊。

对电视许多流行的和学术的分析都暗含着这样的假设,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主要是父母监督儿童观看电视以及播放者规范其节目的程度所决定的。那些持负面影响观点的人常常认为,责任在于太宽容的父母,他们不管孩子看什么内容;还有贪婪的播放者,他们不愿意提供适合儿童的节目。

但是这个普通的观点遗忘了一点,电视不是可与早期传播渠道如书籍等同或者交换的被动的信息载体。虽然对内容和接触的明确控制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对不同的媒介则有不同的效果。假如其他条件都相同的话,印刷倾向于将儿童与成人隔离开,而电视则倾向于将他们再融合。

下面通过关注从“书本场景”向“电视场景”转变的潜在影响,我并没有想抛弃社会化近期变化的其他解释,或者否认维护传统上童年和成年区分的许多因素。当然,婚姻越来越不稳定,经济问题以及许多其他变量对近期的变化也起到了作用;相反,家庭传统、宗教信仰、学校教育、社会阶级和居住地点消除了或疏通了与年龄相关的角色融合的许多压力。我仅希望表明,媒介的变化可能与童年和成年观念的整体趋势有很大的关系,超过了原有的假设。

在电视环境的家中

过去幼小儿童了解世界的知识,主要由孩子住在哪儿和可以去哪儿所决定的。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旅行的自由,才慢慢地开始接触到更大的社会。阅读提供了对世界信息的接触;旅行提供了与之互补的物理接触。

家庭常被描绘为一个“保护的”和“养育的”环境。但是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家的作用实际上只是一个隔绝的房子。由于这个原因,早期的女权主义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攻击家是一座监狱,它限制儿童和女性不能接触外部的世界。

即使那些支持传统家庭功能的人也认识到它的限制特征。例如,在《童年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一书中,奥斯卡·里奇(Oscar Ritchie)和马文·科勒(Marvin Koller)指出,家是儿童的“小世界”,“家是其社会文化的一个屏幕,仅选择那些注定值得注

意的部分”。幼小的儿童可能会有离开家的特别旅行,例如,拜访祖母。但是儿童的生活是以家和家庭为中心的。虽然儿童并没有完全同外面世界的信息隔离,但是这种信息通常是由能自由离开家的父母和其他成人过滤了的。

由于儿童的知识 and 经验有限,里奇和科勒观察发现,客人常常成为兴趣和想像的中心。“作为生活在孩子家外面的人,客人的功能就是一个发送器,将新的观点和信息带进儿童的世界,并且带来代表儿童参与外面世界的新的和不同的机会”。

里奇和科勒所选择的客人比喻非常有趣,非常重要;实际上,它反映了他们自己描述家庭和家在社会化中的角色时所存在的缺陷。该书写于1964年,里奇和科勒应当意识到,在90%以上的美国家庭中,他们所描述的限制环境已经被一个新的有力的发射器——电视——所改变。

里奇和科勒指出,“主要是由于父母控制场景,儿童——客人的关系可能是社会化过程的一个积极方面”。虽然在传统的家庭中,客人是邀请而来的,仍然在家庭的控制之下,并且作为儿童信息的成人过滤器,但是从电视机中出来的客人通常是不速之客,他们没有得到父母的全部许可或控制,由此扩大了儿童的信息世界。

电视对“家”的重新定义的影响全部迷失在电视主流的讯息取向方法的研究中。注重内容而不注重场景结构,妨碍了电视绕过成人权威的过滤以及降低了儿童在家中身体上隔离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电视节目强化“成人总是知道最多的”信息还是“成人并不总是知道最多的”讯息,或者无论是广告让儿童自己去买某个产品还是让父母为他们购买这种产品,这些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无论电视节目和广告中具体讯息如何,总之,信息流入家中的模式有了改变。

当然,今天的父母仍然控制着家庭中大部分的氛围,但是家庭中的生活经历已不再是儿童所有经历的基础。有电视可看的儿童,现在已有了外部的观点,他们可以据此来判断和评价家庭的礼仪、信仰和宗教活动。过去父母可以通过介绍和让儿童阅读那些他们想让自己孩子了解的东西,从而轻易地塑造他们的教养。但是今天,父母必须与那些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方法直接控制的成千上万的具有竞争力的形象和观点进行斗争。结果,家庭内部的权利关系就部分地进行

了重组。当然父母与家庭生活的影响仍然可以看到：儿童的阶级、信仰和道德背景仍然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家庭已不再是全能的个性形成的影响者。

过去由于非常小的孩子没有阅读能力，他们被限制在家中或家庭附近，只能从少数信息来源之中获取信息：画、插图、窗外的景色，以及成人告诉他们的那些事物。但是现在，甚至在孩子们不被允许独立穿过马路之前，电视就陪着他们穿过了地球。

不存在“儿童电视”类的东西

印刷代码的复杂性使所有年幼的儿童都无法利用印刷进行传播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刷建造了一个能在成年人中间进行传播而又不会被儿童偷听到的“地方”。通过书籍，成年人可以自由地讨论那些他们不希望让小孩子知道的东西。另外，由于阅读涉及到需要一步步学习的复杂技巧，成年人通过改变各种图书内容写作代码的难度以控制较大儿童所能获取的信息。由于儿童在阅读复杂的成人书籍前必须先阅读简单的儿童书籍，所以印刷就使得不同年龄的儿童被隔离进不同的信息世界*。

印刷媒介代码不同的复杂程度，不仅用于将儿童隔离在成人场景之外，而且它也将成人隔离在儿童场景之外。例如，儿童能够被“屏蔽”在“成人”话题之外，如性、犯罪和死亡，而方法仅仅是将这些信息编码为长而难的单词以及复杂的书面句子。但是同时，大多数儿童书如此的简单性使之对成人毫无吸引力，而且许多成人在读这些书时被看到会感到很难为情（实际上，教成人文盲阅读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寻找适宜的阅读材料）。儿童通常不知道成人在读什么，成人（除非他们是学校教师，或者为孩子大声朗读的父母）通常也不知

* 当然，印刷品中没有什么固有的东西要求成人使用书本为儿童隔离某种信息。例如，修改儿童的书籍并以类似于“看史密斯太太喂孩子喝牛奶和吃饼干”之类的句子来代替“看到史密斯太太与卖牛奶的人一起上床睡觉了”是可能的。但是印刷使得成年人可以控制不同年龄的儿童对成人场景了解的内容与程度。对社会行为的总体观察发现，当人们能够控制对私下行为的接触时，他们通常会这样做。如果我们知道一群客人要来，我们会将房间收拾整洁。如果我们的家庭出现争吵，我们通常不让邻居知道，除非他们偷听到了。如果一件政治的或个人的丑闻能够隐瞒，它通常就被隐瞒了下来。因此，一个新媒介的场景特征可能会与社会行为的通用规则相互作用，而且还会改变社会交往的特征。

道儿童在读什么。有了印刷媒介,社会则根据对阅读技能掌握的不同程度而被分成许多不同的信息系统。

因此,“儿童图书”的特殊性,是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它们是儿童能够阅读的惟一一种类型的书,并且通常只有儿童才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文学是一个信息贫民窟,既是隔离的又是被隔离的。

电视上没有与儿童图书相对应的场景。电视没有复杂的接触码用以排除年轻的观众或者将观众分成不同的年龄群体。成人的节目可能给儿童展示着他们不能完全理解的信息,儿童的节目可能包含孩子气的内容,但是所有节目播放时所用的基本编码对每一个电视节目来说都是相似的:声音和图像。与印刷媒介不同,电视的形象化形式代表了它所展示的东西。电视画面与所有其他画面相似——看起来像真实的物体和人物;且电视用人的语言说话。

与图书相比,电视节目极少有“预先要求”。电视节目没有必须的观看顺序,因为绝大多数的节目要求同样程度的技能(或者不需要)。你不必在观看“芝麻街”前先看“连裤童装屋”(Romper Room)。你在看“达拉斯”之前也不必先看“拉线木偶表演”(The Muppet Show)。有了电视,就没有将儿童屏蔽在成人节目之外的过滤器,而且当成人观看儿童节目时,也没有令成人厌烦或者难为情的简单的视觉风格。因此,各种年龄的人观看许多相同的节目就不足为怪了。儿童的图书世界能隔离出为儿童展示生活的理想观点,而电视新闻和娱乐却可以为小孩展示成人撒谎、喝酒、欺骗和杀人的画面。

当然,媒介的性质并不是决定人们从电视上学到知识内容的惟一因素。暴露信息与信息的理解及整合并不是一回事儿。态度和信仰、经历、教育、文化和宗教训练,以及智力都会修正个人对信息的理解。对儿童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滤器是儿童认知发展的水平。让·皮亚热对儿童研究的主要贡献就是证明了儿童的思考能力并不是简单地比成人“差”,而是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皮亚热发现了认知发展的许多不同阶段和子阶段。

在研究认知阶段和媒介理解的关系时,研究人员发现不同年龄的儿童在看电视时通常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太小的儿童在跟随情节发展以及区分中心事件与次要事件时会发生困难。孩子也难于将动

机与后果、原因与结果,以及想像与现实分开。研究显示,儿童必须要到十一二岁时对电视的理解才能近似于成人的理解。从这种意义上说,电视将儿童整合进成人场景的能力在11岁之后可能就达到最大值(仍然比他们接受传统上“成人”的地位早许多年)。

然而,就儿童对电视的理解能力所做的研究,总是忽略了所有年龄的儿童经由不同媒介所了解的有关成人的社会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没有哪种研究曾就儿童对成年知识或由此产生的相关角色概念的各不相同的认知,对“口语文化”、“书籍文化”,以及“电视文化”做过比较。尽管11岁以后儿童看电视可能与成人非常像,但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他们通过书本或电视获取的信息与成人的相比差异最大*。

电视可能不会破坏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外在限制,但它与印刷不同的是,电视并没有将另一种超出儿童的信息认知处理能力的非常难的解码任务强加于儿童。看电视和读书是不同等的认知任务(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位从未看过电视或读过书的7岁儿童,假如我们将这个小孩暴露在这两种媒介环境下各一个月,然后将他与7岁的普通读者和电视观众进行比较,很可能他看电视的技能比阅读技能更为“正常”)。因此,虽然十一二岁以下儿童按照成人的标准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电视内容,但他们仍然能够发现电视是可接触的和有吸引力的。而2~5岁的儿童很少能盯着书中的词和句子看,但是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平均每周却花25~32小时看电视。

对认知阶段的研究和对媒介环境的研究是两个重要但却不同的问题。正如人们能抛开环境去观察不同年龄儿童的认知差异一样,也可以抛开观看者的认知程度,去观察不同媒介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理想的情况是,这两种方法在将来会整合在一起。)

* 例如,这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某一经历而言,是否必须对其有全部的和即刻的理解才能对行为和地位产生长期的影响。当某个人第一次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时,如一座大城市,最初到市区的几次旅行留在他的记忆中的可能是一些相互没有关联的具体建筑物、路标或交叉路口。他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将这些元素拼成一幅图,才能知道某些事件与其他事件是怎样联系的(例如,一天中不同时间里警官的数量),并能将主要事件与辅助事件区分开来(例如,中午的笛声和空袭警报)。如果因此就说,由于他没有理解其“所看到的”,他最初几次的市区旅行对这个人“没有影响”,这有什么意义吗?显然,最终的理解是建立在早期经历和部分理解之上的。通过电视所暴露的新奇世界里对儿童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同样不能用标准的理解测试来衡量。

皮亚热最初的发现与最近发现的儿童认知和社会能力的增强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这甚至也许与电视有着某种联系。毕竟电视给儿童提供了丰富的小说刺激和“社会经历”,可能因此促使了认知和社会的发展。实际上,现在学龄前儿童按照标准的智力测量比50年前“更聪明”,这种差别可能要部分归因于电视。即使假定认知的发展丝毫不受媒介环境变化的影响,当儿童突然被暴露在全新的信息环境之中,让他们用自己稚气的观念去处理这些信息,这会对儿童的社会知识和地位产生怎样影响的研究也仍是有意义的。

虽然许多对儿童理解的研究曾关注于儿童无法完全理解的内容,但他们却忽略了儿童无法理解那些过去不让他们知道的问题的重要意义。例如,3岁的电视观众可能无法解释为什么节目中的人被枪杀,儿童观众可能不知道电视中的行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但是无论如何3岁的儿童通过电视被暴露于枪杀以及一些其他“成人”话题中*。

电视的革命性不在于它是否给了儿童“成人观念”,而是它允许非常小的孩子“参加”成人的交往。电视去除了过去根据不同年龄和阅读能力将人分成不同社会场景的障碍。电视的广泛使用相当于一个大的社会决定,它允许非常小的儿童参与战争和葬礼、求爱和诱惑、犯罪谋划和鸡尾酒会。较小的孩子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电视为他们所展示的性、死亡、犯罪和金钱问题。或换种说法,他们可能用一种稚气的方式来理解这些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电视暴露给了孩子们几个世纪以来成年人一直不让孩子知道的许多话题和行为。电视将儿童推进了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并且促使儿童去问那些没有电视他们就不会听到或看到的行为和语言的意义。

不仅大多数儿童能看成人节目,而且从电视时代开始,儿童就喜欢成人节目。当电视开始侵入美国家庭时,教师、家长和研究人員惊奇地发现,儿童似乎喜欢戏剧和百老汇电视演播。海伦·帕克赫

* 据我所知,并没有研究发现3岁以上的儿童一点也不理解电视中所暴露的信息的意义。实际上,一些使用非语言测试的研究发现,非常小的孩子可能有着令人吃惊的复杂的理解力。一项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学龄前儿童能正确区分节目片断和广告,尽管他们无法用语言来解释其中的差别。在另一研究项目中,被研究的2~3岁的儿童中有75%通过了一项测试,(他们识别出了一张显示某人在一家商店挑选并购买某产品的照片。)这说明他们理解广告的目的。

斯特(Helen Parkhurst)是一位教育家及达尔顿(Dalton)学校的创始人,对此他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他们真正好奇的不是剧院,而是在剧院看到的成人世界……实际上,我们的孩子虽是在成人中间,但并未真正同他们在一起。而他们则希望同成人在一起,而不是在他们中间”。

20世纪50年代在英格兰的一项严格而仔细的研究发现,儿童对所有暴露成人世界的任何节目都同样喜爱。希尔德·希默尔魏特(Hilde Himmelweit)和她的同事在核对儿童的偏爱时发现,“最喜爱的节目的选票中四分之三投向了成人节目……而其他类型的节目——如木偶戏、自然和动物节目,以及如何制作节目——并不特别受欢迎”。希默尔魏特对电视吸引儿童的分析响应了帕克赫斯特的分析,并提出了儿童偏爱“成人节目”的一个原因:电视为儿童提供了“进入幕后并了解世界和了解人类的知情的满足感”。

最新的研究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模式,儿童喜爱面向成人的节目超过了面向儿童的节目。据一些研究人员提供,即使是最易引起儿童的兴趣的儿童节目也无法与成人节目竞争。另一项最新研究的结论是,在晚上较早的时间创立特别的“家庭观看”时间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大多数儿童在晚上会一直看到很晚的更“成熟”的节目。据估计500~600万12岁以下的儿童晚上11点以后还在看电视,200万儿童在半夜时仍在看电视。

因此许多父母不断要求电视有更多的“儿童节目”或者期望有线电视、卫星在面对家庭的直接广播以及影像光盘的节目中有更多的年龄划分,这就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证据。仅仅创造出包含传统上认为适合儿童的内容的电视节目,并不等于会创造出等同于儿童文学的孤立世界的信息系统。存在儿童图书与成人图书,但是并不存在儿童电视和成人电视。按照人们能够看的和确实看的内容来分,只有一个“电视”。

出自婴儿的口中

电子媒介不仅使儿童直接接触成人信息,它们也为儿童提供了发送讯息以及看到和听到其他儿童的新机会。因为几乎没有儿童能够写书,而书通常展示的是成人对儿童的观点。由于通过电话、收音机和电视发送讯息所需的技能较少,儿童常常可以为自己发言。

例如,离婚方面的书常常描述离异夫妇的孩子所面临的问题。而在电视上,离异夫妇的孩子则直接被采访。同时,在观看节目的人中有许多孩子。虽然儿童不能直接参加在印刷媒体上关于离婚的公共讨论,但是电视和广播允许儿童对成人和其他儿童谈论这些话题。

1982年,美国心理学会发布了一篇有关核技术的社会心理方面的报告,它包含了儿童对核灾难恐惧的一项研究。虽然这项研究是由成年人写给成年人的,而同样问题的一个“20/20”电视节目(ABC,1982年6月10日)不仅采访了进行这项研究的两位心理学家,而且也采访了儿童谈自己的感受。另外,节目中也包含了全部是儿童的讨论组讨论核灾难的录像(由儿童自己组织的小组),其中还有很小的孩子朗读自己写的有关核战争诗篇的录像。那么与印刷媒介不同的是,电子媒介不仅使儿童意识到了急迫的社会问题,它们也将儿童纳入了有关这些问题的—般社会对话中。

类似地,阅读本章的大多数人是成人。但是在1982年10月,我在史蒂夫·哈特(Steve Hart)的全国公共广播(National Public Radio)热线节目中接受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采访,所有打电话问我问题的人都介于10~12岁之间。有了电子媒介——正如一个ABC电视节目在它的标题中所宣称的那样——“孩子们也是人了”。

印刷和电视编码变量的巨大差异突出显示在美国一家小电视台的组织结构中,它就是威斯康星州的松·普拉里(Sun Prairie)的第四频道。该电视台有40名员工,有摄影师、导演和广播人员。有十几个人组成的节目委员会成员,由他们来决定要播放的内容。到目前为止,这个电视台还没有听起来不同寻常的东西。但是这40个工作人员都是9~14岁的儿童,并且他们运转的这家小有线电视台有着最低限度的成人干预。当然他们的许多观众是成年人。

电子媒介不仅影响了今天的儿童,它们也重塑了未来后代对童年的理解。玛丽·麦克劳克林(Mary McLaughlin)指出,在童年的历史上反映出,“早期生活的现实,肯定仍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起来的世界,我们只能通过不再是儿童的人的回忆、描述和想像才能部分地、间接地接触到”。成人常常根本记不起有关童年的任何东西。彼德·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e)在他对英国的前工业社会的研究中指出,“很奇怪成群的小孩没有出现在文字的记录中”。拉斯莱特认为,“在人类描述自身经历的陈述中,无数怀抱着的、蹒跚学步的

孩子和青春期的少年没有一点声音,这有点神秘”。他甚至对于是否发现过前工业时代儿童养育的详细资料感到绝望。类似地,历史学家詹姆斯·罗斯(James Ross)指出,“没有儿童的声音直接传递给我们”。实际上,我们“通过控制他们的生活或者通过观察他们发展的媒介来听到他们微弱的声音,是无法完全确定的声音”。但是现在,电子媒介允许儿童直接与未来对话。

也许童年的历史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成一块不同的研究领域并不是偶然的巧合。电视展示、记录和保留儿童语言和行为的独特能力,可能使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在过去理解儿童时的真空领域。

电视的门口

图书的许多物理特性成了儿童接触信息的过滤器。每本书都是一个不同的物体,每名儿童必须单独去获取。如果不是父母给孩子的书,孩子必须离开家去找——通常是向成年人借或买。发给儿童特殊的借书卡,这样他们就不能借阅成人的书,而且成人的书常常放在儿童够不到的书架上。另外,儿童对于能得到什么样的书或者到哪儿去找都一无所知。

儿童很少能直接获取或选择书,这一事实在玛格丽特·米德和马莎·沃尔芬斯泰因(Martha Wolfenstein)于20世纪50年代试图创造一种新型儿童文学的一个命运不佳的项目中显得很清楚,这也使他们很痛苦。他们曾计划写一本能够满足儿童心理需求并且也许能解决如兄弟姐妹竞争问题的现代风格的儿童图书。

米德和沃尔芬斯泰因发现,最能满足儿童的图书是完全无法被其家长接受的。例如,母亲们反对,“任何对怀孕的妇女疲惫和坏脾气的描述,以及她们希望更多地强调让孩子做好迎接婴儿的准备时母亲该做什么”。米德和沃尔芬斯泰因在电视上试过几次之后发现,他们无法想出同时符合儿童和成人需求的故事。“当我们在这些不同的水平上试验这些故事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毕竟5岁的孩子不买书,而儿童的需要和偏爱,肯定介入了几层其他人——母亲、父亲、祖母、姑姑、图书管理员、出版商、书店购书者和专家”。因此项目失败了。

作为单独的物体,图书可以有选择性地被挑选并有选择性地给孩子看。但是电视节目的内容则很难控制。一旦儿童能够接触电视,儿童就能直接接触其中播出的所有东西。儿童不必去任何地方

去寻找电视节目,或者看电视时必须征得任何成人的同意。而书本的阅读代码及物理特征提供了一种需要父母最低干预的“自动”限制,但审查儿童看电视则涉及到主动的和不断的监督。因此,对于电视,重要的决定是,要电视还是不要,是让孩子暴露于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中,还是一个节目都不让看。

另外,由于儿童没有将具体的节目带进家中,与电视节目相伴就没有丝毫的负罪感。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买一本廉价小说,或者“脏”书并把它带进家,是与它的内容有关联的;看廉价的或者“脏”的电视节目,则是无辜地观看灌输到家中的东西(从儿童的角度看,它是应当由提供电视机的父母和通过这个媒介展示自己的大世界在暗中限制的)。

从某种意义上看,一本儿童图书是家中的一位“客人”。它形成了一个“社会通路”,也就是说,它至少是在名义上通过父母的权利从大门进来并留下来的。作为一件物品,它必须存放在家中某个地方,也可以被扔掉。相比之下,儿童看的电视就像是家中的一个新门。通过这扇门进来了许多受欢迎的和不受欢迎的客人:老师、总统、推销员、警官、娼妓、杀人犯、朋友以及陌生人。

家长处理审查自己孩子看电视这一巨大的任务时至少面对两个重要的困难选择。首先,控制看电视涉及了价值观的冲突:保护孩子还是允许他们想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过去家长不得不鼓励孩子阅读和学习。对书中成人信息的大量保护由印刷媒介固有的特性自动完成。现在家长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主动干预孩子“学习过程”的不舒服的位置。现在家长必须尽量评价电视的内容,并且确定(常常处于这一点)自己的孩子是否能“处理它”。

其次,家长很难在控制孩子看电视时,不限制自己看电视。虽然一个孩子对同处一室内的成人读给他听的书籍和报纸有着非常有限的接触,但是在相同空间里成人观看的电视节目使任何孩子都能够接触。例如许多儿童都被暴露于成人的新闻,因为他们的父母在晚饭时看新闻^{*}。因此,为了控制儿童看电视,家长必须限制自己看电

* 一项研究发现从幼儿园到五年级的学生有30%说自己“几乎每天”都看一个全国新闻节目。一项英国的研究发现,虽然许多儿童很少明确表示对电视新闻是否感兴趣,且显得对它不太在意,但是被研究的儿童中大约有一半的孩子能够提到新闻中的问题,包括危机、火灾、事故和北爱尔兰的爆炸。

视或者从物理上将家隔开。当家中有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时情况就更复杂了。图书的独特性质使成人能强化暗含的规则,“阅读我们想让你读的书,而不是我们读的书”,但是电视对下面的这种劝告没有给予任何支持:“看我们想让你们看的,而不是我们看的。”

读书时,一家人可以同时呆在一间屋子里,且又被分成不同的信息世界。在有多台电视机的家庭中,孩子和家長可以呆在不同的房间,但仍然被统一进单一的信息场景。

暴露“秘密的秘密”

在印刷传播中,父母拥有一本探讨关于什么样的书适合于孩子的书是很普通的。这种关于书的书是一种成人与成人之间的交流,年幼的儿童不能参与。另外,通常儿童甚至都不知道有这种书存在。

在这种私下成人“讨论”的帮助下,过去儿童就被隔绝于某些话题之外,如性、钱、死亡、犯罪和毒品。但是更重要的是,儿童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被隔绝这个事实。印刷媒介允许成人的“共谋”。从知识和意识的观点来看,儿童处于一种受到催眠以忘记某事且同时受到催眠以忘记催眠的境地。

同样的方式却不适用于电视。事实上电视常常为父母们提供建议。脱口秀讨论儿童电视时,并且在节目的开始有警告语出现,以便让家长知道这个节目可能含有“不适于10岁以下儿童”的内容。虽然这种声明内容类似于父母对图书中内容的建议,但是传播场景的结构是极不相同的。电视的讨论和警告能为儿童所接触,就像成人接触到的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视上的这种建议常常提示儿童哪些节目他们不应当看,但这却增加了儿童对接下来的内容的兴趣。而且即使这样的警告父母听到了,即使家长行动起来审查这个节目,但无论如何父母的控制都被削弱了。因为控制变得公开了,常常使得孩子和父母都不愉快。也许是出于这些原因,几十年的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观看的电视内容所施加的控制少得令人吃惊。

通过书本成人可以对儿童保密,而且他们也能使自己的这种保密成为秘密。相反,电视向儿童暴露了许多成人的秘密,而且也显示了“秘密的秘密”。虽然现在的父母建议图书仍然是成人与成人之间的私下交流,但是它们所包含的(或组成)的秘密每天都在电视上暴露出来。

成人与儿童交往中“秘密的秘密”的重要性在父母建议的许多传统的图书中是不明确的。例如,父母被告知要当心在训斥孩子的过程中出现的“偷偷地笑”,这会显示他们至少部分地感到孩子的不当行为很好笑。父母被警告说,这样的笑会有损于管教孩子的目的。类似地,一位19世纪的部长警告说:

一位护士在有孩子在场时候怎样控制自己的言行都不过分。她绝对不能认为他们只是小孩子,或者认为他们对于面前所发生的事情比她觉察的少。同时,所采用的预防应当尽可能不被察觉,因为如果她让他们知道有些东西被隐藏则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从而使她的最终结果成为失败。

通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旦秘密的存在被泄露,就很难再继续保密。“我不应当告诉你”或者“这是秘密”之类的声明通常会导致要求披露。知道秘密的存在就是知道了秘密的一半。

诺伯特·威纳(Norbert Wiener)就有关美国在原子弹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中表达了这个原理。“如果说有关原子弹的一个应当被保守的,却让公众和所有的潜在敌人都知道而没有进行任何阻止的秘密就是,原子弹建造的可能性。这是非常正确的”。威纳宣称,一旦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知道造原子弹是可能的,他们就已经向答案前进了一大步。同样,一旦电视向儿童提供了成人关于儿童的秘密存在的知识,对成人行为全面而即刻的理解就是第二位的了。电视不必显露出所有的成人秘密;儿童通过确信成人有意识地共谋对儿童隐藏某些东西,他们就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传统成人角色的知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成人使用电视论坛(如脱口秀)讨论如何控制电视对儿童的影响时,其对儿童的知识行为的影响可能最大。

因此与许多宣称相反,儿童通过电视对成人信息的获取不仅仅是父母权威和责任过失的结果。印刷媒介提供的许多过滤和控制电视上却没有。在有电视的家庭中,由于不能将电视机整个移走,无论父母做什么,旧的信息环境都不能全面恢复(即使电视机从这个孩子的家中移走,在朋友和亲戚的家中仍有许多其他的电视机)。

父母在面对电视机时可能显得有些无助,但是允许广播者在电视上播什么的规则肯定会对儿童知道和学习的内容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如果只允许保守的节目如“大草原上的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rie)或者“留予勤奋者”(Leave It to Beaver),而“一天的某时”(One Day at a Time),“不同的抚摸”(Different Strokes)和“银勺子”(Silver Spoons)之类的节目则被禁止,那么提供给儿童的不就是传统上书本的知识吗?不过,这可不一定。

当然,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影响。但是影响的差异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大,那么简单。早期的电视节目如“留予勤奋者”在展示的内容方面比最近的节目如“一天的某时”要保守得多,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节目非常相似:它们都向儿童显示出成人的弱点及存在的疑惑。

正如第九章所述,即使传统上保守的节目也向儿童泄露了成人角色结构的重要秘密。例如,在“父亲总知道”(Father Knows Best)或“留予勤奋者”节目中,在孩子面前父母采用某种行为方式,而他们单独时是另一种方式。父母同孩子在一起时表现的是冷静和有理性,但是当他们只有自己时,就展示了疑惑和焦虑的一面,并且对于“怎么对付孩子”很是生气。

过去儿童图书通常只是展示了成人的“台上”形象,而即使是保守的电视节目也倾向于显示成人的后台或“侧台”景观。儿童观众看到成人在成人中间是一种行为方式,当他们与儿童一起时却是另一种行为方式。他们看到了父母是从后台移到前台区域的。这种形象对传统的成人角色来说极具破坏力。

例如,在“父亲总知道”的一集中(“玛格丽特学开车”NBC 1957年11月20日),三个孩子对父母的关系感到很迷惑。他们想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否曾经打过架。但是当他们的妈妈玛格丽特让他们的爸爸吉姆教她学开车时,将后台的争吵泄露给孩子的轮子就开始滚动了。玛格丽特和吉姆在第一次开车时争吵了一次,但那时他们还足够镇定,说“让我们在孩子面前显得高兴点儿”,他们回到家里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到结束时,驾驶课仍然很糟,吉姆和玛格丽特发现自己在客厅中间相互吼叫。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三个孩子已经下了一段楼梯,靠在支持楼梯的扶手的支柱上(当然按尺寸也是地方)。孩子们目睹了父母的第一次争吵。当玛格丽特和吉姆转身看到孩子时,出现了使人目瞪口呆的沉默。但是孩子们开始鼓掌,说“表演得真棒”,“好的表演”。孩子们宣布(问):“你们是假装为了我们争吵,对吗?”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吉姆和玛格丽特“承认”是,他们

只是假装在吵架。这时每个人都笑了,于是节目结束。

因此,虽然传统电视节目中所描绘的儿童可能是天真的和封闭的,但是看电视节目的儿童则看到了隐藏的行为以及如何将它在孩子面前藏起来的过程。例如,“父亲总知道”向儿童观众展示了父母为了在自己孩子面前显得“知道最多”而处理自己行为的方式。所暴露的成人后台中的行为可能是理想化的,但是从社会动力学的观点来看,所展示的后台行为的特定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暴露了后台本身的存在。如果没有别的东西,通过电视节目,为儿童展示了成人在为他们“扮演”角色。这是巨大的发现(从两种意义上说都是)。儿童年龄大到足以理解这些欺骗时会发现,成人在他们面前所展示的行为并不一定是他们“真实”或者惟一的行为。

这种成年的观点造成的结果是,儿童可能会对成人不信任并更不愿意接受成年人在表面上所做或所说的所有东西。相反,成人则可能感到被电视“曝光”了。从长远来看,试图对儿童隐藏什么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传统上的“成年”并不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就形成的,它是一种行为风格,部分地是由大的后台区域所支持的。例如,在特定场景中成人的行为总是有孩子气,但是却极少在孩子面前这样做。因为电视模糊了成人后台行为和台上角色的分界线,许多孩子气的行为出现在新的公共成人角色中。电视对“成年阶段”——它的保守秘密以及秘密的秘密——的暴露破坏了传统上童年的天真角色和全知的自信的成人角色,并造就了一种向“中区”的、单一年龄行为风格发展的运动。

当然,电视时代之前的儿童通过与父母住在一起目睹了许多后台的成人行为。但是在那时,很小的孩子观看、评价和理解他们目睹的行为所用的观念还非常狭窄。正如许多自传所显示的那样,儿童常常将自己父母的行为认定是理所当然的,除非同家人以外的其他成人的新经验给了他们对成人世界新的理解。在自传中所提到的一项1946年关于家庭客人的角色的研究中,詹姆斯·博萨德(James Bossard)和埃莉诺·博尔(Eleanor Boll)指出,客人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向儿童显示成人行为的不一致。“儿童常常有机会在家庭圈子的私下场合中观察到,父母的行为并不总是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但是成人一起的集会能增加这种观察的机会,这时这些成年人非常友善

或者快乐,并忘记了年轻一代人正在细致地观察”。^{*}

其他不寻常的情景可能也会导致儿童与成人生活的后台首次发生冲突。这样的场景记录在安妮·弗朗克(Anne Frank)的二战日记中。在躲避纳粹时,安妮同她的父母、姐妹以及另一个家庭被推进了一个封闭的但没有个人隐私的地方。成人无法隐藏他们的许多后台行为。给安妮最大的震撼之一是关于成人所展示的不良行为。她写道:“为什么大人那么容易吵架,吵架那么多,而且是为最愚蠢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只有孩子才会发生口角,而且随着长大就没有了。”安妮对成人的印象和敬畏被粉碎了。但是安妮仅观察到了“玛格丽特学开车”中孩子观众所发现的东西:父母吵架,且试图对孩子隐瞒他们的愚蠢和弱点。

对老的电视节目如“留予勤奋者”的赞扬是根据一个简单的假设,即孩子对电视的主要反应是模仿他们所看到的行为。但是通常忽略了电视可能提供了一种儿童用来帮助自己理解和评价成人社会表演的信息。因此,虽然一些电视节目展示的内容可能是保守的(父母总是对的,恶棍总是被抓住,以及所有事情的结局都是喜剧),对成年人角色结构的潜在暴露,可能实际上会导致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相同行为的破坏。即使看起来保守的节日可能通过显示成人的秘密以及秘密的秘密而削弱传统的成人与儿童角色。

这种分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电视节目近乎“极端”的内容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这些节目中所描绘的父母常常根本没有私下的后台区域。例如,“一天的某时”中的母亲,和“银勺子”中的父亲,在自己的孩子面前的疑惑、愤怒和焦急。虽然许多人对成年人的这种描述感到失望,但是成年人较新的电视形象与旧的形象相比给了现实中儿童相对较多的成人秘密的接触。主要的变化是虚构的儿童角色现在没有原来那么天真了。电视上所展示的成人和儿童的交往虽然常受到谴责,但可能代表了一种对展示内容的调整,以适应早期电视节目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获取

^{*} 至于里奇和科勒对客人“发射机”角色的描述,以及博萨德和博尔所指出绝大多数客人的功能也被电视挑选了:评价父母行为的外在标准;家庭相对地位的度量;儿童对社会信仰和习俗意识的增加;学习社会行为规则的来源;导致儿童特殊权利的家庭活动的改变;对儿童的智力刺激;家庭冲突和紧张的来源;整合进家庭“遗产”的秩序和“提示词”的来源。

模式。’

媒介特写：超越了电影和广播

如果电视由于绕过了印刷媒介的过滤而对儿童与成人的交往产生影响,那么这个过程肯定是始于早期的媒介,如电影和收音机广播。虽然电影和广播毫无疑问有一些初步的同化效果,但是两种媒介都不具备电视的所有相关特性。

电影的听觉/视觉编码类似于电视,但它们与电视的显著区别是它们的物理特征和参与的环境。例如,为了看一场电影,孩子必须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儿童必须得到成人的许可才能去看电影(或者带他们去),成人如同电影院入口的守门人。这些限制使非常小的孩子不可能经常观看电影,但他们每周可以看许多小时的电视。即使是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在电影最高潮的时代每周所看电影的时间也比不上现在年龄更小的孩子每周看电视的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佩恩(Payne)基金对电影的大量研究发现,大多数的美国儿童“经常”去看电影,但是这“经常”指的是5~8岁的儿童平均每月不到两次,9~19岁的儿童每周一次。

对于电影来说,一个孩子必须选择、前往、付钱才能看一场电影。这种选择过程非常不同于可以为儿童提供不用寻找的信息的偶然的、按按频道的电视观看。另外,在一些方面,电影院的孩子比在家看电视的孩子更加屈从于成人的权威。正如电视批评家罗伯特·刘易斯·谢昂(Robert Lewis Shayon)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家中,引座员的形象,或者电影护士,成人严厉的形象,权威的世界,并没有在电视屏幕上展现出来”。

因为成年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性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可能对电影

·当然,成年人可以选择在电视上仅播放那些包含从传统儿童图书中能获取的信息的节目。因此,这项分析仍好像是对电视内容的传统讨论,而不是针对信息系统结构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电视和书籍的场景区别。这里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人审查儿童电视,他也就审查了成人电视。与书不同,一个电视节目不能仅仅面向一个特定的年龄群体。成年人只能是让最小的孩子随意看电视或者与各种年龄的儿童共享大部分的节目。那么决定怎样对待电视就类似于住在一个房间的一个大家庭对语言和行止的决定:控制一个年龄段的儿童的经验也控制了其他儿童和成人的经历,并且几乎所有适合年龄较大儿童和成人的信息都向年龄较小的儿童暴露了“成人的秘密”。

和电视的这种差异的认识比儿童意识到的要少。一位小女孩在一项早期的研究中告诉采访者：

如果我必须选择一样，它就是电视。因为在买电视前有许多次我会说，“妈妈，今天我们能去看电影吗？而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不行，天气太坏了”，或者是“不行，我得去商店买东西”。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有了电视，在雨下得最厉害的日子里，我可以看牛仔片，谁还会去看电影呢？另外，在晚上我就有理由晚睡觉了。“就让我看完这个片子吧。”“好吧，就这一次。”妈妈每晚都这么说。如果我没有电视，你想每晚我会找到事情做吗？

电视也比电影更亲密。它在家庭中的出现使它更接近家庭活动的中心。而且常常它就是中心。许多家庭成员聚在电视机周围，就像早期家庭成员聚在火炉旁一样。许多电视观众，包括儿童，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也开着电视。所以电视融入了日常生活，其方式完全不同于看电影的行为。

电视的内容常常与它独特的参与场景相匹配。例如，系列幽默剧和肥皂剧中的虚构家庭生活模仿了真正“家庭时间”的过程。当电视观众追随与真实生活中各周“情节”相似的电视情节的活动时，电视人物就成了扩大了的家中的一部分。而同样新闻播音员，谈话和猜谜节目主持人，每天都进入家庭中参与讲故事和娱乐。

另外，电视的小屏幕与低质量的图像都要求在电视节目大量使用特写镜头。因此，电视的表演甚至比电影的表演更柔和（出于同样的原因，电影表演比舞台表演更柔和）。很宽的风景图、远景以及全景在电视上很难看得清楚。巨大的史诗式的概括行为更适合于电影，而不太适合小的屏幕。因此，电视的主题问题倾向于更加亲密、个人化和“普通”。——换句话说，在传统成年人形象虚伪的外表下更多地暴露了裂缝。

广播在某些方面也类似于电视，但在其他方面则非常不同。广播与电视的共同之处在于不离开家就能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与电视一样是家庭的一个新门户。而广播的编码是全部的听觉的和语言的，没有图像。小的孩子对听觉信息的解码不如对视觉信息的解码。即使当儿童的年龄大到足以理解广播上的话时，广播也不一定给儿童提供与成人相同的信息。由于广播没有画面，广播听众

必须根据过去的经历去创造自己的图像。这显然是将没有经验的孩子置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如果一个孩子从未看到过谋杀或引诱,广播便不会为儿童“填充画面”。在电视时代之前的儿童通过听收音机中的戏剧毫无疑问地知道了许多成人的秘密,但是与电视相比,广播几乎没有能力完全“暴露”成人生活隐藏的诸多方面。

广播与电视相比,允许隐藏更多成人的后台区域。想一想广播信息让人觉得多么亲密和个人化,但它们传递的后台信息少得让人吃惊。广播可以隐藏播音员读准备好的稿子这一事实。广播隐藏了紧张的扭动和流汗的额头。广播可以使一位总统像一名勇士,即使他可能是坐在轮椅上面对麦克风。另外,广播对语言的依赖常常使听众进入一个高度抽象的世界。一个受欢迎的广播系列是由神秘的“黑衣人”介绍的。在一些广播剧中,问题由“上帝之手”解决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形象”在电视这种视觉媒体中很难有效地展示。穿着特定黑服装的具体人的画面或一只特别大的手的图像与相应的语言图像传递的信息是不相同的。在广播中,我们被告知要抵御对“恐惧的恐惧”,而战争是为了“自由的精神”而战的。正如第6章所述,这种抽象不可能用视觉图像表现出来,即使当这些词是在电视上说的,它们也会在更加具体(因此印象不深也不神秘)的日常物品、举止和行为的画面中找不到了。由于电视这种“表象的”而不是“抽象”的偏向,它的讯息倾向于避免这种高度的抽象。即使是最仪式化的表演——如政治演说和宗教仪式——在电视上也常常变得不正式。

因此,虽然广播常常被认为非常“形象”,因为它要求听众创造一幅画面,但是广播的画面和电视的画面是不同的。这些媒介在影响儿童对成人生活的观念时有着不同的潜力。与电视相比,广播是一个“台上媒介”,而电视暴露了人、行为和事件的后台方面。

学校混合的年级

与家庭不同的是,学校没有生理的或自然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学校是一个“信息散布”机构,大的文化的信息系统的任何主要变化都会对它的功能和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印刷媒介为主的社会中,学校是一个有双倍力量的机构。学

校不仅教给孩子社会知识,而且它也教学生获取进一步信息所需的技能:阅读。在电子社会之前,学校本身就是一种主要的渠道,儿童通过它打破了围绕在家庭场合的障碍,并且获取更大世界的信息。

当印刷媒介是儿童学习了解成人世界的主要手段时,学校就可以认为一个孩子所知道的和能学习的内容主要取决于其阅读水平。而阅读程度大体上与儿童的年龄相关。因此根据生理年龄将学校分成许多不同的年级似乎很有道理。学校分年级的结构与印刷的信息特点密切相关、印刷媒介允许有信息的隔离和分级。而由于阅读技能的不同,就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信息系统。年龄很小的读者的课本要简单,这导致了它自己成为成人生活仪式般的陈述,并且是简化的观点和理想化的版本。

按年龄分级的学校不仅给每个年龄群体某种知识,而且也有意识地保存了一些信息。学校的课程计划按照一定的顺序展示知识,实质上是保守秘密的一种固定模式。在低年级,基本的文化理想,角色简化概念以及社会过程被展示为现实。在面对小读者的校外读物中,世界上充满了总是做正确事情的高兴的父母,总统从来不撒谎,社会机构有着令人尊敬的目标并且总是平稳运转。随着儿童爬上读写能力这一阶梯时,有更多的信息被提供出来。神秘和“事实”一步步地被并列提了出来,人和制度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陷就暴露了出来。

在学习的每一个新阶段,儿童都有一种处于“知情者”的感觉。教授给一年级学生的东西,他在家中的弟弟、妹妹不知道;二年级学生学的东西一年级学生不知道,等等。每一个新的水平都是对早期的水平进行批评。当学生知道一年或两年后他们听到的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只是为了给孩子编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大笑。当几年后他们知道华盛顿将军是一位很差的将军,托马斯·杰佛逊曾拥有奴隶,格兰特总统的政府极端腐败时,可能会只微笑一下。在教育的一个新水平上,儿童被教授了一些比他们小的儿童不能知道的新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按年龄分级的学校制度通过不断地向他们教授秘密,从而得到了他们的忠诚。每一年都是进入一个新领域的旅行,更加接近成人生活的核心。每个年级都对已经学过的内容提出一种更成熟的看法。当儿童到达高等教育阶段的时候,这个过程可能已是完全自省的;而学校体制和教育角色本身则可能会

成为分析和批评的对象。

虽然我们将这个结构看成是教育孩子的自然的方法,但是对儿童按年龄分级则只是最近的一项革新。在16世纪,道德家们开始抱怨学校中不同年龄的儿童混合在一起;而到17世纪末期一些欧洲学校引进了按年龄分年级以及按年龄分课程的方法。但是这种做法,直到19世纪才成为普遍的。例如詹姆斯·麦克拉克伦(James McLachlan)在他对美国寄宿学校的研究中指出,在18世纪末期,各种年龄的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在麦克拉克伦研究的那所学校里,一个班的学生年龄范围是6~30岁!约翰·萨默维尔(John Sommerville)将学生按年龄分级看成是19世纪“童年标准化”的一部分,它涉及了对儿童不现实的偏见以及缺乏对个体差异的注意。

即使是对学校持同情和赞同态度的观察者,如奥斯卡·里奇和马文·科勒也都指出,教室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儿童与许多其他年龄想仿的儿童被限制在一间教室里。与仅差一岁的其他儿童的交往也是相当少的。按年龄分年级的制度要求生理年龄与智力及社会年龄的成长一致。这个体制没有照顾到发育“异常”缓慢或者早熟。儿童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他们必须完成同一教室中要求其他人完成的任务。活动和说话被严格禁止。教师取代父母,掌握了权威。信息流——特别是在低年级——是线性的和单向的,从教师传到学生。

但是电视绕过了这个线性的顺序。与书本不同的是,电视没有将观众分成不同年龄的隔离人群,没有按特定的次序为儿童展示信息。有了电视,使得攀上社会知识阶梯的分级不再清晰。

儿童接受社会信息的旧顺序被打破,形成一个新的世界观。通过电子媒介,幼小的孩子甚至在学校学习神话和理想之前,就目睹了与那些神话或理想相冲突的“事实”。儿童看到了政治家颜面扫地,警官和老师游行示威要求长工资,家长因打孩子而受到谴责。通过电视新闻和娱乐,儿童对“真实”生活的性质了解得太多了,他们并不相信老师试图教给他们的理想。结果不仅仅是他们成长得快,而且他们长大后对社会与角色的看法与过去的儿童所持有的观点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传统的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学校制度中,儿童在了解社会现实前先学习神话和理想。社会的“现实”不一定会消除神话,而是将

它们看成是一种前景。神话和事实是不同的。但同样都是现实。一个是社会理想的体现,另一个是对社会现实观察的结果。它们是互补的:我们所希望事情的状况与由于人类脆弱所引起的事情的通常状况。前者是后者看不见的模型。电视极大地破坏了这种两极的现实。

电视引起的结果是,老师对信息的控制根本是不完全的,学校按部就班地为每个年龄群体散发信息的模式被绕过去了。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已无法指望孩子们会把他们当成全知的权威。现在学校的儿童不仅知道老师未曾听说过的事情,而且还知道成年人知道的事情。教育者的台上行为由于电视将其后台暴露而受到了损害。因此,无论学校怎样做,可能也无法重新获得其过去对信息的那种垄断。

上小学一年级前看过几千小时电视的孩子仍需学习许多东西。但是老师不能再假定那些不会阅读的孩子对“成人”话题一无所知。现在开始上学的孩子对整个文化已经有了非常宽广的镶嵌式的印象。学校仍需为孩子们填充细节以及更正某些错误的看法。但是学校不能认为,它的功能是伴着一个孩子从完全无知到社会启蒙如此一个缓慢地爬上读写阶梯的过程。如果儿童对现在的学校失去耐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是许多学校教给学生的东西不够多。儿童可能根据某种标准形成一个群体,但这种标准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与他们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维持学校纪律以及教会学生阅读和其他的课程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多地在于学校的过时的结构,而不是儿童基本能力或学习的愿望突然发生了改变。

一些教师可能欢迎儿童知识的增加,但许多教师却不这样。我不知道是否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调查,但是我听到过许多小学教师非正式的评论,他们抱怨学生“知道得太多”。一位老师的“总统的伟大”一课被一个学生打断,这位学生抗辩说他从电视上知道尼克松总统是一个恶棍。另一位老师向我抱怨,他的学生想讨论最近电视直播的拳击比赛,那么一位年轻的韩国拳手被一拳打倒后死去了,他认为这个话题对年轻的头脑来说“太成人”了。而我的两位朋友受到了老师的斥责,因为他们的女儿完成的三年级的作业,是通过描述观看电视上试图刺杀里根总统时詹姆斯·布拉迪被枪杀时的样子来“写一篇故事”。在传统的按年龄分级的课程中不可能为学生提供这种

“高级”的知识。

对学校问题的最普遍的两个反应都是针对表面的症状而不是根本的原因。当儿童不能达到“同年级水平”的读写时,一个反应是“返回过去”,并且试图将儿童和学校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当儿童在家看着大量的电视,并且似乎对老师的“现场”表演不感兴趣时,一些老师将录像带和电影带入教室以维持学生的兴趣。这两者都不代表对学校的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信息环境。前者忽略了变化,后者则放任自流。

显然,描述学校体制问题的来源要比提供明确的答案简单得多。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学校废止按照年龄将儿童分离的严格的年龄分级体制。电视使人的生理年龄与社会知识之间的关系弱化,家用计算机和其他电子媒介更为广泛的使用会使这种关系进一步弱化。

就像所有延续了几代的社会习俗一样,按年龄分级的结构现在似乎呈现转向自然的印迹。围绕着它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奖惩的体制。家长在孩子“跳级”时会高兴,在孩子“留级”时会感到羞耻。然而导致并支持这种体制的社会信息环境现在已被电子媒介改变了。将一个大几个月或者小几个月的孩子与其他孩子分开似乎已找不到什么理由了。另外,即使发现在某些课上(如阅读)仍需将儿童分成相对一致的年龄群体,但也没有理由让学生在其它课程中总是分成不同的年龄组,例如,在对政治、家庭生活或者当前事件的讨论时。

这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学校要生存,它必须要维持一个“知识界限”。学校必须不断地让学生感到,正是由于学校他们才“处于知情”的状态。学校必须适应这种新的信息环境。不能只是不情愿地接受儿童在校外所学的内容,必须超越这一点。学校所传授的东西一定要比在其他地方能够学到的更多。

阅读仍然是学校的王牌。毕竟即使阅读不再是获得间接经验的唯一手段,读写仍然是通向哲学、科学、诗歌世界的大门,并且它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考和感知的方式。另外,如果计算机继续沿着它目前的道路发展,读写将是接触电子存储信息所需的关键技能之一。然而如果孩子面对的图书和计算机程序,所能告诉他们的有关世界的知识比他们已经知道或者从其他途径学到的少,那么他们就会没有了阅读的动力。

对学校制度的另外一种潜在的拯救方法是使其意识到自己在培养那些从写作到计算机等所有传播技术都不能传授的技能和经验中的作用,包括系统的获取知识、解释、批评,以及学习和思考的“方法”。这种技能的另一个关键例证是与其他人交往的能力——说、听、辩论和探讨。这种技能在混合年龄及混合背景的班中得到极大的强化,不同观点的人们可以相互学习。

读写能力及童年与成年的“发明”

249

如果电视能改变童年和成年的社会意义,那么就开始推理,认为这些人生阶段不是人类的自然或不可缺少的状态,尽管它们已在我们的文化中确定下来有许多代人的时间。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的所有论证中都有一个暗含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对童年和成年的旧观点至少部分地依赖于印刷,在原始的口语社会中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存在。

童年的历史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我们传统的童年观念与印刷有着密切关系,而这种观点也已经有了初步的但也是有力的支持。虽然对童年的各种研究指向了不同时间、国家、阶级以及宗教对儿童态度的波动,但是一个相对一致的理念是,16世纪一些阶层对儿童的态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个世纪中,本国语言的读写和印刷开始在整个欧洲传播。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对儿童特别的关注。但是从16—20世纪,儿童被越来越多地从成人社会中孤立出来,并且被看成是需要特殊照顾、保护和限制的群体。

有关童年历史最有名的著作是非莉彭·埃里斯(Philippe Ariès)的“世纪童年”(Centuries of Childhood)。埃里斯最惊人的论点是,童年是16世纪“发明”的。按照他的说法,作为人独立阶段的童年观念在那个时期之前根本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年龄并不能决定社会地位或角色。一旦度过婴幼儿期,儿童就开始参加成人的活动,而且他们通过直接的经验学会生活。

儿童在成人身边工作,同成人一起在酒馆里饮酒,与成人一起赌博,与成人一起参战,并与成人睡在一起。儿童和成人玩着相同的游戏。儿童和成人没有特殊的服装,不存在儿童不应知道的话题、词语或者活动。埃里斯(Ariès)指出,即使中世纪的艺术也常常将儿童描

绘成“小大人”，他们的服装和面部表情与他们的父母相似。

只有少数的正式学校中存在（主要是训练神职人员）不将人分成不同的班级。埃里斯观察发现，中世纪学校的特征是“缺少根据问题难度的课程分级；各种课程同时教授，各种年龄学生的混合，以及学生的自由权”。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他们能找到住处的地方，可以携带武器、喝酒及赌博。

埃里斯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法国，但是他的观察结果得到了其他欧洲国家历史学家的赞同。例如劳伦斯·斯通指出，16世纪之前英国儿童常常被他们的父母所忽略。有钱人将婴儿送给保姆照料直到大约两岁，而当孩子七八岁时所有阶层的人都打发他们离开家，通常是在另一户人的家中干活。斯通观察发现成人与儿童几乎没有联系，而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几乎没有隔离。儿童观看死亡和实施刑罚，目睹性行为，且自己也常常参加性游戏。

这样，虽然在生理意义上儿童一直存在，但是印刷前的西欧口语社会中并没有赋予他们特殊的社会角色或行为。

但是，从16世纪开始，新的儿童概念开始出现。埃里斯勾画了儿童从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演化成需要特别的照料、爱、约束和不能受邪恶侵害的弱小而无知的人的形象。在早些时候，儿童同他们的父母一样，暴露于同样的暴力和粗俗的民间故事之中，而现在儿童被认为太天真，不能完全分享“成人”的信息。神职人员开始要求儿童只能阅读经典名著的简写版。有关儿童礼仪的以及指导他们父母的特别的书被印刷出来。而孩子们应当单独呆在一起，应在旅行和活动方面受到限制，并应分成相同的年龄群体等，这类观点开始形成。到20世纪早期，“实际上，非常相近的年龄群体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随着按年龄分级学校的传播扩散，儿童的早熟——过去被看成是正常的——开始被看成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儿童的年龄成了他们应当知道什么，应当去哪儿，以及应当做什么的一项严格指标。

斯通也指出了16世纪对儿童态度变化的第一个证据。在早期，父母对非常小的孩子的死亡并不十分悲伤，但是在16世纪，已经死去很久的孩子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他们父母的墓上。斯通看到了从那时开始，至19世纪达到高潮的对儿童态度的演化，人们开始将儿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阶层”。

对童年的新意识并不一定会产生“更好”的照料。实际上，对儿

童的早期关注通常引发了粗暴和严格的纪律。斯通指出,儿童的“天真”,最初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讨论的,它很快“被解释成易于犯罪”,埃里斯认为孩子气的天真使得要“保护它不受生活的污染”。最初,父母有“强烈的决心”,特别是清教徒,“去打破儿童的愿望,强迫他们完全遵从比其年长的人,特别是父母的权威”。正如17世纪的一位部长所说,儿童“不应知道,如果能不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自己也有愿望”。16世纪的英国儿童应当在父母面前下跪,分别称父母为“太太”和“先生”,而且父母在场时不能戴帽子。

虽然儿童开始被隔离出成人生活的一些方面,但是最初他们并没有同死亡隔离开。许多年来,用死亡和永远诅咒的恐惧来吓唬小孩使其虔诚。儿童被带去看绞刑和尸体,并且鼓励他们在还来得及时“皈依”基督教(年少儿童的死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个事实给年幼的头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在17世纪,不服从父母在马萨诸塞州可以被处以死刑。

后来,对儿童的新关注在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演化,演化的方向被斯通称为更加现代的“母爱的,面向小孩的,喜爱的和许可的情绪”。这种变化在不同的国家、阶层和宗教信仰中发生的时间各不相同。到19世纪,“原罪”以及小孩需要同基督“交谈”的信仰被人们抛弃了,更倾向于将儿童看作最差的情况在道德上也是中性的,而最好的状况会是成人罪恶的天使般的拯救者。

虽然从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对待孩子的差异很大,但是也有种潜在的一致性,它将该时期与早期及现在的潮流分开。无论孩子被看成是魔鬼潜在的邪恶工具还是能够拯救成人的天使,无论孩子要在父母面前下跪还是沉迷于自己的奇想,他们都被看成是一种不同类别的人,要同成人世界隔离开来。在中世纪的社会里,儿童和成人自由地组合;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不久以前的趋势是将儿童隔离在他们自己的机构和子文化中。那么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16世纪会形成儿童隔离场合的观念,以及在最近几年里又为什么显著地淡化了呢?

埃里斯也不确定为什么“童年”会突然形成。最初他提出一个人口统计的原因:童年只是在婴儿死亡率下降之后才存在,因为父母不可能同会死掉的孩子太密切。但是埃里斯承认,婴儿死亡数目的下降是童年“发明”后许多年才出现的。“按照统计客观地说”,他指

出,“这个观点应当出现得很晚”。

斯通认为,对儿童的新关注是由清教徒们促成的,他们是宗教上的少数,他们需要自己的信仰永存,而不能依靠大的社区对他们的孩子进行社会同化。类似地,约翰·萨默维尔将16世纪对儿童关注的增加归因于宗教改革和许多“社会运动”的兴起。为了促使社会变革,许多群体依赖于获取自己孩子的忠诚。

毫无疑问,对于童年的社会观念的根本性变化有多种原因,但在本书中提出的分析认为,印刷和读写能力的传播可能是“天真”儿童出现的首要因素。为了能完全共享成人的文字世界,一个孩子必须学习阅读。事实上,斯通和萨默维尔在描述童年在清教徒中传播时忽略了一件事情,清教徒相信阅读《圣经》是获得拯救的一种手段,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还不会阅读的儿童的看法。

埃里斯和其他历史学家所描述的童年成长的许多其他特征也支持了这一分析。童年作为人生中一个独立的时段,首先在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中形成,就如同读写一样。男孩被认为是儿童要比女孩更早,这也许因为男孩被送到学校学习阅读和写作,而他们的姐妹则呆在家里,穿上成年妇女的衣服同她们一样工作的原因。

正如埃里斯在其历史著作中所指出,童年的传播非常类似于学校和教育的成长^{*}。即使当学校开始重新定义童年观念时,学校外面的孩子仍然受到像成人一样的对待。例如在17世纪,学校里孩子同成人分开,但是在军队中他们却仍与老兵混编在一起。一些男孩在很小时就从童年的世界——学校——进入男人的世界——军队。“克洛德·迪·博纳瓦尔(Claude de Bonneval)生于1675年,9岁时进入了耶稣会会员大学。他11岁离开……在皇家海军服役成了一名海军。13岁时就成了海军中尉”。

* 如果读写能力和童年是相关的,那么我们会问,为什么中世纪的学校没有产生清晰的童年观念或者将学生按年龄分级呢?有趣的是,中世纪的学校更加关注道德而不是读写。由于手稿和书写材料价格的昂贵且数量稀少,甚至老师和神职人员也需要大量的记忆。在手写文字时代,“知道”仍然意味着记住。埃里斯指出,“写似乎是一种避免这种努力的令人怀疑的工具”。类似地,伊丽莎白·艾森斯坦指出“外部某些短暂而特别的中心……手写文化的组织结构太薄弱,甚至有文化的精英也极大地依赖口头的传达”。H. L. 蔡特观察发现,中世纪的修道士阅读得非常缓慢,他们“处于我们的那种喃喃而语的学生阶段”,大声地、断断续续地读。直到印刷书籍扩散之后,流利的读写才成为关注的中心,而到那个时候教育者才开始想到根据人们对这些技能掌握的水平将他们进行分离。

图书影响的不断增加使得它们的形式发生变化,突出了对于儿童差异的新观点。在18世纪,儿童文学开始从迂腐的道德说教和令人乏味的训练中转移到娱乐书籍和不太庄重的游戏上,形成了完整的儿童子文化:儿童的神话故事、玩具、生日庆祝、儿歌等。但是这种发展仅发生在有文化的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中;在穷人阶层,童年的观念到很晚时才产生。在19世纪,许多未受教育的儿童继续在工厂里父母的旁边工作。萨默维尔指出了其中的讽刺性,即,童年的广度和深度在19世纪同时达到了。受教育的孩子赞美自己的特殊的书籍和玩具的子文化,而贫穷和文盲家庭的儿童则常常提供劳动力来支持这一子文化。例如,出版商雇佣下层社会的儿童去手染中产阶级儿童书中越来越多的雕版印刷图案。

19世纪,当全民教育的理想成为现实时,童年就扩散到了下层社会。儿童很小就被送到学校并且要在那里呆很长的时间。儿童和课程按年龄的分级也变得越来越严格。

历史文学中包含了许多有关读写在儿童和成人不断地隔离中可能发挥作用的暗示,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此没有明确的评论,这有些奇怪。例如,斯通指出对待孩子的新方法最早起源于最有文化的群体,但他将这归因于有文化的人对于“新观念”的开放。另外,虽然斯通认为,读写在男性中较广泛的传播导致了妇女相对地位的降低,但是他忘记了将这个论点进行扩展,应用到儿童和成人地位的变化上。无论如何,斯通确实观察到——没有分析——对正确教育儿童的新关注怎样导致父母以新的方式“干预”儿童的自由。斯通和其他历史学家所提供的一般数据说明,学校的成长和传播,类似于某些东西不宜让儿童知道这种观点的形成。

萨默维尔也为童年的诞生过程中读写的作用提供了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思路。他指出,在读写传播前,各种年龄的人都喜欢听我们现在称为“哄小孩的故事”的东西。“而从那时起发生的变化是,成人‘长大了’,并且将这些故事留给了儿童。这部分是读写产生的结果。读写发展了人们批评的能力但却造成他们的想像枯萎……也许是在现代之前的早期年代中,成人更具有孩子气”。

在其他方面,萨默维尔指出,当“成人长得太大并且被禁止参加过将各种年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唱歌、游戏和跳舞”时,社区传统的变化就发生了。虽然萨默维尔曾简要地指出,读写对于成人不再

孩子气负有责任,但是他忽略了考虑事情的另一面:读写使得儿童不太像成人。

据我所知,惟一明确地将读写与童年发明联系起来的历史学家是艾森斯坦。她不是在童年的历史中说出来的,而是在她大量研究印刷媒介如何使社会知识发生革命时提出的许多论点之一。艾森斯坦认为,童年的新观念可能与“‘从干中学’到‘通过阅读学’的重要变化”相关联。她说,印刷的机械特性和机械精确所造成的潜力引起了对系统、方法和后果的普遍好奇。另外,印刷工业的成长允许市场和观众的隔离。某些书开始就只面对老师或父母,而学校的课本是一种新的结构,对于一个给定的科目它按照循序渐进的步骤带着学生从基础水平到高级水平。“当印刷材料的消费者认同这种顺序的学习阶段时,儿童就接受了一种不同于中世纪学徒、耕童、生手或童仆的发展过程”。

艾森斯坦说,印刷和读写的传播也根据“积累认知的进步和增量变化”创造出一种“成人思维”。实际上,通过缺省就创造了童年。“实际上,成人的活动受到图书有意识的思考的控制越多,小孩自发的和冲动的行为所提供的对比就越是显著,这样重塑其年轻的‘身体和灵魂’所需的努力就越费劲”。

读写和童年之间潜在的联系需要更多额外的历史研究。我们要追踪读写的线索看童年是否也紧随其后。当然这样的研究有着许多困难。例如,还没有确定如何定义“读写”。正如艾森斯坦指出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基本的读写和习惯性的读书之间有巨大差别。“学习阅读不同于……通过阅读学习”。儿童与成人在后一种情况下的差异最显著,这也是合理的。一对父母越是有文化,其儿童肯定是显得越“孩子气”。但是在过去,发现读写的程度是极端困难的(大多数的研究必须依靠教区或法庭记录中的签名和标记的比例,这种方法可能对于联系成年和童年的观念不够敏锐)。另外,由于穷人阶级有时模仿中产阶级或富人养育孩子的风格,在穷人阶层有文化之前可能会出现一些童年的痕迹。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19世纪的社会改革者将“童年”强加于穷人。研究读写影响的最好机会可能是当时要转入文字社会的口语社会。但是即使在这种变化的“自然实验室”中,也由于读写和电子媒介的同在而使影响变得更复杂。因此在一个大的范围内,我们可能不得不依靠联系读写与童年合理解释以及它们之间的一般历史关系来研究。

读写创造“童年”的论点,可能在开始时显得很容易得出并带有神秘的色彩。但是社会地位的相似性依赖于平等参与社会交往的能力,这样的参与依赖了交流的技能,而对此进行讨论是符合逻辑的。在中世纪原始的口语社会中,儿童被看得与成人的区别较小,可能是因为儿童到七八岁时通常就掌握了语言的基础。印刷和读写可能对文艺复兴有了很大推动,但是它们同时也为儿童和文盲创造了一个新的、长期的黑暗年代。

印刷媒介使儿童从成人世界被赶了出来,其方式和程度在口语文化中是难以想像的^{*}。要想知道成人知道什么,为了能够参加成人的印刷交往,现在要求必须有多年的求学和训练。印刷媒介允许纯成年人的交往,家长和老师能“私下”讨论如何对待孩子,教给他们什么,不让他们知道什么。一个弱小天真的儿童形象应当是伴随着印刷媒介不断增加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惊讶。儿童开始被看成是非常“天真”的,不再是即刻的道德感觉(它形成得较晚),而是指经验和知识天真的意思。相反,随着成人越来越能够对儿童隐藏自己的疑惑、焦虑和孩子气的行为,他们在形象和声誉方面便有了收获。

本文所分析的印刷在“童年”和“成年”兴起中所扮演的潜在的角色进一步支持了下面的论点,电视可能是更进一步同化成人与儿童角色演变的一个主要因素。再说,我们社会中信息传播的方式谋划反对控制儿童对成年和成人角色的了解。儿童仍然要通过一系列的认知和心理阶段,但是信息暴露的社会阶段被模糊了。与印刷相比,电视上可获取的信息的水平和类型没有固定的次序。电视破坏了阅读阶段和学校体制中具体年龄所处的年级所支持的信息等级制度。

* 当然,并不是读写本身的存在导致了“童年”和“成年”,而是它将成人和儿童的信息系统分开的可能性增加了。由于场景的隔离是关键的变量,在各种口语文化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童年和成年区别的一些证据,儿童不能到某个地点参加某些讨论——但是在读写和按年龄分级的学校扩散之前我们很少能看到将童年分成狭窄的、一年一个的阶段。相反,即使在技术上有文化的社会中,某些社会场合可能打破了读写所形成的信息系统的差别。因此,在美国早期的许多殖民定居点的儿童仍然被看成是“小大人”,因为严酷而原始的条件很难将儿童隔离开。类似地,童年在穷人阶层也“延迟”了,这不仅是由于读写传播的缓慢,而且也因为拥挤的条件以及成人缺少隐私权利。童年在许多农村地区也消失了,因为儿童仍然在成人身边每天工作许多小时,而且还因为人口的低密度常常需要在只有一间房的学校中将各种年龄的儿童混在一起。

实际上,印刷媒介所激起的对线性的“顺序”和“阶段”(包括社会发展的阶段理论)的迷恋似乎从我们的文化中消失了。

电视使得成人很难为不同年龄的人创造不同的信息和行为世界。正如,假使我们在同一间教室里教所有的学生,就不能区分不同年龄学生的社会地位,如果我们通过电视向每一个人暴露相同的信息,我们也无法清楚地区分其地位。基础的发展过程和我们文化中读写重要性的持续存在给童年和成年的同化设定了一个限制。当然过去行为的明显差异已不再被支持了。

印刷媒介中的反映

电视引进后不久,新的儿童与成人信息系统以及成人的恐惧开始在成人的故事中反映了出来。例如,在1951年的一个科幻故事,“非洲大草原”(“The Veldt”)中,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描述了“快乐家庭”,它是一个隔音的房子,自动地为其中的人提供食物、衣服和洗澡水。故事中电视的类似物是幼儿室,它是一间大房子,并且可以变成孩子们所期望的任何环境。父亲想,“这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没有什

么过分的”。但是快乐家庭中的儿童并没有按照父母赞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个幼儿室。孩子们不停地将幼儿室变成充满空间的树叶及丛林野兽的炎热恶劣的非洲大草原。这使得父母对孩子们使用该室的关注增多了,他们试图阻止孩子们进入其中。但是孩子们对父母的行为非常愤怒,并对他们撒谎,力图使他们平静下来。总之,为了能重新接触他们的幼儿室,他们会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当他们被锁在门外时,他们竟会破门而入。

为此一位心理学家的朋友被请来,他向家长解释了幼儿室如何改变了家长相对于孩子的角色。“你已经让这间房子在你们孩子的感情上取代了你和你的妻子。这个房间是他们的父母,在他们生活中,比他们的亲生父母重要得多。现在你们想把它关闭了,为此受到孩子们的憎恨就毫不奇怪了”。

布拉德伯里的孩子害怕快乐家庭被“关”,他们会失去对幼儿室的接触,于是最终抛弃父母。他们让大草原的一些居民把他们吃了。

“非洲大草原”中的信息具有两面性:幼儿室不仅自动地绕过了

传统的父母功能,而且它也给了孩子们控制自己命运的方式,并且用他们新发现的力量与自己的父母进行对抗。布拉德伯里对幼儿室的描述极大地讽刺了电视对家庭权利结构的影响。

在布拉德伯里对快乐家庭描述后的20年里,童年、成年以及家庭交往的新观念也进入了儿童的文学。正如第十一章“媒介内容循环”部分中所描述的,一旦儿童在电视上接触了成人信息,那么他们接受传统儿童文学中神圣的、理想化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困难。

在指导潜在的作家时,理查德·巴尔金(Richard Balkin)向他们指出了有关儿童图书新规则的警告。“如果自从你自己的青春开始就没有读过任何儿童图书,当你进入这一领域后就会大吃一惊。几乎没有禁忌的话题,而且许多书对可以提及的和不可提及的话题都是坦白而真实的”。许多儿童的书——包括学校的一些教材——现在开始讨论成人话题,如性、同性恋、毒品和卖淫*。

但是现在面向儿童的图书,比当时曾经是禁忌的话题做得要过头得多;它们也指出儿童可能对成人与儿童角色结构有着复杂的意识。

例如,朱迪·布卢姆(Judy Blume)的儿童图书《超级骗子》(Superfudge),主角是一个5岁的男孩,名叫弗治(Fudge),这本书是通过他哥哥皮特(Peter)的视角去看他的。在圣诞节时,弗治对于给圣诞老人写信大惊小怪,坚持让皮特为他们的保姆以及家中的狗写一封信。皮特私下向母亲抱怨这件事儿,并建议说,是让弗治知道真相的时候了。“毕竟,你告诉了他小孩是从哪里来的。一个知道小孩从哪里来的孩子怎么还会相信圣诞老人呢?”但是他的母亲却拒绝了他的建议,认为这两件事情毫不相干,无论如何,“他那么热心,而对圣诞老人的看法又是那么可爱,你爸爸和我已经决定了,这不会有伤害的”。显然父母发现弗治的信念是吸引人的并从这个角度将他的天真看成是令人愉悦的。

当给圣诞老人的所有的信都写好后,且弗治收到了他向圣诞老

* 在电影中这种敏感性的变化也很明显。例如,现在很难相信,1953年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的《蓝色月亮》(The Moon is Blue)由于使用了“处女”和“情妇”这样的词汇而被电影协会拒绝给予批号。可是现在,即使是G级的电影(普通观众)也会包括这些词,而PG级的电影(建议有父母指导)则常常有淫秽和裸体镜头。就在几年前,这些电影还被分为R级(禁止17岁以下儿童观看)甚至是“X”级(仅限成人)。

人耍的闪亮的红色自行车后，弗治向他的哥哥透露，他真的知道没有圣诞老人，并且他一直都知道。当被问起为什么假装相信圣诞老人时，弗治回答说，“因为爸爸和妈妈认为我相信……所以我假装……我不是很棒的骗子吗？”

在《超级骗子》中传统的保密和秘密的秘密被颠倒了过来。儿童作出某种行为来使他的父母高兴。而儿童对成人与儿童关系的结构太了解了，他竟然能假装不知道。弗治能够使其他人不知道他对信息的接触。在《超级骗子》中，成人与儿童关系的字面表示变成了循环圈：父母比儿童更无知。

十三 政治英雄降为普通百姓 ——权威变化的个案研究

当世界年轻并有像上帝一样的人，没有记者……只有诗人

——狄克逊·韦克特(Dixon Wecter)

在《总统权力增加》(The Growth of Presidential Power)一文中，威廉·戈德史密斯(William Goldsmith)指出：“经过200来年的推动之后，尽管并不是持续增长和发展，美国的总统制度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其方式和程度在它动荡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戈德史密斯写这些话时还笼罩着“水门事件”丑闻的阴影，但是我们的领导人的危机在“水门事件”之前就开始了，而且程度更深。

我们现在所有的总统都被传染上了“信任”问题。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放弃了它的职位；理查德·尼克松不光彩地离开了总统职位；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的总统“任命”后来被选民拒绝了；吉米·卡特在自己党内受到有力的挑战之后又遭到了惨败。即使相对受欢迎的里根，在民意调查中也步入了他前任的后尘，就像是在我们现在熟悉的漫游者海岸轮渡一样。

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既有天赋和风格，同时又有能力和值得信赖的领导人。为了能够至少使一位当今的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声誉，许多人都选择了忘记约翰·肯尼迪当政的1000多天中所遇到的关于那么多信任危机和“新闻控制”的指责。

在1980年的竞选运动中，《新闻周刊》分析了当时的政治民意测验，发现“也许所有的政治发现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选民对绝大多

数主要候选人的幻想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当然,每次赛马总有获胜者,无论候选人的范围多么令人失望,人们总会有自己喜爱的。但是对民意调查百分率的沉迷以及对谁胜谁负的关注,掩盖了领导人形象整体下降这样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

至少有两种方法可用来研究总统的形象和修辞。一种是研究其演讲与行动的内容和形式,换句话说,是研究具体的策略、选择和决定。另一种方法是研究总统扮演其角色的场景。第二种方法要求将焦点从个人政治家具体策略的描述转移到一般的环境,这种环境包围着总统并且为所有的参选者所共享。

本章采用了后面这种方法,重新解释了我们当代国家政治家某些政治悲哀之因由并对某些一般的领导问题进行了阐述。我认为总统形象的降低也许与缺少潜在的伟大领导毫无关系,而是与具体的传播环境关系很大。现有的传播环境破坏了政治家按传统的“伟大领导人”那样行为的能力,因此也就不被看成是传统的“伟大领导人”。

政治舞台及风格的融合

在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前,乡镇和城市是全国性政治人物演练的后台区域。例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896年民主党会议上为赢得总统提名而发表的他那非常有力的“黄金十字架”的演说前,他已经在全国不同的地方多次演练了这场演说。

布赖恩这一传奇的演说者以及许多其他政治英雄的完美形象,是由于他们能够练习和修正自己的公众表演才得以维持。早期的错误能被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细小的改变可以被检验,而演说和表演可以磨合得完美。政治家可以用同样美妙的措辞在不同的时间使不同的人惊讶。例如布赖恩对于自己1896年演讲的结束语非常喜爱(“你不应将这棘手的王冠压在劳动大众的头上,你不应将人类钉在金十字架上”)。实际上,他对此非常喜爱,并在其他演讲和辩论中多次使用。在其回忆录中,布赖恩指出他很早就意识到这句话“适合结尾的高潮”,并且在小范围的公共场合使用过之后,他“将它移到合适的场合”。

现在全国性的政治家通过收音机和电视常常面对一个单一的观众。无论政治家在哪里讲话,他或她都是在对全国的人讲话。因此,重要的演讲无法提前测试。因为它们只能表现一次,它们变得相对粗糙和没有戏剧性。激动人心的语言或者被很快地接受或者变成无意义的陈词滥调。*

19 世纪的美国提供了多种政治场所,政治家可以在其中完善自己主要观点的形式和内容。他们也可以对不同的观众进行稍微不同的许诺以支持自己的核心舞台。现在,由于政治家同时要面对许多不同类型的人进行演讲,他们就很难讲到具体的东西。任何的语言失误都会被显著放大,因为无数的人目睹了它。如果在分析修辞风格变化时没有将这种场景变化考虑进去,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变量。

许多美国人仍然盼望着旧式风格的有活力的“伟大领导人”的出现。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作用使得找到这样的领导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缺乏潜在的领导人,而是关于他们的信息太多了。伟大领导人的形象需要神秘感以及对公众印象的小心控制。通过电视,我们对政治家的各种表现看到得太多了,他们正在失去对自己形象和表演的控制。结果,我们的政治领导人被剥离了自己特殊的氛围,并且更为接近常人。

在对电子媒介给政治表演带来影响的分析时,将其与各种社会角色表演的要求相联系,就会对其有一个非常好的了解。对社会角色表演的要求,在前面章节中已经叙述过了。无论能力有多强,无论目标如何,任何人在扮演一个理想观念的社会角色的时间都有一个限度。任何人都要吃饭、睡觉、洗澡。任何人都需要有时间来思考自己的社会行为,准备社会交往,并且从中脱离出来进行休整。另外,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一个男人可以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是过去大学的室友、是老板。他也可以是美国的总统。

* 为了符合职业上以及竞选运动中经常讲话的需要,政治家仍然必须依赖于有时被称为“基本演说”的东西。但是现在,这种演说必须有意识地保持低调,这样新闻媒体就不会得到所有的东西,也就无法提前向每一位潜在的现场观众“泄露”了。政治家和记者对目前的这种状况都有很多怨言。例如,报道总统候选人卡特的记者们抱怨他总不断地重复,极少说出有新意的东西;卡特则抱怨说自己一时的机智话比他时常重复的基本观点更易于出现在媒体上。

为了能够胜任每一种角色,他强调个性中不同的方面。因此社会角色的表演在许多方面都像在多舞台的戏剧。在一个特定的舞台上,或者“前区”的强度和清晰程度有赖于将观众与后台或“后区”的隔离。其他台上角色的演练、放松和行为必须在舞台灯光之外。对于扮演那些极大地依赖于神秘感和伟大氛围的角色,如扮演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角色,则要求屏蔽后台行为已是非常迫切。

然而电子传播媒介已经侵蚀了政治家传统的后区与前区之间的屏障。镜头这双眼睛和麦克风这只耳朵已探寻到了国家政治家行为的许多方面,并且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了2.25亿的美国人民。电视向观众展示了传统的台上活动和传统的后台活动,可以说电视提供了政治人物的“侧台”或“中区”的景象。我们看到政治家从后台到台上再回到后台。我们看到政治家向满怀期待的人群演讲,然后“私下”向他们的家人打招呼。当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同顾问说话时我们也加入进来,当他们观看电视会议时我们坐在他们的后面。我们看到竞选候选人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向许多不同类型的听众演讲。

按定义来说,现在暴露的“私下”行为已不再是严格的真正的后区行为,因为它们已被暴露给了公众。但它们也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前区行为,演练和表演之间传统的平衡已被打乱。由于电子媒介的报道,政治家将自己与观众隔离开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家不仅失去了自己隐私的一些方面——我们常听到这种抱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扮演传统领导人至高无上角色的许多方面的能力。因为当演员失去演练时间时,他们的表演自然就变成即席的了。

电视所提供的侧台观点使得行为的正常差异变成了不一致或不诚实的证据。我们根据谁在场谁不在场会在不同的场景中有不同的行为。但是当电视新闻节目将政治家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听众面前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的录像编辑在一起时,往好的方面说这位政治家犹豫不决,往坏的方面说他不诚实。

政治舞台的重新配置要求形成在所有暴露的场合中都保持一致的形象。为了能运转平稳,新的政治表演则要求一种新的“中区”角色:这种行为,缺少从前前区行为的极端正式,同时也缺少传统后区行为的极其非正式。聪明的政治家会尽可能地利用新的场景。他们试图暴露从自己的后区中选出的积极方面,以讨好公众。但是设法

应付新场景与真正控制它们是有区别的。无论政治家个人调整暴露有多好,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人的整个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新的政治表演仍然是表演,但是它的风格有了显著的变化。

距离和有限的接触支持了神秘和敬畏。由于现有的新媒介所暴露的东西太多、太经常,以至于政治领导人的传统观念无法取胜。电视镜头像间谍一样侵入了政治家后区的私人空间。它看到他们出汗,看到他们对自己讲话中的错误做鬼脸。当他们屈从于自己的情感时,它将其冷冰冰地全都记录下来。镜头将听众和演员之间的距离缩到最小。演说者的讲台在过去是将政治家抬高,远离人民,不仅实质上而且象征上都是。现在镜头将政治家拉近,让人们仔细审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将政治家降到了与观众相同的水平。镜头将非常丰富的表象信息带给观众;它突出了政治家的道德,而削弱了抽象的和概念的修辞。语言修辞可以超越人性到达神圣,而亲密的表象信息常常暴露出人性的脆弱。难怪继续采用上一个时代伟人姿态的旧风格的政治家,现在看起来像是小丑或恶棍。个人的特写镜头迫使许多政治家假装收敛起他们喜欢的形象(因此,从社会意义上说,他们实际上就变小了)。

对于电视机前的政治家来说一些人参与了某种“中区”的秘密。例如,通过不断的身体接近,许多记者会看到政治家处于多种前区的角色,并对后区行为一知半解。然而,政治家和一些记者之间的关系本身却是一种个人的后区交往,它不同于对公众的媒体报道。电视中播放的绝大多数新闻故事并不是这种个人的后区关系的记录,甚至不是“中区”的记录。政治家总是可以对媒体区分出什么要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应当解释,什么必须推给“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这样,即使记者和政治家是亲密朋友,而新闻发布通常仍是非个人的社会传播。印刷媒介可以“报道”某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从而将记者带到另一个地方。但是报道根本不能算是与地点相联系的经历的真实“展示”。例如在罗斯福刮胡子时,印刷媒体记者采访了他,这时记者所具有的体验并不“等同”于过后的新闻报道。因为在过去,同记者的私人交往与报纸上公共传播的报道是不同的,政治家“个性”的许多信息被很好地隐藏下来,不让普通公民知道。

私下的媒体——政治家的交往仍然在发生,但是电子媒介所创造的新的政治场景彻底改变了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距离。电子媒介

的报道使得政治家失去了对于自己的信息和行为的更多控制。当他们要求关上电视镜头或录音机时,显然是想隐藏某些东西。当镜头或麦克风打开时,政治家就无法将他们与媒体的交往同他们与公众的交往分开。镜头不加思考地记录下了“气得脸红脖子粗”和“在寒冷中的瑟瑟发抖”;当领导人说话或下楼时栽了跟头的图像,肯定会使领导人的形象暗淡下来。与记者的证明或者其他的亲眼目睹不同,记录在带子上的语言和行为是无法否认的。这样,虽然政治家努力控制媒体报道的内容,但是报道形式本身正在改变着政治形象的特征。电视对表象信息暴露的特征,通过控制、练习和重金聘请的顾问是不能被完全克服的。即使是一个导演的媒介事件也常常比非正式演讲或者采访的手稿更具有个人特性。1977年卡特总统允许NBC镜头进入白宫一天,但其结果可能不是他所预期的。正如《纽约时报》报道说:

卡特先生是控制形象的大师,他显然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当他不带热情地微笑时,他在压力面前非常平和冷静。但是镜头侦察到了泄露秘密的小圈套,以及普通人使自己平静下来的小动作。它发现他的手指紧张地抚摸着纸夹子或者玩着钢笔。当总统叙述有关他一个儿子的真实的新闻故事时,它捕捉到了几乎难以察觉的面部肌肉的紧张。

当然某些政治家的“媒介形象”要好于其他政治家,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像印刷时代的政治家那样轻易地控制自己的形象。当后区和前区没有被看成是相互排斥的类别时,这种失去控制的性质和程度变得更为明显。大多数的行为都包含着两种类型的行为。例如,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在表演前台角色时能同时向“队友”发出隐藏的后区的暗示(面部表情,“有弦外之音”的话,在身后手指交叉,等等)。另外,正如第六章中所说,由于表情是持续的和个人的,个人表情的流露是一种进行中的后区行为,过去只有很近的身体接近时才能够得到。这样,对后区接触控制的程度并不是简单的两种状态——接触/不接触,而是无限的变量。任何传播媒介都可以按照它所传播和限制的这些个人化特性进行分析。

例如,印刷传递了词语,但没有语调或面部表情;收音机将词语同语调一起发送出去,但是没有提供视觉信息;电视传送了语音、声

音及表情姿态的全部的音频/视频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印刷到广播到电视的潮流代表了对后区行为屏蔽的减弱以及控制形象所需能力的增加。另外,艾伯特·迈赫拉宾(Albert Mehrabian)的信息相对影响公式——7%语言,38%语调,55%为面部表情和姿势,这说明媒介发展的潮流不仅导致暴露得更多,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多。从绘画到照片,到电影,再到录像特写镜头,媒介提供了领导人更近的、更易复制的、更即刻的形象,因此也是不完美的形象。“伟大”是一个抽象概念,当远方领导人的形象开始类似于与亲密朋友交往时,它就褪色了。

随着镜头不断地变轻变小,随着麦克风和镜头的灵敏度不断增加,公开和私人语言环境的区别不断地受到侵蚀。对于政治家来说,停止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以便站好照相,或者走向麦克风则不再是必要的了。结果,政治家就更难以区分他们在“真实场景”中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要为媒介所展示的行为方式。因此,政治家的新的公共形象具有了过去的政治生活后台的许多特征,政治家和他们家人的许多非正式交往,与员工、记者和选区选民的交往变得更加僵硬和正式,因为它们会被暴露给全国的观众。”

大多数的政治家,甚至是总统仍然维持着真正私人的后台区域,但是这个区域被一步步地向后推移,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萎缩。

写和印刷不仅隐藏了一般的后区行为,它们也隐藏了生成这些“形象”和讯息的行为。总统从前有时间仔细地准备演说。即使看起来是“即席的”讯息也是预先准备好的,通常是得到了顾问、律师和家

。虽然在这里我主要集中于新的媒介环境如何塑造和限制政治家的选项,但是这里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变量:那些报道政治的新闻机构的选择。正如迈克尔·舒德逊(Michael Schudson)曾争论道,记者决定以议会政治为代价突出总统政治是现代政治仪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种决定在电视出现前许多年就有了。因此如果考虑这种新闻规范的重要性,我们就能分析出媒介环境的改变对记者决策的影响如同它们对政治家决策的影响一样大。例如,电报的速度与通达的范围为主要行政官员的“全国性新闻”以及近距离的“个人兴趣”的报道提供了舞台。电报使得整个国家在伽菲尔(Garfield)总统遇刺后及死前的11周中,仔细地关注着其状态细微的变化;它也使得对克利夫兰总统的婚礼和蜜月“惊人的及粗鲁的”完全报道成为可能。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对总统的仔细审视在罗斯福当政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其后,收音机和电视的能力又使之得到强化。理想状况是,将来的分析会考虑到下面这三种重要变量——媒介环境、政治决策、记者决策复杂的相互作用。

人的帮助。在问题面前迟钝、犹豫,以及考虑其他解决的方法,在旧媒介固有的时效性不强所形成的看不见的后台区域中被隐藏了起来。例如,电报发明前,总统从来不必半夜被叫醒来处理危机。迟几个小时并没有关系。

但是电子媒介留给准备和响应的秘密时间非常短。因为讯息可以立刻传遍全国、全世界,听到总统讲话中的任何延迟都是非常明显的。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政治家即使是思考几秒钟也可能被看成是犹豫不决、虚弱或者衰老的象征。因此,官员所传递的公众讯息实际上越来越多地是即席的。

政治家发现很难隐藏在准备公众发言时他需要的时间和建议。他们或者泄露决策过程(转向顾问或者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或者他们展示出非常不正式的、临时的机智评论,这自然就缺少预先准备好的文章的文采。新媒介要求政治家沿着特技表演中拉紧的钢丝绳,坚定地不加思索地说和走。偏向任何一边都是危险的:沉默几秒钟或者是失言,都能导致民意调查中支持率的下降。

政治舞台的变化不仅影响观众的理解而且影响政治家对自身表演的反应。在面对面的行为中,我们必须从其他人正在出现的反应中来获得自我的意识。我们永远无法用与其他人同样的方式看到我们自己。但是,政治家在录像带上能够看到与公众所看到的完全相同的自我形象。在现场交往中,讲话者的紧张和错误常常被听众很有礼貌地忽略,因而讲话者自己也常常会很快忘掉。在电视上,政治家看到了自己出汗、口吃或者紧张地舔自己嘴唇的永久记录。因而电视能够使政治家的自我焦虑增加、自我评价降低。

高度再现的媒介不仅在当代而且也在历史上使领导人的神秘感消失。几乎没有什么领导人在生前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但是不易再现的媒介至少可以在领导人死后使他高度地理想化。个人的习性以及身体的缺陷会同总统的尸骨一起被埋葬,但是他们好的事迹和成就在他们死后仍继续存在。总统死后,留下来的都是吹捧的画像和演讲的文稿。不平常的演讲风格或者不吸引人的面部表情很快会被忘掉。

如果林肯的形象仅通过画像流传下来,也许他的颇丑的形象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进一步淡化。但是林肯传奇故事的其他部分,包括

作为有煽动力的演说家的形象会继续保留下来,尽管缺少对他那又高又尖的声音——他的声音会因为紧张而变得更尖——的记录。同样,托马斯·杰弗逊的轻微语言障碍也很少被提及。但是通过新媒介,总统的个人习性被保存下来并传给下一代。未来的几代人不仅继承总结与回忆录,而且会自己去评价过去总统的风格。他们会看到福特失去平衡,卡特在压力面前汗流浹背,里根在听罗马教皇演讲时睡着了。总统的错误发音、犹豫、出汗,以及身体和语言的笨拙,现在都被永远保存了下来。

表情是所有人共享节目的一部分。当表象讯息处于控制之下并且被简短地暴露时,会显示出“伟大领导人”的“人性”。但是当它们自由地、不断地流动时,表象讯息可能会告诉我们,我们所仰视的人毕竟与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寻找“伟大”证据越是努力,它就越会避开我们。

现在,我们提出了两项要求:完全开放的可接触的政府,以及强有力的领导。我们几乎没有考虑到,非常遗憾的是这两个要求可能是不相容的。我们想探听和监视我们的领导人,但同时我们又希望他激励我们。我们不能既要信息的暴露又要形象伟大所需的神秘。“水门事件”后希望披露秘密并没有伴随着出现领导人密室中会不可避免地看到什么这样复杂的概念。由电子媒介所培育出的熟悉很容易造成鄙视。

作为政治现实的政治仪式

绝大多数社会行为具有仪式的性质。律师、医生、法官、老师、父母、学生和其他社会表演者通常试图展示一种象征性的恰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存在的形态或者“现实”取决于他们交流的模式、行为和表情。当传播的手段以及交往的论坛发生变化时,它所描绘的“人物”肯定也会变化。

电子媒介所创造的新环境对政治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原因有两个:(1)政治表演者通过主要的传播形式比普通公民更直接更完全地表达了自己的性格;(2)政治表演比日常社会行为更为高度地仪式化。单单一个不恰当的行为就能使政治表演者缺少完成所进行仪式的资格。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的公众面前流泪,托

马斯·伊格尔顿(Thomas Eagleton)承认有精神障碍,以及厄尔利·巴茨(Early Butz)的种族主义玩笑就是这种“有危害”行为的几个例子。

那么,政治领导人形象的改变在风格上超出了表面上所呈现出的变化。政治现实和政治仪式是密不可分的。正如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在《政治剧院》(The Theatre of Politics)中指出,“认为存在真正的(有效的或者有用的)、由不真实的(人为的)伪装所掩盖的政治观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欺骗”。

W. 兰斯·贝内特(W. Lance Bennett)曾争论道,政治竞选运动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一个是政治家希望当选的短期实用主义目标。因此,政治家所说的和所做的事情,是那些最有可能使他们当政的。但是贝内特又指出了另一个目标,也许是竞选运动更重要的功能,这就是社会仪式:“公众能够消除紧张,满足其安全、秩序与领导的需要,以及对未来的控制。”贝内特说选举就是“一个大范围的文化戏剧——一个非常熟悉,但又非常博大精深的戏剧,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并了解其剧情和语言,但是我们仍然发现它费时,但值得参加”。

贝内特认为,虽然单独分析竞选运动演讲的实用元素和礼仪元素可能显得简单,但是它们却是不可分开的。他认为,当选这个实用主义目标是由恰如其分的礼仪行为做保障的,而礼仪的功能反过来是由实用的要求所支撑的。贝内特认为有一种“文化逻辑”,将这两个功能编织在了一起。“正是这种逻辑引导着参与者在成熟的文化礼仪中行为时,既能到达实用的终点又能强调重要的原则、价值和社区身份”。

政治家极少讨论政治礼仪和表演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否认政治具有礼仪性质本身就是礼仪的一部分。“真理,而不是诡计”,“话题,而不是形象”本身就是政治剧中重要的赞歌和中心的理念。

即使那些声称报道政治的人也常常被粘在了表演的网中,并且成为礼仪剧的一部分,就像是体育评论员常常成为体育仪式的一部分一样。政治记者和体育记者都将好的失败者和寒酸的胜利者称为“可能获胜者”或“黑马”。记者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帮助维护社会仪式的神秘,而不是消除或者解释。

虽然政治家和政治记者都谈论政治现实和政治形象之间的差

异,但是对竞选演讲和政治行为的任何认真分析都会发现,创造“诚实”的形象甚至需要一些诡计来帮助完成,并且常常“对问题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形象。由于政治是一个戏剧仪式,最终不可能将现实这条线与表演这条线分开。丹·哈恩(Dan Hahn)和鲁思·贡恰尔(Ruth Gonchar)是两位政治传播学学者,他们指出,尽管公众公开宣称拒绝形象而喜爱实在的问题,但是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0%的选民受到了候选人个人性格的巨大影响。同样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指出,人们对总统正面和负面的观点通常是按照总统个人的形象而不是他的政策立场来表达的。

哈恩和贡恰尔使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作为例子来说明政治中形象的能力。“烈士肯尼迪受到人们的尊敬;约翰逊总统如果被人们记住,那也只是憎恨。没有人会去争论两个人的形象是不同的。人们常会忘记的是他们在立场问题上的共同点。”

在政治形象优于话题的一个更明显的证明就是选民第一选择和第二选择的奇怪关系。哈恩和贡恰尔认为在1968年“肯尼迪的白人支持者的第二选择不是无党派人士麦肯锡而是保守党的华莱士(Wallace),而华莱士支持者的第二选择是肯尼迪而不是保守的格拉尼干(Granigan)州长”。同样,在1972年预选中,华莱士和麦戈文(McGovern)都吸引了相同的“中下阶层的异端的”选民。哈恩和贡恰尔认为,他们在不同预选中得到的排名“主要取决于他们将自己描述为反传统的程度,而不是他们所提出的离开传统的角逐力量的解决方法。”

哈恩和贡恰尔认为,那些拒绝简单形象并且试图对付复杂现实的政治家常常受苦受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试图在某个问题上表明立场的人可能显得并不是他们希望的那样。哈恩和贡恰尔指出,在马斯基被逐出总统竞选之前,甚至他的顾问都在抱怨他没有“谈论问题”。但是哈恩和贡恰尔对马斯基的演讲分析显示,马斯基的竞选运动可能是太注重问题了。马斯基并没有选出几个问题,然后用简单的术语不断地讨论,而是他在许多方面讨论得太深。哈恩和贡恰尔的结论是,马斯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没有抓住任何单一的问题进行联系讨论,也就是说,他的形象由于缺乏简洁和过于重复而模糊了”。

政治现实存在于政治形象中。哈恩和贡恰尔认为,最终它可能

没有其他方式。他们指出,“真正”的问题通常是作为全国性政治竞选中的元素发挥作用的,因为真正重要的问题极少会出现在“恰当的”时间(也就是说,在竞选时),而且这样的问题常常过于复杂,不能被简要地展示、快速地理解。

与此相同,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在《选择我们的国王》(Choosing Our King)中指出,试图忽略形象而偏好“现实”只会引起矛盾和徒劳。他观察发现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竞选时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与其他政治家不一样的政治家,一个注意形象的人。那就是他的形象”。诺瓦克认为政治家不可避免地应具有形象。“候选人只有有限的暴露;他必须展示给2亿多公民;没有人能看到他的灵魂。”另外,他还指出,假装不依靠形象是天真的或者伪善的。公众职位本质上就是“仪式性的”。“一位官员不能,不应该,也不被期待着仅仅扮演他或她私人的角色。他或她主要地也许是只能作为公众官员,人民的代表,以及法律和传统所规定的角色进行行动。”

但是政治形象并不仅仅是覆盖在政治家的“真实自我”之上的面具。哈恩和贡恰尔认为实际上政治形象更多地是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抽象的“对问题的立场”。他们说,形象至少是基于实际的个人性格特征之上的(如威尔逊和尼克松的刚毅和正直)。而相比之下,对问题的立场常常很容易用语言的提出来控制。

同样,诺瓦克认为即使政治角色是由“法律和传统”决定的,但是政治家个人必须使用自己独特的个性使其官员角色具有生命力。另外,“每一位政府机关的主管官员在就任之前就可以大概说明可能发生的事情。”在领导角色塑造及限制行为时,角色与个人的性格之间不一定会有冲突。实际上,诺瓦克将公共政治仪式看成是独特的论坛,它“沟通、加深、普遍地满足个性,给予其发泄的机会和余地”。

那么,在政治上,形象和现实是同一块织物上的两缕。政治领导人的伟大与否有赖于他们表演自己礼仪角色的好坏程度。另外,对“表演”的需求并不是用来区分诚实的政治家与不诚实的政治家。我们需要防止那些对自己的表演没有真正责任感的不谨慎的政治家,但是我们要记住,所有的政治家必须关心自己的风格和形象。

因此在讨论媒介对政治表演的影响时,我并不是认为,政治的“现实系数”有必要发生什么变化。从真实到诡诈或者从诡诈到真实

并没有清楚的倾向。但是“真实的且是表演的”政治剧风格发生了变化。政治家能够展示的形象类别有了显著的变化。这种风格的变化是电子媒介所创造的新舞台的附带结果。

伟大的表演要求完美的舞台

由于政治能力与形象、风格与表演紧密相连,所以政治“舞台”的特征对政治仪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总统是一个遥远的形象,只能为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所接触。这种不可接近性使得乔治·华盛顿避开对他“令人痛苦的演讲”的广泛批评。托马斯·杰斐逊为了更多地依赖他“天才的文笔”,而不是“他那细小的声音和缺乏自信的方式”,甚至议会都不能接触他本人;他以书面的形式向法律制订者传递信息,由工作人员代读。

非电子的传播环境偏爱那些在远处看起来有能力、有力量的人。总统细微的面部表情和外表所起的作用很小。即使是在竞选运动中或者旅行中,总统很少被长时间观看或被仔细审视。直到20世纪记者才被许可以经常地进入白宫

在《总统的伟大》(Presidential Greatness)一书中,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很不寻常地述说了是什么使一位总统“伟大”。说它不寻常是因为除了对总统“成就”更多的传统描述之外,他还描述了宗教、姓名、外貌、体形、年龄、婚姻状况、说话的风格,甚至死亡时间之类的变量。贝利说许多这样的变量似乎是“不相关的,没有因果关系的和偶然的”,但是他对总统的历史回顾说明,这些特征与名誉和政治成功有着很大关系。贝利分析了政治胜利和名誉的来源以及与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Sr.)民意调查结果的联系。尽管没有使用比喻,贝利的许多观察都含蓄地与总统政治的“表演”和“舞台”有关。

例如,贝利发现在施莱辛格的调查中,前6位总统中除一位外全部是身材高大,给人印象深刻的男性,这并不令人惊奇。华盛顿身高6英尺2英寸,林肯身高6英尺4英寸。贝利指出“平均”身高在早期各代人中太矮了,且在华盛顿和林肯时期6英尺高的人“比别人高出一头”。另外,华盛顿和林肯通常被认为是我们最伟大的总统,他们“几乎肯定是最强壮的。华盛顿可以用手指夹碎核桃;年轻的林肯

是他们社区的举重冠军”。贝利指出,虽然身材矮小并不阻止一位政治家成为总统,也不能绝对限制一位身材矮小的总统是“伟大”的,但是身材矮小肯定是一种缺陷。实际上,根据施莱辛格的统计,6位最矮的总统中有5位的排名不高于第二流的“平均水平”。

早期总统的身高和力量使他们成为了出众的人物——但也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当他们骑上白色的高头大马时,看起来肯定像上帝一样;在较近的距离上,就会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他们也是难免一死的平常人。华盛顿有很深的麻脸以及安装得不好的假牙。长满雀斑的杰斐逊在威廉姆斯和玛丽大学(Williams and Mary College)时的外号是最不漂亮的学生。林肯“伛偻而且蹒跚”,他的相貌实在太丑陋,以至于他感到有必要拿自己的外貌来开玩笑。罗斯福有一双“近视的斜眼”和“马牙”。由于过去许多“伟大”总统的外表,他们将不会适应电视政治。

贝利将过去非电子舞台看成是没有偏见为标准,他诅咒新的电视舞台消除了潜在的伟大领导。“令人恐怖的结论出现了,如果三位最伟大的总统出现在当今社会并且参与初选,他们可能无法确保被提名。”但是,的确我们一些伟大的领导现在可能确实表现不好,然而毫无疑问,在过去许多潜在的伟大人物从未被考虑成为总统,因为他们不具备适合旧的传播环境的身体特征。矮小的,有残疾的或者说话极端轻的人可能会被排除在早期的总统人选大门之外。

有意思的是,第一位身高低于6英尺的“伟大”总统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生活在电影时代的开始。真正的身高在电影中不如在现实交往中那样重要。在电影中许多优秀的人都不足6英尺高。电影的特写镜头使得在一定距离上的外观不再重要,镜头的角度可以调节,使观看者无论身高如何都有一种“仰视”的感觉。

按照总统风格和活力来说,真正起作用的是总统让大多数公众了解他时采用的具体媒介——或者说,媒介帮助塑造了总统与公众“交往”的场景定义。电影使身材矮小的威尔逊显得高大,就像收音机使残疾的罗斯福听起来有力,而电视使年轻的肯尼迪看起来自信和有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媒介都类似于一种不同类型的房间或者剧院,它要求(允许)它自己的“恰当”类型的表演者

和表演风格。正如一个小的研讨会的房间所要求的教学风格不同于演讲大厅中恰当的风格一样,政治风格必须随着媒介的变化而变化。一些政治家能够从一种环境转变到另一种环境(正如一些老师在演讲和研讨时都胜任一样),但是其他的许多人却不能。媒介的变化通常使得那些能坚持下去的候选人或者成为成功总统的政治家随之变化。

罗斯福是一位有力的广播演说家。但是若在电视上展示有力的形象,对他来说则有着巨大的困难,他无法自己行走会显得非常突出。尼克松也是极其有效的广播演说者,但他在上电视这方面同样有着巨大的困难。在镜头里,他显得不自然和诡诈。实际上,观看尼克松—肯尼迪电视辩论的人都倾向于同意肯尼迪获得胜利,而许多收听收音机辩论的人则认为尼克松获胜。因此,在不同媒介中相同的政治表演具有不同的效果。

肯尼迪的讲话风格与电视匹配得很好,但是在其他的政治竞技场中它可能不是那么好了。正如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曾写道,“肯尼迪的风格非常适应这种媒介。他那种不受欢迎的演讲方式,他的缺少姿势和戏剧性的变化,他的那种略带羞涩但又很迫切的魔力,可能对国会议员竞选程序来说都是缺陷,但它们却恰恰适合于客厅的展示。”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将它说得更加直截了当:“电视爱他,他和镜头相互为对方而生。”肯尼迪本人也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电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0年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Edward)采用的竞选风格则更适合于大的政治集会,而不是电视的特写镜头。在电视上,他的富有戏剧性的风格常常使他显得高度紧张,过度热心,甚至有些狂热。

政治家的命运和演员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些伟大的舞台演员在电视上显得似乎过于夸张且特别愚蠢;许多电视演员在舞台上演出时并不能很好地展示。而一些无声电影明星能完成到有声电影的转变,但另外一些人由于声音的品质,则从银幕上消逝了。“好”和“坏”的演员与政治家都受到媒介变化的影响。

然而这种变化的影响常常变得不易看到,因为那些在新的环境中竞争力最差的演员和政治家很快就消逝了,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剩余的人中,关注着哪一个是最好的。这样,虽然我们可以探讨当前

重要政治家媒介表演的相对质量,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媒介影响的最好的例子是那些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潜在的领导人。虽然政治家个人的策略绝对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更普遍的基调是由政治传播环境的性质决定的。

媒介对政治影响的这个方面常常被研究大众传媒的许多人所忽视。例如,著名的大众传媒研究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基本上拒绝了麦克卢汉的观念——媒介除了它所发送的具体信息之外还有其影响力。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给出了人们发现肯尼迪遇刺的例子,他认为无论人们是从电视上、收音机里、印刷品中或者口头上得到的这条坏消息,人们的反应却是大体相同的。这确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通过引用某个政治家的具体的讯息作为影响的证据时,施拉姆就集中在了一种不可能反映出总体上的媒介对讯息和政治家影响这种传播的水平上。施拉姆忽略了,年轻的且信仰基督教的肯尼迪如果没有电视根本不可能当选总统。另外,他也忽略了,对肯尼迪之死有力的、情感的反应与肯尼迪及其家人与全世界人民的“亲密关系”密切相关,而这种亲密就是由电视所创造的。

当一名候选人打破政治“舞台”的结构或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它时,这种政治“舞台”才最容易让人们看见。例如,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从未征服电视舞台。史蒂文森州长很难让自己的演讲简洁以符合他所购买的电视时间。“他的时间常常是在他到达结束语和拉选票的结论之前就用光了,这时这位州长演讲就被停止播放了。记者都熟悉了当屏幕变黑后史蒂文森州长仍在高谈阔论。”而相比之下,罗斯福则是他的媒介大师。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报道说:

朋友们仍能记起1944年竞选运动中的一个晚上,当他在广播中听到胜过托马斯·E.杜威(Thomas E. Dewey)时的兴奋。罗斯福在全国广播公司网预定了15分钟广播演讲时间;他的对手预定了接下来的15分钟以利用罗斯福的听众作为对他的答复。但是罗斯福只讲了14分钟——然后在他讲话完成之后留下了整整一分钟的付费时间无声无息。这时听众们狂热地旋弄他们的旋钮,寻找其他波段

的声音。而数百万转到其他电台的听众们在共和党的候选人杜威开始广播演讲时却没有在那里收听。

虽然政治的“舞台”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最容易看到,但是在总统的每一个行为和活动中它都存在。许多年来,总统一直例行公事般地利用技巧使他们的行为戏剧化:保留或者“制造”新闻以使信息流平稳、一致;安排新闻发布时间以符合记者的日程和假期;在机场上空盘旋以确保在电视“黄金时间”着陆,在打电话时恰当地征询顾问的意见,以及展示秘密谈判之前的具有戏剧性的最后通牒。“媒介对总统是如此重要”,约瑟夫·卡莉法诺(Joseph Califano)写道:“他试图期望和控制媒介对宣布政策的各种方式做出的反应所花的时间至少等同于他们制定政策所花的时间。”时间与风格是所有社会表演的特征。我们怎能指望一个人在没有“技巧”的情况下到达并留在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呢?

许多人认为艾森豪威尔对这些事情很天真,是业余政治家,但是实际上他比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当他走出去发动人群时,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还记得,当他等待进入拉丁美洲一个小镇的广场时,我同他在一起。这时一个人走了进来说:“总统先生,群众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他深吸一口气,将胳膊拉到熟悉的位置说:“好,让我们给他们做德军投降日演讲。”这就是每个人都几乎认为是神圣的姿势,但是艾克(艾森豪威尔)知道那是什么——一个非常有效的戏剧技巧。

因此,很可能我们所有的总统都必须应付各自时期特定的舞台偶发事件。与托马斯·贝利的论点相反,政治新的电子舞台不是简单地去除了潜在的有能力的总统竞选者,它们也允许新的政治演员竞争耀眼的政治角色。但是贝利认为事情发生了变化,在政治传播环境和表演风格中确实产生了显著变化,从这个角度上看他是正确的。传播趋势是远离抽象的“传播”,而转向个人的形象和“表情”。电视并没有形成传统上与总统相联系的正式的前区的行为。因此,不仅那些能成为真正的总统竞选者发生了改变,而且总统形象本身也有了整体的变化。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客观上更坏的领导人,但他们在主观上变得渺小了。我们领导人的形象显然是人,而不是神。

媒介和总统的死亡

新媒介不仅改变了总统能传递的信息,也影响了总统能隐藏的信息。也许对总统之伟大这个氛围的最大破坏,就是泄露了总统的不坚定和疾病。我们知道即使是伟大的领导人也难免一死。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人是庄重地死掉的,而不是躺在医院里,鼻孔和静脉中插着管子苟延残喘。处于强有力的行为和烈士般地死亡中的任何一种状态的领导人都使我们不舒服。

我们的总统从来就没有缺少过身体上的敌人。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都有过多次疟疾发烧。另外,华盛顿有很厉害的牙痛;杰斐逊有痢疾、风湿、偏头痛,以及可怕的背痛;而杰克逊有慢性痢疾和肠痉挛、肺脓肿,以及可能还有结核病及铅中毒(来自他几乎丧命的决斗的“纪念”中)。亚伯拉罕·林肯“被批评有压倒一切的忧郁症,有时他的朋友对他的头脑清楚感到绝望。他将这些攻击称为‘疑病’——来自疑病症这个词”。然而围绕总统的传播环境造成总统的这些个人的弱点仍然处于隐藏的“后台”。

格罗弗·克莱韦兰(Grover Cleveland)在白宫时曾做了很严重的手术,公众未被告知。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的代谢非常慢。他重350磅,他常带着他的老婆内利耶(Nellie)参加官方的会议,这样当他睡着时她可以戳他的肋骨。据说有一次他在葬礼上因打呼噜而冒犯了某些人。但是这种行为被容忍了下来,因为传播环境使得这些事件与公众隔开并且不为公众所知。经由挑选的外表和领导人的表演允许他们去选择更宜为公众所喜爱、更符合总统仪式的公众形象。

伍德罗·威尔逊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受到各种疾病的折磨,包括神经炎、头痛、部分失明,以及神经性厌食症。“1913年他进入白宫时带着胃吸引器和大量的头痛药片”。直到他在公众面前身体垮掉,他的形象才受到影响。

罗斯福有严重的残疾,但是公众却很少意识到。在广播中,罗斯

福只是一个声音；在电影和新闻图片中，他的形象被仔细地组织和控制”。白宫记者梅里曼·史密斯(Merriman Smith)描述了罗斯福在台上和台下行为的对比：

他实际上是一位没有希望的残疾人，而公众直到他死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他在白宫工作期间如果没有人帮助，他自己根本站不起来。然而在华盛顿外面的人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总是不得不依赖于沉重的铁腿、拐杖支撑，还有更多的是别人胳膊的扶持。他的腿实际上是无生命的。只有费很大的力气……他才能够行走，这常使他在大冷天却额头冒汗。

但是当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就成了胜者，成了一位下巴上扬，大手在空中挥舞且表情丰富的领导人。他了解就单凭这么一挥手或者挥动他那顶似乎是棕色的帽子，就能够发动一个体育馆的群众。他只需这样一做就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欢呼雀跃。

艾森豪威尔是第一位在电视上被人们仔细观看的总统，甚至当他临终前在医院时，公众也通过新闻秘书哈格蒂发布的新闻看到一连串的总统活动。但是肯尼迪很快失去了隐藏后台麻烦的能力，不得不将自己的摇椅变成一个幽默的象征。而到了约翰逊进行胆囊手术之后，他感到有义务大笑着并向整个国家的人们展示他的伤疤。

现在，总统在哪里以及总统的活动变成了公众审视和关注的经常性的话题。“没有我们，总统寸步难行。”一则网络电视新闻的广告吹嘘说。没有近期媒介的发展，过去的总统就没有，实际上是不能够

• 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Stephen Early)要求记者不要报道总统的小儿麻痹症，而当他在轮椅上或拄拐杖时不要拍照。在过去这种请求的提出常常被记者归因于完全不同的理智。但是在当时不同的媒介环境很少有人探讨。在罗斯福时代，新闻记者、摄影师、音响师更加依赖对方的合作，这大大超过了现在的要求。麦克风和电影对声音和光都不灵敏。没有小的，不受阻碍的录音设备（实际上，在罗斯福死之前美国根本没有民用的录音机）。直到1954年前，电影发布会不使用许多亮的热光源是不可能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和他的手下可以轻易地控制拍照和发表声明的时间和地点。重要的是，一旦快速电影发明之后，艾克和他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James Hargerty)感到被迫允许“现场电影”在以后的电视节目中播放。现在摄影的能力可以捕捉总统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词和每一个微笑——不用要求他站在某位置，请他讲慢点以便记清笔记，并要看着灯光，或对着麦克风讲。任何像斯蒂芬·厄尔利类似的要求都含有严重的审查制度的意味。总之，现在大量的“可得到的”个人后台信息等待审查。

被这样近地监视的。

克利夫兰的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它说明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形象的控制范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克利夫兰作为总统有时会被人们认为太诚实了,以至于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他承认自己是一名私生子的父亲,他愿意告诉公众“有争议的事实”,据说这样做的代价是他再次当选的失败。但是,1893年在一次重要的立法之际,他意识到了自己身体力量形象的重要性。

1893年6月18日,白宫医生发现了克利夫兰上颌长有恶性肿瘤。一台手术被策划出来。但是由于议会危机,手术“必须完全保密,因为知道克利夫兰有生命危险会引发新的、更大的恐慌”。

当时的传播环境使克利夫兰仅需向公众“泄露”少量的、延迟的信息就能通过这场艰巨而长时期的身体考验。一台手术在海军准将贝内迪克特(Benedict)的游艇奥内达(Oneida)上秘密进行,当时游艇慢慢地从纽约出发沿着东部河(East River)逆流而上前往兀鹰海湾(Buzzards Bay)。克利夫兰6月30日晚到达纽约并且在船上呆了5天。手术包括切除整个左上颌和部分软颌,但是没有外部的切口,这有助于手术的保密。7月17日又进行了第二次短时间的手术,克利夫兰后来装上了硫化橡胶制成的人工上颌。

手术保密得非常好,将近60天的时间里“没有外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总统的口中塞满了绷带几乎达一个月的时间,而且他的伤口直到9月份才愈合,但是公众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现出了什么事。事实上将近25年后手术的主要细节才公开。

到1975年这种新闻的延迟时间从数年缩短到以分钟计,并且也超越了总统和他的家庭。对总统行为的监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总统福特写道:

但是在没有一群记者跟随的情况下,我们从未到过任何地方。我也知道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件,就会有人进行现场新闻报道。另外,我认为对一位总统来说,从白宫后门悄悄溜走,说话时用比喻,或不告诉媒体他要去哪里,这是不合适的。我被告知有些总统这样做过,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自己得到消息20分钟后就告记者贝蒂我得了癌症。然后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内容。

当然有关总统能保密的争论由于一部分证据不能获得而受到了阻碍。也就是说,任何真正保密的东西是不能被引用的。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这里所展示的只是间接的例子。于是就得出,今天的总统没有过去总统那样的控制。现在的总统被观察得过于仔细,而且更重要的是太经常。现在的总统要秘密进行克利夫兰那么长时期的考验几乎是不可能的。

约翰逊的一个例子表面上似乎与这种理论不符,但实际上也可以用来说明它。约翰逊确实设法“偷偷”进行了癌症手术,而公众没有注意到。这个手术是皮肤癌,但是在踝关节上。如果手术再严重一些,或者他的外表受到了影响,那么手术就不可能保密。另外,对手术报道真相关注的性质说明,问题不是对总统的危险,而是他竟敢做手术——无论多么小——而不让媒体报道。正如当手术传言被最终证实之后《纽约时报》报道:

对皮肤癌问题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其中更多是由于它的保密,而不是它的严重程度。皮肤癌是最普通的癌症并且是最容易治愈的一种。

但是总统和其他政治家的医疗问题被认为是公共信息,而保密的处理使人对约翰逊总统的领导的公开性产生了疑问。

克利夫兰生平的主要历史记录中指出,6月30日之后他在游船进行了秘密手术,但是没有特别提到其中的一天是7月4日。这个事实说明在克利夫兰时代关于总统可接近性的假设是多么的不同。总统在独立日不见了,而没有人注意到。现在,只要有一天不知道总统在哪里,记者就会开始叫闹,“总统在哪儿呢?”

这样就毫不奇怪,总统现在感到需要对媒体“诚实”。电子报道的速度和持续性迫使总统暴露得更多,并且尽可能地快。这种坦白使总统看起来似乎控制着信息的流动。因此,吉米·卡特披露自己有痔疮与他下午6点钟在电视上宣布伊朗救援任务的失败是相似的。它们都试图成为潜在的令人不信的信息的首要来源。然而,虽然总统能够通过先在媒体报道之前抢先披露有潜在危害的信息以维持一些控制,但是他们的形象和名誉仍有一个总体的下降,一是因为披露信息的内容,二是缺少时间对内容进行修改以适合公众传播。

从“私下—公开”到“公开—公开”

即使那些一直是“公开行为”的政治形式——新闻发布会、议会演讲、采访和政治会议——也由于电视镜头的出现而发生了转变。实际上，公开的与私下的这种两分法过于简单，不能用于描述媒介的影响。因为电视将已经是公开的事件变得更加公开。也许我们应当区分“私下—公开”的事件和“公开—公开”的事件。“私下—公开”的事件指涉及公共行为的事件，但是仍然是隔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因而没有亲身到场的人无法接触。而“公开—公开”的事件是指那些在电子媒介的帮助下超越了时间—空间的范围，每个人都可能接触。

看到在公开事件中某位政治家行为的第二手“报道”与通过电子媒介的似乎直接体验这些事件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对政治行为显然是有影响的。例如，新闻发布会总是涉及一位政治家的台上行为，而在过去这也部分地是总统和记者的后台交往。梅里曼·史密斯是白宫资深的通讯员，他指出，新闻发布会在“被电视报道闪光神圣化”之前是不一样的。

于是新闻发布会变成了总统和记者真正刀枪相向的决斗比赛。交谈可能变得愤怒。如当一位记者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后，罗斯福让他“站到一边去”。当一名女记者高谈阔论时，会被赶出总统办公室的会场，这样奇怪的事情也可能发生。

罗斯福的新闻秘书史蒂芬·厄尔利如果认为总统遇到麻烦时，他有时会在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中打断总统。“他会在总统的耳边低声说，而罗斯福会伸出他的双手做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姿势，然后说：‘好吧，史蒂芬告诉我说我错了，不是那样的。不过我还是必须接受他的说法，他说……’”然而这种事件通常是不让公众知道的。

新闻发布会的电视直播报道改变了总统的新闻发布会。记者悲哀失去了尖锐的问题和详细的回答，并为了成了总统剧的多余角色而感到失望。但是总统对此也失去了许多控制。在早期，哈定(Harding)、柯立芝(Coolidge)和胡佛(Hoover)总统要求提前提出问题，并只回答他们选出的问题，而且给媒体施压，让他们在报纸的报

道中不能提到未回答的问题。而罗斯福在他当政期间,保持着传统上禁止未经许可直接引用(“交流”)总统语言。直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第一任中期,媒体才被允许经常拍摄新闻发布会的电影,这样当总统被提问时就能捕捉到并且传播总统的“表情”。肯尼迪走出了最后一步,允许对他的新闻发布会做同步的“现场”电视转播。

对总统来说,新闻发布会的电视直播引发了新的机会和新的问题。积极的方面是,它显得总统能为媒体接触,而实际上却绕过了直接对人们说话这一过程。但同时总统也被置于一种新的危险境地。就像是一名表演特技的司机尝试危险的命运一样,总统可能会由于好的表演而轰动全国,或者反之引起一系列的支持下降。声明出现的错误、犹豫、闪烁其词的回答、发音的错误,或者是紧张的表现都可能损害总统的形象。

另一个通过电视报道变成“公开 公开”的“私下—公开”场景是众议院。过去议会中的交往只能是亲身到场的人才能完全接触。公开的议会记录不带有表象信息。一位政治家读声明时可能是活跃的或者是筋疲力尽的,可能是调子很高的声音也可能是低沉的声音,可能是口齿不清也可能是天才的莎士比亚式的演员,然而议会记录仅记载着抽象的语言信息。通过印刷文字政治家可以使用国王或者平民的“声音”(也就是语言),而且他们可以较容易地选择自己的“语调”和“表情”。

但是电视的表象讯息则很不容易塑造,一旦形成并被记录下来,它的完整性使之几乎不可能被修正。在国会中的镜头仅对准讲台,以避免拍到不当行为或者空座位;即便如此,议会这个场地还是发生了变化。电视镜头捕捉到了政治家亲密的个人风格。它捕捉到了口误、声音紧张得颤抖,双臂下垂的疲惫以及皱褶的衣服。

由于国会的会议传统上是“私下 公开”的事件,过去议员对印刷的《议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有很大的控制权力。事实上,由于《议会记录》对实际议会叙述的不准确而声名狼藉。人们知道那些声明出现在记录中之前经历了扩充、浓缩和大量的编辑。由于实际的“会议录”“消失了”,“会议录”和文字记录之间的不符基本上看不到了。“会议录”仅有一个公开的版本。现在实际的会议过程被记录下来并永久保存在录像带上(并且公众可以购买到),于是就出现了将两种议会记录——录像带和印刷品整合在一起的行动。议

员“修订和扩充”《议会记录》中声明的权力就受到了限制。

政治家的采访按定义来说是公开行为。但是没有电子媒介时，它们也涉及到了政治家和记者之间个人的和私下的交往。在印刷出版的采访中，政治家能够将自己和记者的谈话与他们对公众的“官方”声明区别开来。然而电视采访将政治家——记者的交往与政治家——公众的交往混合起来，而且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行为风格，它既不是私下的交谈，也不是公开的声明。

电视采访的场地常常是实际的或者模拟的客厅。“电视转播的房间”是从“私下——公开”到“公开——公开”转变的恰当象征。因为对于到某人家中做客的人来说客厅是一个“台上”区域，而对于没有被邀请到家里来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后台”区域。客厅中所发生广播的行为，将外面的世界带入了家中“台上”的房间，但是电视采访仍然是公众对个人交往的“偷”听。即使知道被无数的人“偷”听，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所说的话和所展示的行为几乎都是亲密的。

在电视采访中，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身体常常离得很近。正如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指出的，交谈的语调、面部表情、语言的选择常常由人们之间的距离所决定。当坐在距听众三英尺远时很难做鼓动民众情绪的演讲，同样距离20英尺远的恋人也很难谈论亲密的事件。因此电视采访通常是从演讲和“理念”转变到闲谈和个人的。^{*}

1973年新的副总统福特和他的家人在家中接受了迪克·卡韦(Dick Cavett)的采访。从所提的问题中美国公众发现了这个家庭的一些个人生活以及福特对摇滚乐队的无知。即使是芭芭拉·瓦尔特斯对福特相对正式的“离任”采访中，福特夫妇谈到了乳房切除以及在白宫的孤独。瓦尔特斯女士播报了(发送了)“第一家庭私人空间”的电视首映。

在1976年竞选后，采访卡特夫妇时，芭芭拉·瓦尔特斯问了有关婚姻、情书、孩子、婆媳令人讨厌的习惯，以及白宫中单人床与双人

* “与媒体相约”和“面对全国”这样的节目常常是这种亲密规则的例外。但是制作者显然发现，为了在这种节目中制造正式的氛围，他们必须使用桌子并且增大参与者之间的距离。另外，这些节目很少被认为是“好电视”。它们通常是为了满足电视广播许可的“公共服务”要求而设计的，并且它们通常是在“死时段”播出，也就是那些观众数量相对少，不能卖给广告商的时段。

床等问题。卡特夫妇对此一一做了回答。

我们中间许多人看这些采访时会同时感到高兴和感到困惑。另一方面,我们有一种尊敬的感觉。我们因接近“伟大领导人”而感到高兴。首先,这些问题似乎不适宜——我们也许希望在个人交往中看到公众人物。另一方面,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有些让人感到不舒服。我们的领导人似乎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么伟大。总体的印象是:他们也是“普通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被称为“伟大的平民”。在过去我们为“普通”美国人的伟大而自豪。现在我们常常对领导人的普通而羞耻退缩。*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的前主席西·米克尔森(Sig Mickelson)作出了他对会议上电视之后的描述:

会议似乎是骚动且不可控制的马戏团表演,它无法反映出过程的重要性。当公众看到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方式如此混乱,而选民显然像是暴君和超龄青年的混合体,他们穿着异国风情服装伴随着新年前夜般的噪音游行,公众变得愤世嫉俗。整个过程就像是讽刺剧。

媒介对会议报道所创造出的信息流新模式,类似于电子媒介对等级制度的整体破坏。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 Cater)从1968年爆炸性的民主党会议中给出了如下的例子:

在一个时间,威斯康星州代表团坐的地方忽然一团糟。电视镜头立刻就跟了过去,记者也带着步话机冲了过去。立刻全国观众都知道了问题的起因,但演讲者卡尔·艾伯特(Carl Albert)作为会议主持者却不知道。但是,艾伯特是决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人员之一。在这个小世界中,人们目睹了领导人如何被这种可怕的传播系统扔到一边。

当电子媒介试图向观众披露“真正”进行的事情时,通常它们就会改变正在发生的事。这类似于在热切要求“即刻答复”时比赛裁判

* 在20世纪早期,美国人洛德·布赖斯(Lord Bryce)认为出于几方面的原因,美国人羞于提名和选举他们最出色的发言人做总统。他说,美国人选择“安全的”候选人,崇拜者少而敌人也少,他们不会威胁到普通的选民。布赖斯的分析有时被用来说明,我们目前的“领导危机”仅仅是一个长远趋势的延续。但是认定“什么都没有改变”就忽略了总统形象的质变。在过去,距离和神秘化使得当总统的人超越了自身的“普通”而显得是“伟大的领导人”。现在,我们观察总统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显得普通。

角色的变化。信息流的新方向破坏了过去权威与控制。

会议最初的设计是“私下 公开”的事物,记者的出现常常引起不安就是一个证明。实际上迎接记者的常常是敌视。例如在1964年,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被带离了共和党会议室。在1968年的民主党会议上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被逐出会议室,而当丹·拉瑟(Dan Rather)试图进行采访时被保安官员打了一拳。在1976年的共和党会议中,福特在会议结束时让里根从台上下来,使里根大吃一惊。一位记者冲向里根问他的“感受”,但是这种情况没有经过演练,手头也没有声明或现成的意见。记者很快被挤到一边,里根的顾问围成一圈竭力为其创造出一个后台区。

在过去的私下 公开的新闻发布会、立法会、采访和政治会议中、政治家的错误、与顾问的会议、犹豫,以及个人表情仍倾向于不向广大的公众披露。电视的报道是即刻的和相对持续的,政治家不再有机会隐藏自己基本的人性或者他们做决策所需的时间和建议。

埃尔温·戈夫曼指出,对于表演角色非常必要的行为,有时必须做出牺牲,目的是留下角色表演的很恰当这一印象。例如,他指出,裁判常常被迫放弃得到确切决定所需的思考时间,以便做出立刻的反应,并因此而显得确定。但是政治家与更高的个人和社会赌注进行赌博。现在那些试图不花时间与顾问沟通就想听起来很好的政治家发现,他们不得不发表具有很大危害的更正声明。对中区场地的另一种选择是强调传递的过程,以及一个人对其他人观点的包容,并试图由此从建议中得到一些好处。但是这种立场只是一种妥协,无论怎样它削弱了中央权威人物的形象。

在新的传播环境中,许多政治家无论怎样都失败了。如果他们试图扮演过去坚定而自信的领导角色,则会因为过多的信息泄露而削弱其形象。如果他们完全公开自己让公众观看,他们就使自己的角色失去了神秘。因此,政治竞技场的新特征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共同的线索,它将尼克松和卡特似乎毫不相干的总统问题联系起来。

“水门事件”和“卡特门”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到他的语言讯息和非语言风格明显的不一致的困扰。他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和

出色的辩论家,因此他在做收音机广播时收效显著。但是在电视上他常常显得不自在和紧张。他那语调非常优美的语言辩论常常被他紧握的拳头、躲闪的眼光以及轻视的怒容所破坏。

由于他的风格(以及他对政治对手攻击的某些内容),他被冠以“狡诈的迪克”的绰号,有人常用下面的问题讥笑他:“你愿意从这个入手中买二手汽车吗?”选民是否信任理查德·尼克松常常取决于选民是更多地注意他的口头语言,还是他的身体语言。

在1960年的电视辩论中,尼克松的形象出了问题,在此之后,他对电视更加小心警惕。实际上,帮助尼克松易于进入白宫的一个可能因素,是他决定不出现在许多的竞选广告中,公众只能听到他的声音。如此一来,这些场所展示的是尼克松的“广播声音”以及与之相伴的一个画面。但是一旦当选之后,尼克松的公开发言与他个人风格之间的紧张就加剧了。

尼克松总统是新的中区政治理想的受害者。他试图成为旧式的“伟大领导人”,对围绕在总统周围的全新传播环境全然不知。而最终使尼克松下台的就是他台上和台下的行为严重不符。尼克松对于控制接触自己的后区非常自信,他甚至将自己私下的谈话录了音并在电视上发表相反的公众声明。录音带证实了人们对尼克松电视中失言和不自在的非语言风格的猜测。尼克松公开宣称他的伟大以及他对法律和秩序的献身,然而他的后台行为却显示了他的渺小以及他使用流氓团伙的语言。

后台和台上行为的明显分界线是贯穿水门丑闻的主线,但它极少被明确地提出或探讨。相反,对“水门事件”流行的学术探讨倾向于关注法律和道德问题。例如在一份2000页的丰富的总统历史文件中,威廉·戈德史密斯(William Goldsmith)将“水门事件”的意义总结如下:

在过去曾有过总统丑闻以及失去光泽的行政主管,但是这个国家从未经历过像过去几年来我们所见到的对白宫的这种接近。美国总统曾经令人尊敬地为人民服务,有时相当出色,这几乎已经存在200年了。尽管曾出现了权力的衰退和流动,正如某个天才的领导也有升有降……但是在整个这个时期没有一位总统像尼克松那样明目张胆地滥用白宫的特权。公众从这种经历中恢复过来很不容易。

参照这个引用中的“目睹”和“明目张胆地滥用”，出现了一些令人不解的问题：尼克松的行为真的是那么不同寻常？或者是他的行为为“变透明”，也就是说，它们对公众的披露使之变得不寻常和不能被接受？

当然，尼克松宣称他的行为并不是个别的。他的声明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1）许多其他总统也“腐败”（是个很差的理由）；（2）所有的总统——无论好坏——在私下的行为方式必须看起来违背他们公开宣称的价值和虔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论点）。

对于尼克松没有销毁有罪证据的录音带一事，曾提出过许多理论：出于历史原因，税收原因，或由于心理不平衡。一个通常被忽略的可能性是，尼克松并没有立刻发现录音带有什么危害。这可能是不合逻辑的。但是1977年当采访者戴维·弗罗斯特（David Frost）问到尼克松为什么不销毁录音带时，尼克松指出，1973年6月当他第一次听这带子时，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会“对我有危害”。

尼克松宣称他从录音带中没有听到对他有害的东西，这看似不合逻辑，但是如果考虑到尼克松可能是用“后区的耳朵”来听录音带时，就有意义了。也就是说，这些录音带可能对他来说听起来是“正常的”，因为对它们谈论的方式毕竟对于同事或者朋友之间的后台谈话来说，并没有什么是不寻常的。

尼克松的情况类似于同性高中学生在更衣室进行的吹牛。谈话可能充满了淫秽和幻想的性行为，讨论老师、管理人员和异性学生的身体特征，并且“谋划”破坏学校的平稳运行和法律。如果学生把他们更衣室的吹牛录下音并且听一听，他们可能仍然发现自己的谈话非常幽默。他们可能相互祝贺能非常聪明地构造出一些短语和极为淫秽的评论。但是如果磁带公开地放给老师、父母和异性朋友听，它的结果就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尼克松甚至可能错误地认为，他的“自然的”后区风格会使公众更喜欢他，显示一个更人性化的尼克松（就像是男高中生可能会错误地认为他的女朋友会喜欢纯男性情况下谈论妇女的风格）。相反，尼克松发现他后区谈论的话题，好像是震惊公众的一位精神病人的声明。

实际上，当共和党的编辑阅读和抄录“水门录音带”时感到的惊恐非常类似于女性偶尔听到全部是男性情况下谈论妇女时的不快。

赫斯特报(The Hearst Newspaper)的主编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写道:

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使我不可能再相信他在“水门事件”中对自己的声明。……问题是,这些使人蒙羞的录音带反映了一个男人完全沉迷于为了保留面子使用了最廉价、最肮脏的纵容手段,几乎全然不顾道德……

多年来我认识了许多总统,而且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令人敬畏的权力的压力下必然有无情——甚至是可悲的行为。但是我从未听到过像白宫磁带上的这种无情、可悲和没有道德的谈话……

对于林肯、艾克和大多数的总统来说,白宫本身只能是一幢在现实和外表上都具有基本一致性的房子。

类似的情况是,女权主义者舒拉米史·费尔斯通写道:

偷听到更衣室的吹牛,对女性来说是一种伤害:在他们吹牛的这段时间里她仅被看成是“屁股”、“肉”,或者“东西”、被人拿“一块”、“那个婊子”、或者被骗了钱、或性或爱的“这个女人”!最后当她明白自己不比别的女人好,而是完全没有区别的时候,这就不只是一个打击了,而是一个彻底的毁灭。

理查德·尼克松这样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没能预料到录音带的泄露会引起如此冲击,似乎有些令人迷惑,但显然他确实没有预料到。《新闻周刊》报道:“不幸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通过自己里程碑式的错误估计——他在‘水门事件’中秘密录音带文稿的出版——加剧了这种冲击。”令人惊讶的是,伴随着该文稿出版,白宫小结宣称:“在所有说出的几千字中,即使它们常常是不明确和模糊的,但是从未显示出美国总统卷入了妨碍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

显然,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手下将文稿看成了“法律文件”。他们在其中寻找泄露非法行为的词。也许他们甚至看到了“不清楚和模棱两可”的话中有可疑的影子,而这常常导致陪审团“无罪”的判决。他们所忽略的是对总统来说不恰当的后台行为风格。例如,关注单词时,尼克松的手下通过删除感叹词审查了内容,但是这个行为并没有减弱许多人对于删除感叹词的震惊。对于这种风格的震惊从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的选词“可耻的”、“最廉价”、“最肮脏”和“纵容”就可以看出来。

尼克松在公众面前展示一种人物形象；而录音带则披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个性。

对于文稿的读者来说，他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不坚定的人，这个尼克松在其备忘录《六次危机》中是不断变化的专权英雄。

文稿的读者寻找总统对国家福利的讨论以及他在“水门事件”中行为的合法性的讨论，但没有找到。在这文稿之前，他被描述成具有很强的控制力且敏锐的人；但是现在所显示的是，他对事件和人的控制已从他的掌握中溜走，他花数小时的时间避免做任何决定。

然而后区行为的“真空内容”是值得怀疑并且是躲闪的，对它们迅速否定是不聪明的。所有的人都展示与自己前台角色相冲突的行为。许多好的医生、律师、牧师、教授和总统在私下的言行如果被当成是公开的声明或行为，会导致他们丢面子的。例如，难道有谁有些时候会不是“世俗的和果断的”？即使是最诚实，最符合伦理的教授如果发行他私下谈话的文稿也不会不受到伤害。例如，《芝加哥讲坛》对文稿中披露的尼克松的批判似乎是每个人后台交往的恰当描述：“他犹豫不决，他俗，他愿意被领导。他显示了知识方面的巨大差异。”

就我们目前的分析而言，尼克松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例子，因为很难将场景和道德问题分离开。对许多人来说尼克松仍然是一个可憎的人物，这样我们就不易抓住这样的事实，尼克松所受到的这种仔细观察可能同样会使任何总统的行为受到威胁。本分析并不是想为尼克松可恶的道德行为辩解，而是用来解释信任问题的机制，它可能会损害道德和不道德的表演者的形象。

实际上，尼克松在宣称他只是做了其他许多总统做的事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他说得非常准确。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总统——包括“好”总统一——也使用亵渎的语言，并且对人民和议会撒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克松政治上的挫折起因于对新的信息环境没有精确把握。他“正常”的私下行为被公开了。他是一位很差的表演者，根据总统的风格和表演来评价其好坏程度来看，他是一位“坏”总统。

这说明公众更聪明了吗？美国人民对于尼克松试图监视其他人的后区而震惊，然而公众只能通过自己对尼克松后区的监视才能知道这些行为。在披露白宫的这一文稿之后，公众立刻就要求披露用

于长久记录的录音带本身。

而记者和许多学者的态度也同样值得怀疑。戴维·弗罗斯特使用椭圆办公室谈话的文稿来测试尼克松当总统的目标和动机是否公正？换句话说，是否这些后区的评论也要像公共声明那样被分析和检查？任何政治家（事实上或律师、或医生、或教师、或电视采访人员）的名誉都能经受这样的问题吗？许多学者和记者，假定了现在的总统问题是由于议会和人民对总统和行政机关的工作没有足够的信息所致，他们对吗？

目前，“知道的权力”以及“无论什么代价都要诚实”的感觉并没有伴随所有伟大领导人的公众面具之后是什么这种复杂的观念。正如戈夫曼针对等级制度的神秘性指出：“神秘后面真正的秘密是真的没有神秘。”

我们能够窥探政治家生活中过去为后区的能力，为我们整个民族带来了新的矛盾。至少，我们对于在后区所看到的东西有关道德的愤怒是基于权威支持的天真的假设。我们显然想揭露无能 and 没有面具的无情的虚伪。然而我们认为无能或不诚实的证据常常是所有社会表演者的表演过程。

当然难题仍然存在：什么时候披露等同于社会的事实？诚实的“表演”和不诚实的“表演”的界限在哪儿？更重要的，我们能既是“伟大的领导人”又有“信息自由”吗？吉米·卡特当总统的实践说明了这基本上是“不能”的。

1976年11月2日，美国选出了第一位“中区总统”。很难说卡特和他的顾问是否明确地意识到新的中区政治的特征，但是卡特作为候选人的行为和作为新总统的行为显然是经过仔细选择以适应新的政治角逐的。

通过维持“外人”的形象和地位，卡特获得了与其他总统竞选领先者相比明显的优势。作为政治上的陌生人，他没有将前区/后区的许多不一致联系在一起，而这种不一致削弱了两党“旧的忠实”党员的信任。

在他的竞选运动中，卡特将自己描述成杜鲁门的理念继承者——杜鲁门是最近的一位总统，他现在被认为是前区和后区的行为一致的总统。卡特极力避免说出与自己曾说过的相冲突的话。他在全国各地的信息几乎完全相同。重要的不是某一条讯息而是所有

的信息保持相对的一致和持续。他基本上是说：“相信我。”^{*}（几乎每一次他提供更多的细节时，他就会从国家的一部分人那里引火上身）。而这种对信任的根本要求帮助他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以及后来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正如《新闻周刊》观察到的：

自从1940年温德尔·韦尔(Wendell Willkie)以来没有一位候选人以这样缺乏公众记录而获胜；自1924年约翰·W.戴维斯(John W. Davis)以来没有一位民主党人因私生活而获得提名；自从1848年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以来没有一位南方人被两个主要政党提议做总统。除艾克外没有一位现代的政治人物的总统提名完全依赖于个人的信任，而很少根据详细的施政计划。卡特有他的计划，但是他把它们模糊成一点。他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初选的中期呼吁至少要“显得有些内容”。而相反卡特展示的是他的个人，展示每天18小时累得骨头都散了的工作，并且他仔细地不留痕迹地保证他的政府像美国人民一样好。。

理解了必须呆在舞台灯光下的程度，卡特选择了他自己能做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卡特避开了传统的有活力、有权力的总统角色。他通常讲话安静而缓慢。他的声调和风格更适合灵敏的麦克风和特写镜头，而不适合向现场观众的同时演讲。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指出，卡特“比今年任何政治家都意识到并且适应了现代传播和全国的情绪……在电视上一遍遍地看他。他的节奏意识，控制意识，非常低沉而轻声的叙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与其他候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卡特的公共声明充满了尝试。他说“我们会看到”以及“我想”。他提到了自己的局限性。例如1976年4月在克莱韦兰城市俱乐部前的竞选演讲中他说：

我不认为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我仍然在寻找其中的许多答案……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全国最恰当的人选。我确信作为总统，你

* 甚至在卡特的那本经过大量编辑的演讲选集——《一届像人民一样好的政府》(A Government as Good as Its People)中，它仅包含2100篇总统竞选演讲中的不到40篇，下面的声明(或者意思相同的解释)在十几页内出现了3次：“我不会为了当选去做一些事情。我不会说谎。我不会做出误导人的声明。我不会背叛信任。我不会躲避有争议的问题。如果我做了上述的事情，就不要再支持我，因为我就会不配领导这个国家。”

们中间有许多人比我更聪明,受到更好的训练,也许更会管理。我想对你们今年所有没有竞选的人表示感谢。

卡特强调他依赖于他的顾问和内阁,并且声明他决定给予副总统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让他发挥作用,“帮助总统”。他保证开放政府的行政机关让人们监督。“近几年中每一次我们犯严重的错误时,都是由于美国人民因保密、误导的声明,有时是因为流言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他发誓决不向人民撒谎。

傲慢的理查德·尼克松在公众面前讲干净话,而私下却咒骂;低调的吉米(不是 James Earl)·卡特试图展示一种不易被媒介的披露所损害的前区。”他说,他期望与美国人民“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除坚定的信仰上帝和愿意努力工作之外,卡特没有宣称自己有不寻常的优点。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告诉人民:“你们的力量可以补充我的弱点,你们的智慧能帮助我尽量减少错误。”

作为总统,卡特早期的许多行为象征性地适合了新的中区政府:

- 他举行了“人民的就职”并且邀请整个国家参加;
- 在就职仪式上他穿着常见的商业套装,而不是传统的早礼服和高帽子,他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步行而下而没有骑马;
- 他在公共场合穿牛仔服和工作靴子;
- 当他在全国旅行时通常呆在个人的家中;
- 他让自己的女儿埃米(Amy)在一所非隔离的公立学校注册;
- 他举办了现场电视热线,回答“人民”的问题;
- 在他首次总统电视演讲中,他穿了一件羊毛衫,“直接”坐在一个安乐椅上说话,没有加入桌子以增加正式性和距离;
- 他强调(最初)使用自己的语言;
- 他废止了几乎所有白宫工作人员的上下班的大型豪华轿车服务;

但是在卡特被《花花公子》采访时这点却出现了一些波动,他使用了一些粗俗的语言,而且这些语言的出版似乎没有使卡特气愤,甚至这可能是他大的战略的一部分。回顾一下,这是种一致的模式——通过仔细使用宗教的前区与后区的一致。当然卡特有色欲(每个人不是都有吗),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上帝的注视下愚弄别人!也许最重要的是,采访说明,虽然卡特自己是信教的人,但是不会将清教徒的标准施加在其他美国人身上。这个分析解释了为什么甚至在竞选之后,卡特也没有试图使采访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实际上,他的《一届像人民一样好的政府》重新印刷了采访中没有争议的部分。

- 他削减了白宫的电视机,除去了“法庭摄影师”的位置;
- 有一段时间他甚至禁止“向上级致敬”。*

所有这些“去除崇高”行为的目的是似乎都是为了获得现在构成总统形象的各种信息的一致性。但是当卡特试图重塑总统的行为,以适应白宫高度的可见性时,他遇到了两个方面的困难。首先,许多人憎恶他对白宫的“降级”以及他缺少活力和力量。但是同时对总统关注的程度似乎对卡特低调的风格和“直接的”方法来说都甚至是太多了。竞选结束时,他对检查总长的任命被攻击为属于种族隔离俱乐部。这样,伯特·兰斯(Bert Lance)的丑闻危害了白宫的信任。1978年一份全国性的男性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题目为“卡特门”的“揭露”,其中一期的题目是:“吉米·卡特的一百个谎言”。(图画是卡特手握斧头的画面,他旁边是100棵被砍倒的樱桃树。)在他当政的后期,卡特与利比亚可疑的关系以及卡特对事件的处理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然后许多方面都表明,卡特试图调整他表演的风格以适应新的政治场合的要求。但是他的险胜以及对他“不像总统”的风格的负面反应都表明了公众对于领导人只是一个“好人”而感到不安。

到卡特再次竞选时,他看起来似乎无论怎么做都必输无疑。他受到了其他候选人的严峻挑战,甚至在他的党内也是如此。面对不断加大的“信任差距”,卡特开始改变竞选总统的风格和方法。他开始恢复使用更加“崇高的”总统技术。多次发誓政务公开之后,卡特的白宫开始制止未授权的信息流动,并且设置了新的安全设置,比

* 20世纪70年代白宫形象和梵蒂冈形象的演变有着惊人的相似。约翰·保罗(John Paul)一世1978年短暂的34天的统治和目前约翰·保罗二世的统治都显示了一种新的中区风格的教皇政治。约翰·保罗一世被人们记住最多的是他的“微笑,不能抑制的大笑和开玩笑的爱好,以及拥抱他遇到的每一个人的需要”。他的第一项革新是在公众面前时使用一种新的亲密风格。他放弃了非个人的教皇用语“我们”而用“我”,他拒绝戴教皇的王冠,公开承认他对“上帝注视”(Holy See)工作的无知、避免使用准备好的文稿,说话时使用家常的比喻。(例如,一次他将上帝比喻成了汽车商人,将有罪的人说成是将果酱和香槟酒放进发动机然后抱怨说他们的汽车“掉进了水沟”。)对于通常星期三的听众,他选择了谦恭地走向他的王位的方式,而不是被人抬入屋中。罗马的重要人物选择了一个看似不太可能的,但是同样合群的继承者——自1523年以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立刻继承和发扬了他前任的亲密和人性。他打破传统,在他首次进行教皇祝福之前直接向那些迎接他的人演说。他的第一批听众是记者。几天之内,“他为人民和镜头树立了一种比2000年来教堂中任何一位教皇都不正式,但都更容易接近的教皇风格。”

“最高机密”还高一等。但有讽刺意义的是，他曾发誓要去除总统至高无上的统治，但又标出了新的秘密的“皇家”身份。

他的公开和可接近明显失败之后，卡特似乎抓住伊朗人质危机作为一个理由使自己同公众和媒介隔开。他的“玫瑰花园战略”开始模仿约翰逊和尼克松傲慢的隔离。

当受到肯尼迪和里根的挑战之后，卡特说话不再轻柔，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如果肯尼迪与他对抗，他说，他会“抽他的屁股”。然后卡特开始对里根进行正面攻击。他指责里根有种族偏见以及是战争贩子，而且他认为“在处理国家大事的问题上，里根并不是值得信任的好人”。这些攻击显然使里根阵营非常高兴，因为它们使得卡特显得“心胸狭窄”，使里根显得谦卑，原谅别人，和“像发言人一样”。总统顾问哈米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在给卡特的私人备忘录中警告，因为卡特是一个“使人喜爱”，“心地善良的”人，而这样对他的支持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这是首次‘个人品质’不是我们的根本力量”。竞选前一个月，ABC的路易斯·哈里斯调查(Louis Harris Poll)显示，相信“卡特总统不是一个很一致的人”的人数比一年前多了一倍。在卡特无心的帮助下，里根能够比卡特还卡特；也就是说，他能够更多地展示轻柔的中区风格，而这曾经在1976年使卡特有别于其他候选人。

在形象的决战中 卡特—里根的辩论，卡特像尼克松，而里根像肯尼迪。卡特很“强硬”、无情、紧张、不苟言笑。他做作地说着事实和数字。里根则平静、谦恭、充满秩序。他微笑，他以一种似乎幽默的方式指责卡特歪曲事实。“总统先生，又轮到您了。”辩论使公众不再担心里根是疯子，会将美国卷入世界大战。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卡特风格的变化可能给他帮了倒忙。选举结果是里根以很大的优势获胜。

电视镜头中的总统：里根与其后

尼克松、卡特和里根是非常不同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个性和计划，截然不同的长处和短处。他们当选入主白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个人的战略和风格，以及美国人民特定的期望和关注。但是他们三位总统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电子媒介所培养出的新的传播

环境。

在驾驭国家这艘船时,尼克松和卡特在同一水域搁浅了,不过是在不同的两岸。接下来的总统的任务就是与新的传播环境——这片水域进行协商,不触及任何一岸。这个分析并不针对胜利者或者失败者,而是现在进行政治游戏时必须采用的方式。新的规则可能去除了—些竞争者,也允许其他人竞争,但是规则并不能完全决定具体的胜利者。

在过去,所有竞选总统的人都处于一种希望在大的场所演说的位置:他们不得不提高嗓门,挥舞手臂以使后排的人看到和听到。但是他们也有时间和私下场地仔细准备他们戏剧性的公开表演。现在,所有的政治竞争者必须在一种新的、“更小”的、更个人化的政治环境的限制和要求之内进行活动。他们被更加仔细、更加持久地观察。电子媒介倾向于为所有的总统制造新的麻烦:很难同时既是“亲密”又是“像总统一样”,也很难同时既“可接触”又“鼓舞人心”。

电视重塑政治场所,增加恰当中区风格的需求,以及最大程度地减少其他方面的训练和技巧,这可以从选出有多年表演经验的职业演员看出来。如果尼克松是论题,卡特是相反的一面,那么里根就是综合。里根是一个自己说自己“讲话强硬”的人,但是他却是以一种轻柔的、友善的风格说出来的。他穿各种服装,从燕尾服到牛仔套装,他从事各种活动,从舞厅的跳舞到园艺工作,所有这些时候他似乎都很舒适。他是部分的尼克松,部分的卡特,他是一位砍倒自己树木的“至高无上”的总统。与尼克松不同,里根看起来是一位甜蜜的让人喜爱的人;与卡特不同,他为美国的权力和命运提供了浪漫的观念。

里根的风格与卡特相比甚至是更纯的“中区”。里根“有立场”,但是他这样做时有着“没有价值”的谦恭,他的演讲中充满了轶事和对儿童和平民来信的引用。像卡特一样,他避免传统修辞的华而不实,喜欢简单的,百分之百有美国头脑的男孩的简洁,但是他和妻子带回了一种在卡特的白宫中不存在的“贵族”的风格。里根试图传达一种个人风格的可接近性和开放性,但是他逆转了向公众公开政府程序和文件的潮流。他试图通过秘密协议,测谎仪检测以及政府文件更严格的分类体系来阻止向媒体披露信息。里根在区分对他人格的反应和对他政治行为的反应时比绝大多数近代的总统都成功。正

如《波士顿全球报》(The Boston Globe)观察到,“甚至里根的最猛烈的党内批评家在每一项指责的开场白中都暗示出了总统亲切、友善的方式”。

虽然里根友善的风格使他比他的两位前任更能耐受攻击,但是媒介对总统仔细地观察的代价是他的可信性。报道突出了他“具有的管理风格”,他的长假期(他当政的头20个月几乎有16周是休假),他有限的工作时间,以及他对午睡的喜爱。他的许多电视新闻发布会曾充满了各种灾难、错误的声明、愚蠢的回答,以及不能用事实和证据来支持的比喻。在信任这个问题之外,里根被指责有“陈述的差距”,并且难于集中注意记者的问题或者对他们进行反应。他曾被一些人起了个“友善的笨人”的外号。

里根将自己描绘成逆转了总统走下坡路的趋势,但无论怎样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他也有意识地加速了这种趋势。因为里根当总统的另一个特征是,他是一个有自我风格的“强大的领导人”,他领导人民离开强大的中央集权领导。他的“新联邦主义”是一种脱离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运动,并且促使中央集权解体,这是共和党早期反联邦主义人士的理想。例如,1982年里根对巴尔的摩(Baltimore)的县级官员讲话时提到了“恢复”宪法第十修正案,这条法案将大部分权力都下放到各州:“许多年来联邦政府第一次意识到它应当做的事情,它能长多胖,能要求多少权力都是有限制的。在你的帮助下,我们会逆转权力的流动,将它归还地方当局。”矛盾的是,里根将自己勾画为中央领导人,而这位中央领导人得到了不信任中央领导的人的公民的支持。

我们普遍对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失去信任的原因之一是,新的传播环境与我们对政府期待的组合,对总统提出了不可能实现的要求。通过披露更多的信息,新媒介要求更多的管理和控制。但是新媒介披露的信息太多,以至于它们也使得总统需要控制和建议更可见。结果,当人民开始意识到对形象和象征的控制以及对个人印象的控制时,就变得愤世嫉俗。新媒介为政治家制造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它们要求职业演员平稳的表演,但是它们也使得这种表演显得虚假。

报道的里根公关“胜利”中就有——个确实的讽刺。里根曾被欢呼为“伟大的交流者”,因为他那所谓的对媒体的有效控制。然而公众

并不仅仅是里根公关技巧中的台上观众。记者的叙述以及甚至里根顾问的叙述提供了一个“侧台”的报道，它强调了总统试图创造某种台上的形象和印象。如果里根参观的大多数是黑人学校，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象征性的采访，目的是消除人们对他不关心黑人福利的印象。当里根参观奥林匹克队训练中心时，我们听到，“媒介事件”使他能被拍下穿着像运动员一样服装的照片，目的是为了突出他的健康和活力。他的旅行被谈论为提供“拍照机会”，而他的“外交图画书”被描述成“推进人类的梦想”。我们被告知了第一演员的化妆、染发和助听器。我们知道了他避免回答记者问题时使用的伎俩。对于里根来说被赞誉为能进行“一点错误都没有”的演讲是一种混合的祝福，演讲稿的最终定稿（由别人代写）只提前了17分钟给他。

一旦建立敬畏和神秘的技巧向公众开放，神秘就受到了损害。正如乔治·里迪（George Reedy）观察到的那样：

所有关于公关技巧、动机研究和控制人类行为的观念的问题是，一旦技巧为人们所知，它们就会立刻失效……如果它们成了日常交谈的一个话题，人们会感到被推销了一堆货物。尼克松总统入主白宫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有一个很好的关于这个过程例子。日复一日我看到了一篇篇总统助手相互庆贺尼克松总统公关技巧的故事。然而，明确的回答是，当人们开始谈论一个人的公关技巧时，他就不再拥有任何技巧了。

公众对里根风格的普遍接受可能要归因于美国人民现在愿意忍受总统的侧台形象。20世纪50年代，当天才的战争英雄艾森豪威尔觉得需要雇佣一位好莱坞演员为他的电视形象提供建议时，出现了许多抱怨。但是美国人现在接受了总统本人必须是精湛的演员的事实，他必须扮演总统这个角色，而不是当总统。虽然里根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像其他近期的总统一样，充满了管理的丑闻、尴尬的时刻、政策的失败，以及信任问题，但他的行为好像一直没有发生任何有危害的事情——并且公众允许他这样做。在发生几次可怕的总统表演之后，许多美国人似乎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接受了实实在在的风格，至少是在其他一些好的风格出现之前是这样。

因此，与尼克松或卡特相比里根的成功不应与总统的再生相混淆。实际上，考虑到第六章中讨论的“交流”和“表情”的区别，“伟大

的沟通者”的标签似乎是一种误导。几乎没有人珍爱里根的演讲或者阅读他的书。但是里根是一位“伟大的表达者”。即使在躲避记者的问题时，他也常常谦恭地拍拍脑袋，微笑和挥手。即使在他开可怕的玩笑，或者说的句子没有开头、中间和结尾时，他仍像是一个“好人”。里根的交流常常是世俗的，有时无法理解，但是充满感情的声音，或者充满泪水的眼睛，或者一个轻松的微笑——时间和协调都恰到好处，常常挽救了它们。除了其他的可疑的能力之外，里根大师般的表情，是人们将他看成是媒介的好的控制者这个积极看法，以及认为他是“和善的笨人”的消极看法的一个共同的原因。里根许多表达上的成功和交流上的经常失败，解释了为什么民意调查显示说“喜欢”里根的人中有大量的人不赞同他的政策，认为他正在把国家推向战争的边缘，并且怀疑他对自己行政活动的控制。到目前为止，被调查的大多数人不认为里根有着“超常能力”。里根被人看时通常不会尴尬，但他并不是像过去伟大的总统那样令人敬畏的领导人。

无论胜败，当今的总统和有希望成为总统的人被同样的标准评价，那些“电视上表现好的”：他们是否活跃和幽默；他们看起来是否友善和机敏；他们的面部表情是否看起来舒服；他们给出即席的机智回答时能否不想、不停顿，或者不重复词；他们是否按照镜头和麦克风的标准而不是人群的标准来选择词汇和表达？

电视鼓励我们提名像卡特、里根和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这样的候选人，他们避免扮演“伟大的领导人”，他们的风格是平易近人的侧台或“中区”，在那里可以承受大量的披露。虽然某个人会显然成功地赢得每一次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但是总统本身失去了许多光环。我们仍然渴求更多的东西。

第五部分 结 论

十四 我们去过哪儿，我们将去何方

失去意义的地方

对于美国人来说，20 世纪后半叶的标志是不同寻常的数量与类型的社会变化。被剥夺权利的人们要求权利平等，而政治精英中则有一大部分被削弱或者沉沦了，介于两者之间的许多人一直努力寻找新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也许比变化程度更令人不安的是变化表面上的不一致，甚至显得是随意的。它们共同的线索是什么？我们最近目睹了和平的民权示威与暴力的打劫和暴动同时发生。我们看到了政府机构对人民的迫害实质上变成了人民和媒体对总统的迫害。对社会革命愤怒的讨论变成了冷静而决断地追求“肯定行动”、社区控制，以及核武器冻结。

一些社会观察者将 20 世纪 60 年代爆发的一切看成是历史的偶然失常，高兴地指出，过去的嬉皮士们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加入了物质主义的中产阶级，这些使观察者感到欣慰。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发生。但是他们没能看到，男性警察和建筑工人现在则留起长发；“粗野”的农场主让他们的家畜在美国国会大厦前撒欢

儿(回应嬉皮士?);残疾人在轮椅上静坐;法庭在争辩是否归还印第安人的土地;人们在行为和态度方面也发生着大大小小的变化……这都意味着什么呢?是我们正在目睹持续的变化而感到迷惑吗?或者是否存在有向心机制将社会这个钟摆前后摆动?

社会变化向来都是过于复杂,无法归因于单一的原因,而且因其过于多样化,不能减少到一个步骤完成,但是这里所提出的理论认为,联系最近许多看似多样化现象的一个共同点是美国人对“地方的感觉”的改变。这个短语是一个复杂的——虽然也是很严肃的——双关语。说它复杂是因为“感觉”和“地方”这两个词都有两种意义:“感觉”既指理解又指逻辑;“地方”既指社会地位又指物质上的地点。这个双关语很严肃,因为这四个意思的每一种都代表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实际上,它们内部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这里提出的两个基本论点的基础:(1) 社会角色(也就是“社会位置”)只能在社会场景中理解,直到最近社会场景还一直与物质上的地点联系在一起;(2) 场景行为的逻辑与信息流的模式有很大关系。我认为媒介的演化通过改变我们收发社会信息的方式重塑了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的关系,这就改变了社会秩序的逻辑。

我曾持的观点是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对美国人的地方感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子媒介将从前不同的社会场合组合在了一起,将私下行为和公开行为的分界线移向了私下一方,并且弱化了社会位置和物质位置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以印刷为主的社会中,行为场景模式背后的逻辑被彻底推翻。许多美国人可能已不再“知道自己的位置”,因为传统上“地点”中相互联系的成分被电子媒介撕开了。无论一个人现在在哪里——在家、在工作,或者在汽车里——他都被接触着和接触着别人。

过去按照特定点——厨房、操场、监狱、女子修道院等——的物理隔离而定义的社会群体,受到的影响最大。但是社会地点和物质地点关系的改变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社会角色。我们的世界对许多人来说可能突然没有了意义,因为在现代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相对的无地点。

在过去30年中变化的强度可能特别要归因于电视的独特的打破这里和那里、现场和有中介、私下与公开界限的能力。电视比其他任何电子媒介都更倾向于使我们卷入过去我们认为“与我们无关”的

问题中,将我们推到距谋杀犯和总统面前几英寸的地方,使得物质屏障和通路按照社会信息接触模式来看变得相对的无意义。电视通过向我们提供比用收音机体验到的地方或者以电话到达的地方更好的图像,从而加强了早期电子媒介的影响。

本理论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和分裂,可能是行为、态度和法律的调整,以便与新的社会环境匹配。不同群体、处于社会化不同阶段的人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的许多传统区别是基于印刷社会中存在的信息流模式。许多个人或者许多阶层的人的新的、“奇怪”的行为可能是由于从前不同社会环境的持续融合造成的。

电视帮助顺从的黑鬼变成了自豪的黑人,将小姐和太太融合成了女士,将儿童变成了具有自然权利的“人”。电视帮助了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的崛起——那些在感知到更宽广的世界时看到自己被不公正地隔离在某个角落的人。电视通过使人在身体隔离的情况下仍能获取社会信息,而给了残疾人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以力量。电视使妇女看到了她们被监禁在家中的外部的视角。过去距离和神秘强化了权威的氛围和名声,电视则由于破坏了距离和神秘而弱化了可见的权威。电视可以很轻易地做到,残疾人无需离开轮椅,家庭主妇无需停止做晚饭,普通公民也不必离开他或者她的安乐椅。

通过融合独立的演讲社区,电视使几乎每个话题对公众的每个成员都可以成为兴趣或者关注的主题。另外,许多在过去私下的和隔离的行为被带入了大的统一的公开场所。结果依赖大的距离和隔离的行为受到了损害;依赖长时间仔细演练的表演被禁止进入社会的节目表。更为宽广的公共场景几乎给了每个人以全新的(并且相对的共享)视角,从这个视角观察别人并获得反映出来的自我感觉。我们、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警官、我们的总统、我们的秘密机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都被要求在有新剧风格的新剧院中扮演角色。

许多正式的相对的角色依赖于缺少“对方”的亲密信息。如果神秘与神秘化消失,正式行为也就消失了。例如典型的求爱行为在日复一日婚姻的亲密中肯定会迅速褪色。类似地,我们刚刚获得的对远处事件的接触,对异性姿势和行为的接触,对我们长辈和权威的接触并不是简单地“教育”我们,这种接触改变了社会现实。通过向观

众披露过去的后台区域,电视成为解除神秘的工具。它导致了政治领导人形象和声誉的降低,它为儿童去除了成人的神秘,并且也消除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相互神秘。对传统的儿童与成人、男性与女性、领导与追随者等角色广泛的拒绝,应当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第一代在学习读写之前就暴露在电视环境中的美国人。有了这一分析,就没有什么是令人吃惊的了。在电视这个共享的环境中,女性与男性、儿童与成人、追随者与领导对相互之间的行为和社会知识知道得很多——实际上对他们来说表演无知与全知的传统互补角色太过了。

贯穿本书的一个子概念是对20世纪60年代广泛社会变化的原因和意义进行重新解释。讨论提出了那10年特殊性的新解释:过去不同社会场景的撞击,引起了对社会和政治行为的道德的重新评价。按照这里的分析,最近的社会事件通常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潮流的继续而不是推翻。那个时代的修辞和行为所显示的内容可能是过去的一部分,但是行为变化与场景融合的潜在结构仍然继续着。

“60年代”首先就与所宣称的不符。与许多卷入抗议的人的当时想法相反,20世纪60年代并没有引发全面自由、平等与和平的世界范围的乌托邦的诞生。但是它们也不像现在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仅仅是正在消失的“不具任何意义的声音与狂暴”的好奇。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爆炸标志着两个时代社会行为的转变: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特征发生了永久而深刻的变化。被看成是奇异和反叛(两种意义上的)的行为已经向上传到年龄较大的一代,且传到美国体制之外。虽然变化没有全部符合“运动”所标榜的理想和道德的反叛,但它们是被首次引起广泛不满和抗议的社会场景调整为一致的转变。

封闭场景的开放是对有几百年历史的潮流的逆转。正如米歇尔·富科(Michel Foucault)在《纪律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雄辩地指出,包围着监狱、医院、兵营、工厂和学校的墙在几个世纪内变厚了。富科描述了为了使人们被同化进具有单一身份的群体(“学生”、“工人”、“犯人”、“精神病”等),他们如何越来越多地被隔离进不同的地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是可以互换的部件。甚至不同身份的群体也被纳入了内部一致、线性相关、按

等级排列的大的社会系统单元中。但是他没有观察到目前的相反过程。旧的社会秩序将人们隔离进“特定的场所”，以便使个人被同化为社会大机器的一个部件，但是目前的潮流是将所有群体合并进一个共同的场景，因此对个人的特殊需要以及个人特征有了全新的认识。

19世纪的生活使许多隔离场景成为必要，并维持了许多隔离的行为和态度。现时场景的融合给予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过去拥有东西的总和，而是一种新的、综合的行为，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在一个隔离的场景庆祝孩子的婚礼，在那里婚礼是当天惟一的“经历”，那么我们的快乐可能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当我们在参加婚礼的路上，从汽车收音机里听到毁灭性的大地震，或者一位受欢迎的娱乐人士死亡，或者某个政治人物遇刺，我们不仅失去了全心全意快乐的能力，而且也失去了深切悲痛的能力。不同地区许多不同交往风格的电子融合导致了新的“中区”行为，它们虽然包含过去不同角色的成分，但它们本身也是具有新期望和情感的新行为模式。

因此消失的是许多人的“特殊”行为，以及那些与众不同的与隔离交往相联系的行为。消失的还有极端的古怪、充满激情难以压抑的爱、强烈无情的恨、富有戏剧性的诅咒和华丽的赞美。无尽的喜悦和无法减轻的痛苦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存在。当场景融合时，火辣辣的脸红和冰冷的凝视混合成了中区的“冷静”。不同场景中行为的现实和混合场景中行为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就像是19世纪的一个男人应当有一个善良的妻子和一个淫荡的情人的观念与20世纪自由婚姻、“住在一起”，以及持续的一夫一妻制的观念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维多利亚时代——印刷文化的巅峰——是一个“秘密”的时代。人们沉迷于生活的多层次和深度：秘密通道、密室中的骷髅、面具上面面具的面具。但是对这些层次的着迷并没有促使维多利亚人破坏秘密，而是将它强化成社会秩序的自然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骷髅应当呆在密室里，性应当保留在关闭的门后（也许从锁孔中被人窥探），且陋行为应当躲避窥视的眼睛。罕见的暴露和发现是激动人心的，它暗示着惊人的未被发现的现实。

相比之下，我们这个年代也由于暴露而沉迷。实际上，现在暴露行为本身对我们的刺激似乎超过了被暴露的秘密的内容。对社会行

为·层层的不不断剥离使得“丑闻”和“非常黑暗的秘密”被曝光时有发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包含着看似不平常秘密的密室拉出的东西最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普通的”。不平常的变成了平常的:虐待自己孩子的著名影星、有痔疮的总统、情绪低落的教皇、向童仆提性要求的议员。

我们仍然渴望英雄。也许我们期望在社会面具下找到私下的自我与公开的自我一样可敬的人。但是由于为我们的文化做出持久贡献的人被我们审视得时间太长,在我们的眼中无法保持纯洁,我们也开始关注不会受到仔细审视损害的那些做出一个伟大姿态或者完成一项勇敢行为的人。我们新的英雄是像莱尼·什库特尼克(Lenny Skutnik)一样的男女,潜入水中——在电视镜头前——去救飞机失事的幸存者,或者像雷金纳德·安德鲁(Reginald Andrews)一样,在纽约地铁列车下救出一位盲人。两个人都受到了美国总统对待英雄般的致敬。我们能够尊敬这种独立的英雄行为;这种英雄的过去和将来仍然是无关的和不可见的。

虽然我在本书中关注着社会变化,但是我意识到在许多明显的社会变化后面,我们大部分的社会秩序仍然没有变化。角色的群体身份,不同的社会化阶段,共同化趋势中等级制度不同的级别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差异。(目前,在角色融合变化尘埃落定之后,我们也很可能发现我们之间有许多差别。)另外,虽然电子媒介融合了许多社会场景,但是亲身参与和相互监督仍然是基本的体验模式。无论媒介的接触如何,生活在贫民窟、监狱的牢房和中产阶级社区,当然不是“相同”的社会经历。无论如何,角色和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变化方式和原因的分析有助于解释原本不易理解的许多社会现象。虽然电子媒介对场景的融合并不是给每个人相同的知识和智慧,但是包围着其他人物和地位的神秘已经被点破。印刷仍然存在并且为那些掌握它的人保有许多神秘和秘密,但是许多“关于秘密的秘密”被暴露了。

秘密与地点和性别的差异、童年的天真,以及权威的变化观念在一个单一的社会事件——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中都能被观察到。不久前,这个场面的特征还是高度隔离的环境。怀孕的妇女应当在公众视线之外。丈夫要远离怀孕并与生孩子隔离开。生孩子时,父亲在隔离的等候室中焦急地踱着步;母亲本人通过使用药物也从生孩子

的场景中“被移走”，小的孩子呆在医院外，并且由于对怀孕和生孩子过程的无知常常被进一步地隔离。负责生孩子的是全权的医生，他们的权威使他们在冷冰冰的不锈钢产室里从子宫中猛然拉出被麻醉的婴儿时，能够抗拒严肃、本性、好奇、以及母爱。

今天，这个景象已是大不相同了。怀孕和生孩子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父亲和孩子常常全部卷入其中。一个新的短语已经进入到语言中：“我们怀孕了。”现在父亲和母亲一起参加“生育课程”，以及让父亲出现在生孩子现场，并且帮助母亲，是很普遍的做法。小到2岁的哥哥或姐姐，通过参加特别的“准备迎接弟弟或妹妹”课程，到医院里参观，并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在生孩子的现场，从而可能参与到这一过程。

许多医生和护士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界定为“教育者”而不是“权威”；家庭应当做出有关生孩子方式的最终选择。一些医院和医务人员不愿意让家庭做出自己的“生育选择”，一些中产阶级家庭对此的反应是选择在中年妇女的帮助下在家中生孩子。而其他人在“非传统的生育中心”生孩子，这种中心介于医院和汽车旅店之间。但是最主要的趋势是在常规的医院中模糊了产室和家的差别。许多医院正在建造设计像家中卧室式的特殊“产室”。其中一些有双人床、印花的壁纸、地毯，以及软椅。生孩子的设备也在其中，但是在需要使用之前都被放在了看不见的地方。一个男人和女人现在可能会在他们的孩子出生时看着窗外或者看电视。现在，生孩子地方的“特殊性”被进一步地稀释了，越来越流行为生孩子的过程拍照片、制作电影，或者拍录像带——因此这种经历“被带出”了医院，与朋友和家人共享，也许以后会让小孩子自己看。

有序，不是混乱

这一分析认为，新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规则，并不是旧的社会体制随机的或者无序的变化。当然，旧的结构已被打破，但是对场景和行为关系的理解说明了变化以及新的结构中固有的节奏和原因。另外，对变化的方向和类型的分析显示，旧的规范并不是“自然的”或者上帝赐与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是基于社会场景的随机区分的组织形式，这种区分至少部分的是由于印刷的特征造成的。实际

上,许多目前变化的角色和机构初步形成或强化的时期,同时也是本国语言中读写和印刷广泛传播的时期。

强壮的、占主宰地位的丈夫/父亲角色和听话的、从属的妻子/母亲这种相对隔离的核心家庭,最早出现在围绕社区和家族成立家庭的一千年之后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认为孩子是需要特别注意和教导的弱者的看法首先形成于16世纪最有文化的阶层,并随着底层阶层中读写能力和学校的传播而于19世纪达到高潮。最后,对远方有权利的领导人的看法也形成于16世纪和17世纪。16世纪之前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地和社区的。

每种情况下的新关系在最初都是敌对的:严厉而有权威的男性家长对妇女的控制、粉碎儿童意志的强烈愿望、神圣的君主对臣民的绝对控制。后来,它们都变得更富有情感:基于相互吸引和互相尊敬的婚姻,对孩子充满爱心的照料和哺育,以及纯粹的君主制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但是甚至这第二个阶段的特征也是具有“隔离的和不平等”地位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丈夫与妻子以及儿童与成人的权利和角色的融合过程中,再次出现的“社区控制”理想,这种隔离主义出现了明显的逆转。

这样,虽然我所描述的角色许多变化常常被看成是互为因果,但是本分析认为它们可能都受到了相似因素的影响。妇女在家庭场景中的隔离有时被看成是涉及孩子需求和保护的重大利益的一项事业。有时儿童的新形象被看成是女性家庭生活新观念的起因。同样,当今有许多保守者指责儿童失去天真是由于工作的母亲和女权运动。但是这里提出的分析认为,童年的出现与衰落,妇女在公共场景中权利和参与的降低与增加可能与过去的传播技术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技术的重大转变有密切关系。读写的传播强调了等级制度和秩序,它支持着一个线性的权力链,从上帝为父到强有力的中央领导人,再到对妻子和孩子来说像上帝一样的父亲。依赖性越来越强的文盲儿童让文化水平最低的妇女来照看。当新的传播手段模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等级制度和秩序时,我们就正在经历着许多分裂角色的重新整合。

读写传播之后新的信息系统的增加,使得后台和前台场景可以有更大的隔离。当场景融合时我们体会到了“侧台”或“中区”行为。同样,从中世纪后期到不久以前这段时间里,也使得许多角色有更

“深的后台”行为,因此也允许有更理想化的“前前台”行为。读写这个新的信息系统,在男性和女性,成人和儿童,以及领导和民众之间产生了距离。印刷促成了为王子和牧师准备“训练教材”[如马基雅弗利和格拉西安(Gracian)所写的那些],并使得针对不同年龄和性别的许多礼仪手册的出版。

地方概念以及家庭场合的“渗透性”程度在16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学家曾指出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时期,公开和私下、家庭的和政治的,以及家庭和社区之间的“边界”有了新的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发现这种潮流戏剧性的逆转了。

在中世纪后期,丈夫对妻子的权力由于家庭场景的对公众开放而得到制约。同样现在由于他的城堡的衰落,男人的家的观点也消失了。因为无论一个家与别的家或人在物质上多么的隔离,父母压力热线、强奸热线、律师以及警察按几下按键就接触到了。随着电话、收音机、电视和计算机越来越多地将家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外部的行为规范开始融入家中。客厅、厨房、卧室正在被重新整合进更大的社会领地。个人问题的政治化曾将家中打扫卫生重新定义为“未付工资的劳动”,在离婚时妻子可以据此要求“返还工资”。同样,“婚内强奸”的观念说明了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新界限的模糊。几个世纪以来男人在家中这个私人的地方,对妻子和孩子进行“纠正”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现在则被重新定义为虐待罪。一项对伪造、偷窃和攻击的最新犯罪学研究曾经研究了如下类型的“犯罪行为”:孩子自己在成绩报告单上签上父母的名字,小孩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从母亲的钱包里拿走一美元,以及在家中争论时哥哥打了妹妹。以发生的具体的物质场所来定义行为和事件有降低的趋势,上面的这些例子仅是这种趋势的许多例证中的几个。

信息时代的猎人和食物采集者

电子媒介倾向于重新整合许多过去不同的交往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能正在返回一个甚至比中世纪后期更古老的世界。我们“信息时代”的许多特征使我们更像是最初级的社会和政治形式:狩猎和采集的社会。作为游牧部落的人,猎人和采集食物的人与领地没有忠诚关系。他们也很少有“地方感觉”:具体的活动和行为并

没有紧密地固定在具体的物质场所。

狩猎和采集社会以及电子社会都缺少了边界,这使其具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所有已知的社会形态中,狩猎和采集社会从男性和女性,儿童和成人,以及领导和追随者的角色来看是最平等的。很难维持许多“隔离的地方”,或者不同的社会场合,这种倾向使每个人都卷入其他人的事物中。

虽然狩猎和采集社会的男性和女性通常有劳动分工,但是它并不像农业社会那样严格,而且做异性所从事的工作通常并不会被看成是贬低身份。在许多狩猎和采集社会里,妇女在支撑家庭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照看孩子被认为是整个社区的责任,男性和女性都应当温柔、脾气温和,并不竞争。由于猎人和采集者社会不能将家庭场合与公共场合分开,男人就不能建立氛围和距离,而使妇女被包容进了公共决策中。正如我们这个社会一样,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缺少隐私,常常使得社区能够对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私人争论进行控制。

由于生活的开放,猎人和采集者、儿童并没有严格地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隔离,并且他们通常也没有同成人的行为分开。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游戏很普遍,并且有时还有性交。就像当今的父母一样,猎人和采集者也强调依靠自己,而不是服从成人,并且他们通常不采用体罚。

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娱乐和工作常常发生在相同的场景并包含相似的活动。儿童在狩猎和采集时观察和游戏。相似地,工作和娱乐在我们的电子时代也开始融合。儿童和成人每周要花许多小时盯着录像显示器,或者是录像游戏,或者是电子数据表格。另外,正如年轻的计算机“黑客”所展示的那样,现在儿童的娱乐与他们父母的工作发生在相同的公共场景——国内和国际信息网络的丛林中。

由于狩猎和采集社会中的领导人不能离开他们领导的人,因此领导地位——在它存在的这个程度上说——必须通过劝说而不是强制来获得。领导不能轻易地“分离出来”;领导们必需“通过工作最努力,最能同甘共苦的榜样”来获得权威。对于猎人和采集者来说,同我们一样,领导被暴露的常常更多的是一种负担而不是特权。在两种社会中,即使是被认可的领导也不能自己做决定或者将他们的决定强加于不赞同的人。

猎人和采集者的规范与我们刚刚形成的行为模式仍有许多其他

共性。在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中,婚姻通常是基于相互吸引而不是家族纽带,婚姻很容易组织也很容易结束,婚前性行为和持续的一夫一妻制是很普遍的。正如今天的妇女婚后越来越多地保持自己娘家的姓。同样猎人和采集者常常通过父亲或母亲的家庭来认定亲戚关系。与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相比较,我们同猎人和采集者一样,几乎都没有大规模的或者长期的人会仪式。*

十是一种描述我们特征的方法是,看成是“信息时代的猎人和采集者”。我们共享的交往场景是信息的,而不是物质的,但它也使得不能清楚地区分性别、年龄和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过去的各代人依赖于物质地点,并将它作为接触人和信息的首要决定因素,而我们则绕过了这些。部落有特殊意义的小屋和圣地,男人的领地和女人的领地,成人的地方和儿童的地方,而与此不同的是,我们的文化开始变得基本上没有地点了。

我们先进的技术手段允许我们猎取和收集的是信息而不再是食物。猎人和采集者认为“在那里”有丰富的食物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打猎和采集的量仅满足即刻的需要,同样我们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维持需要的信息社会”。许多人不再在记忆中或家里进行长期的知识储备,而是相信“在那里”可以获取信息,个人不必进行存储。我们的孩子唱道“我们不需要教育”,甚至许多学者也已开始转移方向,不再向头脑中存储那些将新发现与旧发现联系起来并指向未来的冗长的线性文字论点。相反,计算机越来越多的被当成是字节和“数据”的富饶丛林(虽然是我们所创造和储积的丛林)。当相关性的需求出现时,一些数据就被猎取、收集和分析。所发现的联系常常被立刻消化,而没有费力地与其他知识和观点相联系。

在西欧,我们正在“返回”原始时代,或者甚至是印刷前的时期,这种观念当然从许多方面看太简单了。与前现代文明不同,我们存储信息和思考的方式仍然极大地依赖读写。电子时代从“印刷文化”中成长起来并且保留了其中的许多特征。因此,读写技能的差异仍

* 重要的是,当名义上的游牧的猎人和采集者开始停下来并且为某个特定的地方所吸引时,他们就失去了像我们新秩序一样的大部分的特征:妇女的自治、可动性和影响力显著降低;工作按性别划分变得更为明显;男孩与女孩社会化经历的差异越来越大;男性进入了特别的部落政治;家庭隔离和隐私越来越多。

然将儿童和成人区分开,并且将人分成隔离的社会类别。但是我们对印刷和读写不再是惟一的依赖,它削弱了不同读写阶段的人的社会区别。因此我们是螺旋式的前进,而不是转了回来。当我们进入新的前沿时重新获得了前·现代世界的一些特征。

好或坏/真或假

一些人将“人们之间界限被打破”这个讨论,错误地认为是预示着充满和谐和快乐的乌托邦社会。但这还不是我的分析中的观点。我同意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934年的评估,人类“在一定距离上比他们即刻的、有限的和局部的自我更易于社会化:当两个群体相互看不见时他们之间的交往有时进行得最好,就像是野蛮人以物易物一样”。

当人们共享一个相同的环境时,他们常常比他们分开时更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异。例如,住在一起并且共享大体相同经历的家庭成员常常为了他们行为和态度细微的差别而争吵。但是当一个孩子从家里搬到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中,并且采用了一种可能实际上与他或她的父母的价值和行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父亲家和孩子家的距离常常使得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相处得非常好。

一起住在相同的环境中时,家庭成员比分开住时更相像。但是人们之间的差异在个人展示最少的时候最容易察觉,而当展示得最多时反倒不易察觉到。出于同样的原因,环绕全球的新的信息环境不一定比吵架的家庭更和平或和谐——但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们都处于一个更加相似的环境中,并且我们相互依赖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

虽然地球的许多角落仍然在远离信息,虽然政治和经济因素将许多可接触的信息被排除在我们的信息渠道之外,但无论如何我们暴露在了环绕全球的大范围的信息中。不幸的是,对屠杀、饥饿和压迫的观察并不一定使得对改变事情所做的积极努力更为有效。为什么?与狭小的过去相比较,也许,恐怖、丑闻和屠杀的披露本身只有象征性力量。我们常常感到仅仅报道某件可怕的事件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它的结束。当然现在某个人肯定会做些什么!在许多情况下,一个态度的转变取代了行动,公开的民意调查的结果部分地取代

了大街上的示威游行。另外,由于我们的媒体将世界各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罗列出来并且将它们推进我们的意识中,对于个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吸收所有提出的问题并进行反应。当你吃晚餐时,如果一位贫穷的女性来到你的门前,你可能请她进来吃点东西;如果几分钟后,一位抛锚的司机来到你家中,你可能允许他用你的电话求援。但是如果20个或者上百个饥饿、疲劳,或者有其他需求的人在大街上游荡,你——同样有同情心的人——可能将大门紧闭。

在前面一章中我提到,如果有人与你在同一间屋里,并请你帮忙,你可能很难再继续读这本书。但是在你的空间里需要帮助的人越多,他们在那儿呆的时间越长,你就越可能忽略他们。在当今媒介扩张的环境里,我们可能就像是在一间拥挤的牢房中的那些犯人,他们一起吃一小点食物,除了他或她自己防守的一角领地之外,他们试图忽略掉所有的东西。我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别人的问题,但是害怕它们会用尽我们的能量和资源。当所有其他人的问题在紧迫程度上相对平等时,许多人就会转向关注“首要问题”,这就毫不奇怪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幸的是,“利己主义”可能就是世界和世界问题扩展意识的逻辑上的最终结果。而这种扩展的意识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激发了青年人对道德的不满和政治抗议。

在描述我们新的场景和行为中,我曾试图避免对我所描述的变化进行价值判断。我这样做不仅是出于经常提到的原因,当具有评估性质的过滤器放在一个人眼前时,所做的分析会更加彻底和客观。另外,也正如前面所暗示的那样,道德和伦理的规范也受到场景变量的影响。

在一个隔离的场景中,我们可能赞扬一位停下来去帮助流浪的狗的人。但是如果在另一个场景中,同时有饥饿的孩子和饥饿的狗,我们可能对忽视孩子而去喂狗的人感到愤怒。但是我们很少想到去谴责在第一种情况下避免前往有可能发现饥饿孩子的大街和场景的人。我们对行为的评价受到了场景界限和定义的影响。绝大多数的行为,在恰当的社会背景中(例如“战争”或者“执行死刑”)即使是杀人,在社会上和宗教上也是禁止的。生育和色情常常包括相似的行为,但是场景不同。许多行为的道德性依赖于发生的地点、时间,以及有谁参与。当媒介改变场景的界限后,价值体系也常常受到影响。

但无论如何,对于那些将新的社会秩序与旧的社会秩序进行评

价的人,本书提供了一些通用的需要注意的指导。通过勾画媒介、场景和行为的联系,我曾争论说,我们不可能在拥有旧的角色结构的同时也拥有电子媒介。例如,对电子媒介内容的控制并不会维持旧的社会组织形式。即使是保守的内容,当其以新的方式传播时可能也会是革命性的。

另外,通过勾画影响许多不同社会现象的单一进程,这一理论指出,没有电子媒介所带来的全部或大部分,我们就不能有产生社会变革力量的一部分。由于这些影响是相互联系且分布广泛的,我们无法轻易选择它们。没有经常变换的目标发展的社会体制,我们就无法选择用新媒体来推进旧的目标。例如,我们不可能给妻子买一台电视机,来消除她对做家务无聊的感觉的同时,而不改变妻子对世界上地理位置的观念。我们不能使用电视来“教育”孩子,而不同时改变阅读的功能以及学校和家庭的结构。当我们使用“芝麻街”来推进儿童学习的速度时,我们也增加了儿童进入真正的街道的机会,也许有些会进入真正的街头犯罪。我们也不可能希望接近伟大时,与政治领导人形成有中介的亲密,而不失去对英雄的信仰。如果我们使用媒介教许多不同的群体相互了解,那么我们也改变了社会团体的界限以及群体身份的周边范围。

因此相对于旧社会来评价新社会必须格外谨慎。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批评和赞扬,但是将新环境的部分看成是疾病,而其他部分看成是治愈疾病的方法,这可能会误解关于社会变化的统一的动力。而新环境中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可能都是同一过程的组成部分。例如,如果我们去掉19世纪许多具体场景行为的极端部分,那么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高度的礼貌和非常“文明”的俱乐部,而且也失去了许多极端的道德败坏、贫穷,以及冷漠。如果我们按照旧的社会秩序精确度量新的社会秩序,那么我们必须将两者当作整体进行判断,并且评估它们之间所有不同的地方。

新的环境与旧的环境相比既不是天生就好或天生就坏,同样它也不是天生就更真实或更虚假。虽然在这两个方面上都有声明。

许多人感到他们不再“扮演角色”。现在他们“自然的”行为就“是他们自己”。同时,许多人更加意识到其他人扮演角色的上演,如政治家、公共关系主管以及广告商。所以他们开始更为怀疑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说的“伪事件”——仅仅通过媒介报道所创造出

的事件。

但是这两种观点可能都没有抓住要点。社会行为仍然是展示某些印象同时又隐藏其他部分,在这里是一种行为方式,在那里又是另一种行为方式。这里和那里的分界线发生了变化,不同社会场景的数量有了改变。人们新的“开放”可能更多的是根据不断地试图避免明显的不一致,而不是新的“诚实”的基本观念。人们正在“暴露”他们过去隐藏起来的某些方面,因为现在很难将这些后台信息继续保密。但是,对于许多最显眼的表演者——总统和其他“名人”来说,暴露的则太多了。他们许多表演的概况太容易接触,甚至最简单的预演行为或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风格的变化似乎都是“策划的”。

与布尔斯廷的“伪事件”分析相反,电子媒介的意义可能是,“媒介事件”的计划与上演可能不像策划面对面交往那样容易隐藏。比如,一位政治家隐藏他的竞选策略,并不能像普通的商业主管隐藏配偶或头发设计师的建议那么简单。电子媒介可能暴露了事件共有的“虚假”,而不是创造了它。布尔斯廷等人对上演可见性的新反应超过了对上演本身的新反应。现在,我们有不同的表演而不是表演多或者表演少;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现实而不是不同程度的现实。

通过将生活的后台区域推向公众区域,电子媒介使得扮演传统的正式角色更困难了。行为所展示的仍然是“角色”,虽然是采用了新的模式以匹配新舞台的偶然性。虽然“礼仪”被认为在一些圈子里是过时的,但是我们对其他人行为的所有期望(失望)仍然有着暗含的礼仪。而新礼仪的一部分是,我们不再必须扮演某种传统的正式角色。正如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在《公众人物的衰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已经失去了过去大部分社会生活的特征——“距离”的意义。“今天重获的信仰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近在道德上是好的。”

我们这个时代“往复的非正式性”有其两面性。它可以说成是,人们现在允许结束正式的传播,或者也可以说,我们现在被迫结束它。无论是哪种情况,信息的接触及其正式性的关系仍然存在。在社会关系中正式与亲密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相互排斥的。正如正式是亲密的障碍,同样亲密也是正式的障碍。

“1984”何处去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预言的惨淡时代。奥威尔的 1984 与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明显的共同点。我们的政府看到了世界分裂成两个超级大国,好的与邪恶的。我们所假设的与敌人不可避免的冲突成了我们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基础和原理。语言也进入了对抗。我们的行动总是“防御性的”,他们的总是“侵略性的”。我们的目的是“保卫自由的拯救行动”;他们的行动是“镇压人们意志的侵略”。我们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是“人道主义的”;而他们的则是“宣传”。使人心灵震惊的致命武器被仁慈地贴上了“和平保卫者”的标签,而许多可能的和平保卫者却被用背叛的暗示包围着。

许多人从这种观察一下就得出了结论,认为电子媒介的发展正在加速奥威尔噩梦的到来。复杂监视设备的演化以及隐私的减少可能被看成是奥威尔所描述的那种极权主义的具体证明。然而这些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可能只是相反方向潮流的标志。

奥威尔所提出的社会观中,老大哥监视着所有的人,但他自己却是不可见的。奥威尔构想出了一个“内部党派”精英,他们观察别人但不能被别人所观察。该党派要求并且接受完全的忠诚和毫无疑问的服从。这种体制在电子时代是可信的,但是如果新技术具有任何“天生的偏向性”,它就可能会反对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

正如第四章和第十章所描述的那样,“权威”和“领导地位”与“权力”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前者依靠的是表现和感染力。如果一个人不在那里被人看到,他就无法领导或者受到尊敬。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的讽刺是,任何向前进入媒介灯光下并且试图让全国都看到的人,都会变得太可见、太暴露,因此也就失去了其神秘色彩。电子媒介可能会被官员用来监视公民的隐私,但是当电子媒介如电视被领导用作同人民交流的手段时,媒介表明的偏向也常常使得公民能够“监视”官员。

另外,为了使一个等级制度存在,追随者的数量必须多于领导的数量。在这个时代一个领导可以容易且相对共享并接触人民的信息,他可以仔细地观察成千上万个追随者,而这些追随者甚至能更仔

细地观察领导。等级制度的简单的数学计算表明,在电子时代很可能破坏地位的金字塔。

电子媒介不仅通过使等级制度阶梯的下层的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接触,使得权威被削弱,而且也通过越来越多的横向共享信息的机会而使权威被削弱。例如,电话和计算机使人们不用“通过频道”就可以与其他人交流。这种信息的横向流动,对中央极权领导来说是另一个重要的阻碍。

毫无疑问,新技术——像旧技术一样——可能会被坏的政府用于不良的目的。一旦某个极权主义政府存在,它就能终止或者控制信息的流动。认为新媒介或者它们所形成的“缺少隐私”本身会支持极权的等级制度这种假说的依据,却是对隐私和等级制度关系的错误理解。因为正是隐私和距离支持着强大的中央权威。我们的隐私观念在西方文明中只有非常短暂的历史,我们从狩猎和采集社会以及印刷前的西欧社会研究中知道,真正缺少隐私倾向在于削弱而不是支持地位的巨大差别。恰恰是那些试图与众不同或在别人之上的人会因为缺少隐私而受到最大的危害,并不是普通民众。我们可能一想到全面而公开的信息接触,就会感到麻醉般的不舒服。但是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的话,这种接触会倾向于使等级制度夷为平地,而不是使之竖起。甚至我们最近收集到的关于我们的领导“滥用权力”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更多地证明了我们收集领导人信息能力的增强,而不是滥用权力的绝对增加。害怕的事情并不是失去隐私本身,而是单向的失去隐私——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监视那些监视我们的人。

至于现在,电子媒介可能最好地支持了“人民的等级制度”。因为电子媒介给了普通人显著的优势。普通人现在可以接触到过去他们无法接触的社会信息。另外,他们拥有了关于高地位角色扮演者的信息。结果,围绕高地位角色的距离、神秘和神秘化都变到了最小。虽然仍有许多具有专门知识和经过训练的“不平常”的人,但是普通人现在知道的东西比这些专门人才以及高地位的人作为“人”所知道的东西要多。在非普通人的特写镜头中看到这么多普通的东西之后,我们可能仍然比他们无知、比他们权力小,但是我们现在也更多地意识到许多他们不知道和不会做的东西。即使这种新的信息接触大部分是双向的,普通人在暴露和可被看见中受到的损失相对较

小。没有人会期望着普通人不普通。如果乔·史密斯(Joe Smith)发现总统的收入税有假,乔很可能会非常愤怒——哪怕是他自己也在收入税上做假,他也一样愤怒。伟大的领导不能有贪婪、邪欲或不稳定这些弱点。

在历史上这个时刻,我们可能正在目睹大范围的政治革命,这个革命被戴上了我们语言的规范以及我们传统理想形式的面具。我们正在从实际上是精英代表的政府走向了由选出的“管理者”直接参与的政府。但是这种变化很难看到,因为我们将这两种体制都称为“民主”,也因为新的体制包含了许多过去无法达到的理想的声明,如真正的“人民公仆”和“民享、民治政府”。但是当理想变成现实时,现实就不能不变了。

电子媒介通过直接投票这一形式为政府提供了潜力,而交互电视的增长使得与“鸣锣表演”结构相似的政治体系有了混合的认同。在“鸣锣表演”中表演者可以在演出中间被人从台上赶走(对这个制度更让人赏心悦目的比喻是希腊论坛)。新的技术造就了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接近大范围的参与的民主政治的潜力——有着全部的最终问题和可能性。但是即使是这些也总是要过去的。如果我们要看到体制是什么,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对权威的理解。因为无论什么人站在我们面前扮演领导的角色,他与我们头脑中的华盛顿、杰斐逊以及林肯的朦胧而闪光的形象相比似乎都是一种失望,而且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的任何步骤,任何与全国民意调查结果中大多数“赞同的”方向相反的运动,都将被看成是对权力的傲慢自大。

虽然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问题并不像许多人害怕的那样明显,但仍有许多理由使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对权威的信任与忠诚的降低充满了矛盾和危险。武器技术的增加以及全球传播速度的加快使得在我们对政府和领导人忠心降低的情况下,仍导致了国家领导人不公平的权力的加强。我们近期的总统曾拥有毁灭整个世界的权力,但是权威并没有说服大多数人他们正在进行一项有能力的工作。领导人使用他们巨大的处罚力量以试图召集他们身后的人——或者作为保密和信息控制的借口,尽管总会存在这样的危险。

我们日渐复杂的技术和社会,使得我们日益依赖“专家信息”,但是由于平常将“专家”暴露成易犯错误的人,使得我们对这些人的信任减少。我们对领导和专家的印象的改变使我们不信任权力,而且

似乎非常无助地依赖我们一点儿都不信任的人。

另外,在我们可看到的政治权威领地中存在的真空,可能给予了掌握着大的国内或跨国公司的不可见的人以不当的权力。与政府不同,公司没有“开放”的规则。实际上,竞争的商业是建立在传统的保密基础上的。拒绝采访的商界领导并不像拒绝向媒体发言的州长或总统那样引人怀疑。因此,我们确实要当心许多公司越来越多地卷入大学研究、政府,以及各种形式的国内和国际传播技术——从图书出版到通信卫星。

这里还有一个阶层的可见的“权威”,他们通过自己在社会中的独特地位,能够成为可见权威没落的例外。这些人试图维护了对人接触的控制,以及对表演的控制。他们就是电视新闻播音员,他们的日常表演受到严格的控制,完全是照本宣科。在没有明确说出的规则中,电视新闻节目不披露自己的新闻节目或新闻人物。黄金时间的一些时候可能用来展示总统滑冰时摔倒在地,跑步时倒了下来,或者发生了严重的口误,但是几乎没有哪家国际电台播放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或者丹·拉瑟(Dan Rather)跌倒、骂人,或者变得愤怒和紧张。这种传统维持了这样的想法:有选择地暴露新闻播音员的性格的一些方面来代表他们整个自我。这种情景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瓦尔特·克朗凯特曾被描述为“美国最值得信任的人”,并且被认为是重要的副总统候选人。到目前为止,我们非常幸运,电子新闻这个行业所招收的男女似乎都没有滥用这个“权力”——例如,克朗凯特曾常常显得对此非常关注,并且感到尴尬。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演出的偶然性,它可能增强了对记者的信任,但同时弱化了我们对政治过程的信任。

新一代的电子媒介

媒介的许多最新发展很可能对我所描述的潮流既有强化又有阻碍作用。信息源的不断增加,个人的微型录放机可在拥挤的大街中创造出私人的空间,通信卫星可以用信息渠道的网络拥抱全球。这种发展分裂了大众并且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已经开始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广播”世界。但是,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论述的那样,新的区分并不是回到了印刷时代很普遍的那种群体区分,而且这种新的区分并

没有破坏媒介(如电视)在同一时刻将数百万人吸引到同一事件的能力。不过毫无疑问目前全国几乎半数以上的人每晚参与三大新闻网的情景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消失。

计算机在我们的工作和娱乐活动中重要性的增加也引起许多新的变化。从某些方面看,计算机是图书和电视的杂交后代。如果计算机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印刷”,那么它可能会加强与读写相关的等级制度水平。另外,计算机程序本身也是需要掌握的新“代码”。总体上来看,为了获得硬件和软件复杂而快速的扩展能力所需要的经验(和金钱)正在创造出新的不同的群体、社会化的级别以及专家和权威的层次。

但是计算机对群体身份、社会化和等级制度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虽然计算机现在似乎是在重建信息系统的许多分支,但是它长期的影响可能仍然是增加了各种信息系统和经历的融合。随着软硬件成本的持续下降以及应用程序变得越来越“用户友好”,计算机可能会进一步使信息的获取民主化。正如汽车涉及的技术比马车的技术更复杂更昂贵,但是它却使得许多一点儿都不懂汽车机械的人增大了灵活性,“用户友好”的计算机是基于复杂的知识,它给了天真的用户以更多的信息灵活性。大的公司和政府使用计算机可能比普通人更频繁,但是低水平和全能之间差异可能会降低。(当然,许多“普通人”在公司工作,他们可以接触到他们在那里使用的计算机)。十几岁的“黑客”最近使用自己并不昂贵的计算机“强行进入”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公司和政府国防信息网,这显示了计算机在倾向于集中权力的同时也分散了权力。

表面上看,在儿童成年之前,计算机的复杂似乎是给儿童一个新的阶梯去攀爬以进一步将儿童和成人分开。但是许多儿童掌握计算机工作原理的速度促使我们仔细考虑计算机对成人——儿童的交往以及学习阶段的影响。甚至当计算机被用于存储印刷信息时,儿童似乎形成了一种对计算机的“感觉”,它超越了他们的年龄(这里指的是我们通常说的“阅读年龄”)。一台计算机的操作比看电视更困难,但是学习者掌握计算机的次序不一定与掌握印刷的次序相同。另外,正如西摩·帕佩特(Seymour Papert)曾经使人非常信服地指出,即使是“编程”也不一定是复杂的成人技能,年幼的孩子也能掌握它,并且常常比那些年龄大的人掌握得更好。

计算机中涉及的技能类型完全不同于阅读,这个事实在计算机的非语言使用中最为明显,如流传全国(全世界)的复杂的影像游戏。与电视一样,影像游戏并没有将它的“观众”分成不同的年龄组。各种年龄的人都玩这些游戏。另外,年龄和传统的教育并没有对技能的水平有任何直接的影响。事实上,许多小孩所掌握的游戏甚至是他们的父母都不能理解的。许多影像游戏都涉及多条线索的行动,加速,再加速。这些方面对于阅读世界中“一次一件事”,“一件接一件”,以及“花时间想一想”来说都很新奇。

许多批评家指责电子媒介应当为近期学术态度测试的成绩下降负责。但是很少注意到电子媒介可能帮助开发了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命名和测量的其他形式的“智力”。例如,传统上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一个变量同其他变量分开并且找出简单的、机械的因果联系,以此解决复杂的问题,如疾病或犯罪。对许多人来说,这是“逻辑地”分析现象的唯一可行方法。这种分隔技术在下象棋时很管用,但是在玩影像游戏时却毫无用处。影像和计算机游戏可能将我们的孩子带入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它包括了综合多个变量和跨越同时行为的界限。也许许多批评家对影像游戏所提出的最好的看法也不过是,它们帮助了“手眼协调”的发展,但是这些玩影像游戏的小精灵们长大后 would 找到治愈癌症的复杂方法,这也同样是可信的。

在印刷社会里,印刷数据分级的复杂性以及印刷读者高度隔离的特征导致了“专家”(expert,在一个领域中的“最高”权威)和“专家”(Specialist,知识集中于一个特定主题非常狭窄信息的人)享有极高的声誉。实际上在印刷社会里一个人接受训练和教育的程度越高,他们就越容易在某个学术领域安身,也因此他们在受训时就越无法意识到其他领域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传统的学科不仅是有结构的知识的主体,也是有组织的无知的体系。专家的技能是根据场景定义的。成为“专家”的关键不是“学习所有的东西”,而是减少“知识场景”的大小,直到他能够掌握其中所有的知识。

但是在电子社会中,来自所有知识领域的讯息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具有同样的可接触性。而这种讯息,特别是在收音机或电视播出后,常常提供了更多的“意识到”,而并不是“理解”。新的传播模式破坏了那些知识和技能仅仅基于分隔的传播网络的权威地位。专家仍然比普通人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但是电子媒介所创造出的新的共

享论坛却影响了我们对这些专门知识的评价。因为我们现在“意识”到了许多领域,而专家对此却一无所知,我们正在进行一种对概括主义复兴的重新欣赏。另一方面,人们期望没有什么话题复杂得不能解释给普通人听,至少在大的意义上是这样的;相反,权威或领导只有当他或她显得拥有“普遍”的社会知识时才能得到完全的尊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专业知识,然而当这些知识在电视中被展示时,我们也很少尊重它。

从某种意义上说,“聪明”的新观念涉及了知识的稀释,这样它就会在电视和收音机上“表现得很好”。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电子媒介潜在地丰富了我们文化的知识储备和理解。通过电子媒介存储和散发信息的手段起初似乎是没有联系、毫无组织的。但是这种理解可能是根据印刷取向的偏向。电子媒介通过融合许多过去不同的知识场景,打破了各种学科的界限,开始了新的对话,并且形成了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的发展。

再者,从这种意义上讲电视和收音机的影响与计算机潜在的长期影响相比是小的。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仍使用计算机存储、获取和分析他们感兴趣的特殊领域的的数据。但是与图书不同(一个人必须在一个给定的领域“研究查找文献”以发现“相关”的资源),计算机提供了对所有领域数据的潜在的平等接触。一个人可以使用一部电话和一个终端,很快获取国会图书馆中的任何一本书,任何杂志上的任何文章,以及放在中央研究银行中的任何数据。通过计算机检索,对一个题目的任何提示(或者是一组给出的混合题目)都能被找到。有了这种可以压倒一切数量的可获取的数据,一种新的“专长”可能会形成:不管各种数据原始“领域”是什么,可以看到这些数据的模式和相互关系的能力。结果“概括主义专家”将是那些并不“知道”关于任何事情的前因后果的人,但是他们很好地了解谁知道在哪里,如何去发现这些事物的什么东西,以及如何在不同的领域将相似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种人可能“几乎对所有的东西一无所知”,他们为一些专家提供了一种平衡,这些专家在我们这个日益专业化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能全了解”。

因此,虽然计算机在表面上似乎根据复杂的编程技巧和软硬件的复杂性和价格的不同,建立了新的获取信息的等级制度,但是计算机的许多特征强化信息系统的融合。另外,除非我们停止使用电话、

收音机和电视,否则计算机和其他新媒介的传播就不可能重新建立印刷文化中曾经存在的距离。

再者,还不清楚计算机是否还会继续像从前那样极大地依赖抽象的书写符号。对交互的计算机图形界面的越来越多的复杂使用,以及能理解和使用人类语言的计算机的发展潮流,两者都说明对读写的掌握可能很快就与计算机和计算机控制机器的基本操作无关,就像电视和汽车的操作无关一样。无论我们对于读写的“降级”是赞扬还是指责,都可以进行讨论,但是很清楚,这种演变会进一步将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整合在一起。

无论哪一条道路是计算机演化的主要道路——抽象的还是表象的符号——计算机和其他新技术肯定强化了电子媒介和所有从前的传播模式最重要的差异——对社会地点和物质地点关系的破坏。任何人的个人计算机都可以通过遍布的电话网络与任何其他的“主机”或个人计算机连接起来。计算机也刺激着各种技术——电视、电话、录音/录像机、卫星和打印机——整合成一种大的信息网络。当我们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工作和娱乐变成“信息的”而不是“物质的”时候,这里和那里的差异会进一步减少,我们作为新时代猎人和采集者的角色会得到加强。

控制还是被控制

在表面上,本书中提出的理论可能显得像是整体的“决定论”哲学的一部分。一些人可能会把我所分析的媒介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错误的解释为,我们仅仅是一个戏剧中的小演员,我们不能控制剧本和场面。但这根本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所降生的这个物质和社会的世界中既有自由又有限制。例如,我们可以选择朋友,但不能选择父母。另外,显然我们不能与死去的或者还没有出生的人会面,如果我们结婚,我们必须选择我们恰好遇到的占人口很小一部分的人中的一位。没有食物、温暖和睡眠我们就不能生存,但我们通常可以自由选择吃什么,在哪里睡觉。由于我们的身体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因此我们选择去哪儿,干什么本身就是伪装的限制。最后,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最终都会死(虽然有时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时间,如何去死)。因此,在研究人类状况时,一

个人可以选择去关注限制或可使用的选项。研究人类选择的人常常把限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同样我选择了研究社会限制的一个变量,同时假定个人和群体显然有自由。

在许多方面,我的工作类似于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研究了人际距离和建筑设计对于社会交往风格和语气的影响。机场的休息室有固定在地面的长排的纤维玻璃椅子,在其他的休息室中软椅松散地围成圈,它们显然形成了不同的交往类型。类似地,我认为媒介一旦被发明和使用,它就会通过塑造通过这些媒介发生的交往的风格来影响我们。只有当某些角色的舞台存在时我们才能扮演这些角色。

这种对于交往场景的结构分析使得大量的个人和群体自由原封未动。在物质的或者有中介的环境中表演的个人在整体限制内仍然有很大范围的行为选择。他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个人风格“恰当地”行动;或者他们可以选择忽略社会的提示,“不恰当地”表现——只要他们愿意承担社会后果。最后,他们可以离开他们感到不舒服的场景或者一开始就避免进入这些场合。就一个群体的层次上,场景甚至更不具有决定性。因为是我们设计和使用我们的房间、建筑物、媒介、礼仪,以及其他社会环境。我们不能对它们重新设计、抛弃、或者改变它们的使用。

最终,最有决定性的观点可能被那些拒绝将我们最大的自由——人类的推理和分析——应用到影响行为的社会变量中的人无意间所使用。我们没有保留自由选择,仅仅是因为我们拒绝看到和研究这些限制我们行为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常常放弃控制我们生活的潜在的额外自由,我们选择了不去看我们所塑造的环境如何反过来对我们进行重塑。

附录 名词术语讨论

一个新的理论不仅仅是一组新的术语或者对旧术语的新定义，它也是概念和观点之间的一组新的关系。因此我没有按照字母排序给出术语的定义，而是决定从本书中理论形成的角度，按照突出内在关系的顺序来讨论这些相关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看，对术语的这种讨论也给出了本书研究方法和论点的小结。对于那些只想阅读一个或几个术语的读者来说，它们是按照下列顺序出现的黑体印刷体：**传播媒介、预测、电子传播媒介、社会场景、信息系统、信息、行为、社会角色、群体身份、社会化、等级制度、电子社会、印刷社会，以及媒介矩阵。**

传播媒介这个术语，指除了直接的面对面传播模式外，信息在人中间传播的所有渠道和手段。我使用这个术语时，书信、电报、电话和收音机都是媒介的实例；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则不是。媒介同时是许多东西：技术、文化制品、个人财产、存储和检索文化内容与形式的载体，以及政治和经济工具。

但是我对媒介的主要兴趣是将它们看成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包括和排除、联合或区分人的某种类型的社会环境。所以，我研究了媒介的广泛使用怎样影响“谁知道什么”，“谁知道关于谁的什么”，以及“与谁相比谁知道什么”。我分析了获取社会信息的不同方式怎样对各种社会角色产生不同的影响。

正如里蒙德·威廉姆斯(Rymond Williams)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中曾令人非常

信服地指出,媒介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某种技术的成长以及这些技术特定的使用和装备是由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力量所引发的。例如,一个对货物分配很有兴趣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可能会促使收音机和电视之类技术的发展,它们能到达潜在消费者的家中并且教他们购物的乐趣和“必要性”。其他技术(或者使用不同的类似技术——如业余电台和社区电视)得到的支持和鼓励可能较少。因此,威廉姆斯等人关注于政治和经济的结构及其与传播技术的相互作用。但是我却认为,无论发展的原因如何,一项传播技术的特定组合以及对使用的配置(也可被称为“技术/使用”组合)所产生的许多社会后果可能与有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目标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新媒介可能对于它所出生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有深刻的影响。为了能够超越对于媒介讯息主流研究兴趣,为了能提供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存在的媒介,我试图说明通过研究一种新的传播技术的使用如何影响社会关系的“场景地理”,以期可以预测行为的变化。

我使用预测术语的意义是描述某种社会变化可能发生的条件。“有条件的预测”指,如果变量 X 以一种方式变化,变量 Y 将会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响应。这种预测形式有别于“纯预测”或“预言”,后者描述的是无论其中其他变量如何变化,变量 Y 将要发生的变化。条件预测是一种解释工具,可以用来描述过去行为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事后预测),它们现在如何发生,以及将来它们会如何发生。与预言不同,条件预测常常给出了我们能够控制和改变将来变化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条件”是指社会场景结构的变化,它是新媒介广泛使用的结果——“所有其他方面都不变”(见第三部分引言)。虽然这种场景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媒介所有变化的影响——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这里的焦点是研究电子传播媒介广泛使用所形成的变化,特别是电视在过去 30 年中的影响。

电子传播媒介是一种特殊的媒介类型,讯息被编码成电子信号,被传送,然后被解码。电报、电话、收音机和电视都是电子媒介的例子。我认为这些媒介值得特别研究,不仅因为它们是全球使用的最新技术革新,而且还因为它们独特的物质特征有着重要的社会学意义。电子信号的特征使之能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快速传送,而讯息的形式常常代表“真正的”面对面交往。结果传播就能轻易地绕过以

往信息流的物质障碍,而且“交往”的发生可以不考虑传统上定义的社会场景。

社会场景是社会环境,或者“上下文”,其中对某些类型的行为有社会预期,并且在其中展示这些行为。它们是由我们扮演和观看社会角色所综合决定并常常是难以琢磨的场合。

社会场景的意义不仅由其中有什么所决定,而且也由它不包括什么所决定。例如,一个婚礼与其他事件如葬礼的区别不仅仅是在于新郎和新娘的出现,而且也在于没有死人。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改变着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场景的定义以及观看表演的“观众”。

考虑到“场景”和“上下文”这两个术语用来描述传播和行为的频度,但直到最近它们仍是未被完满定义的术语。它们的意义常常是不明确的,被包含在传播和社会生活的假说之中。在它的不明确的使用以及相对较新的近期有明确定义的例子中,“社会场景”这个观念通常包含在时间/空间坐标中:一个人在哪儿,还有谁在那儿,日期和时间,以及发生在那个特定时间/空间框架中事件的总体定义(例如“晚会”和“会议”)。

这里提出的理论认为,场景和行为的关系提供了分析新的传播媒介对社会行为影响的一个答案。因为当场景的界限发生变化,并以一种新的方式包括或排除参与者时,场景的界定和行为必须也同时发生变化。但是社会场景与物质地点的传统联系使得媒介对社会场合和行为的影响难以觉察。因为媒介的变化并没有带来地点结构可见的变化。我认为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社会场景类型,它超越了物质上定义的社会场合,并有着自己的规则和角色预期。为了使媒介包含进社会场景的界定,场景在这里被重新定义为“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是获取其他人信息设定的模式。信息的意思是社会信息,我们知道的自己和其他人的行为与行动的信息。我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不同于“信息理论”中定量的“多少条”信息,也不同于通常更为大众化的且内容丰富的涉及“事实”与“知识”术语的使用。这里的意思总是与社会表演和行为联系在一起。

但是正如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对知识和事实的控制常常与社会信息的控制相互作用,它是通过影响谁有权扮演某个角色和接触某个特定场景实现的。例如,在研究群体差异的场景性质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信息系统与“知识”——事实、数据等——

的获取关系。不同群体成员的区别常常是基于他们知道什么以及他们知道怎样去做。在过去,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在于他们掌握不同的知识(例如,“知道如何修汽车”与“知道如何做饭和缝衣服”)。这种群体差异始于简单的、低水平“数据”,但是它们积累的结果却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观。

由于“个人知道什么”不如“还有谁知道”更重要,因此单一关注事实和数据知识可能会无法抓住要点。为了拥有一个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身份,必须有许多人不知道你所知道的东西。那么对知识的控制又使我们回到了社会信息系统的问题——只有某些人能接触的封闭的场景。因为对知识排他性的控制使一个人有权力有能力展示某种社会行为,因此对知识获取(“谁知道什么”)的关注就与关注社会信息流(“谁知道关于谁的什么”和“与谁相比谁知道什么”)相重叠。对群体知识的接触与将其他群体的成员排除在外,同群体场景的接触密切相关。

当然,很有可能,两个或多个人同处在一个地点但仍然经历完全不同的现实。例如,在性别角色这个有偏见的概念中,一个男人和女人可以在看相同的物体——一辆汽车——但各自“看到”的结果却是不同的:女人看到的是它的颜色和舒适的座位,男人看到的是它的机械性能。与此相似,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巴厘岛人斗鸡的详细描述说明,一个人不完全理解场景定义时也可以观看事件。在这个原理的另一个例子中,克里斯蒂娜·尼斯特伦(Christine Nystrom)曾指出,传统上女孩在童年受到歧视的一种方式,身体上可以去接触某些场景,但是并没有给予完全的信息接触。例如,女孩可能允许参加垒球运动,但是没有被告知运动员之间关系这样重要的事情(她们被告知的是,“击完球就跑”)。但是在一个给定场景中物质接触和信息接触的不匹配通常是起源于场景接触的其他重要差异。在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参与者所持有的对汽车、斗鸡和垒球的不同观点是因其各种不同场景中出现的不同造成的。为了同其他人处在相同的群体内,你必须能接触群体全部的或者大多数的场景,或者称之为“共同场景”或“共同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也可以看成是“行为系统”,但是我选择“信息系统”这个词是由于我认为信息是连接面对面交往和有中介交往的一个更好的共同基础。例如,对于“行为”的接触,我们一开始很难想到通过一

本书能了解作者什么,但是若将它看成是对作者以及书中所描述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信息”的形式的接触,就容易理解了。

我想,一个信息系统的社会意义的大部分是在于它所建立的接触其他人的模式。场景(有中介的和面对面的)包括并且也排除参与者。这样,虽然信息常常以它的内容来定义,但是本研究则更加关注信息系统的结构以及不同人接触相似或不同社会信息的程度。由于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在如下方面通常有很大差异:“接触编码”的复杂性;与内容“结合”的程度;“参与的条件”;个人通过媒介获取信息的公开与明确程度;信息形式所形成的个人或非个人的反应程度;媒介加强或削弱物质地点与社会经历关系的程度(见第五、六、七章);我在此讨论了它们如何倾向于创造出不同类型的社会信息系统。我认为由于电子媒介改变了社会信息获取的模式,它们将明显地重塑社会行为。

行为在这里使用的是它最广泛的意义,包括人们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表达与交流中所有的行为。这个定义包括:语言、思想、发音、服装、面部表情和姿势。但是我们具体关注的是行为被组织成社会含义与重要模式的方法——即成为社会角色。

社会角色是有选择的行为展示,当从整体上看时,这些展示被一个社区或群体中的成员看成是在给定的社会场景中某个个体的恰当行为。正像一位社会学家指出的那样:“像那样子的哭的行为是不能被描述成一个‘角色’的;而在葬礼上哭,则是可以被如此描述的行为——它是那个场景预期的、恰当的和具体的”。社会角色的表演不仅取决于场景,而且也取决于参加那个场景的人的相对地位或位置。因此葬礼上的牧师被人们预期会采取一种有别于寡妇的行为。“恰当”的感觉通常是无意识的,只有当人们的行为“不妥”时才可能为人们所看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角色是偶然的,离开了大的社会体系就没有了意义。但是人类天生是社会动物,个人关于自我和身份意识的很大部分是通过他或她所展示的角色行为以及来自其他人的反应而形成的。但是由于角色是基于场景定义的,因此工业化、战争、灾难、移民,或者传播媒介的变化等因素引起的社会场景的广泛重组会对角色产生巨大的影响。

大多数社会学家清楚地区分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地位

仅仅是社会或群体中的位置……而角色是地位的动态和行为方面。地位是为人们所占据，而角色是扮演的”。虽然当这些术语用来描述静态的社会秩序时这种区分也很重要，但事实上它可能阻碍社会变化的动态部分。地位与角色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对一个人来说，维持一个地位，就要求扮演恰当的角色。如果一位牧师或总统没有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他可能会失去那个地位。另外，如果发生的社会变化影响了许多相同地位的人，他们不能以传统的方式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么地位的定义会在总体上发生变化。也许在“家庭主妇”的地位与角色之间存在着不同，但是近年来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两者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当我提到角色类型以及支持它们的信息动力时，我指的可能是许多社会学家更喜欢称为地位的东西。我试图证明，地位和角色都依赖于社会信息系统的数量和类型，而这些反过来可能会由于传播媒介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但是为了研究媒介对社会角色的影响，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角色。社会角色通常是以可观察的行为来研究：什么行为与给定的职业相关？一个社会中妇女的行为如何区别于男人的行为？当教师同学生交往转换到与家长或校长交往时，其行为如何变化？当一个个体由童年到成人再到老人时，其行为会怎样变化？无论角色的研究，是在隔离状态还是与其他角色联系在一起，传统上强调的是描述人们在给定的时间、给定的社会以及给定的角色会做些什么。

虽然研究具体的角色是基于对语言、姿势、服装和整体行为的具体观察，但是“角色”的概念通常都抽象得没有了意义。“角色”，通常是由用在某个给定的场景中，某个给定角色的“正确的”、“预期的”或“恰当的”行为来定义，或者用与特定社会地位相联系的一般“权力”和“义务”来定义。这种角色的概念除了人们一般做他们常做的事情这一事实以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其他的东西。正如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学学术历史许多令人吃惊的特征之一是，这种逃避观念的使用者一直将它视为理论避难所的那种理所当然的程度。”

在两个极端之间 观察到的行为与高度抽象——产生了为数不多的有关社会动力使得角色在不同的社会或者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采用形式的变化的理论。因此，社会角色共同观念的缺乏在分析

社会变化时最为明显。例如,为什么妇女的“权力”和“义务”近几年发生了变化?许多观察者不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仅仅是勾画出了新的角色行为并将其与旧的行为进行对比。由于就像通常接受和使用的那样,“角色”模糊的概念没有要求任何理论来说明其间“正确的”、“预期的”和“恰当的”行为转变。有时恰当角色观念的变化被描述成行为变化的原因。例如,新的性别角色有时部分地归因于妇女解放运动。但是这种观点是一种循环论证——它说明变化是由自身引起的。

一些理论家曾指出,社会角色观念的问题太多,应当被全部放弃。但是我认为,通过研究影响社会角色形式的某个关键变量,角色的概念就能得到加强,而这个变量就是社会场景的结构以及其中信息获取的模式。通过描述角色和信息系统的关系,本书对角色的概念进行了拓展,超越了仅仅对存在的行为进行描述,并将它变成一种概念用来解释和预测社会行为大范围的变化。

为了研究更大范围的社会变化,我将角色分成了三大类别:加盟角色(群体身份),转换角色(社会化),以及权威角色(等级制度)。

我使用**群体身份**指两个互补的现象:(1)个体对各种群体或各类人加盟或具有相同身份的感觉;(2)某个特定群体中的成员,倾向于共同感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以及什么使他们与其他个人或群体区别开来。

任何群体身份的感觉都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它既包括又排除。如果我是“典型的男人”,那么我就不是“典型的女人”;如果我的行为像一个结婚的男人,那么我就不是一个晃来晃去的单身汉;如果我是主管,那么我就不是“建筑工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类别都相互排斥,并且每个人通常都形成一群相对互补的角色和身份(教授、配偶、儿子或女儿、父母、纳税人、朋友等)。

许多社会学家喜欢将“群体”与“社会类别”和“聚集”相比。在这种三部分的框架中,真正的“群体”必须由实际中面对面场景中交往的成员构成(“三楼的股东联合会”,或者“信托委员会”);“社会类别”仅指有共同的人口学特征(例如,年龄、性别或职业);“聚集”仅指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地的人(一个剧院中的观众,或者在火车站候车的人)。

在描述稳定的社会时,这种区分交往类型的通用体系是很有帮

助的,但是在分析社会变化时它可能会引起误导。个人身份的感觉常常与所有这三种“群体”相联系,任何一种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到个体的社会身份。例如,一个人可能属于一个特定家庭(主要的群体),白领工人(一个类别),以及参加足球赛的人(聚集)。

另外,所有这三种关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特定社会信息系统共享的接触。虽然面对面群体的成员共享一种非常特别的“现场”信息,但是相同社会类别或聚集中,成员社会“共性”的特征也可以用共享的信息和经历来分析。

最后,所有这三种关系可能会以相同的方式受到一个单一社会变化的影响。一个特定家庭(主要群体)中成员之间联系的力量,可能会由于电视引发的大多数“儿童”(社会类别)社会经历的变化而受到很大影响。同样电视播放的音乐会、体育比赛、总统辩论将会影响到所有亲临现场的人(聚集)的特殊的共享感觉。为了包括所有这些变化形式并分析信息获取对所有加盟的意义,我使用了广泛意义的“群体身份”,包括许多其他人所指的“社会类别”和“聚集”。通过对“共享而特殊”的信息系统的接触来分析群体身份,以及观察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信息系统的变化,从而研究了电子媒介对群体身份的潜在影响。

社会化指个体加入到一个群体的过程。群体身份指个人自我和“作为”的感觉,而社会化指个人“变成”的感觉,也就是说,从一种地位转变到另一种地位并加入新的群体。在本研究中,正如许多其他的社会化分析一样,重点是儿童社会化为成人以及他们学习有关的社会、机构和恰当的角色行为的方式。但是由此形成的框架也可应用于成人社会化进入任何群体(医学院学生到医生、移民到公民、丈夫到岳父、约翰·史密斯到三K党成员)。

社会化过程的通用定义太模糊,以至于近乎神秘。例如,《现代社会学字典》(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Sociology)中说,“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社会化]几乎总是指个人学习按照他们文化中流行的标准自愿地去行动的过程。”梅特·斯潘塞(Metta Spencer)说的更简洁:“社会化就是人们开始希望去做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的过程”。在其他地方,社会化仅被定义为学习“恰当的”角色。但是这种定义并不能说明的是“恰当”行为观念的变化。由于这种定义忽略了社会化过程的动态性,它们不能解释儿童以及其他社会人社会化成为新

角色要经历的不同角色阶段的数量、类型以及意义的变化。相比之下,这里提出的理论,研究了当一步步接触群体“共享而特殊”的场景时的社会化,并因而解释了社会信息系统的变化可能怎样影响到社会化过程的角色。

等级制度用来指参与者具有不平等的级别、权威或地位的所有社会关系。我使用这个术语时包括了面对面的交往(老板/工人),可能从未见过面的人之间的大的社会关系(总统/人民),以及从未作为完整群体交往过的社会类别间的大的社会关系(专业人员/蓝领工人)。一个个体的等级地位从一个交往到另一个交往时会发生变化。正如休·达尔齐尔·邓肯(Hugh Dalziel Duncan)指出,即使是神圣的君主与配偶、子女或上帝交往时也会改变地位。

正如在第四章所讨论,权威有别于“权力”。在其他方面,权威比权力更加模糊。权力的手段——财产、力量、武器和军队——可以被拥有,但是权威必须不断地实施。另外,特别是对于地位非常高的角色,地位可能是需要学习、演练、维持或“表演”的。(例如,阅读“如何当行李搬运工”或者“如何修电脑”的书我们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但是如果看到医生读“如何获得你病人的信任”我们可能会有点儿不安,而看到神父读“如何当教皇”一书可能会使我们震惊。)因此,许多等级制度角色似乎在于本质而不是行动,也就是说,它们似乎包含着从自然(或者超自然)秩序中而不是人类交往的随机的结构中,所演化出来的天生高级的品质或特征。人和角色似乎比其他类别更不可分开。

虽然我对权威和领导的研究注重个人独特的能力,但是本研究探索了社会表演的结构,以及控制给定场景中支持不同地位定义的信息。通过信息流的模式、信息控制,以及对信息控制需求的控制等方面来观察权威,该理论分析了新媒介对不同层次地位的社会观念所产生的潜在的影响。

正如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三个类别的角色一点也不相互排斥的,但是这“三种角色”可以用来讨论几乎每一个社会角色的任何方面。另外,这三个角色类别的交叉和相似来源于它们都依赖于信息。信息获取/限制是联系着“共同的经历”、“学习”以及“全知”之类熟悉观念的共同基础。相反,三个类别的区别是由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获取或控制:共享而特殊的经历,对群体信息的逐步获取,

神秘与神秘化。我认为,我国传统形式(以及传统的交叉模式)的群体身份、社会化和等级制度依赖于信息获取的模式,这种模式存在于印刷社会中并由于我们现在进入了电子社会而发生了改变。

我提到电子社会时,同人们提到“工业化社会”时的意义相似。当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并不是在宣称读写或者农业已消失,只是说一些新的技术在重塑社会过程中正在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相反,我们可以用“印刷社会”或者“农业社会”表示过去,而同时没有否认印刷和农业分别在电子和工业化的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探讨电子媒介对社会场景的影响,我们不必证明说旧的媒介已经消失或者萎缩没了。即使印刷媒介仍然存活和繁荣着,电子媒介对社会场景仍有很大影响。广播和电视并没有毁掉报纸或书。但无论如何,广播和电视影响了印刷媒介的功能,并且改变了社会信息获取的模式。例如,如果电视去掉了信息流动的限制,它将很显然地会影响到那些从前依赖隔离而确定的场景和角色。“印刷社会”和“电子社会”这两个术语仅仅是描述传播手段之间复杂关系的简写形式。“印刷社会”实际上是口语—书写—印刷社会;“电子社会”实际上是口语—书写—印刷—电子社会。这种简写的标签仅仅是强调了引起传播变化的最新的重大进展。

在许多方面,孤立地讨论任何单一的媒介或者媒介类型都是幻想。媒介在所谓的媒介矩阵中相互作用,它是共同存在的媒介相互连结的网络。不同类型的媒介常常是高度地内部相关。报纸和广播记者依赖于有线服务,播音员使用电话线创造“网络”,许多出版商使用计算机排版,而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是根据印刷的剧本。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探讨当一种特定的新媒介或者一种新的通用类型的媒介引进之后,媒介矩阵以及它对社会行为影响变化的方式。这里所展示的是,当电子媒介加入到媒介矩阵中之后,对场景和角色变化的概要分析。本书的方法类似于研究当许多重要因素中只有一个发生变化时生态系统的广泛变化(例如,降雨量的突然变化,或者气温的突然升高或降低)。

由于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了大量的媒介和行为,我被迫忽略了不同电子媒介之间以及不同印刷媒介之间的许多细微差别。我也没能研究与口头传播相比较,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的许多共性。我关注的是当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加入到媒介矩阵中后,媒介矩阵最剧

烈、最显著的变化。

我试图证明电子媒介一加入到传播家族中,就改变了早期媒介之间的关系并改变了信息流的模式。电子媒介绕过了其他的传播模式,就像是高速公路绕过了地方的城镇和公路。甚至那些对面对面交往、阅读和写作评价很高的人也常常投向电子媒介。正如许多人欣赏乡村公路沿线的小镇生活的结构,但他们也使用高速公路的高速和便利。旧的和新的传播形式可以共存,但是社会生活的图景可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参考文献

- "Adults Are Failing, Not the Children." *USA Today*, 27 Feb., 1984.
- Alexander, Shana, "I'd Wondered What Became of Sally." *Newsweek*, 21 Jan. 1974, p. 32.
- Allen, Charles L. "Photographing the TV Audienc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5, No. 1 (1965), 2-8.
- Alpern, David M. "Clubs: The Ins and Outs." *Newsweek*, 10, Jan. 1977, pp. 18-19.
- Alpern, David M. "A Newsweek Poll on the Issues." *Newsweek*, 3 March 1980, pp. 27-29.
- Alpern, David M. et al. "The President's Men." *Newsweek*, 20 April 1981, pp. 27-32.
- Altman, Lawrence K. "Navy Confirms Johnson Had Surgery for Skin Cancer." *The New York Times*, 29 June 1977.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rd ed.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83.
-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The World's Telephones*. Morris Plains, NJ: AT&T Long Lines, 1981.
- Anderson, Susan Heller. "A Plea for Gentleness to the Newborn." *The New York Times*, 21 Jan. 1978.
- The Arbitron Company. *Home Video Cassette Recorders: Ownership/Usage*, 1978. New York: The Arbitron Co., 1979.
- Arbitron Ratings Company. *Radio Today*. New York: Arbitron Ratings

- Co., 1982.
- Arendt, Hannah.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Rev. ed. New York: Viking, 1968.
- Argyle, Michael, Adrian Furnham, and Jean Ann Graham. *Social Situ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1.
- Aries, Philip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Trans. Robert Baldick. New York: Vintage, 1962. (French edition, 1960)
- Atkin, Charles, "Broadcast News Programming and the Child Audienc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2(1978), 47-61.
- Atkinson, Jeff. "Criteria for Deciding Child Custody in the Trial and Appellate Courts." *Family Law Quarterly*, 18 (1984), 1-42.
- Babbie, Earl R. *Society by Agreement: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Belmont, CA: Wadsworth, 1977.
- Bailey, Thomas, A. *Presidential Greatness: The Image and the Man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66.
- Balkin, Richard, *A Writer's Guide to Book Publishing*. New York: Hawthorn, 1977.
- Ball, Donald W. "'The Definition of Situation': Som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aking W. I. Thomas Seriousl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1972), 61-82.
- Bandura, Albert. "Influence of Model's Reinforcement Contingencies on the Acquisition of Imitative Respon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965), 589-595.
- "Banter Before the End." *Newsweek*, 14 June 1982, p. 27.
- Banton, Michael. *Rol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5.
- Barker, Roger G. *Ecological Psychology: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Environment of Human Behavi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1968.
- Barnouw, Erik. *The Image Empire: A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3—From 1953*.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0.
- Barnouw, Erik. *The Sponsor: Notes on a Modern Poten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8.
- Barton, William E. *Lincoln at Gettysburg*.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30.
- Barwise, T. P., A. S. C. Ehrenberg, and G. J. Goodhart. "Glued to the Box?: Patterns of TV Repeat-View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2, No. 4

(1982), 22-29.

Beardslee, William, and John Mack. "The Impact 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of Nuclear Developments." In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Nuclear Developments*. Task Force Report No. 20.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2, pp. 64-93.

Bechtel, Robert B. , Clark Achelpohl, and Roger Akers. "Correlates Between Observed Behavior and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on Television Viewing." In *Television and Social Behavior*, Vol. 4. , *Television in Day-to-Day Life: Patterns of Use*. Ed. Eli A. Rubinstein, George A. Comstock, and John P. Murray. Washington, D. C. ;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1972, pp. 274-344.

Beck, Melinda, and Eleanor Clift. "Reagan's Articulation Gap." *Newsweek*, 29 June 1981, p. 20.

Bedell, Sally. "Study for TV Industry Says Viewers Are Watching Less." *The New York Times*, 18 April 1983.

Bennett, W. Lance. "The Ritualistic and Pragmatic Bases of Political Campaign Discours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3(1977), 219-238.

Berger, Peter, L.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New York: Anchor, 1963.

Berger, Peter L. ,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Biddle, Bruce J. *Role Theory: Expectations, Identities, and Behaviors*. New York: Academic, 1979.

Biddle, Bruce J. , and Edwin J. Thomas, eds. *Role Theory: Concepts and Research*. New York: Wiley, 1966.

Bierstedt, Robert. *The Social Order*. 4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Binder, David. "Guide Tells Citizens How to Gain Access to U. S. Data." *The New York Times*, 4 Nov. 1977.

Blackburn, Mark. "Teen-Agers Leave Home — Legally." *The New York Times*, 20 Feb. 1980.

Blume, Judy. *Superfudge*. New York: Dutton, 1980.

Board of Institutional Ministry. *The Prisoner's Yellow Pages*. 2nd ed. Los Angeles: Universal Press, 1978.

Bogart, Leo. *The Age of Televisio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56.

Borstin, Daniel J. *The Image: Or What Happened to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Atheneum, 1962.

- Boorstin, Daniel J. *The Americans;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 Boorstin, Daniel J. *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 Reflections on Our Future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 Bossard, James H. S. *Parent and Child; Studies in Family Behavior*.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3.
- Bossard, James H. S., and Eleanor S. Boll. "The Role of the Guest: A Study in Child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2 (1947), 192-201.
- The 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 *Our Bodies, Ourselves; A Book By and For Women*. 2nd e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6.
- Boulding, Elise. "Children's Rights." *Society*, Nov./Dec. 1977, pp. 39-43.
- Bradbury, Ray. *The Illustrated Man*. New York: Doubleday, 1951.
- Bradlee, Benjamin C. *Conversations with Kennedy*. New York: Norton, 1975.
- Braestrup, Peter. *Big Story; How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elevision Reported and Interpreted the Crisis of Tet 1968 in Vietnam and Washington*, Vol. 1. Boulder, CO: Westview, 1977.
- Brecher, John, et al. "Taking Drugs on the Job." *Newsweek*, 22 Aug. 1983, pp. 52-55; 57-60.
- Brim, Orville G., Jr., and Jerome Kagan, eds.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80.
- Broadhurst, Allan R., and Donald K. Darnell.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 In *Foundations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Ed. Kenneth K. Sereno and C. David Mortense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pp. 59-72.
- Brockriede, Wayne, and Robert L. Scott. "Stokely Carmichael: Two Speeches on Black Power." I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Rhetoric in Black America*. Ed. Arthur L. Smi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pp. 176-194.
- Bryan, William Jennings, and Mary Baird Bryan. *The Memoirs of William Jennings Bryan*, Vol. I. Rpt. of 1925 edition.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1971.
- Bryce, James.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New York: Macmillan, 1906.
- Burt, Richard. "Administration Tightening System of Keeping National Secrets Secret." *The New York Times*, 7 Sept. 1980.
- Buss, Allan R. "The Trait Situation Controversy and the Concept of Interac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Situations; Selected Readings*.

Ed. Adrian Furnham and Michael Argyle. Oxford: Pergamon, 1981, pp. 227-234.

Butter, Eliot J., et al. "Discrimination of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Commercials by Pre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21, No. 2 (1981), 53-56.

Califano, Joseph A., Jr. *A Presidential N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5.

Carmody, Deirdre. "Head of Barnard Asks Parents of Defiant Girl for Their Views." *The New York Times*, 19 April 1968.

Carmody, Deirdre. "City's Police Dept. Getting 'New Breed' of Young Officers." *The New York Times*, 8 May 1983.

Carothers, J. C. "Culture, Psychiatry, and the Written Word." *Psychiatry*, 22 (1959), 307-320.

Carpenter, Edmund. *Oh, 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3.

Carpenter, Edmund, and Ken Heyman. *They Became What They Beheld*. New York: Outerbridge & Dienstfrey/Ballantine, 1970.

Carter, Jimmy. *A Government as Good as Its Peop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7.

Castillo, Angel. "Juvenile Offenders in Court: The Debate Over Treatment." *The New York Times*, 24 July 1981.

Cater, Douglass. "Introduction: Television and Thinking People." In *Television as a Social Force: New Approaches to TV Criticism*. Ed. Douglass Cater and Richard Adler. New York: Praeger, 1975, pp. 1-7.

Chambers, Marcia. "Videotaped Confessions Raising Conviction Rate." *The New York Times*, 5 June 1983.

Charlton, Linda. "Stern Plan to Guard Privacy Is Expected." *The New York Times*, 15 May 1977.

Chaytor, H. J. *From Script to Print: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Vernacular Literature*. Rpt. of 1945 edition.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66.

Chodorow, Nancy. "Family Structure and Feminine Personality." In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Ed.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1974, pp. 43-66.

Christopher, Maurine. "Jimmy & Rhett Help NBC Top Nielsen Ratings." *Advertising Age*, 15 Nov. 1976, p. 2.

Clemons, Walter, Martin Kasindorf, and Maggie Malone. "Telling All." *Newsweek*, 15 Jan. 1979, pp. 50-56.

- Clymer, Adam. "Poll Finds Reagan Popularity Rating Misleading." *The New York Times*, 31 Jan., 1982.
- Cobb, Nancy J., Judith Stevens-Long, and Steven Goldstein. "The Influence of Televised Models on Toy Preference in Children." *Sex Roles*, 8 (1982), 1075-1080.
- Collins, Glenn. "U. S. Social Tolerance of Drugs Found on Rise." *The New York Times*, 21 March 1983.
- Comstock, George, and Marilyn Fisher. *Television and Human Behavior: A Guide to the Pertinent Scientific Literature*. Santa Monica, CA: Rand, 1975.
- "Conversation with Marshall McLuhan." *Videography*, October 1977, pp. 30; 57; 59-60; 62-67.
- Cooley, Charles Horton.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Rev. ed. New York: Schocken, 196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2)
- Cormier, Frank. *Presidents Are People Too*.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6.
- Cornwell, Elmer E. Jr.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of Public Opin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65.
- Coulson, Margaret A. "Role: A Redundant Concept in Sociology? Some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In *Role*. Ed. J. A. Jack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2, pp. 107-128.
- Cox, Harvey, ed. *The Situation Ethics Debat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8.
- Cressy, David. *Literacy and the Social Order: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0.
- Crisis at Columbia: Report of the Fact-Finding Commission Appointed to Investigate the Disturbance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April and May 1968*. New York: Vintage, 1968.
- Culbert, David. "Johnson and the Media." In *Exploring the Johnson Years*. Ed. Robert A. Divine. Austin, TX: Univ. of Texas Press, 1981, pp. 214-250.
- Czitrom, Daniel J.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 Dale, Edgar. *Children's Attendance at Motion Pictures*. New York: Macmillan, 1935.
- de Beauvoir, Simone. *The Second Sex*. Trans. H. M. Parshley. New York:

Bantam, 1961. (French edition, 1949)

DeFleur, Melvin L., and Sandra Ball-Rokeach.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4th ed. New York: Longman, 1982.

Degler, Carl N. *At Odds: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80.

Demos, John. *A Little Commonwealth: Family Life in Plymouth Colony*.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70.

de Onis, Juan. "Letter-Bombs Injure Arabs." *The New York Times*, 26 Oct. 1972.

Dutton, Jason, ed. *The View from Goffman*. New York: St. Martin's, 1980.

Dominick, Joseph R. and Gail Rauch. "The Image of Women in Network TV Commercial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16 (1972), 259-265.

Dondis, Donis A. *A Primer of Visual Literac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3.

Donohue, Thomas R., Lucy L. Henke, and William A. Donohue. "Do Kids Know What TV Commercials Intend?"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20, No. 5(1980), 51-57.

Draper, Patricia. "Kung Women: Contrasts in Sexual Egalitarianism in Foraging and Sedentary Contexts."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ayna R. Rei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pp. 77-109.

Dubé, W. F. "U. S. Medical School Enrollment, 1969-1970 Through 1973 1974."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49(1974), 302-307.

Duncan, Hugh Dalzie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Bedminster, 1962.

Edelman, Marian Wright. "In Defense of Children's Rights." *Current*, April 1978, pp. 16-20.

Edelman, Murray.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rbana, IL: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64.

Ehrenreich, Barbara, and Deirdre English. *For Her Own Good: 150 Years of the Experts' Advice to Women*. New York: Anchor, 1978.

Eisenstein, Elizabeth L.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 Vol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

Ekman, Paul, and Wallace V. Friesen. "The Repertoire of Nonverbal Behavior: Categories, Origins, Usage, and Coding." *Semiotica*, 1, No. 1

- (1969), 49-98.
- Elkind, David. *The Hurried Child: Growing Up Too Fast Too Soon*.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1981.
- Elliott, Philip.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A Critique and a Sociological Alternative." In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Ed. Jay G. Blumler and Elihu Katz.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4, pp. 58-67.
- Endler, Norman S., J. McV. Hunt, and Alvin J. Rosenstein. "An S-R Inventory of Anxiousness."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76, No. 17 (1962), 1-33.
- Epstein, Edward Jay. *News from Nowhe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 Epstein, Louis M. *Sex Laws and Customs in Judaism*. New York, Ktav, 196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8)
- Evans, Les, and Allen Myers. *Watergate and the Myth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Pathfinder, 1974.
- "Excerpts from Interview with Nixon About Watergate Tapes and Other Issues." *The New York Times*, 4 Sept. 1977.
- "Excerpts from Reagan Address to County Officials' Meeting." *The New York Times*, 14 July 1982.
- "Falwell Says He Will Press \$10 Million Penthouse Suit." *The New York Times*, 5 Feb. 1981.
- Farson, Richard. *Birthrights*.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form Crime Repor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ossessions*. Washington, D. C. :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51.
-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form Crime Repor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81.
- Fields, Howard. "U. S. Agency to Coordinate Attack on Illiteracy." *Publishers Weekly*, 22 Oct. 1982, pp. 14 and 16.
- Firestone, Shulamith.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Rev. ed. New York: Bantam, 1971.
- Fletcher, Joseph. *Situation Ethics: The New Moralit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6.
- Footlick, Jerrold K. "Too Much Law?" *Newsweek*, 10 Jan. 1977, pp. 42-47.
- Footlick, Jerrold K., Susan Agrest, and Janet Huck. "Kids in Mental Hospitals." *Newsweek*, 12 Dec. 1977, pp. 116-117.

Ford, Gerald R. "Every Mistake a Headline." *TV Guide*, 29 April 1978, pp. 24, 7.

Forgas, Joseph, P., *Social Episodes: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 Routines*. London: Academic, 1979.

Forkan, James P. "CBS Regains Some Wind." *Advertising Age*, 7 March 1983, p. 2.

Foster, Henry H., Jr., and Doris Jonas Freed.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Child Custody*. New York: Law Journal Seminars Press, 1978.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1977. (French edition, 1975)

Fraker, Susan, et al. "The Marines Face Life." *Newsweek*, 10 May 1976, p. 46.

Francke, Linda Bird, and Nancy Stadman. "Adoptees Unite." *Newsweek*, 28 April 1975, p. 86.

Frank, Anne. *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53. (Dutch edition, 1947)

Freidson, Eliot. "Celebrating Erving Goffma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2 (1983), 359-362.

Freud, Sigmund.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5. (German edition, 1933)

Friedan, Betty. *The Feminine Mystique*. Rpt. of 1963 edition with new introduction and epilogue. New York: Dell, 1977.

Friedan, Betty. *The Second Stage*. New York: Summit, 1981.

Friedl, Ernestine. *Women and Men: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5.

Friedrich, Otto. "What Do Babies Know?" *Time*, 15 Aug. 1983. pp. 52-59.

Fritz, Sara. "Hello, This Is Ronald Reagan—Yes, Really." *U. S. News & World Report*, 21 March 1983, p. 48.

Furnham, Adrian, and Michael Argyle, eds.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Situations: Selected Readings*. Oxford: Pergamon, 1981.

Furstenberg, Frank F., Jr., Richard Lincoln, and Jane Menken, eds. *Teenage Sexuality, Pregnancy, and Childbearing*.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Gallup, George H.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Gallup Organization. *The Gallup Report*. Princeton, NJ: The Gallup Poll.

(Published monthly since 1965.)

- Gans, Herbert.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1979.
- Garay, Ronald. "Congressional Television vs.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What Congress Says and What Congress Mea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7 (1981), 193-198.
- Garfinkel, Harold.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7.
- Gaylin, Willard. *The Killing of Bonnie Garland: A Question of Justi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2.
- Gazzaniga, Michael S. *The Bisected Brai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Crofts, 1970.
-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Gelman, David. "Growing Old, Feeling Young." *Newsweek*, 1 Nov. 1982, pp. 56-60.
- Gelman, David. "A Stranger Comes Home." *Newsweek*, 19 March 1984, p. 82.
- Gelman, David, et al. "How Men Are Changing." *Newsweek*, 16 Jan. 1978, pp. 52-56; 59-61.
- Gelman, David, et al. "*The Games Teen-Agers Play*." *Newsweek*, 1 Sept. 1980, pp. 48-53.
- Gelman, Rochel. "Preschool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Child Psychology*. Ed. E. Mavis Hetherington and Ross D. Park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p. 159-165.
- Gerbner, George.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Resistance." In *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 Ed. Gaye Tuchman, Arlene Kaplan Daniels, and James Benét.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8, pp. 46-50.
- Gerbner, George, and Larry Gross. "Living with Television: The Violence Profi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 No. 2 (1976), 173-199.
- Gergen, Kenneth J. *Toward Transformation in Social Knowledge*.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2.
- Gersoni Stavn, Diane, ed. *Sexism and Youth*. New York: Bowker, 1974.
- Giele, Janet Zollinger. *Women and the Future: Changing Sex Roles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 Gilder, George F. *Sexual Suicide*. Rev. ed. New York: Bantam, 1975.
- Giles, Howard, and Peter F. Powesland. *Speech Style and Social Evaluation*.

London: Academic, 1975.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The Home: Its Work and Influence*. Rpt. of 1903 edition. Urbana, IL: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72.

Gitlin, Todd.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Gitlin, Todd. *Inside Prime Time*. New York: Pantheon, 1983.

Glick, Paul C., and Graham B. Spanier. "Married and Unmarried Cohabi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 (1980), 19-30.

Goffman, Erv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1959.

Goffman, Erving.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1.

Goffman, Erving.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Goffman, Erving.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Anchor, 1967.

Goffman, Erving. *Strategic Interaction*.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9.

Goffman, Erving.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Goffman, Erving.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Goffman, Erving.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Golden, Frederick. "Here Come the Microkids." *Time*, 3 May 1982, pp. 50-56.

Goldman, Peter. "Sizing Up Carter." *Newsweek*, 13 Sept. 1976, pp. 22-27; 29; 30; 33-34; 36; 41; 44; 49-50; 52; 57; 59; 60; 63-65.

Goldman, Peter, et al. "The Reagan Gamble." *Newsweek*, 8 Feb. 1982, pp. 24-27.

Goldsen, Rose K. *The Show and Tell Machine: How Television Works and Works You Over*. New York: Dell, 1978.

Goldsmith, William M. *The Growth of Presidential Power: A Documented History*. 3 Vols.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74.

Goleman, Daniel. "The Aging Mind Proves Capable of Lifelong Growth." *The New York Times*, 21 Feb. 1984.

Goodale, Jane C. *Tim's Wives: A Study of the Women of Melville Island*.

- North Australia*.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 Goodhart, G. J., A. S. C. Ehrenberg, and M. A. Collins. *The Television Audience: Patterns of Viewing*. Farnborough, England: Saxon House, 1975.
- Goodman, Nancy T. "Children Are Family, Too!" *Nursing Management*, June 1982, pp. 52-54.
- Goodman, Walter. "Of Mice, Monkeys and Men." *Newsweek*, 9 Aug. 1982, p. 61.
- Goody, Jack, ed.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 Goody, Jack, and Ian Watt,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 (1963), 304-345.
- Gorvine, Beverly, et al. *Health Care of Women: Labor and Delivery*. Belmont, CA: Wadsworth, 1982.
- Greenhouse, Linda. "Pragmatism Brings Changes in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The New York Times*, 18 Feb. 1979.
- Greenstein, Fred. "Popular Images of the President." In *The Presidency*. Ed. Aaron Wildavsk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9, pp. 287-296.
- Greer, Germaine. *The Female Eunuch*. New York: Bantam, 1972.
- Gregory, Michael, and Susanne Carroll. *Language and Situation: Language Varietie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Gremillion, David H. "The Child Visitor: A Hospital Hazard?" *Forum on Medicine*, Sept. 1980, pp. 566-567.
- Greven, Philip J., Jr. *Four Generations: Population, Land, 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 Massachuset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1970.
- Grimes, Alan P. *The Puritan Ethic and Woman Suffrage*.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67.
- Gross, Larry, and Suzanne Jeffries-Fox. "'What Do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Grow Up, Little Girl?'" In *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 Ed. Gaye Tuchman, Arlene Kaplan Daniels, and James Benét.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8, pp. 240-265.
- Grove, Andrew S. "Breaking the Chains of Command." *Newsweek*, 3 Oct. 1983, p. 23.
- The Alan Guttmacher Institute. *Teenage Pregnancy: The Problem That*

- Hasn't Gone Away*. New York: Alan Gutmacher Institute, 1981.
- Gwertzman, Bernard. "Ramsey Clark Mission Tests Law." *The New York Times*, 3 June 1980.
- Gwynne, Peter, and Sharon Begley. "Animals in the Lab." *Newsweek*, 27 March 1978, pp. 84-85.
- Hacker, Helen M. "Women as a Minority Group." *Social Forces*, 30(1951), 60-69.
- Hahn, Dan F., and Ruth M. Gonchar. "Political Myth: The Image and the Issue." *Today's Speech*, 20, No. 3(1972), 57-65.
- Halberstam, David. "The Coming of Carter." *Newsweek*, 19 July 1976, p. 11.
- Halberstam, David. *The Powers That Be*. New York: Dell, 1980.
- Hall, Edward. *The Silent Language*. New York: Doubleday, 1959.
- Hall, Edward. *The Hidden Dimens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 Hall, Elizabeth. "Acting One's Age: New Rules for Old—Bernice Neugarten Interviewed." *Psychology Today*, April 1980, pp. 66;68;70;72;74;77-78; 80.
- Handler, David. "Now the Playmates Move But will America Pay to Watch?" *TV Guide*, 25 June 1983, pp. 45-48.
- Haney, Craig, Curtis Banks, and Philip Zimbardo. "Interpersonal Dynamics in a Simulated P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 69(1973), 69-97.
- Harre, Rom, and Paul F. Secor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Totowa, NJ: Littlefield, Adams & Co., 1973.
- Harris, Louis. "Public Support for ERA Soars as Ratification Deadline Nears." *The Harris Survey*, 6 May 1982.
- Havelock, Eric A.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63.
- Havelock, Eric A. *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Toronto: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1976.
- Hayes, Donald S., and Dana W. Birnbaum. "Preschoolers' Retention of Televised Events: Is a Picture Worth a Thousand Word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6 (1980), 410-416.
- Hearst, Patricia Campbell, with Alvin Moscow. *Every Secret Thing*. New York: Doubleday, 1982.
- Heath, Jim F. *Decade of Disillusionment: The Kennedy-Johnson Yea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75.
- Hendrick, Grant H. "When Television is a School for Criminals." *TV Guide*,

- 29 Jan. 1977, pp. 4-10.
- Herbers, John. "Interest Groups Gaining Influence at the Expense of National Parties." *The New York Times*, 26 March 1978.
- Hiebert, Ray E., Donald F. Ungurait, and Thomas W. Bohn. *Mass Media III: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Longman, 1982.
- Hilgard, Ernest R., Rita L. Atkinson, and Richard C. Atkinso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7th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 Himmelweit, Hilde T., A. N. Oppenheim, and Pamela Vince. *Television and the Child: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Television on the Young*.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58.
- "Hinckley's Last Love Letter." *Newsweek*, 13 April 1981, p. 35.
- Holt, John. *Escape from Childhood*. New York: Dutton, 1974.
- Horton, Donald, and R. Richard Wohl.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 *Psychiatry*, 19 (1956), 215-229.
- Hotchner, Tracy.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A Complete Guide to a New Life*. New York: Avon, 1979.
- Hoult, Thomas Ford, ed. *Dictionary of Modern Sociology*. Totowa, NJ: Littlefield, Adams & Co., 1969.
- Howitt, Dennis. *The Mass Media and Social Problems*. Oxford: Pergamon, 1982.
- Hughes, Michael, and Walter R. Gove. "Living Alon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No. 1 (1981), 48-74.
- Hunt, David.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History: The Psychology of Family Lif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 Hymes, Dell.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Sett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3, No. 2 (1967), 8-28.
- "I'll Whip His Ass." *Newsweek*, 25 June 1979, p. 40.
- Innis, Harold A.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Rpt. of 1951 edition with new introduction by Marshall McLuhan.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1964.
- Innis, Harold A.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Rev. ed.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1972.
- "Inside Looking Out." *Time*, 13 Sept. 1982, pp. 42-55.
- Jackson, J. A., ed. *Ro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2.

James, William.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Henry Holt, 1890.

Janeway, Elizabeth. *Man's World, Woman's Place: A Study in Social Mythology*. New York: Dell, 1971.

Janeway, Elizabeth. *Between Myth and Morning: Women Awakening*. New York: Morrow, 1974.

Joblin, Judith. "The Family Bed." *Parents*, March 1981, pp. 57-61.

Johnson, Haynes. "Initial Reaction on Hill Divided Along Party Lines." In *The Presidential Transcripts: With Commentary by the Staff of The Washington Post*. New York: Dell, 1974, pp. xvii-xix.

Johnston, Lloyd D., Jerald G. Bachman, and Patrick M. O'Malley. *Student Drug Use in America, 1975-1981*. Rockville, MD: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81.

Jones, Ernest.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 2.: Years of Maturity, 1901-1919*.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5.

Jordan, Hamilton. *Crisis: The Last Year of the Carter Presidency*. New York: Putnam's, 1982.

Karpel, Craig S. "Cartergate V: The First Hundred Lies of Jimmy Carter." *Penthouse*, April 1978, pp. 52-58; 164-170; 174-181.

Katz, Elihu, Jay G. Blumler, and Michael Gurevitch. "Utiliz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by the Individual." In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Ed. Jay G. Blumler and Elihu Katz.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4, pp. 19-32.

Keerdoja, Eileen, Ron Moreau, and Jerry Buckley. "David Dellinger's Life of Protest." *Newsweek*, 11 July 1983, p. 9.

Kessen, William. "The American Child and Other Cultural Inven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Oct. 1979, pp. 815-820.

Kett, Joseph F. "Growing Up in Rural New England, 1800-1840." In *Anonymous Americans: Exploratio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 History*. Ed. Tamara K. Hareve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pp. 1-16.

Kett, Joseph F. "Curing the Disease of Precocity." In *Turning Points: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Essays on the Family*. (Supplement to Vol. 84 o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Ed. John Demos and Sarane Spence Boocock.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 S183-S211.

Kiefer, Monica. *American Children Through Their Books: 1700-1835*.

-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8.
- Kihss, Peter. "A Manual Warns Social Workers of Extension of Children's Rights." *The New York Times*, 2 July 1978.
- Kihss, Peter. "2 Children in Foster Care Named to City Panel to Improve System." *The New York Times*, 11 June 1979.
- Kleiman, Carol. "Our Fortune 200." *Ms.* Aug. 1982, p. 45.
- Kleiman, Dena. "Reopening of 'People's Firehouse' Is Celebrated." *The New York Times*, 18 June 1978.
- Kozol, Jonathan. "Operation Illiteracy." *The New York Times*, 5 March, 1979.
- Kubler-Ross, Elisabeth. *On Death and Dy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 Kuhn, Anne L. *The Mother's Role in Childhood Education: New England Concepts, 1830-1860*.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1947.
- Kuhns, William. *The Post-Industrial Prophets: Interpretations of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Langer, Susanne K.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A Study in the Symbolism of Reason, Rite, and Art*. 3r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57.
- Langway, Lynn, et al. "A Nation of Runaway Kids." *Newsweek*, 18 Oct. 1982, pp. 97-98.
- Langway, Lynn, et al. "Bringing Up Superbaby." *Newsweek*, 28 March 1983, pp. 62-68. (a)
- Langway, Lynn, et al. "Showdown on Smoking." *Newsweek*, 6 June 1983, pp. 60-63; 67. (b)
- Laslett, Peter. *The World We Have Lost*. New York: Scribner's, 1965.
- Lazarsfeld, Paul F., and Robert K. Merton.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In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v ed. Ed. Wilbur Schramm and Donald F. Roberts.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71, pp. 554-578.
- Leboyer, Frederick. *Birth Without Violence*. New York: Knopf, 1975. (French edition, 1974)
- Leibetter, Les. "More and More, Voters Write Law." *The New York Times*, 30 Oct. 1977.
- Lee, Richard B., and Irvn DeVore, eds. *Man the Hunter*. Chicago: Aldine, 1968.
- Leifer, Aimee Dorr, Neal J. Gordon, and Sherryl Browne Graves. "Children's Television: More Than Mere Entertainment."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4(1974), 213-245.

- Lerner, Michael A., Eleanor Clift, and Thomas M. DeFrank. "Presidential Fatigue?" *Newsweek*, 16 May 1983, p. 30.
- Levine, Arthur. *When Dreams and Heroes Died: A Portrait of Today's College Student*.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1980.
- Levine, Suzanne and Harriet Lyons, eds. *The Decade of Women: A Ms. History of the Seventies in Words and Pictures*. New York: Paragon, 1980.
- Levinson, Daniel J., et al. *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 New York: Knopf, 1978.
- Levinson, Paul. "Human Replay: A Theory of the Evolution of Media." Diss. New York Univ. 1979.
- Levinson, Paul. "What Technology Can Teach Philosophy: Ruminations Along Kantian/Popperian Lines." In *In Pursuit of Truth: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Ed. Paul Levins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1982, pp. 157-155.
- Levy, Mark R. "Watching TV News as Para-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3 (1979), 69-80.
- Levy, Mark R. "The Time-Shifting Use of Home Video Recorder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7 (1983), 263-268.
- Lewis, Flora. "U. S. Is Said to Agree with Hanoi on Framework of a Cease-Fire; North Vietnam Discloses Plan." *The New York Times*, 26 Oct. 1972.
- Lieberman, Jethro K. *The Litigious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 Lincoln, Alan, and Murray A. Straus. *Crime and the Family*.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forthcoming.
- "Lost Identity." *Time*, 26 April 1982, p. 24.
- Lukas, J. Anthony. *Nightmare: The Underside of the Nixon Years*. New York: Viking, 1976.
- Luria, A. R. *Cognitive Development: Its Cultur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Trans. Martin Lopez-Morillas and Lynn Solotaroff. Ed. Michael Co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Russian edition, 1974)
- Lyman, Stanford M., and Marvin B. Scott. *A Sociology of the Absur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Crofts, 1970.
- Lyons, Richard D. "Refusal of Many to Heed Government Health Advice is Linked to Growing Distrust of Authority." *The New York Times*, 12 June 1977.

- McAnany, Emile G., Jorge Schnitman, and Noreene Janus, ed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Media Research*. New York: Praeger, 1981.
- McGinley, Phyllis. *Sixpence in Her Shoe*.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 McGrath, Peter, Thomas M. DeFrank, and Eleanor Clift, "A Disengaged Presidency." *Newsweek*, 7 Sept. 1981, pp. 21-23.
- McGrath, Peter, Eleanor Clift, and Thomas M. DeFrank. "20 Months, 12 Vacations." *Newsweek*, 6 Sept. 1982, p. 18.
- Machiavelli, Niccolò. *The Prince*. Trans. Luigi Ricci. Rev. E. R. P. Vincen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2. (Italian edition, 1532)
- McHugh, Peter. *Defining the Situation: The Organization of Mean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8.
- McLachlan, James. *American Boarding Schools: A Historical Study*. New York: Scribner's, 1970.
- McLaughlin, Mary Martin. "Survivors and Surrogates: Children and Parents from the Ni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Ed. Lloyd deMause. New York: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pp. 101-181.
- McLuhan, Marshall.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1962.
-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 McLuhan, Marshall, and Barrington Nevitt. *Take Today: The Executive as Dropou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 McMorrow, Fred. *Jimmy: The Candidacy of Carter*. New York: Whirlwind, 1976.
- McWilliams, Nancy. "Contemporary Feminism, Consciousness-Raising, and Changing Views of the Political." In *Women in Politics*. Ed. Jane L. Jaquette. New York: Wiley, 1974, pp. 157-170.
- Maeroff, Gene L. "Diplomas May Be Earned By Excellence at Real Life." *The New York Times*, 13 March 1977.
- Magnusson, David, ed. *Toward a Psychology of Situations: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Hillsdale, NJ: Erlbaum, 1981.
- Malinowski, Bronislaw. "Culture."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4 (1931), 621-646.
- Mandelbaum, Michael. "Vietnam: The Television War." *Daedalus*, 111, No. 4

(1982), 157-169.

Mankiewicz, Frank, and Joel Swerdlow, *Remote Control: Television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Ballantine, 1979.

Marbach, William, et al. "Beware Hackers at Play." *Newsweek*, 5 Sept. 1983, pp. 42-46; 48.

Marks, Jane. "Welcome Mat in the Maternity Ward." *McCall's*, Aug. 1978, p. 68.

Marshall, Lorna. *The Kung of Nyae Nyae*.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76.

Mast, Geral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ovies*. 3rd ed.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81.

Mathews, Tom. "Reagan's Close Call." *Newsweek*, 13 April 1981, pp. 31-38.

Mathews, Tom, and James Doyle. "Fritz and Company." *Newsweek*, 10 Jan. 1977, pp. 16-17.

Mathews, Tom, et al. "Lennon's Alter Ego." *Newsweek*, 22 Dec. 1980, pp. 34-35.

Mayer, Martin. "The Telephone and the Uses of Time." In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 Ed. Ithiel de Sola Poo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7, pp. 225-245.

Mead, George Herbert.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Ed. Charles W. Morri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34.

Mead, Margaret. "Implications of Insight - II." In *Childhood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 Eds. Margaret Mead and Martha Wolfenstei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5, pp. 449-461.

Mead, Margaret. *Male and Female: A Study of the Sexe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Dell, 196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9)

Mead, Margaret.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0.

Mehrabian, Albert. *Silent Messages*. Belmont, CA: Wadsworth, 1971.

Melody, William H., Liora Salter, and Paul Heyer, eds.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Dependency: The Tradition of H. A. Innis*. Norwood, NJ: Ablex, 1981.

Merton, Robert 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Messaris, Paul, and Carla Saret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elevision Related

-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7 (1981), 226-244.
- Meyrowitz, Joshua.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personal Distances to Television Shot Selection." Masters Thesis, Queens College 1974. (ERIC, ED 210 734)
- Meyrowitz, Joshua. "Television and Interpersonal Behavior: Codes of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In *Inter/Media: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a Media World*. Ed. Gary Gumpert and Robert Cathcart.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9, pp. 56-76.
- Meyrowitz, Joshua. "Analyzing Media: Metaphors as Methodolog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ew England Conference on Teaching Students to Think, Amherst, MA, November 1980. (ERIC, ED 206 030)
- Mickelson, Sig. *The Electric Mirror: Politics in an Age of Television*. New York: Dodd, Mead & Co., 1972.
- Millett, Kate.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Ballantine, 197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0)
- Mischel, Walter.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Wiley, 1968.
- Mohr, Phillip J. "Efficacy of the Family Viewing Concept: A Test of Assumptions."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0(1979), 342-351 (a)
- Mohr, Phillip J. "Parental Guidance of Children's Viewing of Evening Television Program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3(1979), 213-228. (b)
- Monahan, John, and Laurens Walker. *Social Science in Law: Cases, Materials and Problems*. Mineola, NY: Foundation, forthcoming.
- Montagu, Ashley. *Growing Young*.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 Montgomery, Paul L. "Throngs Fill Manhattan in Arms Protest." *The New York Times*, 13 June 1982.
- Moore, Gary. "What America is Really Like." *Newsweek*, 10 April 1978, p. 23.
- Moore, Wilbert E. *Social Change*.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4.
- "More Rights for Children; What an Expert Say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31 Oct. 1977, p. 33.
- Morganthau, Tom, Eleanor Clift, and Thomas M. DeFrank. "Master of the Media." *Newsweek*, 18 June 1984, p. 25.
- Morganthau, Tom, Thomas M. DeFrank, and Eleanor Clift. "The Leaks at the White House." *Newsweek*, 4 April 1983, pp. 23, 27.

- Mount, Ferdinand. *The Theatre of Politics*. New York: Schocken, 1973.
-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4)
- Murray, John P. *Television and Youth: 25 Years of Research and Controversy*. Boys Town, NB: Boys Tow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Youth Development, 1980.
-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Excerpts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Abuse*; 1979. Rockville, MD: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80.
- Neiman, Lionel J., and James W. Hughes. "The Problem of the Concept of Role: A Re-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Social Forces*, 30(1951), 141-149.
- Neugarten, Bernice L. "Age Distinction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Chicago Kent Law Review*, 57(1981), 809-825.
- Nevins, Allan. *Grover Cleveland: A Study in Courage*. New York: Dodd, Mead & Co., 1932.
- Newfield, Jack. "The Media: Kennedy Obsession and Carter Protection." *The Village Voice*, 31 Dec. 1979, pp. 15-17.
- Nie, Norman H.,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76.
- A. C. Nielsen. *Nielsen Report on Television*. Northbrook, IL: A. C. Nielsen Co. (An edition of this booklet is published every year.)
- "Nielsen Gets First Good Grip on Cable and Viewing Levels." *Broadcasting Age*, 4 Aug. 1980, pp. 27-28.
- Nigro, Georgia, and Ulric Neisser. "Point of View in Personal Mem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15(1983), 467-482.
- Noble, Grant. *Children in Front of the Small Screen*.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5.
- Norback, Craig T., and Peter G. Norback, eds. *TV Guide Almanac*. New York: Ballantine, 1980.
- Novak, Michael. *Choosing Our King: Powerful Symbols in Presidential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 Oakley, Ann. *Sex, Gender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 O'Connor, John J. "TV: A Full Day at the White House." *The New York Times*, 14 April 1977.
- Oelsner, Lesley. "High Court Upholds U. S. Control Over Papers and Tapes of Nixon." *The New York Times*, 29 June 1977.

- Ogburn, William F. *On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Selected Papers*. Ed. Otis Dudley Dunca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4.
- O'Kelly, Charlotte G. *Women and Men in Society*.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80.
- Oliphant, Thomas; "Why Is That Man on the Television Always Shouting?" *The Boston Globe*, 2 May 1980.
- O' Neill, Lois Decker, ed. *The Women's Book of World Records and Achievements*. New York: Anchor, 1979.
- Ong, Walter J.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Some Prolegomena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 1967.
- Ong, Walter J. *Rhetoric, Roma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Expression and Culture*. Ithaca, NY, 1971.
- Ong, Walter, J. *Interfaces of the Word: Studies in 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1977.
- Ong, Walter J.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New York: Methuen, 1982.
- Ortner, Sherry B.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Ed.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1974, pp. 67-87.
- Papert, Seymour. *Mindstorms: Children, Computers, and Powerful Idea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 Parsons, Talcott.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Rev.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
- Parsons, Talcott, and Robert F. Bales.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5.
- Pauly, David, and Nadine Joseph. "High Tech's Challenge." *Newsweek*, 5 Sept. 1983, p. 53.
- Pervin, Lawrence A. *Current Controversies and Issues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Wiley, 1978. (a)
- Pervin, Lawrence A. "Definitions, Measurement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Stimuli, Situations, and Environments." *Human Ecology*, 6(1978), 71-105. (b)
- Pick, Grant. "The Anchorboy Falls Off His Chair, the Anchorgirl Shoots Spitballs." *TV Guide*, 14 Nov. 1981, pp. 45-46.
- Pillitteri, Adele. *Maternal-Newborn Nursing: Care of the Growing Family*. 2n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81.

"Playboy Interview: Barbra Streisand." *Playboy*, October 1977, pp. 79-82; 87-92; 95-98; 100; 102; 104; 106-107; 193-194; 197-200.

"Playboy Interview: Marshall McLuhan." *Playboy*, March 1969, 53-54; 56; 59-62; 64-66; 68; 70; 72; 74; 158.

"Playboy Interview: Patricia Hearst." *Playboy*, March 1982, 69-70; 74; 76; 84; 86; 88-89; 91-93; 96; 98; 100.

Pogrebin, Lety Cottin. *Growing Up Free: Raising Your Child in the 1980s*. New York: Bantam, 1981.

Popenoe, David. *Sociology*. 4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0.

Popper, Karl.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Beacon, 1957.

Postman, Neil.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 New York: Delacorte, 1979.

Postman, Neil.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New York: Delacorte, 1982.

"The Private Life of Gwyned Filling." *Life*, 3 May 1948, pp. 103-114.

Purcell, Susan Kaufman. "Ideology and the Law: Sexism and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In *Women in Politics*. Ed. Jane L. Jaquette. New York: Wiley, 1974, pp. 131-154.

Quint, Bert. "Television and the Pope—A Perfect Match." *TV Guide*, 29 Sept. 1979, pp. 4-6; 8.

Read, Piers Paul. *Atuei: The Story of the Andes Survivor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74.

Reed, John R. *Victorian Conventions*. Athens, OH: Ohio Univ. Press, 1975.

Reedy, George E. *The Presidency in Flux*.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73.

Reedy, George E. "A Symbol is Worth More Than a Thousand Words." *TV Guide*, 31 Dec. 1977, pp. 2-5.

Remarque, Erich Maria.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Trans. A. W. Whee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29. (German edition, 1928)

Rich, Adrienne.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Bantam, 1977.

Rielly, John E. "The American Mood: A Foreign Policy of Self-Interest." *Foreign Policy*, 34 (1979), 74-86.

Riley, Matilda White. "Aging, Social Change, and the Power of Ideas." *Daedalus*, 107, No. 4 (1978), 39-52.

- Rintels, David W. "Why We Fought the Family Viewing Hour." *The New York Times*, 21 Nov. 1976.
- Ritchie, Oscar W., and Marvin R. Koller. *Sociology of Childhoo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4.
- Rivard, Kathy. "One Way to Head Off Sibling Rivalry: Involv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Birth." (Associated Press) *Fosters Daily Democrat*, 11 Aug. 1980.
- Rohrbaugh, Joanna Bunker. *Women: Psychology's Puzzl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 Roper Organization. *Trends in Attitudes Toward Television and Other Media: A Twenty-Four Year Review*. New York: Television Information Office, 1983.
- Rosaldo, Michelle Zimbalist.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A Theoretical Overview." In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Ed.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1974, pp. 17-42.
- Rosaldo, Michelle Zimbalist, and Louise Lamphere, 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1974.
- Rosenthal, Raymond, ed. *McLuhan, Pro and Con*.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68.
- Rosenthal, Robert, and Ralph L. Rosnow, eds. *Artifact in Behavioral Research*. New York: Academic, 1969.
- Rosenthal, Robert, and Ralph L. Rosnow, eds. *The Volunteer Subject*.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75.
- Rosnow, Ralph L. *Paradigms in Transitio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81.
- Rosnow, Ralph L. "Von Osten's Horse, Hamlet's Question, and the Mechanistic View of Causality: Implications for a Post-Crisis Social Psychology." *The 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 4(1983), 319-337.
- Ross, James Bruce. "The Middle Class Child in Urban Italy, Fourteenth to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Ed. Lloyd deMause. New York: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pp. 183-228.
- Rossi, Alice S., ed. *The Feminist Papers: From Adams to de Beauvoir*.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73.
- Roszak, Theodore. "The Summa Popologica of Marshall McLuhan." In *McLuhan: Pro and Con*. Ed. Raymond Rosenthal.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68, pp. 257-269.

Rothenberg, Alan B. "Why Nixon Taped Himself: Infantile Fantasies Behind Watergate."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 62, No. 2 (1975), 201-223.

Rothman, Sheila M. *Woman's Proper Place: A History of Changing Ideals and Practices, 187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Salomon, Gavriel. *Interaction of Media, Cognition, and Learning: An Exploration of How Symbolic Forms Cultivate Mental Skills and Affect Knowledge Acquisi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9.

Sancton, Thomas A. "He Dared to Hope." *Time*, 4 Jan. 1982, pp. 13-20; 22-26.

Schardt, Arlie, et al. "TV's Rush to Judgment." *Newsweek*, 28 July 1980, pp. 72; 75.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73.

Schofield, R. S. "The Measurement of Literac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In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Ed. Jack Goo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8, pp. 311-325.

Schramm, Wilbur. *Men, Messages,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Schramm, Wilbur, and Donald F. Roberts, eds.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v. ed.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71.

Schudson, Michael. "The Politics of Narrative Form: The Emergence of News Conventions in Print and Television." *Daedalus*, 111, No. 4 (1982), 97-112.

Schwartz, Tony. *The Responsive Chord*. Garden City, NY: Anchor, 1974.

Sennett, Richard.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Knopf, 1977.

Settel, Irving. *A Pictorial History of Radio*.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7.

Shapiro, Walter, et al. "Testing Time: 'Reagan Was Reagan.'" *Newsweek*, 7 Nov. 1983, pp. 80; 82.

Shatz, Marily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77: Soci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Ed. Charles Blake Keasey. Lincoln: Univ. of Nebraska Press, 1977, pp. 1-42.

Shatz, Marilyn, and Rachel Gelma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Modifications in the Speech of Young Children as a Function of

- Listener.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Serial No. 152, Vol. 38, No 5 (October 1973).
- Shaver, Phillip. "The Public Distrust," *Psychology Today*, Oct. 1980, pp. 44; 46; 48-49; 102.
- Shayon, Robert Lewis. *Television and Our Childre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51.
- Sheehy, Gail. *Passages, Predictable Crises of Adult Life*. New York: Dutton, 1976.
- Shorter, Edwar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 Siegel, Linda S. "The Relationship of Language and Thought in the Preoperational Child: A Reconsideration of Nonverbal Alternatives to Piagetian Tasks." In *Alternatives to Piaget: Critical Essays on the Theory*. Ed. Linda S. Siegel and Charles J. Brainerd. New York: Academic, 1978, pp. 43-68.
- Siegel, Linda S., and Charles J. Brainerd, eds. *Alternatives to Piaget: Critical Essays on the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1978.
- Sitkoff, Harvard.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1954-1980*. New York: Hill & Wang, 1981.
- Slack, Jennifer Daryl, and Martin Allor. "On the Polit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Constituents of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 No. 3(1983), 208-218.
- Small, William J.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Press*. New York: Norton, 1972.
- Smith, Timothy G., ed. *Merriman Smith's Book of Presidents: A White House Memoir*. New York: Norton, 1972.
- Sommer, Robert. *Personal Space: The Behavioral Basis of Desig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9.
- Sommerville, C. John.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ldhood*.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2.
- Sorensen, Theodore C. *Kenned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 Spanier, Graham B. "Married and Unmarried Cohabi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0,"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1983), 277-288.
- Spencer, Metta.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y*.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9.
- Sprafkin, Joyce N., and Robert M. Liebert. "Sex-Typing and Children's Television Preferences." In *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 Women in the*

- Mass Media. Ed. Gaye Tuchman, Arlene Kaplan Daniels, and James Benét.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8, pp. 228-239.
- Starr, Bernard D., and Marcella Bakur Weiner. *The Starr-Weiner Report on Sex and Sexuality in the Mature Years*.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 Starr, Mark, John Carey, and Madlyn Resener. "Give Peace a Chance." *Newsweek*, 21 June 1982, pp. 40-41.
- Starr, Paul.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 Steele, Richard, et al. "What Damage to Carter." *Newsweek*, 19 Sept., 1977, pp. 24-27; 29-30; 35.
- Steinberg, S. H.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3rd ed, Rev. James Moran.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74.
- Steinem, Gloria. "Introduction." In *Decade of Women: A Ms. History of the Seventies in Words and Pictures*. Ed. Suzanne Levine and Harriet Lyons. New York: Paragon, 1980, pp.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 Steinzor, Bernard. "The Spatial Factor in Face to Face Discussion Group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1950), 552-555.
- Stier, Serena. "Children's Rights and Society's Duti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4, No. 2(1978), 46-58.
- Stone, Lawrenc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 Strasser, Steven, et al. "Reagan's Secrecy Campaign." *Newsweek*, 26 Sept. 1983, p. 38.
- Strasser, Steven, John Walcott, and Thomas M. DeFrank. "Reagan and China: Afterglow." *Newsweek*, 14 May 1984, pp. 22-23.
- Stuart, Reginald. "Cleveland to Use Questionnaires to Determine Obscenity Standard." *The New York Times*, 13 June 1977.
- Sunley, Robert.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on Child Rearing." In *Childhood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 Ed. Margaret Mead and Martha Wolfenstei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5, pp. 150-167.
- Takanishi, Ruby. "Childhood as a Social Issue: Historic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Child Advocacy Movemen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4, No. 2(1978), 8-28.
- Tannenbaum, Percy H., and Wendy A. Gibso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for Change." In *Children and the Faces of Television: Teaching, Violence,*

- Selling*. Ed. Edward L. Palmer, and Aimée Dorr. New York: Academic, 1980, pp. 201-218.
- Teitelbaum, Michael S., ed. *Sex Differences: Social and Bi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Anchor, 1976.
- Television Audience Assessment, Inc. *Executive Summary: The Audience Rates Television*. Cambridge, MA: Television Audience Assessment, 1983.
- Terman, Lewis M., and Maud A. Merrill. *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 Manual for Third Revision, Form L-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 Thomae-Forgues, Maria E., and Xenia Tonesk. "Datagram: 1979-1980 Enrollment in U. S. Medical Schools."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55 (1980), 1042-1044.
- Thomas, William I. *The Unadjusted Girl: With Cases and Standpoint for Behavior Analysi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25.
- Thomas, William I., and Dorothy Swaine Thomas. *The Child In America: Behavior Problems and Programs*. New York: Knopf, 1928.
- "Thunder from the Heartland." *Newsweek*, 20 May 1974, pp. 24-25.
- Tiger, Lionel. *Men in Group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 Townley, Rod. "The Mystery of the Unloved Channel Lock." *TV Guide*, 27 Nov. 1982, pp. 33-34.
- Tuchman, Gaye, Arlene Kaplan Daniels, and James Benét, eds. *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8.
- Turnbull, Colin M. *The Forest Peop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1.
-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72nd Ed.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1.
-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2-1983, 103rd Ed.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elevision and Behavior: Ten Year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Eighties*. Rockville, MD: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1982.
-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Higher Education Guidelines, Executive Order 11246*.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72.
- Vanderbilt, Amy. *Amy Vanderbilt's Everyday Etiquette*. 2nd rev. ed. New

York; Bantam, 1970.

Van Dyke, Charlotte. "Family-Centered Health Care Recognizes Needs of Patients, Families, Employees." *Hospital Progress*, Aug. 1980. pp. 54-57;68.

van Gennep, Arnold. *The Rites of Passage*. Trans. Monika B. Vizedom and Gabrielle L. Caffe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0. (French edition, 1909)

Vetterling-Braggin, Mary, ed. "Femininity," "Masculinity," and "Androgyny": A Modern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Totowa, NJ; Littlefield, Adams & Co. , 1982.

Viguerie, Richard A. *The New Right; We're Ready to Lead*. Rev. ed. Falls Church, VA; 1981.

Wackman, Daniel B. , and Ellen Wartella. "A Review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and the Implication for Research on Children's Responses to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4, No. 2 (1977) , 203-224.

"Wanted: A Pen Pal for the Ayatollah." *Newsweek*, 15 Sept. , 1980, pp. 97 and 99.

Warren, Mary Anne. "Is Androgyny the Answer to Sexual Stereotyping?" In "Femininity," "Masculinity," and "Androgyny": A Modern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Ed. Mary Vetterling-Braggin. Totowa, NJ; Littlefield, Adams & Co. , 1982, pp. 170-186.

Wartella, Ellen, ed. *Children Communicating: Media and Development of Thought, Speech, Understanding*.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Waters, Harry F. , and Betsy Carter. "'Holocaust' Fallout." *Newsweek*, 1 May 1978, p. 72.

Waters, Harry F. , et al. "TV News Under the Gun." *Newsweek*, 13 April 1981, pp. 104;107.

Watson, Russell, et al. "A Death in Rome." *Newsweek*, 9 Oct. 1978, pp. 70;74-76.

Watts, William. "The Future Can Fend for Itself." *Psychology Today*, Sept. 1981, pp. 36-48.

Watzlawick, Paul, Janet Helmick Beavin, and Don D. Jackson.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 New York; Norton, 1967.

Webster, James G. , and William C. Coscarelli. "The Relative Appeal to

- Children of Adult vs. Children's Television Programming."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3(1979), 437-451.
- Wector, Dixon. *The Hero in America: A Chronicle of Hero-Worship*. New York: Scribner's, 197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1)
- Weitz, Shirley. *Sex Roles: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7.
- Wellborn, Stanley N. "Ahead: A Nation of Illiterate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17 May 1982, pp. 53-56.
- Werner, Morris R. Brya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9.
- White, Sheldon, and Barbara Notkin White. *Childhood: Pathways of Discovery*. London: Harper & Row, 1980.
- White, Theodore H.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72*. New York: Atheneum, 1973.
- White, Theodore H. *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5-198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 Whitman, Alden. "Who and What is Richard Nixon?" In *The End of a Presidency*. Ed. staff of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4, pp. 9-21.
- "Who Is Ronald Reagan?" *The Boston Globe*, 11 April 1984.
- "Why 'Roots' Hit Home." *Time*, 14 Feb. 1977, pp. 69-71.
- Wiener, Norbert.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Avon, 196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0)
- Wilkie, Curtis. "Reagan in Control, Advisers Emphasize." *The Boston Globe*, 27 March 1982.
- Williams, Dennis A., Eleanor Clift, and William Schmidt, "The Klan Also Rises." *Newsweek*, 12 Jan. 1976, pp. 33-34.
- Williams, Dennis A., Lea Donosky, and Martin Kasindorf. "The Great White Hope." *Newsweek*, 14 Nov. 1977, p. 45.
- Williams, Raymo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New York: Schocken, 1975.
- "Will Nixon Resign." *Newsweek*, 20 May 1974, pp. 22-28; 31; 34; 38; 43.
- Winick, Mariann Pezzella, and Charles Winick. *The Television Experience: What Children See*.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 Winn, Marie. *Children Without Childhood*. New York: Pantheon, 1983.
- Wishy, Bernard. *The Child and the Republic: The Dawn of Modern American Child Nurture*.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8.

- Wohlwill, Joachim F. "The Age Variable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Review*, 77(1970), 49-64.
- Wolfenstein, Martha. "Introduction to Part Three." In *Childhood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 Ed. Margaret Mead and Martha Wolfenstei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5, pp. 145-149.
- Woodward, Kenneth L., Elaine Sciolino, and Christopher Matthews. "The 34 Days of John Paul I." *Newsweek*, 9 Oct. 1978, pp. 72-73.
- Woodward, Kenneth L., et al. "Living with Dying." *Newsweek*, 1 May 1978, pp. 52-56; 61. (a)
- Woodward, Kenneth L., et al. "A Pope from Poland." *Newsweek*, 30 Oct. 1978, pp. 78-82. (b)
- Yankelovich, Daniel. *New Rules: Searching for Self-Fulfillment in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 "Your Number, Please." *Corrections Compendium*, 3 No. 9 (April 1979), 1-3.